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

主编 瞿林东

SHIJI YANJIU

史記研究（上）

第二卷

分卷主编◎施丁 廉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第二卷

史記研究

（上）

SHIJI YANJIU

分卷主编 施丁 廉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研究/施丁,廉敏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

(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瞿林东主编)

ISBN 978-7-5000-8013-8

Ⅰ.史… Ⅱ.①施…②廉… Ⅲ.①中国-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Ⅳ.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0003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前期统筹 劳雅路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037
电　　话 010-88390671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38.25
字　　数 820千字
印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013-8
定　　价 118.00元

凡　例

一、本书收录范围,限于1901年至2000年中国学者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研究论文,以及有关的文章、讲话等,未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及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一般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二、本书收录原则重在学术标准。

三、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均收录全文,其标目、文字,一仍其旧,一般不作删节或节录,以存其真。

四、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其注释形式作如下处理:凡脚注(页下注)、夹注(随文注)者,一仍其旧;凡文尾注者,为读者阅读方便和全书体例大致统一起见,则移为脚注(页下注),移置中不改动其注文。

五、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一律于文末圆括号内注明其原始出处。

六、本书收录的论文、文章如系繁体字竖排者,一律改为简体字横排,并按规范加上新式标点。

七、本书各卷均包含总序、前言、目录、正文、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等几个部分:总序略述全书宗旨;前言概括本卷主要内容及问题,并对重要专著和未曾发表于报刊的重要论文作适当评介;正文与主要论著目录索引略按总论、分论分类编次,以便于阅读和检索。

总　序

瞿林东

一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二十四史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正史”的缘故。它们的重要和价值,是由其内容所决定的。唐初史学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小序,回顾了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东汉史官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撰述活动后指出:“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又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①]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正史是依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体裁即纪传体所撰写的皇朝史,或称朝代史;第二,除《史记》上记轩辕、下迄汉武是一部通史外,《汉书》记西汉历史,《东观汉记》记东汉历史,《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历史,多以“世代”断限而述其史事,所谓“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正史”的两个基本特点[②]。

---

①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②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把编年体皇朝史(朝代史)也列为“正史”,但后世少有遵循者。参见《史通·古今正史》,清人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从上引《隋书·经籍志》来看,“正史”之说当先于隋朝。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有南朝人阮孝绪所撰《正史削繁》94卷,似是根据有关正史删削而成。这是目前所知“正史”之最早的称谓。《隋书·经籍志》以下,“正史”之名历代相沿,直至清代。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称:“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①]四库馆臣把“正史”看作历代历史著作的“大纲”,认为其余14类或是“参考纪传”,或是“参考诸志”,或是“参考论赞”,尽管这一见解并不十分准确,但可以表明“正史”在诸种史书中的崇高地位。

二

20世纪伊始,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对历史学的变革和走向近代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梁启超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还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这一看法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的这个评论是不正确的,其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其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自己已经改变了对二十四史即历代正史的看法,他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讲到“人的专史”时说：“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代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①]这个说法同《新史学》对二十四史的说法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引用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讲的这番话，是为了说明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史学家，他是一个能修正自己的某些不恰当见解的史学家。同时，我们引用梁启超的这段话，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时至今日，也还有一些对二十四史抱有偏见的人，其中或许有人就是受到梁启超早年看法的影响。

当然，二十四史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因时代的局限和作史者立场、观点的局限，还有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局限，因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二十四史决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相斫书”，而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伟大记录。

---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第18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三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二十四史,如何评价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卓越贡献,是人类文化工程中的一个罕与其匹的奇迹。

二十四史的撰写,上起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历代纂修,未曾中断,各朝正史,代有所出,下迄清代官修《明史》,前后连续一千八百多年,历代史家、史官笔耕不辍,成此系列的浩大工程,这在全世界的史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朝灭亡,上下近五千年中国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中华文明之连续不断发展的伟大轨迹,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十四史作为纪传体史书,是以记述历史人物活动为主,同时记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及有关典章制度等多方面内容,实质上是古代的一种综合体史书。这种综合体史书,是古代史学家用以全面反映历史进程、历史面貌的最好形式。清代四库馆臣把“正史”称为“大纲”,把其他十四类史书看作是参考“正史”中的纪传、诸志、论赞而作,固然不恰当,但从中可以看出“正史”之全面反映历史面貌的特点和价值。

二十四史记载了大量的、社会各阶层或不同群体的历史人物,显示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中心位置。恩格斯针对欧洲的历史这样说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

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二十四史虽然也时时讲到"天命",但它客观上都是记述人的活动,它所展现的,正是无数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道德、智慧等留给后人的启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这就是一种启示。江泽民指出:

>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这是更高境界的、更加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要之,二十四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方面的历史影响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因为它是我们为之自豪

---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信》(1999年4月25日),《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的中华文明的光辉记录。历史学家顾颉刚在 1935 年指出:历代正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1]。史书重在“事实”,正史既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评价。另一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 1981 年曾对二十四史做了这样的评价:“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2]这可以看作是对二十四史的全面的评价。

四

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几代学人对二十四史做了广泛的研究和精心的整理,也可以说是研究中有整理、整理中也有研究,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其所得者专著以百数,论文则以千计。

以研究而言,至少包含考证和评论两种类型。前者如范文澜的《正史考略》,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等,都是名著;后者如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季镇淮的《司马迁》、白寿彝的《〈史记〉新论》、安作璋的《班固与〈汉书〉》等,亦皆佳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精彩之作,更是不胜枚举。考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考镜源流,正其讹误,有助于人们的阅读和研究。范文澜在《〈正史考略〉绪

---

① 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 · 序》,开明书店 1936 年版。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言》中这样写道:"《四库》区分群史,首曰正史,即糅合私修官修之二十四史而成者,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凡一十五类,而正史为之大本。兹编所述以正史为境域,过此以往,则非日力所及,不复赘述。考四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时增《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为二十有四。浩兮汗兮,非旦暮所得遍读也。文澜偏陋,未尝学史,然窃观前儒著述,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善,示我周行;窃欲九杂旧闻,缀为一编,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云。至于耳目所囿,遗落滋多,琐碎考证,例不具举。大雅君子,傥不我遐弃,幸复有以教正之。"[①]这里说的"或考源委,或正得失,美言可信",就是作者"考略"的旨趣,即"他日翻阅正史,此或为其一助",此系"考略"者之良苦用心。

白寿彝在评论《史记》一书是"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时写道:"《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妹,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

---

①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1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①]这一段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作者多年研究《史记》的心得都表达出来了，人们从作者的这些认识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史记》的伟大。

至于整理，主要也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是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精心点校。前者如顾颉刚主编的《二十五史补编》，后者如张元济等在二三十年代之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集众多学者点校二十四史，都是浩大的工程而有大益于学林。

《二十五史补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史学家们之所以要致力于这一工程，是因为："历代史书里头，表谱书志未必齐备；那原有这些门类的若干史，又往往因为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引起读者的憾惜。历来的史学家弥补这种缺失，做了许多的工作。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一是补作的工作，像钱子文作《补汉兵志》、郝懿行作《补〈宋书·食货志〉》等就是。二是校正的工作，像王元启作《〈史记〉月表正讹》、汪远孙作《〈汉书·地理志〉校本》等就是。三是考订的工作，像梁玉绳作《〈汉书·古

① 白寿彝：《〈史记〉新论》，第74—75页，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今人表〉考》、姚振宗作《〈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憾惜",编者搜求丛书和稿本,荟萃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果,定名为《二十五史补编》,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七十多年来,此书对历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序文中说:"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会禁网既弛,异书时出,因发重校正史之愿。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商务印书馆既覆印旧本行世,先后八载,中经兵燹,幸观厥成。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董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属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取阅原稿,语较详尽,更摘如干条用活字集印,备读史者之参证。管蠡所及,讵敢望王、钱二子之什一,亦聊师其意而已。"[②]以十余年的工夫,"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就是为了"备读史者之参证",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是一种什么动力? 这除了说明二十四史的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说明校史者对二十四史极其敬重和热爱,恐怕没有别的原因了。作为读者,要真正体会到校史者的这种甘苦和心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中华书局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学者们共同参与对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史学遗

---

①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载《二十五史补编》第1册书首,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② 张元济:《校史随笔》,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产整理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可以说，当今的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以及众多的史学爱好者，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对自己的重要。甚至可以认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在阅读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一步一步走向史学殿堂的。正如参与点校工作的史学家唐长孺、陈仲安所说：“二十四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照原样重印行不行呢？我们认为，那样做很不便于读者。古书既无标点，又无断句。由于句读不明而引起的误解屡见不鲜。特别是到了近代，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的变化很大，现在的青年阅读二十四史，实在是困难重重。即使中年以上有过阅读古汉语训练的人，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读懂。各史流传的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漏，给阅读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花一番工夫整理二十四史是必要的。标点便是这种工夫之一。我们按文义划分段落，区分句读，让读者易于理解。在人名、地名、书名旁加上标线，使读者易于识别。把一连串的官称、爵号、器物名称用顿号隔开，以利读者区分。把书中引用的古书、成语、文章、讲话加上引号，使读者明了。这样就使读者省出一些推敲文字的时间。”①这些话，讲得很具体，也很中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对此当有深切的体会。二十四史点校本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推进历史知识的传播，推动历史研究人才的成长，其功可谓大矣。

---

① 唐长孺、陈仲安：《点校本为读者提供方便》，见《整理二十四史工作的感想和体会》，《光明日报》1978 年 6 月 1 日。

五

20世纪的几代学人,用他们的勤奋、心血、智慧和对于二十四史的尊崇与挚爱,为后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在二十四史的研究和整理的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为了总结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推动关于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促进二十四史的广泛传播,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从数千篇研究二十四史的论文和文章中,精选出一部分,汇集成书,定名为《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予以出版,供史学工作者和广大的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和研究。本书凡十卷:第一卷《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综论》,第二、三卷《〈史记〉研究》(上下),第四卷《〈汉书〉研究》,第五卷《〈后汉书〉、〈三国志〉研究》,第六卷《〈晋书〉、"八书"、"二史"研究》,第七卷《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第八卷《〈宋史〉研究》,第九卷《辽、金、元史研究》,第十卷《〈明史〉研究》。

本书各卷主编在搜求有关论著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时间的限制和文献资料的分散,难以求全,因而遗漏在所难免,应该收录而未能收录的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对此,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并给与谅解和帮助,以裨将来再版时有所改进。

2007年9月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 言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传之于世，留芳千古。司马迁在世界文化史上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之父”。《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里程碑。

一 司马迁的时代

在迄今为止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是一个社会剧变和发展的时代，是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制确立的生机蓬勃的时代。

西周王朝衰亡，春秋战国伊始，政治变局越来越大，社会变化更为复杂，诸侯兼并更为激烈。相传西周时期有一千八百国，至战国时期只有七个大国和几个小国，最后是秦的统一。

在春秋战国大动荡的年代里，先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越王勾践等，成为霸主或企图称霸。再就是七国称雄，互相对抗，各自兼并四周小国。这时社会变化更大。有些眼光远大的政治家搞起了变法运动。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到了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历史影响极大。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耕战，申明法令，加强国君的统

治地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土地可以买卖,鼓励个体农民生产,废除贵族的传统特权,建立军功爵的制度,并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全国设立若干县,每县设有令和丞,由国君直接任免。基层实行编户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还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同时,秦在蜀地、关中大兴水利,又“西和西戎”,“远交近攻”。变法和国策正确,大大加强了秦的国力,为秦的统一开辟了道路。秦于是于公元前230年始,十年间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齐,于前221年实现了统一大业。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变化,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这时由于采矿业和冶铁技术的兴起与发展,铁制的兵器和农具已多应用,牛耕也已习见,因此而深耕细作。同时,兴修水利工程,使农业大有发展。

为了解决生产关系的矛盾,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原来村社里那种定期分配耕地的办法逐步被抛弃,农民已变成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者。其特点,就是劳动者依附于土地,以耕织结合的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

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为地主制生产关系所代替。个体农民和地主间的关系,就是封建制生产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业也有所发展。战国后期,大商人吕不韦,既善于经商,又能政治投机,竟然当上了秦国的丞相。魏国的大商人白圭以囤积居奇而著称,赵的郭纵和卓氏,齐的程郑,梁的孔氏,曹的邴氏,都以冶铁而成巨富。他们进行商品生产,并使用了奴隶。

到了秦汉时期,中国“大一统”了,封建制成长了。

秦兼并了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只存在15年(前

221 ~ 前 207)。接着楚汉相争 5 年(前 206 ~ 前 202),刘邦灭楚兴汉,才有了统一的西汉封建王朝。

秦始皇建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一整套专制的政治体制。朝廷设丞相,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还有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等九卿,管理朝廷各个行政部门。地方上,分各地为 36 郡,后增至 40 多郡,设郡守、郡尉、监御史。郡的下级设县,有县令(长)、县尉、县丞。郡县官吏的职掌,与朝廷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职掌是一致的。县的下面设乡,乡的下面设亭,最底层是什伍编户制。这是一套宝塔式的政治体制,最高是皇帝,朝廷在上层,什伍在底层。这种郡县制,不同于西周分封制,那时封国的君位是世袭的,而郡县的首长是随时任免的,那时封国是相对独立的,而郡县是朝廷监管的。

为了统一,秦始皇还命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产和交易的发展都提供了方便或促进了发展。秦始皇大力修筑水、陆道路,如以咸阳为中心的两条“驰道”和一条“直道”,直通全国各地;南方的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成为长江跟珠江流域之间的通道。这不仅是当时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秦始皇销毁兵器,消除险阻,破坏一些城郭,迁徙各地豪富于关中,多次出巡和刻石,都是为了加强统治,防止反抗。甚至焚书、坑儒,也是为了维护统治和加强专制。继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在北方扩大修筑长城,企图阻挡匈奴南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遗留下伟大的建筑工程。

秦始皇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但他又是个暴君。他不顾民生困苦,征调了大量劳动人民征戍、运输军粮、修筑长城、

兴建宫殿,造成了人民的痛苦和死亡。他严刑峻法,残酷地迫害人民,以至到了他的晚年,阶级矛盾已非常严重。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沙丘,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合谋,害死了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拥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接着赵高阴谋害死李斯,教唆二世迫害宗室、大臣,促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于是前209年,陈胜、吴广举起反秦大旗,刘邦、项羽等纷起响应。起义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终于在前207年灭了秦朝。

项羽于秦亡之后,倚仗军事优势,压制刘邦,主持分封,立十八王国,封刘邦为汉王,自封为西楚霸王,号为霸王。这是倒行逆施。刘邦在起义后,一直注意安抚百姓,又能礼贤下士,结纳豪杰,信用萧何、张良、韩信等人,于是在反楚斗争中,由弱而强,转败为胜,经过5年奋战(前206~前202),终于取得陈下之战、垓下之战等决定性胜利,穷追项羽,迫使他于乌江自刎。

刘邦、萧何、陈平、周勃、樊哙、灌婴等开创西汉王朝的人,大多出身于平民,证实了陈胜所谓王侯将相本来无种的观点。这些人掌握政权,起初减轻百姓负担,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注意各族交往;再就是逐步解除诸侯王国对朝廷的威胁。因此,汉初五六十年间,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百姓得以生存,地主经济有所发展。这时,贾谊建议积贮粮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晁错提出重农轻商和“削藩”的观点,都是适时而重要的。汉初几十年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逐步恢复了农业生产;并解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刘长、刘濞等同姓王对于朝廷的威胁,免除了王国的行政权力,削减了王国的官吏,从而加强了朝廷对王国的统治。

前139年,汉武帝即位。这位英武的君主,在汉初六七十年

经济恢复、政权巩固的基础上加强作为：

(1)他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朝廷权力。搞了所谓“推恩法”，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使其力量分散。把郡国划分为十三部，各设刺史，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在内廷设立中书机构，集中处理文书，侵夺了原属于丞相的这部分职权，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同时，在经济上，任用桑弘羊等人，采取铸新币、严禁私人铸钱，官营煮盐、冶铁，专卖盐铁，以及算缗、告缗、卖官鬻爵等一系列措施，抑制民营，打击豪富，加强掠夺敛财，也加强了专制统治。

(2)对待匈奴等少数民族，改变了汉初联姻求和的局面，多次派大将卫青、霍去病领兵大规模地出击，迫使其远徙。这样，既保卫了中原农业地区，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3)武帝为了对付匈奴，曾想联合西域大月氏等各族，派张骞两次出使，沟通了汉与西域的关系，也加强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汉与夜郎人、滇人等“西南夷”也加强了联系，在那里设置了郡县。汉与两越也加强了联系，也在那里设置了郡县。在海路方面，汉与朝鲜半岛、日本都有往来。还与印度东部及东南亚一些地区有商船通航。

(4)武帝在学术文化方面，一改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各家立言的局面，而采纳董仲舒维护“大一统”的理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思想文化的专制。

武帝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王朝，曾多次发动战争，兴修一些大的工程，巡行各地，还严刑峻法，以至其晚年时山东多有暴动，弄得内外交困。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出生和成长的。

二 司马迁的成长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或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诞生于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龙门山跨黄河两岸,其东在今山西河津县北,其西在今陕西韩城市北。所谓"河山之阳",是指那个地区的黄河之西、龙门山之南,即当时的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

司马迁的家世源远流长。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写,远的不说,自司马错为秦蜀郡守以来,几百年间,就有司马靳(从大将白起参加长平之战)为秦将,司马昌为秦"主铁官",司马无泽"为汉市长",司马喜"为五大夫",司马谈"为太史公",司马迁为谈之子。家世不算显赫,也不算清寒,可谓仕宦世家;加之家在韩原"耕牧",即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必是豪富之家,故他思想上倾向豪富。[①]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他大约在建元二、三年间迁徙到了茂陵。秦汉时期迁徙至关中(多为诸陵)者,大多是豪族或豪强、富商或家赀三百万以上者、二千石以上高官。汉武帝徙吏民于茂陵也是如此。司马谈被徙于茂陵是什么原因?就司马谈先为太史丞来看,只是秩六百石,不是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实不够格;就财富的角度来推测,恐怕不是富商,最多只是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家赀不可能达到三百万钱以上。司马迁于天汉年间遭李陵之祸时,自言"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②],家中拿不出五十万的赎罪钱。而从其仕宦之家来看,在夏阳居住了几百年,必有宗族聚居,又经营"耕牧",必有大片私有土地,其为豪族无疑。大致可

① 参考拙文《〈史记〉与秦汉豪富》,《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报任安书》。

以肯定，司马谈是因豪族而被迁徙于茂陵。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多受其父司马谈和其师长董仲舒的影响。他自言“年十岁则诵古文”。可以想见，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教育，包括诵读《诗》、《书》、《易》、《礼》、《春秋》以及《左传》、《国语》等。或说他曾从孔安国诵习古文《尚书》（《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即黄生）。黄子笃信黄老，曾于汉景帝时在朝廷与辕固生争论桀纣汤武放弑或革命的问题。司马谈曾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要旨，以为各家均有长短，惟道家最优。这与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是抵触的。司马迁将此《论六家要指》记入《太史公自序》，并发表感想，在《史记》中也有所表白，显然是受其父思想影响的。当然他也不反儒。他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推尊孔子，重视六经，只是讥刺汉代俗儒而已。

董仲舒是著名的《春秋》公羊学者。《春秋》是鲁国的史记，大约经过孔子删定，但决不是他的私修之作。《春秋》问世后，后人学而传之，出现了左氏、公羊、谷梁三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早已传世。司马迁在记事行文方面颇受其影响。公羊学传到汉代，有胡毋生、董仲舒等传人。董仲舒精于公羊学，“学士皆师尊之”[1]。他的弟子很多，有的进入仕途，有的治学撰述。司马迁曾受公羊学于董仲舒，故撰史发论颇有公羊学的味道。

司马迁很注意游历，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他掌握了一定的书本知识之后，20岁就出外游历。《太史公自序》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

① 《史记·儒林列传》。以下凡引《史记》文字，只书篇名。

照司马迁所言,他于元朔三年(前126)开始游历。王国维依据《史记》提供的一些材料,说:“考《自序》所记,亦不尽以游之先后为次。”并提出了司马迁游历各地的先后次序的看法:“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浮于沅、湘。窥九疑。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会稽,探禹穴。上姑苏,望五湖。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适淮阴。行淮、泗、济、漯。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厄困鄱、薛、彭城。过薛。适丰、沛。过梁、楚以归。适大梁之墟。”[①]此说大致可信。司马迁此行,不是走马看花,而是沿途调查访问,甚至体验生活,王鸣盛所谓“约计当有数年”[②]之说,是有道理的。这次游历,为他写史搜集了丰富的材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游历归来,司马迁“仕为郎中”。这是元狩年间(前122~前117)的事。大约在这期间或稍后,他结识了李陵、任安等人。他为郎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③]。其时可能始于元鼎六年(前111)春。当时,武帝命令驰义侯遗“征西南夷”[④],司马迁参与了这个活动。司马迁自言“西征”、“南略”,一般可以理解为负有经略西南夷的任务,具有军事性和政治性。巡视西南,了解情况,为日后写《西南夷列传》准备了真实的材料。他这次奉使,经过巴、蜀、邛、筰,参观岷山和离堆,再至“昆明”。昆明远在西洱河一带,今云南省西部地

① 《太史公行年考》。

② 《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条。

③ 《太史公自序》。

④ 《汉书·武帝纪》。

区，故后世载籍写有司马迁远至西洱河、大理的传说①。稍后于司马迁，汉还曾"遣使"十余辈往昆明地区，"出此初郡"，只是未获成功而已②。司马迁"还报命"，大约是在元封元年冬。是时武帝率领大军北巡朔方，"威震匈奴"③。司马迁便"北自龙门至于朔方"④向武帝报命。然后往见"留滞周南"的父亲，遂"见父于河洛之间"⑤。

司马迁为郎中之后，常侍从武帝。郎中，在郎官系统中最低级。郎官的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⑥。皇帝出巡，就是车驾的侍从。所以司马迁自言："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⑦。他于元封三年当了太史令之后，一般就不侍从皇帝了，但武帝进行祀神封禅之事还是要扈从的。他晚年为中书令，可能还要扈从武帝。他侍从或扈从武帝，大致是这样：(1)自元狩年间至元封三年大约十年间，有：元狩五年从至甘泉，"入寿宫侍祠神语"⑧，还暗知霍去病乘打猎之机射杀李敢的内情。元鼎四年从至三河地区，从行中得知武帝恼恨河东守接待不周，迫使其"自杀"⑨。元鼎五年冬侍从西巡，"遂逾陇，登空桐，西临祖厉河而还。……立泰畤于甘泉"⑩，得知陇西守因接待失误而畏罪"自杀"⑪。又北出

---

① 参见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大理府王案山"条。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二。
② 参考《史记·大宛列传》。
③ 《汉书·武帝纪》。
④ 《河渠书》赞。
⑤ 《太史公自序》。
⑥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⑦ 《封禅书》赞。
⑧ 《封禅书》。
⑨ 《平准书》。
⑩ 《汉书·武帝纪》。
⑪ 《平准书》。

萧关,“猎新秦中”①。元鼎六年冬侍从东巡,“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元封元年冬由朔方从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②,在桥山得知武帝探问黄帝死或仙的问题③。元封元年春夏侍从封禅及北巡,四月“登封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归于甘泉”④。元封二年侍从负薪塞宣房。“至瓠子,临决河”,负薪塞瓠子之决⑤。

司马迁自元封三年为太史令至天汉三年遭刑之十年间,扈从巡祭情况是:他官为太史令,具有神官的性质,“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凡武帝封禅祠神,当扈从和筹办。这期间,武帝的一些封禅祠神活动,大多是幸河东、泰山、甘泉、海上等地,搞那些祠后土、郊泰畤、修封祠神等老一套的事,兹不一一述列;只有两次较为重大,有必要一提:一是元封四年冬扈从北巡,“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⑥。司马迁曾自言:“余北过涿鹿。”⑦可能是指这次扈从之事。一是元封五年冬扈从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灊天柱山,自浔阳浮江……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祀祠其名山大川”⑧。这次还扈从武帝登庐山、望九江⑨。

---

① 《平准书》。
② 《汉书·武帝纪》。
③ 参考《封禅书》。
④ 《汉书·武帝纪》。参考《封禅书》、《蒙恬列传》。
⑤ 《汉书·武帝纪》。参考《河渠书》。
⑥ 《汉书·武帝纪》。
⑦ 《武帝本纪》赞。
⑧ 《汉书·武帝纪》。
⑨ 参考《河渠书》赞、《水经注》“河水”三十九。

自天汉三年为中书令之后,司马迁大概仅于天汉四年春扈从武帝于甘泉一次。《报任安书》所谓“会东从上来”,指的就是从甘泉返回长安。

司马迁多年游历或扈从,有重大的收获和重要的意义,主要是:(1)开阔了眼界,胸怀祖国,故有称“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故他能写下了当时具有世界史性的著作;(2)增长了学识,故治史能由表及里,探究真相;(3)深知人情世故。明白贫富对立,理解了社会,才真正懂得历史;(4)抚今思古,忧国忧民,故“述往事,思来者”①。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官至太史公。曾记载过一些近世史事。元封元年春“留滞周南”,不能参与封禅泰山之事,“故发愤且卒”。司马迁奉使西南返回,见父于河洛之间。父谈“执迁手而泣”,谆谆遗嘱:司马氏祖先是“周室之太史”,“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孝在于立身“以显父母”,周公“能歌文武之德”,孔子“论《诗》、《书》,作《春秋》”,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现在“汉兴,海内一统”,好人好事多有,“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他嘱咐儿子继承和发扬所撰述历史的事业。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一定遵从教导,“弗敢阙”②。司马迁还谈到其父对他另一有关的重要教导:“先人(指父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③他觉得,遵从父教承担史学事业,责无旁贷。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为太史令,“纳史记石室金匮之

---

①②③ 《太史公自序》。

书”[1]。他认真地阅读皇家收藏的图书档案文件资料，在文献方面更为撰史打下扎实的基础和具有必要的条件。

太初元年，司马迁参与修订新的历法。这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一朔望月等于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天汉三年(前98)春，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受腐刑。天汉二年秋，李陵自告奋勇，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遭遇匈奴主力骑兵，英勇奋战，终因兵力悬殊而兵败降敌。汉武帝为此恼怒，廷臣震恐。司马迁因武帝召问，乘机为李陵辩说，说李陵“有国士之风”，“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武帝“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于是对司马迁处以“腐刑”[2]。武帝为何认为“欲沮贰师”呢？问题就在于同时“贰师功少”[3]。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所宠的大舅子，司马迁“推言陵功”[4]，像是“欲沮贰师”，故武帝有了想法。据班固记载：天汉二年，“汉使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使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单于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5]按此粗略计算：李陵带步兵五千，损失十分之九，杀敌万余，则是以一抵三，杀伤过当。李广利带骑兵三万，损失十分之七，俘杀虏万余，则是四以抵三，得不偿失。据此来论功过，司马迁“推言陵功”是可以理

---

① 《太史公自序》。

②③ 《汉书·李广附陵传》。

④ 《报任安书》。

⑤ 《汉书·匈奴传》。

解的，李广利"功少"是明显的，而武帝"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是专制君主的歪理。司马迁因此不满，怨愤不已。故他在《报任安书》里倾诉之，即使武帝于事后任以中书令之要职也无丝毫释怨之意。

正因于此，司马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难以善终。他晚年专心致志修撰《史记》，大致迄于天汉。大概在太始元年（前96）末，他因怨愤情绪暴露而被下狱，终因身体衰弱及心脏病严重而猝死狱中①。

三　司马迁撰《史记》

司马迁为太史令之后，牢记其父教导，继承历史文化传统，肩负起历史使命，而私撰历史，完成了五十二万余字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太史公自序》谈到他撰史的动因、旨趣、体例及梗概等。其中说：

>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党，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

① 参考拙作《司马迁行年新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这里交待了其书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体裁和要旨,也谈到了编撰其书的文献学问题,这里所谓"成一家之言",是就编纂学而言的,是要创作一部全新的史书。

就其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而言,足见其推陈出新:(1)本纪——取名于"禹本纪"以立体①。(2)表——仿"历谱牒"以立体②。(3)书——这种分类之史,"乃史迁所创"③。(4)世家——谓世禄之家,也有创意。(5)列传——或是人物传记,如"伯夷传"、"李斯传"、"李将军传"等;或是"国"、"族"之传,如"大宛传"、"匈奴传"、"西南夷传"等;或是"类传",如"刺客传"、"儒林传"、"货殖传"等。这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融五体于一书的做法,实为首创,影响深远,"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④,后世的纪传体史正是如此。

就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拾遗补艺"而言,其取材编制是极为广泛而丰富的。《史记》以前的史书《春秋》、《左传》等,基本上取之于文献,材料是有限的,故孔子有"文献不足"之叹⑤。司马迁撰史则不同了。汉初"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⑥,司马迁得以着力"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其中包括历代各种载籍,一些档案文件、文物

① 《大宛传》赞提到"禹本纪"。

② 《三代世表序》提到"历谱牒",《十二诸侯年表序》提到"春秋历谱牒"。

③ 《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条。

④ 《十七史商榷》"史记创立体例"条。

⑤ 《论语·八佾》。

⑥ 《汉书·司马迁传》。

资料等；其父谈已着手撰史，司马迁乃“悉论先人所次旧闻”[1]，尤其是汉初人物的一些传记；他游历各地，调查访问，所得远远超过文献范围，至为宝贵；他十岁始诵古文，向孔安国、董仲舒、其父谈等学习到各种学术文化知识。像司马迁这样具有丰富学养的历史学家，古今中外是少有的。

《史记》写了古今三千年的历史。从远古黄帝写起，一直写到当世汉武帝。从《史记》内容和司马迁的论说来看，尤其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和《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篇章结构和内容来看，显然是将古今历史分成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个阶段。写三代历史比较简略；写春秋战国较有系统，比之《春秋》、《左传》和《战国策》等显得要言不烦；写秦汉则甚为详细，几乎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2]。

因其详写秦汉史，就可从中看出司马迁的如椽大笔勾画了几项通古今之变的大线条：(1)写战国时代的变法，尤其是写秦国商鞅变法及其历史影响，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变革问题。(2)记述先秦氏族贵族到汉初的布衣将相的变化，是司马迁着意考察的重要问题。(3)西周分封、列国并峙到秦汉统一，是司马迁用心之所在。(4)由先秦的世卿世禄制至于秦汉的封建集权制，也是个历史特点。(5)在写封建集权制的发展史中，独具慧眼地点出了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秦皇、汉武是典型代表。(6)写历史变化，往往把政治和经济、文化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整个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文化为政治所用又有反作用。(7)《货殖

---

① 《太史公自序》。

② 参考拙作《司马迁写当代史》，《历史研究》1979 年第 7 期。

传》、《平准书》所写春秋战国至汉初一些商人和盐铁手工业者的发家致富,及汉朝官营盐铁、大搞均输、平准“与民争利”,反映了历史上工商业的状况。(8)所写先秦至秦汉的儒法史,反映了历史上思想文化潮流的发展倾向①。另外,还写了人民生活甘苦、礼乐习俗变化等。由此看出,司马迁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通古今之变,注意抓了历史的特点,写出了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当时天下一统的形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封建专制的强化等情况。

司马迁写汉代史,即其当代史,最可贵的是“实录”。扬雄曾称:“太史迁,曰:实录。”②班固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③班固的意思是,司马迁的“实录”,主要包括“善序事理”、“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记事核、行文直、达义明等三个方面。

所谓“善序事理”,主要是善于抓住重大的突出的历史问题,写出其发展变化的线索和原委。他写了汉初百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情况,当代君主及具有代表性的将相大臣以及商贾、游侠等人物,朝廷与一些封建割据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封建专制酷法和独尊儒术的历史,汉朝与“四夷”关系的历史,官府与百姓在经济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等等。所写既具体,又生动,还符合“事理”。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仅四五百字,就把汉初分封王、侯的概况及“削藩”效果交待清楚了。司马迁在写汉初一些

① 参考拙文《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法言·重黎》。

③ 《汉书·司马迁传》。

重大历史问题的发展时，指出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是空前统一，“隆在建元”①；另一方面是国穷民困，社会不安，甚至“盗贼滋起”②。这说明汉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结果，固然使得帝国威震中外，但也因此引起矛盾重重。

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记述有根据，不是曲笔，而是直书；不是伪造，而是实事。如其写汉匈关系史，真实地记述了汉初百年间汉匈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起初，有平城之役，刘邦采取娄敬建议，与匈奴“和亲”③；吕后闻季布之言，“遂不复议击匈奴之事”，“复与匈奴和亲”④；文帝时，“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⑤；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终孝景时，时（匈奴）小入盗边，无大寇”⑥。汉武帝初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⑦元光元年（前314）汉设马邑之谋（诱击匈奴，未成）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⑧。汉乃大举兴兵，在元光至元狩的十余年（前134～前117）内，几乎每年都动用几万、十几万兵马进行征服匈奴的战争，取“河南”，攻祁连，至幕北，直到精疲力竭，国空财尽，才“久不伐胡”⑨。这些记述都是文直事核的。

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记述态度谨严，反映史实准确，

---

① 《太史公自序》。

② 《酷吏列传》。

③ 《刘敬列传》。

④ 《季布列传》。

⑤ 《孝文本纪》。

⑥⑦⑧ 《匈奴列传》。

⑨ 参考《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

善恶必书,恰如其分,对善不虚夸,对恶不隐讳,达义分明。这从司马迁记述"今上"汉武帝及当代时政的态度最能看得真切,如记述汉武帝时兴修水利,因为河患严重,武帝动员治河,"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终于"塞瓠子","而道(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①。又写当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引渭穿渠","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②。还写了其他一些修渠兴废得失。有些渠的兴修,动辄"数万人",历时数年,"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③。说明修渠有得有失。所写当时严刑酷法,则明讽暗刺,说酷吏横行,"多以权富",使得"百姓不安其生"④,酷吏张汤死,"而民不思"⑤。至于所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表面上有"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⑥等冠冕堂皇之语,实际上是热辣地讽刺武帝独尊儒术及当代俗儒的。如其所写:"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⑦,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⑧这显然是讽刺"尊儒"乃欺世骗人之术。

司马迁非常细心地考察当代的历史变化,并直率尖锐地发表评论。《平准书》写有这么一段话:

---

①② 《河渠书》。

③⑤ 《平准书》。

④ 《酷吏列传》。

⑥ 《儒林列传》。

⑦ 荀悦《前汉纪》云:"上曰:'吾欲兴政治,法尧舜,何如?'"这可以补充说明《汲郑列传》中"上曰吾欲云云"的内容。

⑧ 《汲郑列传》。

>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接着写：自此之后，大事兴兵兴工，使得"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于是卖官鬻爵，"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①，搜刮争利，层出不穷。这就将汉兴百年间前后盛衰转变及其原因揭示出来。司马迁从汉初的贫困看到了它在复兴，从武帝时表面的强盛透视了它的衰象，指明"物盛而衰"，其手笔是入木三分的。

司马迁详写当代史，由于历史条件、个人遭遇等原因，对汉初似乎"溢美"，称颂"无为"有点夸张，对汉武稍有不恭之词，肯定当时"文治武功"稍欠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脚步，揭露了汉代的社会矛盾，流露了反专制独断的思想倾向，且表达了渴望社会安定、国富民足的意愿，这是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和进步作用的。在中国古代，像他那样写当代史，实在是凤毛麟角。

四　司马迁的史笔

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所撰《史记》，具有"实录"和明确、生动的史笔等特点。

他的"实录"特点，即"善序事理"、"文直事核"、"不虚美，不

① 《平准书》。

隐恶”等,上文已谈,这里从略。

所谓明确、生动,就是把历史上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物和事件的特点和意义,鲜明而生动地表述出来。司马迁在这方面,主要的表现是:

(一)突出历史人物自身的特点

不同的历史人物有其不同的特点。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是以主观框框去乱套,任意装扮历史人物,也不是为其开生老病死的清单,或填写其一生的履历表;而是按实际的人物特点去描写。如写张良,对其出身于韩国贵族的身份,对其如妇人好女的美貌,对其辟谷习静的养生之道,都只点到为止,重点是抓住系天下存亡的“运筹”的特点,一再记述和强调刘邦这个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①《留侯世家》又写:“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司马迁是强调张良“言天下事”的“运筹”特点来传写这个历史人物的。所以在《留侯世家》中主要是记述了张良协助刘邦反秦灭楚兴汉事关大局的几次筹策,如:(1)刘邦“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抢在项羽前入关,张良乃为刘邦筹划“利啗秦将”之策,果然使刘邦先入了关中。(2)刘邦在关中受到项羽大军压来的燃眉之急,危在旦夕,张良为刘邦设法“固要项伯”以脱鸿门之险。(3)刘邦被项羽压抑而王汉中,处境危难,张良为刘邦出了个“烧绝栈道”的主意,使刘邦得以喘息又可乘机挺进关中,进而东向与项羽争天下。(4)刘邦于彭城之役惨败,一时束手无策,张良为他谋划了联合英布、彭越,

① 共3次。见《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及《太史公自序》。

信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的良法，使汉军得以转危为安，由弱而强。(5)鸿沟分界之后，刘邦率军追击项羽楚军，遭到固陵之败，张良为他策划“许诺分封”之法，以笼络韩信、调动彭越，保证取得击垮项羽楚军的胜利。(6)刘邦称帝之后，封赏了一些大功臣，还有一些有功之人争功疑忌、内部不安，张良劝说刘邦封赏本有宿怨的雍齿，消解了前嫌，搞好内部团结，收到了群臣释疑“皆喜”的效果。此外，还写了张良为稳定太子地位的谋划。这样，就把张良写活了，很有特色了。

司马迁写廉颇、蔺相如、信陵君、李斯、项羽、萧何、韩信、陈平、周勃、樊哙、窦婴、田蚡、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是很有特点的。

(二)运用历史人物的语言

若要把历史人物写得生动，必须将其动作、眼神、语言等描写出来：写出人物语言，尤其能反映出人物的特点。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语言，使其宛然如生，自我表白，乃司马迁常用的手法。

司马迁能通过历史人物的语言，把其特点、品格、身份、地位、思想感情等真实地反映出来。《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个贵族东朝廷辩，可谓突出的例子。司马迁在几百字的文章内，写了九个出场人物，其中记了六个人物的语言；这些人物语言，都能真实生动地反映人物状况和特点，这里依次介绍：(1)“夫人谏魏其曰：‘灌(夫)将军得罪丞相(田蚡)，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这写窦夫人在家对窦婴说的话。窦婴与灌夫交好，同丞相田蚡有矛盾，田蚡有靠山王太后，又身为丞相，仗势抓了灌夫，想严治之。窦婴已失势家居，但决心营救灌夫。窦夫人为此十分担忧，所言反映了田蚡位高权重、后台硬，也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失势的贵妇人的心情。

(2)“魏其侯(窦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灌夫字)独死,婴独生。’”这是窦婴答夫人的话。窦婴因密友受田蚡坑害而气愤,决意豁出老命营救灌夫,同田蚡斗一场。武帝决定“东朝廷辩之”。窦、田在东朝廷辩了两个回合。司马迁先写窦婴说灌夫“善”、田蚡“短”的两次发言,再写田蚡的第二次发言。

(3)“武安(田蚡)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田蚡因窦婴揭了其短而自认贪污腐化,以退为进,血口喷人,诬言窦、灌两人招聚壮士妄想造反。这话充分反映了小人得势,信口妄言以坑害他人的伎俩。汉武帝问朝臣:“两人孰是?”朝臣就议论开了。

(4)御史大夫韩安国发言,既说窦婴“言是也”,又说“丞相言亦是”,表面上公正、骨子里倾向田蚡,含有应治灌夫罪过之意。末了是说“唯明主裁之”,把矛盾交给武帝去处理。其言反映了此人是非常滑头的老官僚。

(5)接着,主爵都尉汲黯表态,以为窦婴是。内史郑当时也说窦婴是,后不敢坚持己见。其余的人沉默不敢表态。

(6)“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武帝早对田蚡专横不大满意,故这时对郑当时态度不明朗,朝臣表态不积极,非常恼怒,便指责郑当时,以一儆百。因武帝一怒,便罢了朝。王太后是田蚡的姐姐[1],自然袒护其弟,故在武帝侍膳时便责备了。

① 参考《外戚世家》。

(7)“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耶！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王太后怒责儿子(武帝)公开偏袒其弟田蚡,怨责武帝是“石人”。既说明这个老太婆的泼辣,也反映了汉代母后有一定权势。

(8)“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武帝对母后表面上让了步,实际上是辩白,强调窦、田两个外戚都应重视和照顾(窦婴是武帝的祖母窦老太后之堂侄),也有两人的是非曲直需要辩清之意。窦、田的矛盾,显然使王太后、武帝母子产生了裂痕。这时为人“谨慎”的郎中令石建暗助了武帝。

(9)“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石建对武帝打了小报告。作者点到为止,无法公开之。石建擅长此道,“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①]。他不在朝廷当众表态,专在背地里嘀咕。田蚡对韩安国(字长孺)似乎暧昧的态度颇不满意,罢朝后指责之。

(10)“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田蚡此言,透露了他本来勾结韩安国对付“无官位报援”的“老秃翁”窦婴的幕后活动,也说明韩安国其人言行恰如老鼠出洞时“一前一郤”,是个老滑头。但韩安国并不示弱,反而教了田蚡一招。

(11)“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齰舌自杀。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他反责

---

① 《万石君列传》。

田蚡不识“大体”,教他如何奸猾。田蚡觉得颇受启发。

(12)“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田蚡立即向韩安国道谢,自认不足。

司马迁通过记述东朝廷辩事件六个人的语言,把窦夫人之担忧,窦婴之激怒,田蚡之奸愚,韩安国之滑头,武帝之为难,王太后之泼辣,以及石建之谨慎,都和盘托出,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黑暗内幕,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尔虞我诈的龌龊行径。《史记》记人物语言精彩处多有,不再例举。刘知幾强调写历史人物语言应该“从实而书”[①],并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实录”[②],乃有识之见。

(三)结合历史环境的描写

历史人物影响历史环境,历史环境造就历史人物,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司马迁写历史人物,都与历史环境结合起来,写两者在矛盾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

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把商鞅活动与秦国变法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写,一环扣一环,情节步步深入发展,使人物与历史的互相作用鲜明生动地反映出来。他写信陵君、李斯、项羽、萧何、韩信、李广等人物,也都是很注意对历史人物的主观与客观进行描写的。这是写历史人物很重要的方法,也是宝贵的经验。因限于篇幅,只好从简言之。

(四)根据人物特点进行评论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仅记述,而且评论,写得栩栩如生,评

---

① 《史通·言语》。

② 《史通·杂说下》。

得实事求是。他评人物之法，既"寓论断于序事"①，又在各篇末设"太史公曰"。他纵论古今人物，褒贬多出己意，往往有点睛之笔。

《史记》所写历史人物，述和评是统一的。尽管评论或粗或细，或重或轻，或全面或一点，但对记述内容来说，可谓画龙之后的点睛。描写文字似画龙身，评论语言像点龙睛。如果只是画龙身，而不点龙睛，即使龙身画得再好，那也似龙非龙；当然，如果龙身画得飞动，而点睛不妙，那龙就少神了。只有龙身画得像，龙睛点得妙，那龙才有了神。

《项羽本纪》记述项羽是粗豪的英雄，英勇奋战，无所畏惧；又猾贼少智，残暴多过。其篇末"太史公曰"：

>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首先肯定项羽率众灭秦而称"霸王"，是近世首屈一指的大英雄。再就指出他放弃关中，衣锦还乡享受富贵，放逐义帝，不守盟约，引起诸侯叛己，怨恨别人，"难矣"；自矜功伐，只想力征，不总结经验教训，至死不悟，"过矣"；一再强调"天亡我，非用兵之罪"，怨天恨命，"岂不谬哉"！这真可谓一唱三叹。将项羽的功过是非及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

其败亡原因,作了高度的概括,恰当的评论。历来学者读了《项羽本纪》发表了种种评论,说项羽或左或右,或是或非。实际上,司马迁对项羽是两点论,后面一点是重点。简言之,司马迁评项羽是反暴秦的英雄,又是以暴易暴的侏儒[①]。这种评论,不是模棱两可,而是分清主次,很有分寸的点睛之笔。其于《李斯列传》评论李斯类似于此。

司马迁有时评历史人物,不仅着眼此人特点,还往往扩而大之,放眼于此人所处的时代做出评价。如评汉高祖,"太史公曰":

>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②]

这是针对汉高祖刘邦为政及时代特点而发的评论。这就不仅是为龙点睛,而是为龙的腾云驾雾而题款了。其于《吕太后本纪》、《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等的"太史公曰"也有这个特色。

有些人物传记的"太史公曰",对人物不作全面评价,而只强调某些特点。如《蒙恬列传》、《陈涉世家》的"太史公曰"或结语,就只强调蒙恬、陈涉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有的人物传末的《太史公曰》,往往只发作者感想,如《李将军列传》、《游侠列传》的"太史公曰",使读者随之而发生无限的慨叹。

章学诚说过"传人适如其人"的话[③],司马迁确能如此。而做到这点,首要的是"实录"精神。这是写好历史人物的关键。

---

① 《太史公自序》有云:"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子羽暴虐,汉行功德"。

② 《高祖本纪》赞。

③ 《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

司马迁还善于写战争，能将战争的形势、战略、计谋、细节、胜负、得失等写得恰到好处[1]，这里从略。

五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既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他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世，撰著《史记》流露出来的思想有“一家言”的特点。下面分几点谈谈：

（一）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2]，要探究人与“天”的关系。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历史理论问题。

究“天人”关系，是个古老的课题。古时人们受历史局限，“天命”、“天道”观念较为严重，汉代还有天人感应论；但先秦已有重人事、轻天命者，荀子有“天人相分”说。司马迁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然又不为其囿役。他的《史记》写古今几千年的历史，其中偶尔提到“天”，并不着意谈论之，重点在谈人事和历史变化，写人的活动，论事在人为。其论夏、商、周的更替，秦的统一和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大多归结于人为。楚汉相争，惨败的项羽强调“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于《项羽本纪》末指出了他的过错，认为他强调天命“岂不谬哉”。

应当承认，《史记》提到的“天”，有的是言神秘的上天，如《天官书》颇有天人感应的味道；但大多是指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如《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所谓“得天统”，就是言汉初“承敝易变”，与民休息，颇得民心，符合历史的要求。

这里顺便提一下司马迁的人生观。他在《史记》里对众多历

---

① 参考拙文《〈史记〉写战争》，《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4 年。

② 《报任安书》。

史人物有褒有贬,强调人为,从而表达出人生观:人生在世,无论处境顺或逆,身世富贵或贫贱,老或少,男或女,总要有所作为,奋发上进,懂得恩怨荣辱,应当重义重情。对于陈涉号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①司马迁是赞赏的。他从古代贤哲言行上学到奋发有为的品质,而发愤著述②。

(二)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③,主要是想弄清历史发展变化的奥秘。这是历史观问题。

古人早有历史观念,《易》有变易思想,法家有今胜于古思想。司马迁汲取了养料,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首先,他提出了"承敝易变"的观点。《易传》提到"通变",《史记》则曰"承敝通变"④,"物盛则衰,时极而转","承敝易变"⑤,就把通变思想发展了。人为的社会变革,有改良,有革命,有胡为,结果或好或糟,或安或乱,关键是要"承敝通变",改了敝,变才通。其次,提出了"世异变,成功大"的观点⑥。秦以暴力灭六国,统一天下,是好是坏?司马迁以为,这个异变之世,是很大的成功,应当肯定。这在汉初非秦之时是不同凡响的历史观。再次,肯定"伐无道"的正义性。人们一般习常惧变,怕战争思安居。司马迁则识见非凡。《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对伐无道事件的历史评价。《殷本纪》、《周本纪》

---

① 《陈涉世家》。

②③ 参加《报任安书》。

④ 《高祖本纪》赞。

⑤ 《平准书》赞。

⑥ 《六国年表序》。

写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孔子世家》写了孔子感愤周失道而作《春秋》。《陈涉世家》写了陈涉揭竿起义,反对暴秦,为新天下立了首功。此外,司马迁还为农虞牧工商、医者、刺客、游侠、滑稽人物、日者等"俶傥非常之人"树碑立传,肯定他们各有一定的历史作用,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司马迁所提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①],是探讨政治成败和政权兴亡的道理。这是个政治观问题。

先秦诸子的政治观,以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孟的"仁政",法家的耕战政策,最为著称。汉初士人学子上书论政,大都谈些礼法吏治、伦理道德、农商本末、藩属如何、汉匈关系等问题。司马迁汲取已有的思想养料,加以熔冶改铸,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着重考虑因俗安民、知人善任等问题,主要观点是:(1)善因民俗是基本的治国思想。《太史公自序》引述《论六家要指》,颇为赞赏"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在施政上就得善因民俗,顺着民心,"与俗同好恶"[②]。故肯定汉初与民休息政策,强调工商经济政策"善者因之"[③]。(2)提出了"无为"以安民的观点。司马迁接受了贾谊"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④]的观点,并发展了一步,以为安民之道要在"无为"。所谓"无为",是言少惹是非,不要多事扰民,因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平准书》提到汉初"人给家足","府库余货财",关键在于"国家无事"。武帝兴功

---

① 《报任安书》。
② 《管晏列传》。
③ 《货殖列传》。
④ 《过秦论》。

兴利,多事了,就弄得民困国穷。(3)提出了巧法酷刑不如"奉职循理"的吏治思想。武帝兴功兴利,使用巧法酷刑的酷吏推波助澜,然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①]。他称赞"奉法循理之吏",强调"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②]意思是,官吏应当忠于职守,按理办事,而不能仗势欺人,胡作非为。(4)主张善于用人,强调"智不可专"。司马迁欣赏古谚"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③]。《史记》所写历代兴亡都与用人得失有关。如楚汉胜负,司马迁就肯定刘邦的总结。刘邦灭楚称帝后于雒阳南宫举行庆功酒会上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是大实话。司马迁信之,在《留侯世家·赞》中还提了一下。秦汉君主专制强化,多任用庸才,大臣多恭谨自保,或阿谀献媚。司马迁以为,为政应当群策群力,强调"智不可专"。他就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一事而发论:"语曰:'千余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用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④]这有暗刺当时封建君主专制的意味。

(四)在民族关系上,司马迁主张友好相处。《史记》有很多

---

① 《酷吏列传》。

② 《循吏列传》。

③ 《楚元王世家》赞。

④ 《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篇章写了各族历史及汉朝同各族的关系。所写各族间的矛盾和战争,多指责为灾难,害民害国;而对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亲”联姻,则是肯定的。他写汉匈关系,对汉初两族“和亲”,基本上肯定;而对武帝大事征战匈奴,劳民伤财,则明讽暗刺,以为得不偿失①。对于汉通西域是赞赏的,但对李广利征大宛是讽刺的②。这种思想,符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根本利益。

(五)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非常突出。他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封建官府垄断,而是着眼于民生,关心百姓生存生活的权利。他的经济观主要是:(1)百姓求利是正当的权益。他以为,人们都求生,都有求生求利的欲望,“富者,人之情性”。百姓勤劳致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③,大有好处。(2)提出不同于世俗的本末观念。当时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官府强调重本、轻末或抑末。司马迁却为历史上的工商业者立传,即《货殖列传》,赞扬工商农牧业者经营致富。他是重农而不轻商。(3)强调劳动致富,反对“奸富”。他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必用奇胜”。勤劳生产是正道,发财还要善于经营。但他反对“以权富”,即反对以权谋利。(4)提倡放任管理政策。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意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加以引导;如有差错,则教诲和整齐之;最下之策是与民争利。(5)经济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关系。司马迁以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

① 参见《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平准书》等篇。

② 参见《大宛列传》。

③ 《货殖列传》。

之理也。"[①]这就是说,财富的多少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之主奴尊卑,决定着剥削奴役与被剥削奴役的关系以及有无礼仪文化。

(六)司马迁的伦理道德观念,既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有其特点。首先,提出了社会上存在着富贵者与贫贱者两种道德观。他引了《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话,断定"非虚言也"。他肯定游侠扶危救弱之义,而其行"不轨于正义","时扞当世之文网"。就是说游侠同权贵的义是不同的、对立的。游侠郭解,受到一些人的仰慕,而由儒士为相的公孙弘却说他"大逆无道"[②],建议武帝杀了郭解。

与对待礼法相比,司马迁更强调为人处世以情义为重。《史记》写了许多世道人情的点点滴滴,写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记述了古人的感叹,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正因于此,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心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身正"赢得士卒的深切同情[③]。他是最讨厌官场上那种假仁假义,称许布衣平民间可贵的深情厚意的。

(七)司马迁修撰历史的思想也是值得一提的。突出的有三点:(1)讲究"务为治",以有益于社会为宗旨。《太史公自序》提到的"务为治",乃应用和服务于社会的意见。他听到的董仲舒所谓孔子修《春秋》"以达王事"的话,实际上也是"务为治"。司马谈的临终遗嘱,司马迁牢记教导,都是要继承周公、孔子以来的历史传统,发扬而光大之。(2)发扬史学传统,努力写出一部社会全史。《史记》有五体,130 篇,52 万多字,记述了黄帝以来三千年政

① 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

② 以上引文均见《游侠列传》。

③ 参见《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

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天文地理、风俗习惯、各种人物、各族关系等包罗宏富的社会全史。其史学目的与方法是,“以古为镜”,“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有褒有贬,有章有微,别善恶,明是非,终之“成一家之言”。(3)强调“述往事,思来者”,期望后人以史为鉴,理解这份遗产,继承这个传统。

还应该指出,司马迁《史记》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在先秦史料上有些欠缺,记事也有失误。但瑕不掩瑜,其人其书是值得后人仰止的。

六　20世纪对《史记》的研究

因司马迁与《史记》在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故古今中外学者对其人其书都认真地研究,取得了很多很大的成绩,就以20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整理和评价来说,其成绩是非常可观的。大致说来,这百年之中,参与研究的学者达千余人,出版了有关著作约二三百部,发表的文章约两三千篇。

早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在近世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些学者就以近代思想和方法研究司马迁和《史记》,促使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王国维著《太史公系年考略》(后改称《太史公行年考》)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及其一生提出了令人重视的看法,引起了不少学者参与讨论。梁启超撰《〈史记〉解题及其读法》,评介了《史记》的结构、思想和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杨启高的《〈史记〉通论》(1926)是较早的一部研究《史记》的专著。

三四十年代,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果多了起来。出现了几百篇论文,几十部著作。郑鹤声的《〈史汉〉研究》

(1930)、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1931)、李景星的《〈史记〉评议》(1932)、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1940)、朱东润的《〈史记〉考索》(1943)、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1948)等著述都相继问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长之的书,至今仍在印行,吸引了不少读者。

五六十年代,新社会颇有新风气,学术讨论和百家争鸣颇为活跃,新老学者都纷纷撰文著书,研究和评价司马迁与《史记》,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郑鹤声、齐思和、高亨、白寿彝、季镇淮、程金造等学者的文章在当时颇有质量和影响。翦伯赞的《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1951)一文以及郑鹤声、齐思和等学者的文章,树立了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高大鲜明的形象及其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1955),引起了讨论和考证司马迁的生卒年及研究《史记》的新浪潮,程金造、王达津等学者都积极地参与了讨论。侯外庐的《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1955)一文以及高亨、任继愈等学者的文章,明确了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贺次君的《〈史记〉书录》(1958)、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1960)等著作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白寿彝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1961)、《司马迁与班固》(1963)两文,评价司马迁的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及写作特点,实事求是,成绩显著。稍后,白寿彝又在此基础上改写为《〈史记〉新论》,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旨趣,多有令人信服的看法。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59)的问世,为研究司马迁与《史记》提供了优良的本子,并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顾颉刚在点校《史记》工作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少数青年学子曾争分夺秒地诵读《史记》,加强了传统文化的

修养。

在我国港台地区,也有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论著问世,施之勉、王叔岷等多有专释《史记》的文章。刘伟民的《司马迁思想研究》、钱穆的《〈史记〉地名考》等都相继问世。

70 年代,大陆地区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几乎奄奄一息,只有极少数论著出现。陈直的《〈史记〉新证》(1979)是在"文化大革命"后问世的。施丁的《司马迁写当代史》(1979)一文,肯定司马迁面对当代直书实录,颇耐人寻味。而这时港台地区涌现了一批论著,如有施之勉的《〈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以及某杂志编的《〈史记〉考证研究论集》。

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与评价热闹非常,论文如雨后春笋,有时一年内就有百余篇文章发表。20 年间,论文发表一两千篇,专著出版百余部,可谓果实累累;参与的学者很多,达近百人,大多是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谓新人辈出。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光明日报》、《文史杂志》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台湾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白寿彝、杨向奎、施丁、逯耀东、阮芝生等学者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心得的文章。白寿彝的《〈史记〉新论》(1981)、施丁和陈可青的《司马迁研究新论》(1982)、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1983)、王叔岷的《〈史记〉斠证》(1983)、赖明德的《司马迁的学术思想》(1983)、徐朔方的《史汉论稿》(1984)、张大可的《〈史记〉研究》(1985)、程金造的《〈史记〉管窥》(1985)、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1985)、宋嗣廉的《〈史记〉艺术美研究》(1986)、杨燕起的《历代名家评史记》(1986)等,都相继问世,对这个时期的讨论与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思想活跃,方法灵活,就司马迁及《史记》的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军事、民族、文化、艺术等思想与观点展开探讨,态度是诚恳的,学风是正派的,讨论是深入的,收益是很大的。90年代初,陕西省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1993),并策划出版了"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12种,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工作更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思想活跃、方法灵活,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就少了一些以往的不良倾向,多了一些公允的见解。因为问题深入范围拓宽,就不总是唱老调,不纠缠在几个问题上绕来绕去,可以宏观中外古今,纵横驰骋,多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与看法。就以对待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说,从发表的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来看,就可知深入程度。

应当注意到,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对研究司马迁与《史记》也有所影响。在有的学者身上,可以看到贪大贪多而粗糙,轻视少而精;贪大求全,计量而轻质,欠深思熟虑,多有炒冷饭、装拼盘现象。我们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应当学习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品格,讲求质量、创新、贡献。

施丁

2007年9月写于

芳古园寓所

目　录

《史记》解题及其读法

梁启超

《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作。迁字子长(见扬雄《法言》及王充《论衡》),左冯翊夏阳人(据《自序》"司马氏入少梁"语案推汉地),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也。司马氏世典周史,迁父谈,以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仕为太史令。谈卒,迁袭官。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以此推算,知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前145)。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迁皆传其学。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喜游历,足迹遍天下,其所经行之地见于本书者如下: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

千余里。”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适鲁,观仲尼庙堂。”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

《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冢”。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迁初仕为郎中,及继父任太史令,则奉诏修太初历。自发议迄颁定,皆迁主之。始末具详《汉书·律历志》。修历事毕,从事作史。史未成,因上书救李陵,获罪下蚕室。已而为中书令,尊宠任事。其卒年无考,大率在武帝末年。今据王静安(国维)所著《太史公系年考

略》,略表其行历年代如下:

西纪前一四五(景帝中元五年)迁生。

前一四〇(武帝建元元年)六岁。

前一三六(建元五年)十岁。《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

前一三四(元光元年)十二岁。

前一二八(元朔元年)十八岁。

前一二六(元朔三年)二十岁。《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全文见前)所记或不止一年事,要之自二十岁起游学四方也。

前一二二(元狩元年)二十四岁。《史记》所记事,讫于是年。说详下。

前一一六(元鼎元年)三十岁。《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约在元狩、元鼎间。

前一一〇(元封元年)三十六岁。《自序》云:"奉使西征巴、蜀,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迁归自南,见父谈于河、淮之间。未几,谈卒。遗命使迁撰史。

前一〇八(元封三年)三十八岁。始为太史令。《自序》云:"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石室金匮之书。"

前一〇四(太初元年)四十二岁。据《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法废坏,宜改正朔,乃诏以明年为太初元年,命迁等造汉历,选邓平及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参其事。事竣,诏迁颁所造八十一分历,即所谓太初历也。

《史记》盖以是年属稿。《自序》云:"五年(为太史令后之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

前一〇〇(天汉元年)四十六岁。

前九八(天汉三年)四十八岁。下狱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注云:“天汉三年。”(据《李将军列传》及《匈奴列传》,李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是时《史记》尚未成书,故《报任安书》云:“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岁。《汉书》本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当在此数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岁。是年有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书见《汉书》本传,不著年月,惟书中有“会东从上来”语,又有“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语。考《汉书·武帝纪》“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即所谓“东从上来”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时。”即所谓“季冬从上雍”也。故知报书在是年。迁时为宦侍,故每出必扈行也。

前九二(征和元年)五十四岁。

前八八(后元元年)若迁尚在,则其年五十八岁。明年武帝崩。迁卒年,绝无可考。惟据《汉书·宣帝纪》载武帝后元二年遣使尽杀长安狱囚,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云云。案《续汉书·百官志》知内谒者令即中书谒者令,亦即中书令。然则其时迁已不在中书,计当前卒矣。大约迁之年代与武帝相始终也。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史记》之名,非迁书原名也。其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应劭《风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班彪《略论》王充《论衡》同。而《风俗通》(卷二)时或称“太史记”。

是知两汉时并未有名迁书为“史记”者。本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

《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

《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牒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绛滕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冯唐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

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任之，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

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以上就理想方面论。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复绝。

以上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

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史记》是否已成书耶?按《自序》则百三十篇粲然具备,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问题,二千年从未发生。然据《汉书·司马迁传》已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谓"迁没之后亡",则认为书本完成后乃亡佚云尔。吾细考史公年历,则不能无疑。《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事,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其时书尚未成可知。时天汉三年也。自此以后,去太史令职而为中书令,"金匮石室之藏",不复能如昔时之恣其䌷读。又近侍尊宠,每有巡幸,无役不从。依《汉书·武帝纪》所载:"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陇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东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归。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官中书时事,计数年间能安居京师从事著述者殆无几日,《报任安书》所谓"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盖实情也。《报任安书》已经考定为太始四年冬间作,玩其语气,史确未成。《书》云:"仆诚已著此书,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则书未成而前辱未偿明甚。越二年而巫蛊难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则书竟不成而赍志以没,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则《史

记》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无所欠,其果为迁书之旧耶否耶?

《史记》所记事以何年为最终年限耶?据《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以为述事之端。上包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上据迁所自言及扬雄、班固言(《扬雄传》雄所自作,班书全采之。《班彪传》班固作,范书全采之),则"麟止"一语,殆为铁案。案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前122)。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窃比《春秋》,时亦适有获麟之事,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之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

虽然,本书所载元狩元年以后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异说。其年限之异说。则:

一、讫太初说。《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叙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太初凡四年,若讫太初四年(前101),则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讫天汉说。《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之《集解》《索隐》《正义》皆主是说。天汉接太初后,凡四年,若讫天汉四年(前97),则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讫武帝末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为后元二年(前87),若讫于此,则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第二第三两种异说出自后人之口,且暂置不理。惟第一异说之讫太初,则与讫麟止语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迷惑。查“讫麟止”语,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讫太初”语,乃在小序之后另附一行,文体突兀不肖。又《汉书》本传全录《自序》而不载此一行,似班固所见自序原本,并无此语。衡以史公窃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为断也。但太初、天汉事,尚为史公所及见耳。今本《史记》,不独太初、天汉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记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凤间(前80~前75),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云:“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宣帝地节二年(前68),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齐悼惠王世家》载:“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同年,菑川王横卒。”成帝建始三年(前30),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将相名臣表》武帝后续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止。成帝鸿嘉元年(前20),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上不过举数条为例。书中所记昭、宣、元、成间事,盖更仆难数。无论如何曲解,断不能谓太史公及见建始、鸿嘉时事。然而此诸条者,固明明在今本正文中,稍粗心读去,绝不能辨矣。吾侪据此等铁证,可以断言今本《史记》决非史公之旧,其中有一部分乃后人羼乱。

然则《史记》何故容后人羼乱耶?某部分属于后人羼乱耶?其来由及种类约有三:

第一类　原本缺亡而后人补作者。《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颜注引张晏曰:“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

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案：今本《三王世家》、《日者》、《龟策》皆有褚先生补文，附于赞嗣之后，而史公原文，似亦未尝缺。若《武帝纪》则并褚补字样而无之，而其文乃割裂《封禅书》，赞语亦全与《封禅书》同，非原文明矣。其余张晏所举诸篇，今本皆现存，其不足信益明。又《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皆各有"褚先生曰"一段补文附于赞语后，则褚补原不仅四篇也。如《张丞相列传》于赞语后有一大段补文，但并无"褚先生曰"字样，知补者又不独一褚先生也。补文别附赞后者，吾辈能识别之。若如《武帝纪》之类，竟以补文作正文，或所补并非褚先生之旧者，则后人从何辨耶？

第二类　后人续撰者。《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之后，接列"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刘知幾《史通·正史篇》云："《史记》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班彪传》注亦列举续《史记》者尚有阳城衡、史孝山二人。孝山当即岑）据此，则西汉、东汉之交，续《史记》者将二十家，而皆仍其旧名。即班彪续作数十篇，亦仅名为《后传》（见彪传）。盖自冯商、刘向以迄班彪，其意皆欲各据所立时代以次递续，不别为书。其截采《史记》记汉初以来之一部分，续以昭、宣迄哀、平之部分，以成断代之史，则自班固始耳（然《汉书·古今人表》所表皆汉以前人，则其体裁仍是补续《史记》也）。当时既未有印书，传抄皆用竹木简或缣帛，奔携两艰，用之弥啬。各家所续本，或即以涂附于原抄本中。即不然，而学者展转诵习，

竟将续本与原本合抄以图省便,亦意中事。故今本《史记》,有冯商、刘向、刘歆……诸人手笔杂入其中者,定不少也。

总之书中关于汉事之记载,若严格的甄别,宜以元狩元年以前为断;即稍宽,亦只能截至太初末而止。其有溢出此年限外者,决非史公之旧也。然此犹较易辨别,其最难者,则有:

第三类 后人故意窜乱者。西汉末学界一大公案起焉,曰今古文之争。事缘刘歆典校中秘书,自称发见各种古文经传,其主要者则《春秋左氏传》、《周礼》、《古文尚书》,其余群经亦皆有古本,而其学说十九与汉初以来诸师所传者相背戾。又有各种纬书,亦皆起自哀、平间,其言荒诞不可究诘。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皆信此等书为先秦古籍,而今文家则谓是皆歆及其徒党所伪造以媚王莽而助其篡。内中与《史记》问题关系最密切者,尤在《尚书》、《左传》两书。今文家谓《尚书》为备(意谓汉初诸师所传二十八篇之《尚书》已完备无缺,无所谓百篇及《书序》也),谓《左氏》不传《春秋》(意谓《左氏春秋》即《国语》,纯属别行之史,并非为《春秋》传也),然则史公所述三代前及春秋间事,宜以《尚书》二十八篇及原本《左氏春秋》即《国语》为限,而今《史记》乃多有助"古文家言"张目者。严鞫此谳,乃不能不归狱于歆等之有意窜乱。

然则歆等窜乱,果有可能性耶?曰有。其一,据《汉书·王莽传》:"元始四年,征天下有逸礼、古书(即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识、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前后至者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古文学说之掩袭天下,自此役始。盖此千数人者,皆承莽、歆意旨以改窜古书为职者也。而"史篇"亦在其中,则迁书之遭蹂躏,实意中事。时歆方典中秘书,则彼之所改,自称定本,谁复能与抗

辩？其二，续《史记》者十六人，而歆与居一。歆所续今虽不传，然其人学博名高，其书必有可观。故班固《汉书》多采之（黄省曾《西京杂记序》谓："班固《汉书》全取刘歆。"虽言之或太过，然歆书为固书最重要之原料殆不可疑）。今本《史记》以后人补续之语羼入正文者，既所在多有（见前文），且尤有后世妄人取《汉书》窜补者（见下文），则其中有一部分为歆手笔，并无足怪。

上所举第一第二类，清代乾嘉诸儒考证颇详。其第三类，则吾师康南海先生（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初发此疑。近人崔觯甫（适）著《史记探原》大发其覆。虽其中有过当之处，而大致盖可取。今略综诸家之说推考各篇真伪如下：

第一，全篇原缺后人续补者。《汉书》本传明言："十篇缺，有录无书。"班固所不及见者，后人何由得见？故左列十篇，应认为全伪。

《孝景本纪》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班书补之。"

《孝武本纪）张晏云："《武纪》亡，褚先生补作也。"司马贞云："褚先生集合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今案：此纪即《封禅书》之下半，疑并不出褚先生手。或褚补亦亡，后人再割裂他篇充数耶？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张晏云："亡。"裴骃云："太始以后，后人所续。"案：当从张说，全篇为后人补续。

《礼书》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荀卿《礼论》。"

《乐书》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礼记·乐记》。"

《律书》张晏云："《兵书》亡。"颜师古云："序目无《兵书》。"司马贞云："《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

《三王世家》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今本于太史公赞后附录褚补文，而赞前则录三封荣，实则前后皆褚补也。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此两篇文甚芜鄙,是否即褚补原本,尚未敢信。

《傅靳蒯成列传》张晏云:“亡。”案:今本盖后人从《汉书》录补。

第二,明著续之文及补续痕迹易见者。

《三代世表》篇末自“张夫子问褚先生曰”以下。

《张丞相传》篇末自“孝武时丞相多”以下。

《田叔列传》篇末自“褚先生曰”以下。

《平津侯主父列传》篇末自“太皇太后诏”以下。又自“班固称曰”以下。

《滑稽列传》篇末“褚先生曰”以下。

以上各条,今武英殿版本皆改为低一格以示识别。

第三,全篇可疑者。班固称有录无书者虽仅十篇,然吾侪因此已得知《史记》确为未成之书,或虽成而已有亡佚。原书未成之推定,说已详前。即已成之部分,亦有亡佚之可能性。以卷帙浩瀚之书,在传写极艰之时代,散亡甚易,略可想见。《汉书》本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据此似是一部分陆续传布。《后汉书·窦融传》云:“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则摘篇别写单行,固有明例矣。则各家抄本有一部分亡缺,亦事理之常。要之原缺续补者既有十篇,则所缺所补亦可至十篇以外。《淮南子》所谓“凿一孔而百隙随”也。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义,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取《史记》者。崔适指出各篇如下:

《孝武本纪》　　妄人录《汉书·郊祀志》

《律书》《历书》　　妄人录《汉书·律历志》

《天官书》　　妄人录《汉书·天文志》

《封禅书》	妄人录《汉书·郊祀志》
《河渠书》	妄人录《汉书·沟洫志》
《平准书》	妄人录《汉书·食货志》
《张丞相列传》	妄人录《汉书》
《南越尉佗列传》	妄人录《汉书》
《循吏列传》	妄人所补
《汲郑列传》	妄人录《汉书》
《酷吏列传》	妄人录《汉书》
《大宛列传》	妄人录《汉书·张骞李广列传》

崔氏疑古太勇，其言虽未可据为典要，然既对于此诸篇提出问题，且颇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则吾辈固宜一为推勘矣。

第四，元狩或太初以后之汉事为后人续补，窜入各篇正文者。此类在年表、世家、列传中甚多，不复枚举。

第五，各篇正文中为刘歆故意窜乱者。此项辨别甚难，举要点数端如下：

一、凡言"终始五德"者。《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孟子荀卿列传》，《张苍传》等篇。

二、凡言"十二分野"者。《十二诸侯年表》，齐、宋、郑世家，《张苍传》等篇。

三、凡言《古文尚书》及所述《书序》。夏、殷、周本纪，齐、鲁、卫、宋世家等篇。

四、凡记汉初古文传授者。《儒林列传》，《张苍传》等篇。

以上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采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

读《史记》法之一

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

一、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读《汉书·叙传》论《史记》之部,刘知幾《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今先论常识的读法。《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今为节啬日力计,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 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

一 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一 《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十九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

一 《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芜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定本,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全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之。《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前既言之矣。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纲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彰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若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宜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不可徒拘于寻行数墨，庶几所谓“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迹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既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迹，总应以之为研究基础。为此项目的而读，宜先用“观大略”的读法，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要点所在，便专向几个要点有关系之事项，注意精读。如此方能钩元提要，不至泛滥无归。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学者如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

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

《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右诸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班叔皮称史公："善序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良史之才。"如诸篇者，洵足当之矣。学者宜精读多次，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读《史记》法之二

今当继论专究的读法。《史记》为千古不朽之名著，本宜人人共读。徒以去今太远，文义或佶屈难晓；郡国名物等事，世嬗称易，或不审所指；加以传写讹舛，窜乱纷纭，时或使人因疑生蔑。后辈诵习渐希，盖此之由。谓宜悉心整理一番，俾此书尽人乐读。吾夙有志，未能逮也。谨述所怀条理以质当世，有好学者或独力或合作以成之，亦不朽之盛事也。

一、《史记》确有后人续补窜乱之部分，既如前述。宜略以前文所论列为标准，严密考证。凡可疑者，以朱线围之，俾勿与原本相混，庶几渐还史公之真面目。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可以崔适《史记探源》为主要参考书，而以自己忠实研究的结果下最后之判断。

二、吾辈之重视《史记》，实在其所纪先秦古事。因秦、汉以后事，有完备之《汉书》可读。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之事，有组织的著

述，未或能过《史记》也。而不幸《史记》关于此点，殊不足以餍吾辈所期。后人窜乱之部分无论矣，即其确出史公手者，其所述古史可信之程度，亦远在所述汉事下。此事原不能专怪史公。因远古之史，皆含有半神话的性质，极难辨别，此各国所同，不独我国为然矣。近古——如春秋、战国，资料本尚不少，而秦焚一役，“诸侯史记”荡尽，凭藉缺如，此亦无可如何者。顾吾辈所致憾于史公，不在其搜采之不备，而在其别择之不精。善夫班叔皮之言也：“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后汉书·班彪传》）试将《史记》古史之部分与现存先秦古籍相较，其中芜累诬诞之辞，盖实不少。即本书各篇互相矛盾者，亦所在而有，此非“文重思烦，刊落不尽”之明效耶？然居今日而治古史，则终不能不以《史记》为考证之聚光点。学者如诚忠于史公，谓宜将汉以前之本纪、世家、年表全部磨勘一度。从本书及他书搜集旁证反证，是正其讹谬而汰存其精粹，略用裴注《三国志》之义例，分注于各篇各段之下，庶几乎其有信史矣。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则梁玉绳《史记志疑》、崔述《考信录》实最重要之参考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书中《史记》之部，次之；其余清儒札记、文集中，亦所在多有。然兹事既极繁重，且平决聚讼，殊大非易。成功与否，要视其人之学力及判断何如耳。然有志之青年，固不妨取书中一二篇为研究之尝试。纵令不能得满意之结果，其于治学之方法及德性，所裨已多矣。

三、《史记》之训诂名物，有非今之人所能骤解者，故注释不可少。然旧注非失之太简，即失之太繁，宜或删或补。最好以现今中学学生所难了解者为标准，别作简明之注，再加以章节句读之符号，庶几使尽人能读。

四、地理为史迹筋络,而古今地名殊称,直读或不知所在。故宜编一地名检目,古今对照。

五、我国以帝王纪年,极难记忆。春秋、战国间,各国各自纪年,益复杂不易理。宜于十表之外补一大事年表,贯通全书,以西历纪,而附注该事件所属之朝代或国邑,纪年于其下。其时代则从《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起,盖前乎此者无征也。其事件则以载于本书者为限。

以上五项,为整理《史记》方法之纲要。学者如能循此致力,则可以《史记》之学名其家,而裨益于后进者且不赀矣。至如就《史记》内容分类研究,或比较政治组织,或观察社会状态,则问题甚多,取材各异,在学者自择也。

(原载《史地学报》1923 年第 7 期)

读《太史公书》

章炳麟

甚矣,曾国藩之妄也,其言曰:“司马迁书,大半寓言。”史家之弊,爱憎过其情,与解觏失实者有之,未有作史而横为寓言者也。国藩之意,岂不以迁载六国时事瑰特谲丽,与周汉事状绝殊,故疑其出于胸臆耶!案六国史记遭秦燔灭,不复见,迁书《六国表》具言之,然则其记六国大事,取《秦记》,其人自为传者,取于其人之遗书与其徒所传述而已。自商君而下,苏秦、张仪、鲁连、虞卿皆有书,魏公子有兵法,其他陈轸之伦所著不传,短长书或载焉。《屈原传》乃本淮南王,蔺相如荆轲事,大氏剑客之所称道。史之燔灭,非此无可征者,百家之自述也。辩必己胜,策必己效,或什佰于庸众而无算,非徒驾说之士然。孟子、孙卿尚往往有是,故其瑰特谲丽,上轶周,下踊汉,非恒情所有,乃其人与其徒自为增饰使然,迁安得有寓言乎!迁知其增饰而不能去。顾扬子以迁为“实录”者何也?曰:迁虽才,属辞不过景帝以下,前即伯夷、老、庄、孟、荀,其他结集与施训诂而已。如六国分裂之世,奇材固多,悉弃而不忍,悉信则非国史所传,为是迻写其文,不敢有增损,以厕传疑之列,乃所以为实录也。若寓言者,可以为实录乎哉!

(原载《制言半月刊》第23期,1936年)

《史记》新论

白寿彝

一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名著。他在《报任安书》[1]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成为司马迁一家之言。现在看来，司马迁自我评价的这十五个字还是比较全面的，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的目的要求，也概括了《史记》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对《史记》这部书的最好评价。

司马迁为什么提出这十五个字？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时说起，一直讲到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止。平常讲历史背景，一般只讲当

---

①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即任少卿）的一封信。在信中，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宫刑的冤屈，同时说明自己之所以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为了完成《史记》的编著，“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是一篇感人很深的著名佳作。

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为什么这里要讲几百年呢?因为这几百年,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史记》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成就的传统。

《史记》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1年前后才写完。从西周共和执政(前841)到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共有七百三十七年。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大变动。

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历史,所记录的都是王朝的事情。尽管殷商、西周都有许多藩国,但从甲骨文来看,记载的都是王朝的活动。从《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也可以看出,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没有记载诸侯的作品。《尚书》里的《商书》、《周书》也是讲王朝的活动。《诗经》里的《周颂》、《大雅》还是王朝的东西。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很少。

从西周末年开始,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才多起来。诸侯之国的活动,从鲁国、齐国、晋国、卫国开始,有了记载。有纪年可考的以鲁国为最早,其他国家大多从共和执政(前841)以后的历史记载才有年代可考。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周末年是个变化开始的时期。武王灭纣以后,大规模封侯建国,山东东海,黄河中下游,到处都是它的侯国,同时,把周人的农业技术也带出去了。他们利用被征服的当地人民作为劳动力来开发土地,这在《诗经》、《左传》里都有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相互之间往来逐渐增多,矛盾也逐渐多起来了,有阶级矛盾,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与侯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的冲突都随着往来的频繁而增加,因而历史的记载也多起来了。从现在留下来的史书看,如《春秋》、《左传》、《国语》,早

从西周末年,晚到周平王末年,记载的都是有关征伐、会盟、朝聘、往来的事情。这些历史记载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彼此关系的复杂化。所以,从西周末年起,特别是从东周平王起,诸侯各国的历史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正像通常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周天子权威旁落,诸侯掌权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了全国。秦统治的时间很短,但战争却很多。秦汉之际,斗争也很激烈,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结果,由汉高祖称帝。此后,又从汉高祖传到汉武帝。《史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这些历史过程、事件和人物的。五帝和夏、商、周的事情讲得很少。

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历史的变化很大,一个变动接着一个变动。从一个王国分封出好多侯国,其后又相互兼并,出现了战国七雄,随后秦又吞并六国,统一全中国。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如果说西周是封建社会,那么这七百多年的变化,就是从地方割据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周是奴隶社会,那么最晚到春秋末年,社会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形成了,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汉武帝的活动,给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带阶段性的时期。在司马迁以前,《春秋》、《左传》、《国语》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但它们包括的时期很短,只有二百四十多年,写得也不够完整。司马迁的《史记》发扬

了《春秋》、《国语》的传统,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从此以后,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隋修过一次,唐初又修过一次;唐中叶时,杜佑著《通典》,把唐中叶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又把五代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可以说,这个传统在《春秋》、《左传》、《国语》里已经有了,司马迁的《史记》则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并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从历史观的变化来看。在西周末年以前,人们的历史观,主要是宗教的历史观,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至上神——即最高的、主宰自然的神的看法;一是对祖先神的看法。这种对神的看法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充分反映出来。据郭沫若同志研究,殷商的祖先神与至上神是合而为一的。王室的祖先死了以后就成了最高的神,殷王都可以成为"示","示"就是神。甲骨文有"六示"、"十示"的字样,也就是六代、十代的祖先,在世为王,死后为神。地上的王权反映到天上就是神权,这就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统一的观念。

西周时期,对神的观念有了变化,至上神被叫做上帝,同祖先神分了家。上帝是周人的神,也是各诸侯国家的神。这就把周人的神世界化了,凡周人的势力达到的地方,都信奉同一的神,把信仰统一起来了。同时,各国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周人最大的祖先神是文王。《诗经·大雅》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帝的左右,影响、传达上帝的旨意,要子孙都跟着文王学,其他祖先神的位置都不能和文王相比。周人这种宗教观念是适应当时封侯建国的形势需要的。

尽管周人同殷人对神的观念有这样的不同,但都还是宗教的

历史观。就是说,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神支配的,是按照神的意志发展的。到了两周之际,社会起了变化,宗教的历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社会矛盾增加了,有许多现象是宗教的历史观所不能解释的。随着各地侯国的发展,王权开始动摇,人们对神也产生了怀疑。虽然还不敢说没有天,没有上帝,没有祖先神,但上帝、祖先神究竟管不管事,人们有了疑问。《诗经·大雅》是西周晚期的作品,里面表现的怀疑色彩相当浓厚,不大相信上帝、祖先神能管事。这实际上是王权动摇的反映,在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变化,怀疑思想也有了发展,但还是不能说不要天了,只是采取了保留的形式,表现为"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本质上是要把天道束之高阁,转而注意人道的问题了。这也反映了人们对至上神的看法有了变化。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完全不信神了,它是同许多迷信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的。但在当时,这就是新思想,是进步的。

另外,春秋时期对祖先神的看法也有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比较保守一点,就是《国语》所说的:"凡有大功于民者,子孙必昌。"意思是说,当代贵族就是夏禹、后稷等人的子孙,他们将来一定要昌盛。这是贵族"轮流坐庄"的思想,已经同过去成汤或文王之子孙永远保持王权的思想不一样了。还有一种更为进步的思想认为,虽然是"有大功于民者"的子孙后代,当他做了坏事,不为人民所拥戴的时候,也一样要下台;祖先虽然没有地位,但其子孙立了大功,受到人民拥戴的,也可以昌盛。这个思想已经把祖先神推开了,认为主要要看本人的功业和威信。这比两周之际仅仅怀疑祖先神管不管事的思想又有了进步。

到了战国时代,产生了变法思想,最突出的是法家思想。从商鞅起,就不管什么上帝、先王那一套,而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

伯不同法而霸”。后来韩非、李斯都主张变法。战国末年,秦要统一全国,就大力提倡变法思想,不承认至上神和祖先神,否定旧秩序。所以,法家思想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变的思想。

上述情况说明,从两周之际到秦的统一,在历史思想上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天人之际”的问题;另一个是“古今之变”的问题。天人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人们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从统治阶级来看,天代表独断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统治阶级;从被统治阶级来看,天的统治是可以变的,是可以怀疑的,甚至也是可以用人来代替的。当商王或周天子的统治比较巩固的时候,人们对“天”的统治是没有怀疑的,天是高高在上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当人们对“天”的统治产生怀疑、动摇的时候,实际上反映了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统治在动摇,或者要灭亡。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主张政权统治不变的总是快要下台的统治阶级,主张变的则是要求当权的阶级或集团。

秦统一以后,情况就和统一前不同了,它要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要把上帝复活起来。不过秦始皇的经验不多,这方面做得还不到家,他只是封禅名山大川,祭祀天神,表示他的土地、人民受之于天,可以传之万代,而他自己的统治就是万古不变的神的统治。这实际上还是祖先神的思想。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不仅人民反对他,贵族也反对他,都要起来推翻他的统治。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一种新的观念,这就是项羽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所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所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说法和秦始皇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是针锋相对的。

陈涉起义也还利用了一下宗教迷信思想,搞了一个“鱼腹获绫”,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秦的统治。司马迁写这个事件的始末过程很有意思,这对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是个讽刺,是反对天命思想的。当然,陈涉利用宗教号召人民起义,和秦始皇利用宗教统治人民有本质的区别。

陈涉起义和刘邦做皇帝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但时代很相近。秦末农民起义一发动,就有很多人起来,很快便把秦朝灭亡了。刘邦出身不过是一个小亭长,后来居然做了皇帝,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可以说是震动人心的大事,在人们的思想中印象很深。

汉初,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一些,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由于刘邦杀了一些大臣,同姓诸侯又图谋叛变,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汉文帝设法把大的封国分成小的封国,汉景帝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并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取消了王国的独立地位,汉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奠定下来。直到汉武帝时,专制主义的制度才巩固下来。

汉武帝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制度,从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了一番建树的工作。经济方面实行盐铁官卖,这是一种很重的封建剥削。因为人不吃盐不行,生产没有铁不行。盐铁官卖,就是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盐价、铁价不断提高,简直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同时,他还用均输平准的名义,把大量财富集中到中央,又让商人登记财产,向他们征收财产税,隐瞒不实报的没收财产,没收商人的土地等。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专制主义的办法,大量进行封建性的掠夺。政治方面的控制也很紧,任用了不少酷吏,囚禁对他不满的官吏。在《史记·酷吏列传》里面反映了不少由于实行严刑峻法而引起武装暴动的材料。文化方面,他

也没有放过。《史记·儒林列传》讲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说汉武帝给臣下的诏书、律令都是“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可见汉武帝很重视这两条。所谓“天人分际”、“古今之义”是什么东西呢?汉武帝所提倡的,并不是从秦以前就不断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明天人分际”实际上是提倡阴阳灾异的学说,也就是用“天意”来解释一切自然灾害和奇奇怪怪的事情,通过这种学说,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通古今之义”就是在儒家定于一尊的形式上,利用儒家经典,宣扬封建制度是永恒的,封建统治的秩序是不可变易的。他们为了尊崇儒家,有时甚至在判决案件的时候,也引证《春秋》作为断狱的标准。

由此可见,秦始皇统一以后,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古今”、“天人”的关系问题,仅仅有个苗头,到汉武帝时才逐渐明确起来。这时候的“天人分际”、“古今之义”显然和秦统一以前不同了。汉武帝时期,在历史观上出现了两种思想:一种是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统思想,以董仲舒为代表。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意思就是天人合一,古今永恒。儒家一尊,也是董仲舒的建议。他说,现在有各种学派和议论,妨碍统一,所以要发扬《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取消各家学说,定儒家于一尊。这是典型的正统思想。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继承了秦统一以前历史观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和董仲舒的思想针锋相对的。董仲舒是他的老师,他跟董仲舒学过公羊学,不过他不属于公羊学派。他主张“究天人之际”,而不同意“道之大原出于天”;他要“通古今之变”,首先肯定有变,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要“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自成一家,而不是儒家独尊。所以说司马迁的思想

是进步的,道理就在这里。司马迁不反对统一,但反对暴虐专制;他不主张农民起义,但认为搞政治要得人心,应该对人民有好处,否则,你的统治就不能巩固。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

从历史编纂学的源流发展来看。《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纪传体的书。说它是纪传体,还不能算是一个很完备的说法。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书,有的没有表或志,但各书都有纪和传,所以统称为纪传体。《史记》不但有本纪、列传,还有世家、表、书。诸侯之国,或者某方面有成就的、影响大的人物都有"世家",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说《史记》是纪传表志体的书,更合适些。

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史记》应该说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却又是新的东西。司马迁搞出这种体裁很不简单,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

司马迁以前,没有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历史记载。据现在掌握的文字资料和考古材料来看,最早的记载是甲骨文。甲骨文以前有没有记载?不敢说没有。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也有些比较早的、类似文字的东西,但材料比较少,而且不能断定它就是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算不算历史记载?从原来刻甲骨文的主观意图来看,不好说是历史记载。它的内容约有这样四部分:一部分是占卜的日子;一部分是为什么事占卜;又一部分是占卜的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的记录。如某一天要到某地去打

猎,事先占卜是"吉",结果打猎得到了鹿、鸡、兔等,这就是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验。这一部分不是每片甲骨文都有,许多甲骨文只有前三部分。就是有实际效验部分的,当时的主观意图也不是为了载入史册或流传后世。总之,甲骨文很简单,由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四个部分构成。反映在甲骨文中的时间观念是很贫乏的,一般只有干支计日,后来才慢慢有了月,很少纪年。记时间的次序是日、月、年,有点像现在西欧人的记法。甲骨文是最简单的文字记录,它初步具备了历史记载的最简单的形式,同后来的历史体裁有关系,可以说是后来编年体记载的始祖。

甲骨文的字数不多,少者几个字、十几个字,多者也不过几十个字、百把字。郭沫若同志的《卜辞通纂》中,有一片甲骨文有六十三个字;现在还发现有一百多字的,不过六十个字以上的甲骨文不多,一般只有二三十字。但金文就不同了,一方面是时间比较长,从殷商末年到秦的统一都有,而主要是在西周;另一方面字数也比甲骨文有所增加。西周时期的金文,字数在一百字到五百字左右的已有相当数量。它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丰富了,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有了记述,还有记言的。金文在时间观念上也比甲骨文有所发展,表述时间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日、月、年,另一种是年、月、日,第二种是后来通用的形式。

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并行的还有《书经》。《商书》的著作年代问题较大,其中《盘庚》篇很古奥,不好懂,一般认为可能是殷代的东西,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加工。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估计不会是盘庚时的著作,但保存有殷代的东西。《周书》比较可靠一些,它的内容和《商书》一样,主要都是帝王、贵族的语录,但也有新的东西。其中《金縢》、《顾命——康王之诰》两篇,从历史编纂学来说,就包含有新的因素。金縢是西周王家收藏重要文件的金

属器具。《金縢》就是以它为线索,叙述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祈祷上天和祖先保佑武王,不要让他死去,并愿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祈祷以后,他就把祝文藏于金縢中。后来成王即位,三叔叛乱,造谣说周公要取成王而代之。成王听到谣言后,对周公的信任有所动摇。当时周公到东方去了,周朝发生了大风灾。成王想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打开金縢看看先王留下了什么东西,不意却发现了周公的祝文。于是成王大为感动,连忙把周公迎接回来,天气又变好了,被风吹倒的树又复活了。这个记载是纪事本末体,以金縢为线索,从周公藏书到成王发书,把好多年的事情写成一篇东西,这是《尚书》中的一种特殊体裁,也是一个新的发展。

《顾命——康王之诰》,现在的本子《古文尚书》是两篇。《今文尚书》有争论,有人说是两篇,有人说是一篇。不管两篇还是一篇,文章却是连续的。《顾命》是成王临死前对大臣的遗嘱。《康王之诰》是写大臣受遗命之后,迎康王即位时康王讲的一番话。这两篇东西内容都是成康之际的记载,但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纪事本末体,写的是成王去世、康王即位的经过;另一种是记述成王留遗嘱和康王即位时的典礼,写得相当具体,文章很好,把繁琐的事情写得很有趣。这也是纪事本末体,是记述典礼最早的一篇东西。《尚书》里的这两篇文章是纪事本末体的始祖。不过,《尚书》有个大缺点,一般不纪年、月、日,因为它是官方文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保存下来的。

《诗经》里面也有新的东西。现在文学家讲《诗经》,一般认为《国风》最好,价值最高,《雅》、《颂》要不得,是庙堂文学。从历史家的角度来看,则恰恰相反,《雅》、《颂》最有历史价值。《国风》多是讲男女爱情的故事,历史价值不及《雅》、《颂》,而且记载也没有《雅》、《颂》具体。

我们讲的雅、颂就是《大雅》、《周颂》。《大雅》里的《生民》、《公刘》都是好材料，值得注意。《生民》是讲后稷一生的主要事情。后稷的母亲没有结婚，在走路时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后来生了后稷。产后，她以为不祥，把后稷扔到偏僻的地方，但牛羊都不肯践踏他；后来又把他扔到冰上，鸟儿又飞来用自己的羽翼保护他。于是，她看出孩子是个不平凡的人，才把他抱回养大。后稷很小就会种地、选种，有一套办法把庄稼种得很好。丰收以后，他又把粮食磨了，做成食物，并酿酒、烧肉，祭祀上帝，上帝很高兴。《公刘》是讲公刘建立国家的过程。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的传说，是传记体。这种体裁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尚书》中是没有的，它在历史编纂学上又是一个发展。雅、颂是史诗，它的价值不能小看，有很多有关周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情况等重要记载，在别处找不到的，在《周颂》里却有一些。把《大雅》的诗歌按歌咏对象的时代排列一下，就成了一部西周兴衰史。

总之，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已有编年、纪事本末、记述典礼、传记等多种体裁。记述典礼就是后来的“志”，亦即《史记》的“书”。同时，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所记的都是王朝的事情。从西周末年开始，各国都有了历史记载，主要是编年史。春秋时期，历史记载最发达的国家第一是鲁国，第二是晋国，第三是楚国。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特别提出这三部书，就因为这些是当时有名的书，它们都是编年史。春秋时期的这些历史著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相传孔子所写的《春秋》，大约是在春秋末年写的，也有较晚写出的部分。春秋时期编年史的发展，可以从《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所引证当时的记载中看出来。当时的编年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按年把一些大事记下来，但比较简单；另一种形式也是编年的，但把

事情的过程记载得很细致。有人认为《春秋》是当时史书的唯一形式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最大的发展有两点:第一,历史记载不仅限于王朝的活动,对诸侯之邦的历史也加以记载。第二,各国的历史书不光记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记两类事情:一类是记会盟的情况,包括参加会盟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另一类是记"告",即记述别国来告知本国的事情。

战国时期,历史记载又有了进步。《左传》、《国语》都是战国初年重要的史书。特别是《左传》,从历史编纂学上看,这部书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左传》不是一国的史书,它把当时主要国家的历史都记载在一起,带有综合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左传》采用了许多不同的历史体裁。应该说,综合体不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左传》已经开始了,不过,一般讲《左传》是编年体,因为编年体是它的主要体裁。此外,也有纪事本末体,如把晋公子重耳出亡和周游列国十八年的历史记在一起,这就是纪事本末体。第三,记言和记事糅合得很好。总的讲是按年记事,但对事情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议论,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另外,还有一本书叫《世本》,记载王、侯、卿、大夫的世系。这本书是战国时期写成的,汉朝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到此为止,历史编纂学上已出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三种体裁。《四库全书》把历史书主要分成这三大类。编年体以年为主;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纪传体以人为主。

《史记》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甲骨文就不必说了,这条和那条不相干,各自独立。《诗经》、《书经》每篇也是各自独立的。《春秋》是按年编的,但在《春秋》中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左传》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

联系，事情的记载始末有些照应，但从全书看，记载也是比较杂乱的。所以，《史记》以前历史著作的形式，虽然具备了各种历史记载形式的萌芽或幼稚状态，但不完备，记载历史事件缺乏内在联系，甚至外部的、表面的联系也不多，而彼此孤立的、片断的记载比较多。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就是历史知识和争鸣的各学派有了很密切的关系。当时，各派思想家运用历史知识作为思想资料，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运用西周的历史资料，把西周初期的制度理想化，提出复古的主张。道家的始祖老子就是历史家，是柱下史，他对社会历史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墨家讲三表，以“本”、“原”、“用”为判断事情的三个标准。“本”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讲办事要上考历史，要合乎诗书上记载的古圣先王的行为，否则就不大可靠。法家韩非子的著作，有好多篇就是把历史故事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如《说难》就是用历史故事说明他的论点。先秦诸子的著作，无论哪一部书都是言行录，主要记载这个学派奠基人的主要言论、主要事迹，还记载了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的议论。比如《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学生记孔子的言行，但其中也有孔子学生的学生记孔子学生的言行。《韩非子》有一篇《初见秦》，有人考据说这一篇不是韩非子所作。但这里面记载的也都是韩非子的言论。《庄子》外篇记载庄子的事情很多。

战国晚期史学的发展表现在杂家的著作《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史学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的记载大部分像历史故事类编，就是像《韩非子》那样，用历史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论点。二是《吕氏春秋》主要反映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墨家、阴阳家的思想。虽然它的思想很杂，但杂而成家，有自己的主张，对各家有

自己的取舍标准,打破了门户之见,有历史家的风度。汉朝的《淮南子》也是杂家,它主要也是道家的思想,但各家学说及各种历史传说都兼收并蓄。这种作法对司马迁也是有影响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论六家要指,对儒、墨、道、法、阴阳、名各家都有评价,而且相当公道。一方面司马谈是历史家,有历史家的风度;另一方面从源流来讲,他来自杂家,但比杂家更进了一步。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在政治上是针对汉武帝的儒家独尊而发的,但也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历史传统。《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

杂家把各方面的记载都融合起来,不限于某一家和某种形式的记载。司马迁在这一点上近似他们,但超过了他们。司马迁综合了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历史体裁,写成《史记》,在书中又继承了战国以来的传统,通过历史事件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体裁上说,"本纪"是从编年体来的。"世家"是记各国诸侯的历史,是从各国史来的。《史记》有很多学术方面的传记,这是独到的,后来的《汉书》在这方面不及它。以前《诗经》的《生民》、《公刘》以及战国时期史家所纂言行录之类,都是传记。《史记》的"列传"继承了这种体裁。"表"就是根据战国时期的谱牒而来的。"书"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纪事本末的形式,记述典章制度。《顾命——康王之诰》记典礼。《周礼》也是一部记载西周典章制度的书。这些都是《史记》中"书"体的来源。

《史记》对长期的历史记载,从编纂学上、历史学上作了总结,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历史领域里面来了。虽然董仲舒也在学术思想上作了一番大综合的工作,但他是正统思想的代表,而司马迁的指导思想则是和他针锋相对的。司马迁的贡献是带总结性的,是突出的,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二 “究天人之际”

《史记》在史学上的贡献,我们前面已说过,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现在先说“究天人之际”。

“究天人之际”,主要是指他的世界观而言,其中也包括历史观。根据《史记》的内容,这个问题可以分几点谈:

1. 司马迁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

阴阳五行的说法,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阴阳五行之说刚刚兴起的时候,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但到后来,它变成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变成了宗教迷信。无论什么事物,它都企图用这五样东西去说明,对任何天地自然现象都加以牵强附会,甚至用天象去解释社会现象,占卜吉凶。汉武帝时,董仲舒讲《春秋》,就专讲阴阳和禁忌。当时,董仲舒思想已成为儒学的正宗,是汉武帝为首的汉王朝所大力支持的。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用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司马谈概括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要点,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但下面还有一句:“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紧接着,他又说这“使人拘而多畏”,好像一举一动都有阴阳管着,什么事情都叫人害怕。这个批评,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再往下,他又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

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认为阴阳家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提出按照四季运行的规律从事生产活动。司马谈既肯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中论述自然现象的部分,又批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阴阳禁忌学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批评了阴阳五行家的“星气之书”。所谓星就是星占,气就是望气。阴阳五行家认为天上的星象决定着人间的祸福,所以有所谓“星占术”。望气则是通过对气象的观察,以推断人事的吉凶,例如,吕后就曾说,汉高祖外出,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找到,因为汉高祖头上有云气。司马迁不赞成这类胡说,他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意思是,这些谈吉凶祸福的都是一些不经之谈,不足为法,不可相信。

从《太史公自序》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我们能看出司马迁对天人关系持有明确的态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但不存在什么所谓预兆和吉凶祸福的问题。这种观点是同当时从皇帝以下广泛提倡阴阳五行的迷信风气针锋相对的。

《史记》八书中有《天官书》。“天官”原是个官名,掌管看天象,订历法。《天官书》原书失落不少,现在所见的有好多是后人补入的,但也还有司马迁原来写的东西。在《天官书》里面,司马迁记载了各种异常的天象变化,如什么时候出现过什么特别的星象,而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天象变化又有什么附会的说法等。司马迁既然不赞成这些东西,为什么又要加以记载呢?这是因为当时规定了史官应该记载些什么,史官这个职务与天象历法都有联系。司马迁也学过星象学,但《天官书》中所记的各种说法不见得代表他自己的观点,我们读的时候应加以分析。

在《天官书》里,司马迁曾明确指出周幽王、周厉王以前的天

象变化一般已不可考。他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的天变。同时他又说,对于春秋以后的天变,各家说法不一。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不可信,称之为"机祥不法"。他还说:"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这里所说的六经,主要指《春秋》。他是说,《春秋》对天象变异是记载的,但并不加解释。也就是说,《春秋》对这类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这说明,在对于天象变异的态度上,司马迁和阴阳五行家有区别:阴阳五行家是加以附会,他则保留;阴阳五行家认为日、月蚀与人事有关系,他则认为日、月蚀的出现有一定的时间。这是科学的见解。他认为天象有五宫,每宫都有它所属的星宿。五宫也就是五个部位,是固定不变的,但有大小广狭的不同。还有所谓"五星",即金、木、水、火、土,它们"见伏有时",到一定时候就能看见,而且经过的地方,运行轨道的长短,都有一定的度数。阴阳家则不然,他们只强调五星的出没隐现各主什么吉凶祸福。司马迁懂得历法,用当时所能掌握的科学知识,否定了阴阳家的牵强附会的说法。

2. 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

在《伯夷列传》中,对天道的否定表现得特别强烈。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举出了不少事例,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他说,有很多坏人,专干坏事,但过得很舒服,子孙后代也累世富贵;另一种人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但他们却多灾多难。所以他提出了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项羽本纪》记项羽在失败之后曾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对项羽是有感情的,认为他是一个英雄,但却不赞成他这话。他批评项羽"难矣"、"过矣"、"岂不谬哉"。所谓"难矣"用了三件事加以说明:一是"背约"。他同刘邦曾约定:谁先进入

关中,谁就可以称王。后来,刘邦先进入关中,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二是"怀楚"。项羽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想回家乡,无意西征。三是杀义帝自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义帝杀了,自立为王。司马迁根据这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至于"过矣",主要是指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想靠武力征服全中国,结果弄得称王五年以后身败名裂。但他至死还不觉悟,不仅不责备自己,却反说什么"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事实上,并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思想也不对头,他的失败与天无关。因而司马迁批评他"岂不谬哉"。这是司马迁认为天道不可信的很典型的例子。

有时,司马迁也用"天"字,也讲"天命"、"受命"。但是,我们看古书不能光看字面,要看它的含义。古人常用现成的字表达新的意思。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他说汉高祖能称帝"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从字面上看来,这是在称颂天,认为汉的天下是天命。但具体分析起来,这和旧观点不同。他所说的"受命"、"天命"是指历史条件。司马迁首先交待了秦代禁令繁多,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手脚,为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历史条件。然后写了秦亡汉兴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陈涉发难;第二个阶段是项羽推翻秦朝,即"虐戾灭秦,自项氏"。但项羽不得人心,灭了秦也不能建立他的统治;刘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做了皇帝。司马迁把这个历史条件叙述了以后,才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可见,"天哉"就是历史条件的配合。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汉高祖是不能成功的。当然,汉高祖也有他的一套办法。

总之,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项羽、刘邦的成败,司马迁不是宿命论者。他是从历史条件、从人事上讲“天命”、“受命”的,他认为一定的历史条件加上领袖人物的作用,才能成功。他通过对史实、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之不可信。

3. 用宗教的历史揭露宗教迷信的虚妄。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不针对某种迷信说法进行批评,一般都是对迷信活动加以揭露,把事情摆清楚。这种做法很有力量。当时盛行一种阴阳学说,是战国的邹衍创始的。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邹衍“其语闳大不经”。邹衍讲宇宙开辟的来源,司马迁说,“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对邹衍所讲海外,司马迁说这是“人之所不能睹”。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揭露了阴阳学说的实质。但他还肯定了邹衍的用意是好的,只是这种学说在以后发展起来就不好了。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说,后来的方士没弄懂邹衍的学说,于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这十六个字很厉害,它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当初就不可信,后继者又出来这么一帮子人。他对这种迷信的虚妄,作了很好的揭露。

司马迁还把五行学说结合历史来研究。邹衍讲宇宙起源是从黄帝开始的,《史记》有两个地方加以驳斥。一是《五帝本纪》中的“太史公曰”:“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他认为五行之说荒唐得很,老先生都说不出口。另一处是在《三代世表》里,司马迁说,他读了一些关于世系的记载,从黄帝以来都有年数可考,并且都按照五德始终来排队(黄帝是土德,下面依次是金、木、水、火德)。可是,“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意思是说,仔细核对一下,古文记载都不一样,互相矛盾,不可信。接着他又赞扬孔子不讲黄帝以来的年月和五德始终,认为有道理,“岂虚哉”!这就从历史上说明五行学说出于

捏造,不可信。

此外,还应当谈一下《封禅书》。封禅书主要记载帝王的宗教活动。这是司马迁讲“天人之际”很重要的篇章。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讲这些帝王有好多宗教建筑(神祠),并列举了好多神的名字,而这些神都是历代帝王造出来的。另一个是讲由于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通过这两个内容,司马迁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统治者捏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们捏造的,而他们又去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真是荒唐之至。《封禅书》还讲秦始皇晚年统一六国以后,到沿海各地巡行,到泰山刻石颂扬功德。对此,司马迁加了个注解:“明其得封也。”说秦始皇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离天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明其得封也”,这五个字很有挖苦意味。写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用了很大篇幅写他找了许多人间“神仙”——方士。写起初他怎样崇拜他们,后来又怎样发现他们说谎欺骗,最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杀掉。司马迁在《封禅书》里最后下了结论,说天子对这些方士的怪诞话越来越讨厌,但还是不断地找他们,希望能碰上一个真神仙,因而访仙谈道、修建神祠的事越来越多,“然其效可睹矣”。司马迁用这一句话点破了汉武帝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徒劳无功。

在长达几千字的《封禅书》里,司马迁用客观的笔调,描写了这些荒唐怪诞的活动,有时既不肯定其有,又不明言其无,很俏皮地用“若”什么、“若”什么的写法来表现。最后,他说自己参加过封禅的活动,也到神祠里去过,了解过方士祠官的意图,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他把自古以来侍奉鬼神的活动集中起来,“具见其表里”。“具见其表里”这五个字很厉害,说明他是洞悉这些活动真相的。他还特地指出,他这样写是为了要让后世的君子,看出一

个究竟来，“后有君子，得以览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究天人之际”是针对阴阳五行之说开展的一场斗争。

4. 司马迁论天的自然观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司马迁从几个方面论天，讲得很清楚。它的进步意义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有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分开，不牵强附会，用科学知识剥掉阴阳五行家强加于人事的神秘外衣，并揭露使这些现象神秘化的各种说法的由来。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著作里，对待天的问题就不像他这么明朗。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很有贡献。第二是在现实政治上，司马迁的天论也很有进步意义。

毛主席说，中国封建社会有四条束缚人民的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政权和族权不分，皇帝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凡人；他又是神圣皇族的族长；对老百姓来说，他是民之父母。在封建制度下，在家庭里就培养人们的忠君思想。父亲就是“家君”，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家之君。把范围扩大一些，统治者既是政权的代表，又称为“民之父母”。政权和族权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夫权实质上是族权的一部分。女子在封建家族和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虽然，也出过女皇帝，但那是极个别的。至于神权，更不用说，没有一个皇帝不掌握神权。他当皇帝是受神的委托，神要保护他，他本身也是神。这样一来，他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也是大宗教主，把封建社会束缚人民的四股绳索集中体现于一身，成为维持和巩固统治的命脉。

汉武帝的时候，正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完成的时候。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宗教理论也需要统一起来，需要有一套东西用来进行精神的统治，这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它是宗教的另一种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说过,罗马帝国采用了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来适应它作为世界帝国的需要。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比起夏、商、周、春秋、战国来,带有一定意义的世界性质,因而也需要有世界性的宗教。但这种需要并不是由皇帝下一道命令就能得到满足的。要建立这种宗教必须有一套理论。董仲舒的作用,就是适应了这一要求。他们用他们的公羊学说,制造出一种符合皇家利益的统一的宗教。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

那么,司马迁的思想究竟属于哪个阶级呢?我认为,司马迁的思想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有所不同。司马迁赞成汉武帝的统一事业,对秦始皇的统一也赞成。但是,对封建统治者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他都反对。封建制度这时还处在上升时期。司马迁并不反对封建制度,而反对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反对派。他要求减轻剥削,要求较好的统治,而不是打倒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他认为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会使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他在某些方面,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寄予同情。从这个角度看,他在政治思想上是进步的。

司马迁对天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不必讳言,《史记》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起作用。气数这个东西似乎有科学根据,其实,也是一种附会。他在《天官书》中曾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这里面有天文科学,可能是他从日月五星的运行中得出来的。但下面又说:"为国

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还是把它附会到人事上去了。这还是天人感应的说法。不过,这对司马迁的历史观影响不大,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上不起什么作用。按照他的说法,天运与人事发生关系,要在很长时间内才有所表现,少则一千五百年,多则四千五百年。这和阴阳五行之学所说的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上应天象不可同日而语。

5. 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司马迁首先注意人谋。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作战的双方历史条件一样,具体情况也差不多,但胜败不一,甚至有时强者败,弱者胜。道理在哪里?司马迁认为取决于人谋。前面讲过,司马迁不同意项羽所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举了好多事实说明项羽的失败不是天意,而是人谋上出了问题。我们试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阅读,就可得到很大启发。项羽一开始就气势凌人,直到他临死还是轰轰烈烈,像个英雄好汉。刘邦就不是这样。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就显得有些赖皮。起兵前,他好酒色,不事生产;起兵后,老毛病还是常犯。尽管司马迁在情感上喜欢项羽,讨厌刘邦,但写的时候还是按照历史真实情况的。他笔下的项羽,有两件大事不如刘邦:一是民心向背,二是知人用人。第一件大事,项羽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刘邦则处处安民。司马迁在写项羽作战时,不断用"屠"、"坑"字样,如写"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写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写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在《高祖本纪》里,这类事情就很少,并着重写刘邦到处安民,入关中,约法三章。这个"民"不一

定是劳动人民,刘邦主要是收罗地方豪杰、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这么一来,老百姓也沾了光。一个到处安民,很得民心;一个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这是刘邦、项羽两人在政治上的很大区别,也是他们之间决定胜负的关键问题。第二件大事,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甚至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先把这个人笼络住,然后再想办法收拾他。以上两点区别,在这两篇本纪中很突出。司马迁通过对楚、汉之争的叙述,说明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的是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如何。刘项之争是很典型的,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主要在于人谋。

《史记》很多地方都讲人谋的问题。《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秦王强索赵璧,赵王在两难之下派蔺相如奉璧使秦。形势很险恶,但蔺相如无所畏惧,拼死捍卫了国家的利益。回国以后,他又能顾全大局,对廉颇表示退让,以求团结。司马迁称赞蔺相如,说他"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的"智勇双全",是从人事上予以褒扬。《春申君列传》写黄歇由于没有听从门客朱英的规劝,后来遭到李园的暗算。司马迁分析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几度处境危急,差一点丢掉性命,但他能得保善终,这是由于有智有谋的缘故。这些都是人事的作用。可以看出,司马迁首先注意的是人谋,看你怎么努力,怎么策划。

其次,司马迁讲"时"、"势"。"时"是时代条件,"势"是形势,两者指的都是历史条件。一般说,"时"的含义比"势"更具体点。司马迁虽然注重人谋,但并不认为光有人谋就能无往不胜,还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要有"时"、有"势"。《伯夷列传》说得

很清楚:"'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风云还需有龙虎相随,万物的作用得以发扬还要有圣人的兴起。《管晏列传》引管子叙述他和鲍叔的交情的话说:我曾经替鲍叔出主意,结果是情况更坏了,但鲍叔不以我为愚。为什么呢?"知时有利不利也"。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引老子的话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里,司马迁颇有个人遭遇的感慨。

司马迁这种重视历史条件的思想也表现在《外戚世家》中。他在《外戚世家》中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这里我们看到司马迁虽然强调人的力量,认为人能把道恢弘光大,但对"命"却没办法,受到"命"的限制。这里的"命"就是指历史条件。历史条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努力,就能有所成就;历史条件不好,人纵然作了种种努力,仍可能失败。

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史记》这部书基本上是历史人物的传记,而传记中主要是突出了上层人物。本纪十二,写的都是帝王贵族。世家三十,只有陈涉、吴广是平民。孔子不算贵族,但出身于没落贵族,他的家庭也属于上层集团。列传七十,讲平民的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绝大部分是将相。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

从今天的要求来衡量,《史记》在写人民群众这一方面是非常不够的。但在当时,他能写成人的历史就不简单了。在他以前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人鬼不分的。《春秋》记的事情主要是朝聘、会盟、征伐,这些事都与宗教活动有关。孔子的高明处,就在于能把这些活动从人事角度来加以观察。《左传》里面甚至记载了好多鬼话。司马迁却能把人和天分开,专门写人的历史。虽然他把历

史发展归结到少数人的作为上,认为创造历史的是大人物,但比起以前来,还是进步的。

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他在《史记》里面写了一篇《陈涉世家》,把农民领袖和贵族王侯列在一起。对此,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却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认为,人民群众的活动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利钝,上层人物如果能够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就可以取得胜利;相反,如果忘记了人民群众,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就会失败。这就是说,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这就是司马迁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非常高的思想水平了。

《史记》有好多地方同情群众,揭发官吏的罪恶与昏庸无能。有时是委婉地表达,有时则是尽情地揭露。《酷吏列传》便是尽情揭发武帝时政治黑暗的篇章。他对酷吏下了一个评语:“以恶为治。”这四个字很厉害,又很富于讽刺意味。意思是说,这些酷吏拿作恶当统治的方法,企图凭杀人、监禁来使统治者安享太平,坐稳统治的宝座。《酷吏列传》列举了他们许多惨无人道的行为,其结果是“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里用了“盗贼”两字,有人说这是仇视人民群众。其实,这里主要是说酷吏为非作歹,引起了严重后果。我们应当看行文中的具体内容,不应只从字面上推敲。接着,他又叙述某处发生了几千人的武装暴动,起事者攻城占地,夺取武库里的兵器;释放犯人,杀死官吏;还通知地方官,叫

为他们准备饮食。而为了镇压暴动,政府颁布了“沉命法”,规定哪个地方发生暴动,地方官没有发觉,或者虽发觉而镇压不力的,杀头。这么一来,无论哪里发生了武装暴动,地方官都不敢上报了。结果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他揭露了官逼民反的实质,对老百姓起来反抗表示同情,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行了揭发和讽刺。

关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他对“天”、“人”两方面的研究都是有贡献的。

三 “通古今之变”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追述自己写《史记》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很重要。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开来讲。

1.《史记》在编纂方面对古今关系的处理。

在《史记》十二本纪里,五帝只写了一篇。夏、商、周也是各一篇,比《五帝本纪》详细。秦写了《秦本纪》,又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是一个皇帝一篇,而吕后也占了一篇。表,三代有一篇,记了世系,而无年代。十二诸侯是年表,六国也是年表。秦楚之际变化很大,是月表。汉兴以来,表就多了,共有六个。越到后来,搞得越细。不要小看这些表。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侯建国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虽然战国的年表里面有一些错误,可是这部分最难作。要以极少的语言概括那么多年的事情,没有历史眼光

是搞不出来的。我们看,《六国年表》没有多少条,《十二诸侯年表》也没有几条。可是,表越简单,写的人越得有本事。这些表包含着很多学问,是从许多繁杂的历史事件中,挑选重要的事情,可以当作一定时期的简史来阅读的。

八书本来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但由于残缺较多,并且有相当多的部分真伪难辨,已不能显示原来的全部面貌。仅就现有的篇章而论,《平准书》集中表达了汉兴百年之间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全书中的一篇杰作。

世家自西周以后才有。从西周开始的世家有十二个。从战国开始的有四个。春秋时代还有个《孔子世家》,秦汉之际有《陈涉世家》,汉兴以后,又有十二世家。历代世家的安排也是各不相同的。

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列传》,它不仅是个人的传记,还带有列传总序的性质。《史记》的列传,从春秋时期起才正式开始。春秋时期有《管晏列传》等六篇。战国就多了,包括秦在内共有二十二篇。汉兴以后更多了,有四十二篇。春秋、战国、西汉几个时期的传记有时互相交错或综合,例如,屈原就和贾谊合传。但这种情况不多,大体上还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从《史记》的编纂可以看出:第一,司马迁对待历史是略古详今的,越古越简,越近越详。第二,他对几千年历史记载的处理是有阶段性的,这从本纪和表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三代作成一个表,十二诸侯一个表,战国一个表,是按历史阶段来处理的。从《史记》的通体编纂上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心目中有一个古今演变的大势,眉目分明。有人说《史记》杂乱无章,这种说法不正确。

2.《史记》对历史事件、人物评价上的历史发展的观点。

在古代,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观点是个传统观点。到了周

代殷时,说“天命靡常”,天要变了。可是当它建立了统治以后,就要“亿万斯年”地永远统治下去。秦始皇更干脆,声称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汉代的诏书里,同样也有子孙万代的说法。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统治阶级却不大喜欢变化。他们最怕改朝换代,他们要求永恒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却说历史是进化的,是变的。

司马迁很称赞战国时期的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把贵族的地位降低了,实现了富国强兵。司马迁称赞吴起的政绩说:“诸侯患楚之彊。”卫鞅在秦实行变法,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吴起和商鞅这两个人,司马迁在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说他们“刻暴少恩”,但对他们变法的成绩则是肯定的。

汉兴以来,几乎没有人不骂秦始皇,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说汉朝好。清代的考据学家也骂明朝的学者没有学问。后一代照例是要骂前一代的。在《六国年表》的序里,司马迁分析了战国的形势之后,指出:“秦取天下多暴。”但接着又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对秦的功绩还是肯定的,他表彰了秦统一六国的功劳,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创举。他还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学者,说他们光看秦占据帝位的日子短,耻笑它,不敢说它有功绩。他讽刺了那些学者,说他们是“耳食”,不用嘴巴而用耳朵吃东西,人云亦云,无知盲从,何等可怜!

还有对所谓“封建”的看法。这个封建是指古代的“封邦建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的问题是历代学者一直争论的问题。儒家学者一般是支持“封建”的。清朝学者顾

炎武曾表示不赞成恢复古代的封侯建国制度,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司马迁也是反"封建"的。他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首先指出,西周以后,周王的地位衰落下去了,"非德不纯,形势弱也",像西周开始时那样建立同姓、异姓诸侯国以屏藩王室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诸侯强大起来了,王室必然要趋于没落。随后,他又论述了汉初封侯建国的意义与可能。他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但是,在汉朝建国一百多年以后,因为"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于是,武帝采取措施,将原有封国划小,分王、侯"百有余焉"。这样一来,封侯建国的制度逐渐衰落下去了。当时,诸侯的情况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这样的侯国尽管在地主阶级中有很高的地位,但不过是食租税而已。他认为,这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朝廷是根本,是树干,强起来了,封国是枝叶,弱下去了。这样才能"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有助于全国局势的稳定。这是对汉代文、景以来直到武帝时改变诸侯封国制度的肯定。

3.《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

《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揭露,表现在许多文章里。《万石张叔列传》描写汉景帝、汉武帝时代的大官,说他们都是"恭谨无与比",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人。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做了大官。石奋被人称为"万石君"就是因为石奋父子五人俸禄俱二千石,一门集万石。万石君长子名石建,为郎中令,管起草文件。有一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现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马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但文件中的马字少了一画,皇帝要是问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为太仆,是九卿之

一，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跟着皇帝出门，皇帝问他：这车套了几匹马？他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他还要挨个数了之后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见。然而像这样的人却能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官至丞相。通过这些小故事，司马迁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讽刺。试想：朝廷里当权用事的都是这样恭谨自保的人，政治上能有什么朝气？

在《汲郑列传》里，汲黯是个敢说老实话的正直官吏，治理地方也很有成绩。汉武帝非常怕他，又很讨厌他。别的大臣来了，武帝很随便，有时连帽子也不戴，但汲黯来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一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兴高采烈地讲他自己如何欲施仁义。汲黯当面揭穿其虚伪，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后很生气，当时就变色罢朝。汲黯正是因为"好直谏"，始终不得志。

通过《万石张叔列传》和《汲郑列传》，司马迁刻画了武帝时政治风气的腐败、恶劣。

司马迁很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公孙弘是当时儒家的头号人物，汉武帝很喜欢他。他对武帝专门阿谀奉承。武帝喜欢什么，他说什么；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酷吏列传》里的张汤也是个重要人物，是专搞严刑峻法的。在《平准书》里，他又写了一个专门给汉武帝弄钱的桑弘羊。总之，司马迁从政治、经济、学术、司法等各个方面，选择了典型人物进行刻画，对当时的社会和汉武帝统治时的政治危机作了大量的揭发。

司马迁还写了两类将军。一类以李广为代表。《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很能打仗，有勇有智，很得士卒拥护，可是汉武帝却不

喜欢他。在列传的后面,司马迁评论了这么几句话:“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和李将军对比,我们再看看《卫将军骠骑列传》。这篇列传写卫青、霍去病以皇亲国戚的关系做了大官,也立了战功。在写他们的战功时,司马迁极少对战争进行正面描述,只写了他们在皇帝诏书中所受到的表扬、奖赏、封官拜爵等。至于是否真有这样的功劳,司马迁则不加评论。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司马迁作了交待,“骠骑所将,常选”,“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在这一列传的最后,司马迁借别人的话耐人思索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青、霍去病当时如此得势,而贤大夫对他们却并不称赞。把这段评语和对李将军的评语比较一下,一褒一贬,很是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帝时候任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在编排上,司马迁也有自己的意图。他把《李将军列传》放在前面,中间插入《匈奴列传》,后面才是《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并不是乱摆,其用意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明确说了出来:“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再三申述“择任将相”的重要,指出由于选择将相不当,匈奴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如上所述,司马迁从各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见盛观衰”。当人们正在热衷于吹捧武帝统治的丰功伟绩,高唱国泰民安赞歌的时候,他却看出了汉朝统治的危机已在隐伏之中。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推断未来。这在

《史记》里表现得很突出。如果我们把《酷吏列传》记述的在严刑峻法之下激起的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和《陈涉世家》对于秦末情景的描述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统治的前途,已经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4.《史记》对学术发展变化的记载。

汉武帝的时候,五经博士搞得很热闹,尊儒的风气大盛。司马迁却能从历史变化的观点,看出当时学术上的巨大变化。他主要的看法有两点:一是认为儒学已经起了变化,当代的儒学已不复是孔子之学。他对孔子之学的看法,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得很清楚。他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就是说,他认为儒学原来是有原则的,有政治主张的,但是后来变了。

汉代儒学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叔孙通的时候。叔孙通是汉初有名的儒者。《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他有很多学生,跟着他好久,却没有官做,大家都有怨言。汉高帝时,叔孙通制订了朝仪。这一套朝仪把刘邦当皇帝的威风充分地表现出来。刘邦很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任用他做大官,赏给他五百斤金子。他的这些学生也因此被封为郎官。太史公说叔孙通"卒为汉家儒宗"。可见,汉代开国时候的儒家大多是这样的人:为了做官、拿钱,毫无原则地逢迎皇帝,阿其所好。在这些人手里,儒学变了,丧失了原来的理想。

汉代儒学的第二个变化发生在以公孙弘为首的博士弟子之手。司马迁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太史公自序》中说:"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学变成了写文章,说空话。以上两次变

化是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在孔子时期,儒家有政治理想;而汉代统治者把儒学变成了空洞的说教。这也是“通古今之变”,是“见盛观衰”的一个方面。

其次,法家的学说也有变化。汉朝政治是外儒而内法,表面上讲儒家学说,标榜仁义道德,骨子里却采用法家之术。司马迁认为:法家的学说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讲申不害、韩非时,说明了这点。他把韩非、申不害和老子、庄子排在一起,把法家与道家排在一起,认为申、韩思想归本于黄老,主张通过法实现“无为而治”,反对严刑峻法,要求不分贵贱,一律按法律评定是非。至于汉代的法,则是《酷吏列传》所描述的严刑峻法,“以恶为治”,“以酷烈为声”。法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因而子孙当大官,家财有巨万。所以,他认为汉代的法家也已变了味道,把原来的理想放弃了,本质已起了变化。

当然,儒法两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这些变化,一方面适应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制度下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我们不能要求司马迁在当时就能理解这些变化的历史必然性。但他仔细地观察、研究了这些变化,并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把它表达了出来。司马迁对“古今之变”的分析概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5.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性。

《史记》以前的历史书都是片断的记载,像《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这并不是挖苦。《国语》、《左传》有了一些进步,但缺乏对整个历史形势发展变化的看法,并且也只写了二三百年的事。《史记》不但写了几千年的事,而且主旨明确,对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观点。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写《史记》

是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古今之变"便包含着这种要求。他不把历史看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认为其中有成败兴坏的道理,并打算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仅在当时很可贵,就是在后来,也是难得的。这是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方面的第一个成绩。其次,他认为历史有变化,有阶段。这是历史进化的观点,也有进步意义。第三,《史记》能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当然,他并没有达到多么高的水平,但我们也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对他要求过高。

关于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对史学的贡献,还有一两点值得提出来研究。

《游侠列传》里有这样几句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否意味着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封建社会法律、道德的阶级本质?我以为这几句话在客观上揭露了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司马迁写这几句话,无疑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历史家,他的确看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穷人偷一点东西就要被杀头,有钱人偷得越多,权势却越大;有钱有势也就有道德,没钱没势就是不道德。司马迁把这些客观事实当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揭露出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说他已经认识到法律、道德的阶级性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多不过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公道的,看着不舒服就是了,还不能说他已经懂得阶级分析了。

另外一点是:司马迁是否已经懂得用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曾讲到农、虞(在山林里开矿伐木的)、工、商,这四种人都是社会生活所不能缺少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他们各有所能,各尽所能,为满足各自的要求而努力生产,"若水之趋下,日夜无

休时”。经过他们的努力,社会上的财富大量涌现出来了,“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种现象,“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

《货殖列传》是中国史学思想史上珍贵的遗产。它完全不理睬有神论的一切论点,专从社会经济上论述人事。它认为老百姓都有生存的欲望,都有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这是与生俱来的。这种生活的本能推动人们去从事劳动生产,而用不着别人强迫他们去干。它指出,财富占有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作用。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再把《货殖列传》和《平准书》结合起来看。作者指出:老百姓愿意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得物质报酬,维持生活,但当时的统治者却不让老百姓活下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显然作者是同情劳动人民的。他批评了当时的政治,提醒统治者要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让人民活下去。这种思想当然是进步的,应该加以肯定。试问,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个历史家注意到这些问题呢?但是也不能估计得太高。我们不能说,司马迁已经能够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是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把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提得过高了,把它说成好像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动力,把思想意识的反作用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老路。

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司马迁虽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观点,但也还有一些陈旧的杂质没有排除。总的说来,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在有些地方,他还摆脱不了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在《历书》里讲三正历法,说“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

本”,用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来说明循环的道理。在《高祖本纪》末尾,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就像是董仲舒的口气了。另外,他还相信阴德,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会起作用,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在《项羽本纪》中,他说,项羽是重瞳子,舜也有重瞳,很奇怪,“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在《白起王翦列传》中,他又借别人之口说:“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王翦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了,因为王翦为将时杀人太多,而且“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可见,司马迁没有彻底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因而有些地方还是流露了这种神秘的观点。这是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问题上的局限性。

四 “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在当时史学领域里是件新事。司马迁以前,历史学方面谈不到成“家”或成“派”。《春秋》之前,历史书都是官书。史官修书,有一定的规格要求。《春秋》之后,《国语》、《左传》主要是把历史材料排列起来,也很难说成一家之言。《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国史加以整理而成的。拿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鲁国《春秋》的佚文和孔子修的《春秋》对比,可以发现内容有些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原来的东西。《国语》是由各国历史材料集合起来的,风格形式各不一样,原始材料的特点很突出,说明它还不是经过融会贯通组织起来的东西。《左传》也不是一家之言,当时,晋、楚、鲁三国的历史著作很出名,《左传》就是以这三史为基础搞起来的,形式上它以鲁国的《春秋》为主,但内容是有关晋国的记载最多,楚国次之。《左传》还不是一部整齐的编年史,它对

各国历史的记载详略不同,而且往往一年里讲很多年的事情,不是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的。其他一些书就更不行了。《世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片断,已非原貌。《竹书纪年》已佚,现在只能从古书的摘引中辑录一些片断。过去曾有很多人推崇《竹书纪年》,其实它所记载的不一定都真实可靠,讲晋、魏、西周的事可能可靠一些。但它也是官书,很难说是一家之言。汉人作的《楚汉春秋》,现在也看不到了。总之,《史记》以前的历史书,就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来说,都谈不上是"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言"者,议论也,即有意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主张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司马迁却要来个"成一家之言",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表现在下列几点:

1.《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他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讲过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按照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司马迁把《史记》比作六经的传。但从《史记》的实际内容来看,这句话的范围应该更广泛一些。前一句用"协"字,协者,合也,说明他认为经传是比较正确、可靠的,就是要把六经异传综合起来,把它们都吸收到《史记》里面去。后一句用"整齐",则含有批判的意思,意味着百家杂语的正确性差一些。

司马迁在《史记》里,采用了哪些经传呢?

第一,《诗经》这部书被采用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谈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

缺”。孔子对《诗经》的工作,也正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要做的。《殷本纪》、《周本纪》里面很多材料来自《诗经》。《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儒林列传》里也提到了韩诗,但没有采用。

第二,采用了《尚书》,用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用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第三,《春秋》、《左传》、《国语》。主要采用《左传》,《国语》次之,《公羊传》用得较少。

第四,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言》、《五帝德》、《帝系姓》。这些篇章大多见《大戴礼》。

第五,《论语》。

第六,《秦纪》。

第七,《世本》。

第八,《战国策》。《战国策》这部书当时并无其名,是刘向时才有的。

第九,《楚汉春秋》。

司马迁用的经传主要是这几种。其中《诗经》、《尚书》是他写春秋时期以前历史的根据。春秋时期则用《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同时用《礼记》作补充。记孔子的事迹采用鲁语。记战国的事用《秦纪》、《战国策》。从秦末到汉惠帝、文帝用《楚汉春秋》。他采用这些书时经过了分析综合,并把古文翻成了当时的语言。

在“整齐百家杂语”方面,司马迁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整齐”这两个字,有综合排比的意思,也有批判、订正的意思。在《五帝本纪》的后面,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思是说百家讲黄帝的事迹荒诞不经,是不大

可靠的。在《苏秦列传》后面又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苏秦是一个游说之士,很出名,因之,别人就常常把其他游说之士的事迹移植到他的名下。这也是对苏秦传说的批评,是很有见解的。在《刺客列传》里太史公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说一般人把这件事渲染得太过分了。下面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接着就讲自己的看法,说明司马迁对百家杂语是有批判取舍的。

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主要是利用汉代的材料。司马迁在自序里面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谓"章程",当时是指数学、历法和有关工艺用材、成品的规格等一类的东西,张苍有这方面的著述。上面所说的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等各种规章制度,就是所谓"石室金匮之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关于"明圣威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记载。这些就是《史记》中关于汉代纪传和八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的一部分材料的主要来源。赵翼《廿史札记》卷一《史记变体》条,曾说《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记曹参的战功很像功劳簿;其后卷九十五、卷九十八所记当代一些功臣的战功,都是用一样的记法:详细叙述他们在哪一次战争里斩杀敌人若干,生擒若干,招降若干,并分别叙述某一个大将和他的部下各杀、擒、招降了多少敌人,最后又总起来叙述一下得了多少城,擒、斩了敌人多少大将、裨将和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叙述得非常清楚、完整。赵翼说这都是根据汉初分封时所用的记功簿加以整理而写成的。这个看法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否则,司马迁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细。他一定利用了当时的档案,做这样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古代文字都写在竹简或木简上,后来,也有一些用布帛记载。一条竹简或木

简写不了多少字，而司马迁的《史记》就有五十多万字。这几十万字是从多么浩繁的原始材料中产生的，司马迁仅仅在翻阅、整理这些原始材料上就投入了多么繁重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还访问了各地名胜和历史遗迹。他生在陕西龙门，二十岁左右就外出游历，南到长江、淮河、浙江会稽和湖南，东到现在的山东（当年的齐、鲁）和徐州，西到河南、湖北，西南还到过四川南部，走过的地方相当多。他每到一处就访问当地的历史古迹和遗老。在《货殖列传》里面关于各地风俗、物产，《游侠列传》里面关于山东、洛阳等地的游侠，都有生动的叙述或记载。这些材料看来是他在长期游历中的亲身见闻，像是来自民间的东西。《史记》中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他的经历，如在《齐太公世家》里，他说自己曾到过山东，"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在《魏世家》里，他说自己曾到过大梁的故墟，那里的父老向他讲，秦破大梁的时候，曾决河引水灌大梁，三个月以后，城墙都淹坏了，魏王才出降。在《孔子世家》里，他也讲到自己到过山东，看到孔子的庙堂和孔子当年用的车子、服装、礼器等。

综上所述，《史记》的史料来源于四个部分，即：经传，"百家杂语"，档案材料和他自己的亲身见闻。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从传说时期的黄帝起，一直到汉武帝，写成一部一百三十卷的通史，这在当时，是空前的创举。司马迁创造了一个好的历史传统：每当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点，当一个阶段或一个朝代结束后，或是社会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便有人出来把过去已经告一段落的历史写出来。比如：二十四史里大部分著作是写各朝代历史的；杜佑的《通典》是记载历代经济、政治各种典章制度的，上起传说中的唐虞时代，下讫唐玄宗天宝末年以至德宗贞元十三

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从政治上来看,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以他把北宋统一以前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郑樵的《通志》是在宋室南渡时,有感于社会变化而写的,是会通历代史书的一部通史。司马迁写《史记》,正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完成的时候,这恰好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为中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史学上留下了个优良的传统。

2. 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

《史记》不仅是一部政治史(当然主要是政治史),学术史的分量也相当重。这也是二十四史中其他著作所不及的。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好一些,后来的便差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讲了"六家要指",这是司马谈、司马迁的学术总论。司马迁以前也有人讲学术,比如:荀子有《非十二子》,评论十二个思想家;庄子《天下篇》也曾评论当代的学术。可是,无论荀子、庄子,都是讲某人如何,而不是议论学派的。韩非子的《显学篇》里面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有些分析学派源流的意思,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学派的概念。《太史公自序》里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则把学术综合为六家,也就是把学术的发展分成几种流派来评短论长,这是很不简单的。学术流派本是客观存在,但司马迁提出学派的观念,却是过去没有的,在学术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所谓"六家要指"就是关于各个学术派别的总论。在六家中,《史记》对儒家的记载尤为详细。他按照时代的先后,先写《孔子世家》,再写《仲尼弟子列传》,然后写《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是《儒林列传》,安排得相当严整。在《儒林列传》的前面,司马迁把儒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在儒家"六经"里面,他对《春

秋》说得最多,《太史公自序》有好几大段都是讲《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讲到《春秋》之学的发展:一派是从《左氏春秋》到《吕氏春秋》,这是一个系统;孟子、荀卿、韩非这些人用《春秋》里面的事实写书,这又是一派;还有一派是汉代的张苍、董仲舒等人,从《春秋》里面引申出五行之说。司马迁对这几派都进行了评论,他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指出:"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年表》,把"《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中国的历史书始于《春秋》,而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把各家对《春秋》的研究作了概括,有了评论,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史学简史。这是司马迁对儒学六经,特别是对《春秋》的看法。

对于道家,司马迁是很推崇的。《太史公自序》、《酷吏列传》、《货殖列传》里都说得很清楚。司马迁和他父亲所说的道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家不一样,他在自序里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道家事实上是和杂家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杂家发展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比如:杂家著作的巨擘《吕氏春秋》兼采诸子之说,而以道家思想为主;在杂家著作《淮南子》里面,占主导地位的也是道家思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事实上也是杂家,其主导思想则是道家的思想。司马迁的政治理想是道家的,而在实际作法上,则倾向于法家和儒家的主张。

《史记》所记述的学术活动,以儒、道两家为主,同时还记载了各家的言论,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的有道家,有法家;《孟子荀

卿列传》记载的除儒家外,还有名家、墨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商君列传》、《李斯列传》记载的都是法家;《封禅书》所记载的则属于阴阳家的活动。

除六家之外,《史记》里面还有兵家、数术家、方技家,如第六十四卷的司马穰苴,六十五卷的孙子、吴起,六十六卷的伍子胥,七十三卷的白起、王翦,八十卷的乐毅,以及九十二卷所记的淮阴侯韩信,这些人都是兵家。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二十八卷记的是卜算,它和历书、天官书,都是数术。一百零五卷的医生扁鹊、仓公,则是方技。另外,《史记》也记了一些文学家,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在这些列传里面,还把他们的某些作品整段地记录下来。

《史记》开创了学术史的先河。《史记》以前,没有通史,也没有学术史。《史记》的学术史和后来的学术史也有所不同,原因在于从先秦到汉初,学术有所发展,原来“学在官府”的情况有了改变,但发展还很不充分,当时的学术家和事业家往往不能分开。无论学术家、政治思想家还是兵家,他们大都既是理论家,又是实际活动家。文学家、思想家兼实际活动家的更多。越到后来,学术家和事业家的分化越趋明显。某些人虽也擅长学术,但政治活动更多一些;某些人虽也兼搞政治,但学术活动更多一些。正因为在先秦、汉初时期学术家和事业家两种身份兼而有之者居多,所以,《史记》里面专门记载学术家的传记,像《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并不多,而具有两种身份的人却不少。《太史公自序》里的“论六家要指”,有意识地记载和评论学术活动,成为当时学术史的论纲,它说明司马迁自觉地注意了学术的发展。但是,在司马迁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只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得到了部分的继承。后来的

史书对司马迁开创的学术史的继承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书志，如《艺文志》、《天文志》、《律历志》。《天文志》是天文学的历史，不是天象的历史。第二种是专传，即专门人物的传记，汉魏六朝都有。第三种是杂传。

3. 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

关于《史记》的体裁，在《太史公自序》的最后一段有总的说明。司马迁讲了一下基本情况，说明了各种体裁所记载的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是“本纪”。《史记》共有十二本纪。他说本纪是关于“王迹所兴”的记载。这四个字很扼要。对于《项羽本纪》，过去有争论，有很多人批评司马迁，说项羽既非王又非帝，为什么给他写本纪？其实，“王迹所兴”四个字，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项羽曾号令了大半个天下，为什么不能写他的本纪？

第二部分是十“表”。自序里曾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这是作表的原因。前者如《六国年表》，每一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纪年，相互对照，成为一个表。后者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把每个诸侯王的封国、发展变化、最终结果及其年代，分别列表说明。这样排一下队，问题便清楚了。

第三部分是八“书”。自序里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说明八书以反映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为主。

以上三部分是全书的总纲。本纪以人为主，年表以时间为主，八书以制度为主。

关于“世家”和“列传”，司马迁说三十世家记的是“辅拂股肱之臣”，七十列传写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

《史记》里面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分开来讲,过去都有。这在上文已说到了。但是,把不同的体裁有意识地相互糅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却是《史记》在形式上的创造。通史、学术史是《史记》在内容上的创造。把几千年内容极为广泛的历史事件分别用不同的体裁来表现,这是《史记》在综合运用方面的创造。拿五种体裁的相互关系来讲,本纪、表、书是总纲,世家比较详细,列传更详细。世家是为纪作注解的,列传有时为纪作注解,有时为世家作注解。纪和传的关系,可以比作"经"和"传"的关系。世家则介于二者之间。世家的内容有时起本纪的"传"的作用,有时起列传的"经"的作用。

后世对《史记》的体裁议论纷纷,批评它的人不少,认为《史记》的体裁很乱。这是由于不大懂得《史记》的特点。章学诚曾说,《史记》和《汉书》不一样,《史记》是"圆而神",《汉书》是"方以智"。这是说《史记》对历史的表达不受形式的限制,很灵活,而《汉书》则是规规矩矩地讲史事,提供知识。也就是说,司马迁注重思想,班固则注重知识。这个评语很允当。"圆而神"的好处便在于不使内容为形式服务,不因拘于形式而削足适履,而是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这并不是说《汉书》就不好了,我们说《汉书》有它的好处,但在不受形式局限这一点上,《史记》却是高一等的。

我们了解了"圆而神"的含义,便能理解《史记》在运用体裁方面的特点了。如果按照"方以智"的标准去要求《史记》,《史记》里面成问题的地方就多了。以"本纪"十二为例,不仅项羽不应该写成本纪,其他十一篇也有问题。就拿写法来说,《五帝本纪》和后面的十一篇都不一样,写的只是传说。五帝究竟在位多少年?代表多长时期的历史?他的子孙世系如何?都没有写。《夏本纪》、《殷本纪》又是一种写法,没有年代,却有世系,某王之

后是某王，有材料的就多写，没有材料的就少写。《周本纪》和《夏本纪》、《殷本纪》又不一样，不是每一个王都有年代，从周厉王开始才有年代可考。四个本纪就有三种写法，不强求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意见来要求，这四个本纪都不能叫做本纪，因为本纪要有年、月、日，而这几个本纪却没有或不能完全合乎这一要求。《秦本纪》就更奇怪了，既然周尚未亡，为什么又搞《秦本纪》？但如果不搞，战国时期的大局就提挈不起来。为了说明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提出本时期的重大问题，司马迁单独写了《秦本纪》。既然要写《秦本纪》，秦在战国以前的发展过程当然也要包括进去。所以《秦本纪》的前一部分不代表历史时期，后一部分则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秦始皇本纪》则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是皇帝的本纪，说明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吕太后本纪》主要是记宫廷和功臣内部的斗争，没有记什么国家大事，所以只好那样写。按照后来的说法，本纪应当是编年体，应当像《春秋》一样写法，《史记》则不然。也有人认为本纪只能写大事，不能写个人生活，司马迁的本纪里却记了帝王的个人生活，把国家大事和个人生活互相联系起来写，效果更好。司马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写法，不拘一格，注重精神，这种办法值得学习。不像《汉书》以后搞得那么死板。

"表"是一门大学问。如《十二诸侯年表》要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理清其盛衰大指，是不简单的。写历史不怕写多，写少却不容易，"表"就是要用少量的文字来反映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学识。司马迁的十个表把三代以来直到汉武帝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极其概括地反映出来，这非有极高的见识不可。十表的序是《史记》的精华，用简短的文句概括了所要说明的时代的历史，并对整个形势进行了精采的评论。《秦楚之

际月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序都好得很。可以这样说,《史记》的“表”把主要线索、历史轮廓搞得清清楚楚。它的序则更是画龙点睛。

“书”,基本上不全,《封禅书》是全的。《平准书》不全,但是从传下来的部分看,写得很好。《封禅书》实际上是写汉代政治的,它揭穿了封建政治披着的宗教外衣及其对人民的欺骗作用。《平准书》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写封建经济的法外掠夺;一是写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无穷无尽的奴役。前者是不顾法律,掠夺人民的土地、财产;后者任意攫取人民的劳动力,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司马迁抓住了封建社会的经济问题,写得很深刻。八书里面现在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主要是这两种。后来的《汉书·食货志》,就大不如《史记》的《平准书》了。

“世家”部分,《吴太伯世家》以下的十六世家是一类,写的是贵族诸侯。《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各是一类,很难归在一起。再往后,《楚元王世家》以下三世家和《梁孝王世家》以下三世家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宗室贵族。《萧相国世家》下面五个世家又是一类,写的是汉代大臣、开国元勋。这些写得都好。《史记》这部书并不是每篇都好,它也受到时代的限制。世家里面写春秋时期的那部分写得不好,零碎。战国时期的世家则写得好,如《赵世家》写得生动。《陈涉世家》写陈涉的成功与失败,都写得好,指出了陈涉之所以成功和失败是由于民心向背的问题。对陈涉起兵的时代背景写得很深刻。陈涉以后的失败也写得很好,说陈涉登上王位,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起老伙伴。老乡来找,他不见面。老乡对别人揭了他的底,他竟把老乡杀了。通过这些事情揭示陈涉失败的原因,写得很生动。《外戚世家》看来没下多大功夫。写汉代几个开国大臣是下了功夫的。我们要了

解汉初的政治情况，光看《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还不够，一定要看看这几个开国元勋的世家才行。《萧相国世家》讲萧何怎么明哲保身，批评萧何是刀笔吏，缺乏宰相风度，反映了汉初政治空气的不和谐。当然，其中也有说他好的地方。

"列传"七十篇。首篇《伯夷列传》并不是专为伯夷而写的，它是列传的帽子，带有总序性质。以下六十九篇大部分按照时代顺序排列，但也不完全如此。从第二篇《管晏列传》以下六篇是讲春秋时候的人，也有战国时候的，如韩非子、申不害。《商君列传》以下二十一篇是写战国时候的人。秦统一以后的，因为时间很短，和战国分不开。这二十一篇里面也有写汉代人的，如贾生。《张耳陈馀列传》以下四十二篇，除循吏、货殖等杂传以外，基本上写的是汉代人物，大体上按照时代的顺序排列。过去有人认为《史记》的列传乱，其实未必，比如《李将军列传》后面是《匈奴列传》，再往后则是《卫将军骠骑列传》。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把《匈奴列传》插在两个人物传记中间？因为这三个人物和匈奴有关系，这是司马迁有意识地按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来编排的。列传里的《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三篇连排，是因为三篇文章从三个方面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面貌。《儒林列传》写汉武帝时候的学术思想；《酷吏列传》写当时的政治、司法状况；《大宛列传》写汉武帝经营西域花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下面便是《游侠列传》，反映了游侠一类的人物不满现状，起来反抗，这是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必然产物。但这些人的反抗并没有得到好结果，多被逮捕，有的竟遭族诛。最后一篇是《货殖列传》。司马迁注重政治，对"货殖"好像是赞成，又好像不赞成。所谓"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批评统治者与老百姓争利。《货殖列传》就是讲上下交争利的事。在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上升了，另一

部分人则遭到牺牲。司马迁说,"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他指出,比普通人财产多十倍、百倍的便可以高人一等,令人生畏;拥有千倍、万倍于普通人的家赀,就可以奴役人民,为非作歹。这是必然的现象,"物之理也"。总之,列传的后几篇也是《史记》的精华所在。

从历史著作的体裁来看,司马迁把过去所有的体裁综合在一起作了一个全面的安排,既提纲挈领,有本纪,有表,有书;又包罗了很丰富的材料,有世家,有列传。从历史内容来看,安排得比较好,对于读者来说,也可以做到各取所需:你要详细的可以,要提纲挈领的也可以,要发挥议论的也可以,要选择你认为重要的材料加以吸收也可以。所以,《史记》的体裁成为中国长时期内历史著作选定体裁的主要根据,是有道理的。它和编年体比较有许多长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杰作,内容丰富,但必须从头看到尾,不像纪传体方便、灵活;没有年月日可考的事情,纪传体也可以容纳,编年体却办不到,只好采取不得已的办法加以安排。比如,写当代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有些活动可以分年写,有些就没办法分年,只好在"某年某人死"的后面,再附一篇传记。有些制度不知哪一年创立的,就说某年授某人某官,附带地说明一下官制。编年体后来不能成为主要的体裁是有道理的。刘知幾说编年、纪传二者互有短长,角力争先,不可偏废,这个说法有一点偏。

司马迁综合过去史体创立的纪传体裁,是他在历史体裁上"成一家之言"的地方。就这一方面来说,是前无古人,而又为后世长期继承的。这种体裁一直到后来清朝修明史,辛亥革命以后有人写《清史稿》,都还在沿用。

4.《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的用意在于继承《春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字上,一

个是"渐",一个是"微"。

"渐"指的是"未然"之前,也就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但还没有成为现实之时。《太史公自序》里面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学历史、写历史有什么作用?是为了要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能看出兆头。这种思想认识比过去的人前进了一步。过去的人懂得"殷鉴不远",如《尚书·无逸》篇就讲了殷周两代四个先王的历史故事,叙述他们如何勤劳恭谨,目的是给后代看,作为借鉴。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有所发展,但远不如司马迁所认识的那样深远。为了让人们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便能预先觉察,知所趋避,司马迁把掌握历史经验的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太史公自序》里,在"继《春秋》"之前,还有一句是"正《易传》",也就是这个意思。《易经》是讲占卦的,"正《易传》"不是否定占卜的作用,而是告诉人们,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事实里面去预察未来。

"微",是讲表达的方法。《史记·匈奴列传》后面"太史公曰"中提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章"是明明白白地讲,"微"是隐隐约约地暗示,这是"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记当代的事情就有所忌讳,所以写春秋晚年的事,不得不"微"。在这一点上,《史记》也仿效《春秋》。司马迁对汉武帝尽管有所揭露,但多是委曲婉转的。《太史公自序》里面还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就是说用隐约暗示的方法把内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

《史记》之继《春秋》,主要目的是"渐",表现的方法是"微"。有时也兼而有之,如《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便两者兼具。写法是"微"——委曲婉转地流露,但是要写出他所觉察到的当代社会危机,所以目的是"渐"。

"述往事,思来者"。这里,"往事"是历史,"来者"是理想;就是说,要通过叙述往事来表达他的理想。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事实,有所称赞,也有所批评,有褒有贬。传统的说法认为《春秋》有褒有贬,其实看不出来。按照后人的解释,《春秋》是有贬无褒。司马迁的《史记》却是有肯定,有否定。如他对刘邦是肯定的,但对刘邦的勾心斗角,杀戮大臣,却进行了批评。对吕后,肯定中又有揭露,他写了不少宫廷内部的斗争以及吕后怎么嫉妒刻毒,欺侮人。但在《吕太后本纪》的结尾,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称赞吕后治绩的。对汉文帝的表扬,《孝文本纪》里虽不很明确,但在八书的《律书》中却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这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文帝时的统治是较好的。在《自序》里说到司马谈曾嘱咐他:汉兴以来有许多好事,不记下来对不起死者。看来,司马迁是执行了父亲的嘱托的。有人说司马迁的书是谤书,其实,《史记》中有很多是歌颂汉家功德的。

司马迁从不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哪一个人。他对萧何固然有

很多批评,如说萧何是刀笔吏等,但也还是有所肯定的,如在《萧相国世家》中,称赞萧何在入咸阳时,"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里的图书指户口册等),对刘邦取胜很有关系。对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也是加以肯定的。汉高祖领兵打仗,萧何守关中,后方工作做得很好。司马迁通过这三件事肯定了萧何识大体,有才干。

《史记》在"述往事,思来者"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

五 "寓论断于序事"

《史记》以"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写出了深刻动人的篇章。它不是先发一套议论,再讲事实,也不是把事情说完了,再来一个架空的分析,而是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以《刘敬叔孙通列传》所写叔孙通为例。叔孙通是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中有四次对他的论断。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时,秦二世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人提出要发兵平定反叛。秦二世恼怒了,叔孙通便上前献媚说:"诸生言皆非也,……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于是二世赏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对此事,司马迁没有明文评论,但他紧跟着就写道:"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论断。

汉高帝时,叔孙通作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借鲁两生的嘴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论断。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刘邦得意忘形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司马迁借用刘邦的话,从侧面批评叔孙通,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论断。

第四次论断是借叔孙通的一批弟子在定朝仪受宠前后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定朝仪前,叔孙通对弟子“无所言进”,弟子皆悄悄骂他“专言大猾”。叔孙通定朝仪后,其弟子也分赏、做官,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分析《史记》对叔孙通的论断可以看出,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本事是很高明的。他结合具体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应,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应又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写,落墨不多,生动深刻,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并有余味。

顾炎武曾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司马迁的文章“于序事中寓论断”,让事实本身说话;一是“太史公胸中固有天下大势”。《史记》确实如此。司马迁的这支笔以浩浩荡荡的气势,把历史事实写得既清楚,又生动。作为一个历史家是要有文学修养的,必须使历史人物活现在纸上,才能显示出历史著作的吸引力。《史记》以写人物为最好,写战争次之。

六　空前的巨著,优秀的楷模

《史记》这部通史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

前无古人的。书中写贵族的很多，写平民的也不少，这是二十四史里的其他著作比不上的。司马迁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就能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说明他的眼光是比较远大的。这一点和以后的史书比起来也是很突出的。《史记》里面不仅写男子，还记载了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如聂政的姊姊，王陵的母亲，虽没有为她们专门写传记，但写得很突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史记》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他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此外，《史记》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了解到的国外情况。就是这样，司马迁把他当时能收罗到的材料和书面上见到的东西，都利用起来，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含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

这样说，我们对司马迁的估价是否太高了，难道后世的历史家都不如司马迁？这似乎是有关史学进化还是退化的问题。应当承认，像司马迁这么全面地发展了史学，后来的人是很少有的。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也是后无来者的。当然，后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还是超过了司马迁的，比如班固的“方以智”，固然不如司马迁的“圆而神”，但在很多具体事实上，班固的《汉书》纠正了司马迁的错误。我们不能机械地去看待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里，讲希腊艺术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

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这是什么道理呢?马克思拿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来解释:"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2页)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各方面出现了空前蓬勃发展的局面,也就在这时出了一个司马迁,他的成就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产物,这是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化而磨灭的。它的魅力将会长存,只是后来的更加发展罢了。艺术创作是这样,历史著作也是这样。

(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史记》的特质

阮芝生

一 前 言

《史记》不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但却是最著名的一部史书。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①的史书，不但在中国"二千年来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②，而且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逐渐流传到东西方甚至世界，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史记》一书之所以受到如此长久而普遍的喜爱，主要是因为书中记载的故事极其动人，而司马迁的文章又极其优美；二者相加，遂产生极大的魅力。然而，史公倾其一生之力所成就的《史记》，其目的并非只是要为后人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提供令人击节称赏的文章。历史中充满了故事，动人的故事，所在多有；江山代有才人，美妙的文章，何代无之。这位"自请宫刑"③的史家的椎心泣血之作，实更有其庄严而深远的用意。

一般讲《史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总不外以下两

① 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见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

② 梁启超语，转引史次耘《司马迁与〈史记〉》。

③ 司马迁被判的是"诬罔"死刑（方士栾大以"诬罔"罪腰斩），他自请宫刑以赎死。详拙著《司马迁的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23期，1974年。

点:(一)正史鼻祖。《史记》是"纪传体",乃中国第一部有组织、有方法、有宗旨的历史著作,以后历朝的"正史"写作基本上都沿袭它。(二)散文大宗。中国的文学分韵文与散文两大系统,《史记》的散文"雄深雅健"[①],对唐宋以迄清末之文学产生极大之影响。史学名作通常也是文学名作,中外皆然,《史记》更是范例。故中国大学中的历史系与中文系,一般都同时开设《史记》的课程。然而,《史记》的价值不仅在于"正史鼻祖"与"散文大宗",它的最大价值同时也是它的特殊性质乃在于它是"百王大法"。

史书上记载的人事,多少都具有一些鉴戒作用,史家写史,多少也都会有些个人的批评意见。但那并不等于"百王大法"。这里所说的"百王大法",不是指普通自然产生的鉴戒作用或批评意见,而是指司马迁在洞察古今二千年中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之后,秉持先秦学术的大传统,怀抱个人的深心宏识,在《史记》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当时以迄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或有志于成为政治领导人者)提供一些最高的政治原理与准则(大经大法)。《史记》不仅是"一代良史",实为"百王大法",这话清朝的包世臣曾经说过[②],但只是一句话,从未引起注意,以致现今讲《史记》者似乎皆未提及,大约不是不知便是不信了。这实是《史记》的不幸。以下仅就个人知见所及,针对此点试加论述,并就教于高明。

二 论治的传统

《史记》是"百王大法"不应只是一句空话。它的思想应有来历,并且在《史记》书中应有具体的呈现,无论其为显见或是含蓄委

---

① 见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

② 见包世臣《艺舟双楫·读〈史记〉六国年表叙》。

婉。首先考察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中国古代学术演变的大势为由王官学至百家言。王者“设官分职”，由世官、世业而形成世学，此学在官府，具有政治性，固不待言；即百家言，亦复如是。诸子百家虽众，最要者有六家，此由司马谈首先提出。他有“论六家要指”一文，开头即引《易·大传》(即系辞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语，并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①司马谈于百家中选出六家，六家名目不同，是其异处；而异中有同者，此即六家皆从事于治道与治术的讲求，希望把国家社会治理得和平安稳。只不过各家所讲的理路不同，各有善有不善而已。② 就其“从言异路”而言，是“殊途”、“百虑”；但从其“务为治者”而言，则是“一致”、“同归”了。可见先秦主要六家学术的共同点，是要论治、求治。此非司马谈一人之私言，《淮南子》亦云：“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③见解正同，范围更广。

司马谈之后，《汉书·艺文志》举十家，并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去小说家)。此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④。此言九家道术不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即“从言异路”；“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亦即“皆务于治”。“九家”比“六家”多出纵横、杂、农三家。马司谈“但举六家者，纵横

① 以上引文俱见《太史公自序》。

② “有省不省耳”之“省”字，宜作“善”解。《诗·皇矣》“帝省其山”，《礼记·大传》“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笺注皆训“省”为“善”。“有省有不省”，即有的地方讲得好，有的地方讲得不好，亦即各有长短。

③ 见《淮南子·汜论》。

④ 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起于六国、杂家出于秦汉,农则无甚当于治道,故皆存而不论”[①]。简言之,其重要性都不能与司马谈所举的六家相提并论。六家之中,又以儒道二家为主。司马谈论六家学术各有长短,惟独道家有长无短,且着墨独多,并取与儒家相较,最为推崇道家。史公幼承庭训,自是深晓道家之学,《史记》中亦可看出受道家思想影响之处。但司马迁父子异学,史公最推尊的是孔子,而非老子。故孔子独列世家,称“至圣”;而老子与申韩同传,称“隐君子”而已。

儒家最重要的典籍是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史记》中有两段文字特别讲到六艺:

(1)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2)(余闻董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太史公自序》)

合此两段文字可知,(一)六艺的形式与功能有不同。《礼》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与行为(《礼》主分别,故讲亲疏等差,等级制度之根据亦在此)。《乐》是用来增进发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① 吴忠匡编注《〈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乐》主和合,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书》是用来传述历史上重要的人事经验以为后人的鉴戒。《诗》是用来表达人们心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民意。《易》是用来说明推测宇宙以及人间事物的变化。《春秋》是用来辨别是非,建立人间的义理(此义理甚多,"其旨数千",故王船山称《春秋》为"义海"[①])。(二)六艺于治一也。六艺的形式与功能虽有不同,但有大同处,即六艺都具备政治的功能。六艺的义理皆有关于治道,一致而不可分割。(三)六艺固然都与治道有关,但以《书》与《春秋》为甚,尤其是《春秋》。因为《春秋》"长于治人",可以"拨乱反正"。

司马迁受父命而作《史记》,他自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易》、《春秋》合《诗》、《书》、《礼》、《乐》,正是六艺。可见他所当仁不让的,乃在欲据六艺的思想以从事著述,尤其明言要"继《春秋》",即那部"长于治人"的《春秋》。由此观之,《史记》一书亦欲论治,岂非不言可喻。

《春秋》是怎样的一部书?《春秋》是孔子六十九岁返鲁之后所作;也就是孔子不能行道于天下之后,为了让后世的人能够了解他的理想与抱负并继起奋斗而作的书。所以,《春秋》不只是单纯的史书,而是孔子政治思想寄托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主要是笔削《鲁春秋》而赋予微言大义。韩宣子适鲁,见《周易·象传》与《鲁春秋》时曾说:"吾乃今知周之所以王也。"[②]可见《鲁春秋》已是有义,可以看出一些周人王天

---

① 王船山:《春秋家说》卷二下。

② 见《左传·昭公二年传》。

下的道理。孔子修《春秋》更重“义”,“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①]。行事不是重点,“王心”才是重点。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②],最重要的是“义”。《春秋》言“况”(比喻),孔子作《春秋》,主要是借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来讲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群进化的治道与治法。简言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立一王之法”。“一王之法”是本,“拨乱反正”是用,有本才有用。“立一王之法”是公羊家最简捷的讲法,孟子谓之“天子之事”,《史记》说是“当一王之法”[③],都是一个意思。孔子以《春秋》当新王,故“《春秋》之道”虽是通三世人群进化之治道,而“《春秋》之法”则为继周新王之法以待后王继起师法之法。“立一王之法”者,实欲以为万王之法鉴也[④]。

六家皆务为治,六艺于治为一,六艺中的《春秋》又“当一王之法”,可为万王之法鉴。那么,本此先秦学术旧统(论治的传统)并欲继此“一王之法”之《春秋》而作的《史记》,它之成为“百王大法”,从学术渊源来看应是不难理解的事。

三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史记》若为“百王大法”,则司马迁论治的思想应在全书中随处可见,要在读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⑤]而已。《史记》首本纪,本纪是以宰制天下者为中心,按照时间的顺序历记各朝的盛

---

① 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引孔子语。

② 《孟子·离娄》下。

③ 俱见《太史公自序》。

④ 参拙著《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台大《文史丛刊》第23期,1969年。

⑤ 《史记·五帝本纪》赞语。

衰兴亡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活动。但司马迁写《史记》并不仅是在作客观的历史叙述,他在历史叙述中用各种方式加入了他个人的思想见解。例如,本纪首五帝,《五帝本纪》最特别的地方是“见其治未见其乱,见其盛未见其衰”①。历史的本质是变化,怎么可能只治不乱,只盛不衰呢?中国三代以下的历史不是如此,中国以外其他地区人类的历史也不是如此,而司马迁写五帝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治乱盛衰与统治者本身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而五帝个个都是好帝王。所以五帝本纪“全讲五帝德”,篇中除了叙述天地山川、岁时日月、礼乐制度、设官分职等经世大典外,主要讲五帝的性行德业。司马迁写五帝,皆圣德渊懿,仁民爱物,举贤征凶,化育天下,协和万国,足为后世政教的典范。史公开篇首重帝“德”,不论是否溢美,他写史是有深心的。《五帝本纪》后,《夏本纪》主述禹之明德,至末代夏桀“不务德”,而“汤修德”②,才代夏有天下。《殷本纪》写殷五盛五衰,也都与人君修德用贤与否,有直接的关联。《周本纪》篇幅较长,前半截详西周所由盛,在于效法先祖、世德相承;后半截详东周所由衰,在于与周家旧德背反。此外,史公在《周本纪》中不厌其烦地抄录了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召穆公谏厉王弭谤以及甫刑之哀矜恻怛诸文,固然是盛陈周德,更有为后世法的用意。三代之后为秦,《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写秦先祖以养马起家,而后逐渐壮大,由初盛、二盛以至十盛(称皇帝),然后盛极而衰。史公既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最后又“稽其兴坏成败之纪(理)”③,

---

① 牛运震评语,《〈史记〉评注》卷一,空山堂藏版。

② 见《夏本纪》。

③ 见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纪”作“理”。

引贾谊《过秦论》断其败亡之故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①。秦之兴亡始末,足为万世炯戒,史公心中实有此意。

《史记》欲继《春秋》,《春秋》从鲁隐公让国讲起。相传孔子不但作《春秋》,也删《尚书》,而《尚书》从尧舜禅让开始。史公受此思想影响,所以他写《史记》,列传首伯夷,世家首吴太伯,也都因为是让国的缘故。《史记》崇让,不仅以上二例。本纪首五帝,五帝本纪之主要内容即是尧舜禅让,叙目中也特别提到:“唐尧逊位,虞舜不台。”②可见也有贵让崇德之意。十表首三代,三代世表记载的第一件事为“帝启伐有扈,作甘誓”。帝启为何要伐有扈? 因为“有扈氏不服”。有扈氏为何不服? 因为帝启父死子继为家天下之始,与尧舜禅让不同。启伐有扈,大战于甘,其战前誓师之辞为“甘誓”。徐克范曰:“夏表书帝启作甘誓,见世变也。征苗之誓惟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大家要同心合力,才会打胜仗)甘誓则曰:‘不用命,孥戮汝。’(不奋力拼死作战,我就杀你老婆孩子)故君子谓读《甘誓》则知唐虞之风微,商周之运至矣”③。不服者,当服之以德,今乃以战服之;为争天下而战,不用命则“孥戮汝”,其德可知。要把这两条文字比较对看,才知道司马迁的微意。这条表文,显然以帝启为非;以帝启为非,则史公崇尧舜德让之意可知。《史记》的十表很特别。跟其他史书中的表不同,因为不能只拿它当资料表来看。司马迁作表的目的是要“表天下之大势与理乱兴亡之大略,而观一时之得失”④。十表首记“伐有扈,作《甘誓》”,正是

① 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赞。

② 俱见《太史公自序》。

③ 徐克范:《读三代世表补》,见《廿五史补编》第1册。

④ 见拙著《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9年第12期。

好例证。十表之后又有八书，八书首《礼》。“让者，《礼》之实也”[1]。无让不成《礼》，故曰“礼让”。“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八书首《礼》次《乐》，决非无意。司马迁作八书，决不只是在讲典章制度史，其目的乃在于“观世变，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后王之意”[3]。总合来看，《史记》五体之首都寓有贵让崇礼、礼让为国之意。不但如此，《史记》全书随处也可见到这种思想。[4] 这也正是《史记》上继《春秋》、下启百代之所在。

《史记》一共只有七十篇列传，要以此有限篇数记述黄帝至汉初二千五百年间的历史人物，其事甚难；这势必要有选择剪裁，有选择剪裁自然有去取之义。列传首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人；次管、晏，是春秋时人；次老子、韩非，是春秋末战国时人。从黄帝到殷末周初约一千五百年，仅得伯夷一传，而此一传所写又实事少而议论多，且就实事部分言，读来也若在真假有无之间。从周初至管仲约五百年无传，其中有二百年属春秋时代，其时封建体制日趋崩溃，但也正是古典文明渐臻烂熟之时，故名公巨卿辈出，贤士大夫史不绝书，一时不知出了多少人物，而司马迁都不写，独取管、晏。管、晏二人都是大政治家，不乏史料，可以写成两篇独立的专传；而史公却偏将这两个相隔一百多年的人物合传，并写成

---

① 《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曰：让，《礼》之主也。”此言让为《礼》之实，亦前人成语，取其无让不成《礼》之义，然亦难考其始。

② 《史记·礼书》。

③ 《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曰：让，《礼》之主也。”此言让为《礼》之实，亦前人成语，取其无让不成《礼》之义，然亦难考其始。

④ 参见拙著《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第五节，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社 1976 年版。

一小篇,而且略其政绩,群其交友,岂不可怪?

清初汤谐在《〈史记〉半解》中曾说:"列传首伯夷,次管、晏,世序故也。然伯夷、叔齐所全者,君臣父子兄弟之伦,而管、晏传独于朋友之道三致意焉。维持人纪之义备矣,作史者其有忧患乎!"[①]伯夷让弟以遵父命是孝,兄弟相让而逃是悌,不臣二姓是忠,《管晏传》写管鲍之交,晏子赎越石父是朋友之义,汤氏所言正确。但《管晏传》末也写有一段御者与其妻的故事:

>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此段文字乃史公欲借御者妻口写出晏子其人神貌,以及晏子如何察人用贤。但这段文字的实际内容,则为夫妻间的故事。家有贤妻,犹国有良相。御者幸有贤妻,故能夫以妻贵。听谏抑损,从善改过,此其夫妇之际亦足可传诵,立为楷模。所以,我认为"史公立伯夷、管晏二传,实已为偏五伦。他的目的是要在写史之中纲纪人伦,各留榜样,垂教后世"[②]。汤氏虽于五伦中仅言其四,但末句讲得极好,"维持人纪之义备矣,作史者其有忧患乎!"五伦是古往今来人间五种基

---

① 汤谐:《〈史记〉半解》第二册,《管晏列传》,康熙乙未,慎馀堂藏版。此书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得见。

② 参拙著《〈伯夷列传〉发微》,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4期,1985年。

本的人际关系,司马迁乃各为举例。像兄弟让逃,管鲍之交这些例子,实是人伦的最高典型,具有超脱时空、垂范永久的价值;把它们写进历史中,足可永远引起人类心灵的共鸣。中国文化特重人伦,这在经部、子部、集部的作品中常能反映出来,但史部著作能在写史之中隐含此意,并用以昭示后人者,司马迁的《史记》却为开山[①]。这在中国固属罕见,就是在世界史学史上恐怕也难再找到例子。由此写法,可见中国文化以及司马迁史学的特色;也可证明《史记》并非单纯的史部著作,与一般史书大不相同。

四 百王大法

以上系就《史记》的编次、去取、写法等个别举例说明司马迁论治的思想。但《史记》既是通史,司马迁似应对人类数千年的生活经验有个总结,有一个通盘的见解。这就与他所说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有关。《史记》记载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司马迁自谓要在这二千多年历史中穷极古今,旷览时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最后还要探寻其"成败兴坏之理",留给后人作为法戒。换句话说,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最后的目的是要"得古今之常"[②]。从《史记》看,古今之变莫大于周汉之际,其要有三:(一)封建改郡县;(二)礼乐之沦亡;(三)儒术之污坏。仔细分析这三大变,其始都与周衰有关。周衰之征兆,在于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是由于厉王奔彘。厉王奔彘,是因为弭谤。弭谤,是因为恶闻己过;而厉王之过则在"好利"、"专利"。由于好利、专利,京师遂乱,乱自上始,天下遂趋于乱。司马迁自己说:"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

① 参拙著《〈伯夷列传〉发微》,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34期,1985年。

② 徐复观语,见《论〈史记〉》。

也!”[1]公孙弘欲以利禄诱进仕途,司马迁又于《儒林传》首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历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又于《孟荀传》首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三次废书而叹,都是为了“利”字,而且明白指出利为乱源与好利之弊。[2]

好利则争,争的至大对象就是国与天下,而所用以争的至大手段就是“诈”与“力”。这是天下大乱与生民涂炭的根本原因,考察周衰以后至武帝时代的历史,也足以证明。司马迁旷观古今,见到了为争利以致君臣诛弑,父子诛弑,兄弟相残,夫妇反目,朋友成仇的例子,不可胜数,乃说:“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3]“本”是什么?就是“礼义”,所以他在《平准书》的赞中说:“以礼义防于利。”这是司马迁论治的根本主张。好利则争,“争”之相反为“让”,“利”之相反为“义”,所以司马迁崇让尚义。《史记》书中记崇让尚义的事例颇多,其中最特出者为伯夷与吴太伯。史公把他们列为列传与世家之首,都含有“以义绌利”、“以让化争”、“以礼义防于利”的思想在内。崇让尚义,则必重礼。古代言礼必及乐,二者与治道皆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史记》八书以《礼》、《乐》二篇为首,司马迁正有深意。八书是史公的论治之言,前面说过,司马迁作八书的目的是要“观世变,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后王之意”。“以礼义防于利”,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后所得的结论(亦即“得古今之常”)。这个思想并非是他个人的发

---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③ 参拙著《试论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明，乃有所本；本于孔子，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孔子"罕言利"[①]，常防其原，主张"为国以礼"[②]，"见得思义"[③]，又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⑤]司马迁为孔子立世家。孔子弟子"崇仁历义"[⑥]，司马迁为他们立"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子"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④]，司马迁为他们立"孟子荀卿列传"，以明孔子之道之所传。但司马迁主张"以礼义防于利"，其最大的本原则在孔子的《春秋》。因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⑤]。这是史公作史大义之所本，也是《史记》之继《春秋》处。必须认识到这个思想的脉络，然后才能了解太史公何以在"自序"中不厌其详地记录了一段和壶遂谈论《春秋》的对话。这段文字，从孔子讲到《春秋》，从《春秋》讲到六艺，又从六艺讲回《春秋》，最后归结于"礼义"，又忽然冒出一笔，由"礼义"讲到"礼"与"法"的区别。"法施已然之后"，其为用易见；而"礼禁未然之前"，其所为禁者就难知了。这表示"礼"是用来预防的，乃防患于未然，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弭乱于未形，其成效甚大却难为人知（此犹老子所云：故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然而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周衰以后，礼坏乐崩，遂有孔子出来，整理六艺作《春秋》，想要拨乱反正。孔子道不行，下边从战国到秦汉的人君，都是轻礼重法以争利。武帝之时，汉兴已百年，照司马迁的意思，这本是贤

---

① 《论语·子罕》。

② 《论语·先进》。

③ 此子张语，但亦可视为孔子的思想。

④ 《史记·礼书》。

⑤ 《论语·里仁》。

⑥④⑤ 俱见《太史公自序》。

君的一个大好机会——应当上接夏商周三代绝业(不接暴秦),重新制作一代之大法,制礼作乐。然而,武帝表面上虽然也兴礼重儒,其实只是专饰钟鼓玉帛以欺世,武帝时代的严刑嗜利反而超过高、惠、文、景之世,而古代的礼乐遂从此不可复见。司马迁痛惜武帝错失了这个千载一时的良机,以多欲侈心败坏了文、景以来长期休养生息的富裕,又恐怕重蹈暴秦的覆辙,所以他才不让周孔五百之期,本《诗》、《书》、《礼》、《乐》之际,正《易传》,继《春秋》,就上数千年的历史中去申明治道,从"通古今之变"中来达制治之原,最后仍寄望于后人,说,"述往事,思来者","俟后世圣人君子"①。这是司马迁也是孔子对后世的寄望和对人类的热爱。所以,《史记》不止是一部好的历史书,它还是"百王大法"。

五 结 论

《史记》基本上只是一部书,一部史书,但不是任何一部书或史书都有必要去讨论它的特殊性质。可是,《史记》这部史书特别,它有特殊性质。因为,它上承中国古代学术中论治的传统,以及《春秋》"立一王之法"的思想和精神。它的特质就在于它是"百王大法",不明白这点,就不算对《史记》有深知。司马迁不是一般的历史家,他有一副热心肠;他对现世绝望却又对与己死后无关的后世怀抱急切的热望;他有许多从千百年历史经验中归纳、提炼出来的肺腑之言要告诉世人,希望中国、人类将来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不明白这点,也不算对司马迁有深知。

以四部的观点来看,《史记》是"正史鼻祖",应属史部;《史

① 俱见《太史公自序》。

记》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记》“成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带有子书的性质（此子书不过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罢了！）；现在讲《史记》是“百王大法”，它竟有经部的血统。最早登录《史记》的，是《汉书·艺文志》。汉志把“《太史公书》百三十篇”（《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下，可见汉人原把它归入经（六艺）部，视它为《春秋》的嫡子。以一部书而同时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宋朝的郑樵曾推崇《史记》是六经以后最伟大的作品（“六经之后，唯有此作”[①]），确有见地。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部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单独就《史记》作研究，或拿它来和其他时空中产生的史学作品作比较时[②]，都不应忽视了这部书的特质——百王大法。

（原载《中国学报》[韩国]第29辑，1989年6月）

① 郑樵《通志·总序》。

② 欧西古代史著可取与《史记》作比较者，至少有1. Herodotus 之 *HISTORIAE*（《历史》）；2. Tacitus 之 *ANNALES*（《年代记》）；3.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之 *DE VITA GAESARUM*（《皇帝传》）；4. Suetonius 之 *DE ILLUSTRIBUS VIRIS*（《名士传》）；5. Plutarch 之 *VITAE PARAL、LERAE*（《对比列传》，或译为《希腊罗马英雄传》）。稻叶一郎《〈史记〉成立一考察》一文（《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第273~306页，久洋出版社，1987年版）曾言及此，但未深入比较。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侯外庐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于公元前 145 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到现在已经两千一百年了。关于司马迁的生年，过去有两说。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 145 年；但也有的记载说他生于公元前 135 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这里是照前一种说法。他的卒年没有明确的记载，大约是在公元前 90 年左右。

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和思想性，它不但总结了前代学人的成果，所谓“六经以后，惟有此作(《史记》)”，而且长期教育了中国人民。司马迁的富有创造性的优良学术传统，中国二千多年的学者没有不给予他以崇高的评价，鲜有未从他的宝贵经验里吸取精神营养的。直到近代，鲁迅也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司马迁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胆识，又使他以后的封建正统派代表学者大都感到威胁，或者公开地诬蔑他的著作为“谤书”，或者曲解他的思想诋为“异端”。因此，对待司马迁的遗产，从来就有两种态度直接间接地反映在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领域的斗争中。我们纪念这位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战士、学者和历史家，应该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他的全部学问，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吸取它的精华。

司马迁用一生精力所写成的著作《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的

编于二十四史首部的《史记》,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著述,它和当时御用学者博士官们所做的和所想的都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部史无前例的通史中,包括着从黄帝到汉武帝为止的约三千年历史,分为十二本纪(近似于政治史)、十表(近似于年表)、八书(近似于社会制度史)、三十世家(近似于国别史和人物传记)、七十列传(近似于人物传记和思想史),共一百三十篇。这些就是后人如郑樵所说的"五体",开创中国史家"纪传体"的先河。从《史记》的形式来看,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世界著作中无疑地没有这样比较完整的史学著作。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可以说天才的司马迁,企图对三千年的历史图景编制出前人所不能作的总结,特别是企图据汉兴以来的当代社会图景,创制出当代学者所不敢作的"实录"。在这一点,连那不同意司马迁思想的班固,也不能不借他人的口吻而叹服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的史学眼光确是嶙峋不凡的:时代制度的演变、民族的生活状况、阶级社会的人物面貌、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都生动地被他用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式描画出来。至于《史记》所表现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对于后代文学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顾亭林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还只是说到司马迁文学的一面。鲁迅在《汉文学史纲》形容《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可以说是概括的文学评价。

这篇短文不允许对《史记》作全面的分析评价,这里仅就作者有限的研究,试从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来简括地说明一下个人的看法。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首先,司马迁对自然是抱着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他懂得天

文星历,也参加过武帝时代修订历法的工作。他的历史观是和他的科学知识联结在一起的。在他的时代,阴阳五行一类怪诞的世界观极其嚣张,成了汉代统治阶级御用的理论。坚持唯物观点的司马迁对这些迷信的思想展开了斗争。他说明他作历书是在于使“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秒)忽”。他重视算术的功用。他说,“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他著《天官书》就是为了反对这些东西。他根据父亲的遗教,提出对待自然史的唯物观点。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值得重视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名言: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迁的这种世界观是反对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的。他批判了继承孟子的阴阳家驺衍,他斥责邹衍助长了秦汉之间“营于巫祝,信机祥”的迷信思想。他以这一世界观为根据,对中国古代的荒诞传说加以抉别。他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按已佚)、《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更接受荀子的传统,否认远古的神话,批判了汉代人们的造谣,“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虽然委婉地记述着汉代神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的目的——拿阴阳灾变的迷信以取悦于武帝,语句间并没有明白地显露出他对董仲舒、公羊家的批判来,但在《伯夷列传》中,他却对这种天道观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他首先讲

到古代的好人有的饿死、有的夭亡,为什么说"天之报施善人"?古代的坏人横行杀人却得长寿,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接着他说到汉代,坏人毫无忌惮地干坏事,却一辈子享受富贵,并把富贵传及子孙;好人谨拘言行,什么不满意的事也不敢轻易做,却多数遭了祸灾。最后他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怎样攻击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观点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古代唯物主义者,几乎不谈神怪,而是单纯解释自然事物。司马迁就是这样,他介绍他父亲的遗训说"形(物质)神(精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这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朴素唯物观点。

其次,我们再看看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点。司马迁虽然没有把他的历史观点概括成为有体系的学说,然而这毫不足以损害《史记》所表现的有机联系着的历史观点。我们应该这样说,司马迁没有专门的一篇(包括《太史公自序》)抽象地讲述他的历史观点,可是他有着《史记》里的历史观点,换言之,他有着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和各阶级人物的记录中所显示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虽然有时隐约难辨,但我们从全面的分析中还不难看出他的历史观点所包含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因素。

我们知道,古代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而一进入复杂的社会领域则大都陷入唯心主义观点。当然,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司马迁的历史观点不能不有局限性,不能不露出属于唯心主义的成分,例如循环论(如说三代若循环)和强调地理条件的说法(如在《货殖列传》中所论的风俗观点);然而他的社会思想是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素的。他在《货殖列传》中,关于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史有如下的名论: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很明显,这是把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它和自然现象一样,也有一定的规律(道)可寻。这就不是如一般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决定于人的意志或政治教育之类。应该指出,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点。二千多年前对人类社会史的分析方面有这样伟大的思想,的确是杰出而罕见的。因此,他也重视普通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把一个平常从事"生产"的白圭,居然和古代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平列起来。他引述白圭的话说:"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司马迁发现由于财富不均而产生的人对人的阶级奴役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和自然的规律一样。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反对经商剥削和巧取豪夺而得来的财富,说:"本富(指劳动而富)为上,末富(指商贾而富)次之,奸富(指榨取而富)最下。"这种观点是和那种认为贵贱贫富是"天命"的封建主义正统观点截然对立的。

司马迁大胆地宣告法律是一种治人的工具。他有一篇叙述儒者叔孙通替汉高祖定礼的故事,首先说明制定礼法的大师是这样的卑劣人物,即"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面谀以得亲贵"的所谓"知当时之务的圣人";其次叙述了一通为皇帝大排喜剧的假场面;最后说"高祖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乎定礼

大师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常,受赐金五百斤,一群追随他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并分享了赏金。这就是所谓叔孙通定礼的内幕。原来,司马迁在这个具体事例的叙述中,无情地揭发了这种"礼"的虚伪!司马迁对于张汤为汉武帝制定各种法度的具体叙述,又是一种暴露。张汤是为武帝立法的能手,他定了不少维持封建制度的专制法令,只要武帝喜欢,张汤都会附会经义来迎合,因此,天下事"皆决于(张)汤";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说出,正因为这样的法律,张汤在世时,百姓已经不能安生,要"骚动"了,张汤死后,"而民不思"!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司马迁已经看到封建制度的法律的虚伪,即一方面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制度,而另一方面是无耻的非法横夺。他还借汲黯的话形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一语道破了统治者所谓"仁义道德"的实质!

对于统治阶级的横暴,在《平准书》和《酷吏列传》中揭发得很多。他对于一般财政大臣们和一群酷吏人物的描绘,不仅给读者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而且由此暴露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矛盾。恩格斯曾指出优秀的文学要比社会学统计学公法学更能表露出社会的丰富而多样的图景,我们以为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在两方面是兼而有之的。这里,我们再看一下酷暴的杜周怎样为封建法律下了一个定义。有人责问杜周,你不遵循法律,专门以人主的好恶来治狱,执法的人是这样么?杜周说:"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又暴露了当时所谓神圣的法律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任意残害人民的工具。一方面,《平准书》说明最高地主阶级代表大量没收了人民的财富、土地和奴婢,使中家以上大量破产,说明了少数特权豪强地主"蹛财役贫",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酷吏列传》指出了农民起义,著名的大暴动

和不可胜数的小暴动此落彼起,威胁汉代的统治,吓得统治阶级“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基础上,司马迁的著作必然具有丰富的人民性。除了上面所说的对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法律等等观点已经表现了它的人民性以外,我们从司马迁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它的人民性在道德观点方面的表现。他指出,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它是以权力的窃取和财富的掠夺为标准的。他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享)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们的身份是所谓“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他还指出,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它是以平等的报施和患难的恤救为标准的。他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统治者的道德作了无情的暴露,对于人民群众的道德作了崇高的颂扬。

不但这样,他还列举了当代的许多任侠人物,他们是和豪暴地主对立的,如朱家的品质是“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如郭解的品质是“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之所以为这些下层人物立传,就是因为他们和一般富贵人们不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我们再从叙述陈涉起义的故事来看,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这样看来,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和传统思想所谓的汤武“圣王”开创商、周二代的王朝,以及孔子著作垂法万世的《春秋》是等量齐观

的。他把农民领袖陈涉列入世家,也是创举。汉高祖虽然被列在本纪,但司马迁对这位皇帝的讽刺是入骨的,甚至叙述他是“无赖”。司马迁虽然在形式上因有所忌讳,而不能不规避其词,说什么三代若循环的王道,然而一到了他的具体叙述里,便反而倒转过来,被统治者所骂的盗贼俨然而成圣王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地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

最后,我们知道,在《史记》写作的年代里,儒家已经被汉王朝宣布为一种类似国教的正宗,借此正宗,才如董仲舒的对策所说的,不使百家并进,而后统纪可一。然而,司马迁却站在表章《六经》的反对方面,把《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传统一样看待,而无差别。这也是他独到的科学论断。

我们纪念伟大的富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应该研究他的伟大著作,接受这份丰富历史遗产。

(原载《人民日报》1955 年 12 月 31 日)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任继愈

司马迁曾说过他写《史记》的目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司马迁写作的目的,决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从历史事件中探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中的“成败兴坏之理”,也还在于探寻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这也就是他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惜这一些庄严的词句被后来一些无知文人用作自吹自擂的滥调,中国古代有不少的文人,只要写历史,都要大言不惭地宣称他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就近于无聊了。像蒋介石御用学者钱穆也在他写的历史书中自称为“究天人之际……”不但是无知,而且是无耻了。

我们研究古代的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是只看他主观的愿望,而是要根据事实来作具体的分析。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上的伟大的成就,这里不再重复论述,就以他的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来说也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

---

① 《报任安书》。

一

在宇宙观方面，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一样，都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道家思想的传统，接受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不是由于超现实的精神性实体或上帝创造的，而是由于物质世界本身的原因。世界是物质性的：

>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①

这正是先秦以来，老子学说的继承。“气”的原始状态是“混混冥冥”的，在它没有形成任何具体东西以前，还说不上什么“名称”，所以叫作“无名”。“无名”决不是不存在的东西，而是最根本、最原始物质性的实体。至于人类的生命、身体的起源，司马氏父子也提供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们认为：

>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②

这一段中所说的“神”的性质，张守节在他的《史记正义》中说：“混混者，元气神著之貌也。”《史记集解》引用韦昭的话也说：“声气者神也，肢体者形也。”张守节和韦昭都是沿袭了秦汉以来唯物主义哲学对“神”、“气”的一般的理解来注释《史记》的。司马谈父子继承了周秦以来唯物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认为气是一切事物的根源。自然界和人类都是由气产生的，和神或上帝没有

①② 《太史公自序》。

关系。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宗教家故意把“神”说成精神性的、永存的上帝或鬼神。这种观点和古代唯物主义是鲜明对立的。司马谈父子采取了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处在对立的地位。

唯物主义从来就是和自然科学密切相联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司马谈父子都是“世掌天官”,司马迁本人就是精通天文科学的一位专家。汉初的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都是以道家的哲学作为骨干的。更具体地说,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根据的。郭沫若先生曾说过:“(阴阳五行)这一思想在它初发生的时候,我们倒应当说它是反迷信的,更近于科学的。在神权思想动摇了的时代,学者不满足于万物为神所造的那种陈腐的观念,故尔有无神论出现,有太一、阴阳等新的观念产生。对这新的观念犹嫌其笼统,还要更分析入微,还要更具体化一点,于是便有原子说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现。万物的构成求之于这些实质的五个大元素,这思想应该算是一大进步。”①

司马谈父子的哲学,就接受了当时最流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高涨和广泛传播是秦末、汉初哲学发展的总趋势。相信阴阳五行学说的不止邹衍一派,像《吕氏春秋》、《礼记》的《月令》、管子的《四时简》、《淮南子》都是的。就是那些不满意唯物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像董仲舒,和后来的班固,也采用了阴阳五行的间架而充填了一些唯心主义的内容。《汉书》的《司马迁传赞》,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这虽是班彪和班固对司马迁的不满,认为司马迁不是正

① 《十批判书》,第405页,人民出版社版。

统，意存贬斥。古代也曾有些好心肠的卫道者，认为司马迁并不是“先黄老”而是“尊六经”，这种“爱护”恰恰掩盖了司马迁的进步的一方面。司马迁被正统派认为“异端”正是他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

司马迁参加了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制定“太初历”的工作（前104）。他和当时全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唐都、洛下闳、邓平、儿宽、尊、射姓、司马可、宜君、淳于陵渠、壶遂等二十余人共同制定了新历。新历改正了周秦所用颛顼历长期所积累的差误，避免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缺点。

在汉朝的统治者看来，制历一方面是为了装点刘姓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的新气象，另一方面这部精确的历法却直接对生产起着指导作用。这部历法就是以后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夏历”的基础。它的特点是以建寅之月为一岁之首，以包括冬至节的那一个月后两个月为正月。人们过年的时候正是冬闲的时候，适当地配合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节奏，因而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司马迁是制定历法的主要参加者，他的阴阳五行的学说充分表现在《史记》的《律书》和《天官书》中。其中有些观点和周秦时代《礼记》的《月令》的哲学思想极为接近。据说汉代“太史令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①。

司马谈父子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有它的缺点，认为“大（太重视）祥（吉凶预兆）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但是他们还是承认阴阳五行学说在解释“四时之序”，天道运行方面“不可失也”。

我们说司马迁在宇宙观方面，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唯物主义传统，并结合了他的精深的科学造诣，建立了他的唯物主

① 《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旧仪》。

义哲学的世界观,完全是有根据的。

司马迁在天文学方面,根据丰富的科学知识,说明天体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具体而精密地观察了天象、星座的位置,从而说明天象运行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由人类推算出来的自然现象。这种科学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打击宗教迷信的武器。今天看来,《史记·天官书》所记载的两千多年以前星球的运行、星座的位置和中国古代第一部记载星象的著作《甘石星经》具有同等不朽的价值。《史记》精确地记载着几百个星体、星座,并指出它出现的时间和季节运行的规律。

但是也必须指出,司马迁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今天的科学成就相比,应当说是不够成熟的。汉代的天文学虽然已经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但也残存着古代占星术的影响。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还相信天上某星的出现和运行会造成人世上灾难和幸福,比如他曾认为金星在南,会"年谷熟";火星与木星合、火星与金星合的时候,不可以用兵,用兵就会"大败"。岁星与金星争斗,"其野有破军"等。

在音律方面,他也相信某种音律和社会上的用兵的成败、刑罚的适当与不适当有一定的联系。

"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熟)万物也"。他利用当时的科学成就,从唯物主义原则,在更多的方面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说明。他在音律方面提出有乐理学根据的理论。这一贡献的哲学意义就在于他根据科学的事物否定了圣人由他的主观意图可以创造音律的唯心主义观点。

司马迁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现象中某些偶然先后联系出现的事件看做内在的必然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司马迁在主观上固然反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迷信思想,但是这种占星术的残余所留下的"天人感应"的观点势必给宗教唯心主义留下了活

动的地盘。

虽然如此,科学的局限性没有使司马迁放弃对宗教迷信思想的战斗。司马迁在宇宙观方面一直进行着反对目的论的斗争。他要尽可能地用人事来说明人事,而避免用“天道”来说明人事。《史记》记载着项羽失败时,自称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指出项羽的失败是他自己的过失,而不是什么“天意”:“(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①

蒙恬被秦二世赐死时,自以为有功,不当死,但他最后认为赐死是他修长城、修驰道时曾经堑山堙谷,犯下“绝地脉”的罪过的报应。司马迁也批判了这种迷信的思想:“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脉哉?”②

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思想,在当时是有他的实际意义的。因为当时统治者御用的学者,像董仲舒这一批人,从各方面搜求“证据”,论证天是有意志的,天子是代天立言的,王权是神授的。从而教导那些被统治者必须乐天安命,安心当奴才,不要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还力图“证明”富贵贫贱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只要按照统治者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办事,奉公守法,就会得到好的结果。这种从思想上麻痹人民的反抗思想的手段是反动的,也是毒辣的。司马迁由于他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更主

① 《项羽本纪》。

② 《蒙恬列传》。

要的是根据历史上大量的事实,他对当时统治者从思想上奴役人民的教条提出了怀疑。他在《伯夷列传》中对于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不为暴力屈服的伯夷、叔齐兄弟的殉道行为表示敬仰,并对宗教迷信、天道有知的观念提出了怀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者可谓善人者非邪? 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 非邪?”①

司马迁这种怀疑是带有“叛逆”性格的。作为一个精通古今历史事变的专家,他所看过的古往今来许多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事实刚好证明统治者所宣传的那一套教条全是鬼话。安富尊荣的,经常是那些最贪婪、最无耻、最低能的剥削者、寄生者。至于那些善良的、忠诚的、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们却经常遭到凌辱、迫害、折磨和贫贱的痛苦。这是什么“天道”呢? 对“天道”的怀疑构成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司马迁另外的著作中:“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 私于私者自相悲兮! 天道微哉,吁嗟阔兮! 人理显然,相倾夺兮! ……顺逆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②

---

① 《伯夷列传》。

② 《悲士不遇赋》,《全汉文》第二十六卷。

司马迁在这篇简短的抒情诗中倾泻了他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悲愤的抗议。他诅咒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倾夺和欺凌，他也指出了天道的渺茫和天道的无知。

司马迁要在不合理的社会中企图寻找所谓公道，他要探寻人类的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真相。因而他探求的问题自然从宇宙观转向了社会观、历史观。

二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司马迁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首先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天和鬼神的力量。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①"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是古代相传的宗教迷信的成语。司马迁在这里给它以新的、排除宗教迷信的解释。他认为所谓"祯祥"不是什么祥瑞、符命的出现，而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政治清明的现象。"妖孽"也不是什么"妖怪"事物，而是"贤人隐、乱臣贵"的政治混乱现象。这种打击神圣宗教思想决定国家兴亡的进步思想，是极其珍贵的。

司马迁的功绩不仅在于摆脱宗教迷信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并且在于他积极地建立了他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于历史的看法。

司马迁的《史记》固然主要记载了帝王将相的世系和事迹，这和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英雄伟人创造历史的基本观念是

① 《楚元王世家》。

分不开的。但是我们更应当注意的乃是他还记载了许多小市民、一向被人轻视的、在社会上不占地位的小人物的许多值得尊敬的事迹,他精密地观察了历史上极丰富极生动的事实。他给仅仅称王几个月的陈涉以极高的历史地位,甚至和正统派一向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汤、武并称。他歌颂这一群揭竿而起的奴隶们,肯定了他们在推翻秦政权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也初步意识到社会上各阶层、各种不同的职业中的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功绩,这种历史家的见识是极可贵的,可以说是古代历史家中绝无仅有的范例。至少,司马迁对历史发展已具笼统的整体的观念。当然,司马迁也还是承认英雄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客观上,他这样去写历史,势必不自觉地妨害了少数人物包办历史的旧观念。既然把历史的发展的动力放在人物的身上,自然排斥了天意、天志的作用。司马迁第一次,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把历史看成人类自己活动和创造的历程,而不再是实现神的意志的工具,不再是被神意早已安排好了的,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司马迁为了通过历史的事实更有力地揭露社会上的压迫、欺诈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他大力歌颂了给人们解除困难不惜以身命相殉的游侠人物;称赞那些为民除害的“循吏”;给那些残下媚上的坏官坏事写下了《酷吏列传》。这都表示司马迁的憎恨暴力,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

就在这些具有善良愿望,具有进步意义的表现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的弱点。司马迁向往公平、要求社会合理、他希望能有真正为被压迫者(因为司马迁自己也在某些方面和被压迫者有着同样的命运)主持公道的社会,但是他看不见(也不可能看见)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也不知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也看不出历

史发展的方向。他最后不得不又回到“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1]的旧轨道。他憎恨暴力，同情弱者和人民，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阶级社会内政权的实质就是和暴力强制分不开的。抽象的“仁义”，不过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需要，硬把它说成全民共同的道德规范和千古不变的是非的标准。司马迁找不到他所憧憬的公平时，便发出对天道怀疑的怨言。这种怀疑天道的怨言是清醒地认识历史的第一步。但是要真正认识历史，要从历史发展本身中进一步探寻，社会历史的现象是最复杂的，司马迁和古代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使他在这方面无能为力。当他没有能力用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时，他不得不对宗教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作重大的让步。像他在《东越列传》中无法解释东越何以能长久统治，而归结为其先世可能“有大功德于民”，所以“历数代常为君王”。在《韩世家》中认为韩国有“阴德”；在《魏世家》中认为秦统一海内是命定的（天方令秦平海内），认为李广有卓越的战功而不得封侯是八字不好（数奇）。他虽然力图摆脱宗教迷信的思想，但是最后不得不求救于茫茫的“天道”。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也曾提出过极有意义的见解。他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哲学家的优良传统，企图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原因。他认为人们关心自己生活的幸福，谋取个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的要求是不能遏止的：“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

---

① 《吕后本纪》。

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①司马迁这种说法,确实触到了正统派的思想家的隐痛所在,因而惹起他们的不满。说他离经叛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②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卫道者的不满,不但不足以贬损司马迁的价值,相反地倒是更可以见出司马迁的伟大。

司马迁把每一个人对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并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③。这不是无的放矢,正是对那些荒淫无耻、唯利是图,但又"口不言利"的统治者们有力的打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正统派,秉承了汉武帝的意旨教导人们不要讲什么利,只要讲明"道"、"义"就够了。这就是汉代统治者向人们标榜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对策)。统治者只要自己广收天下人之利,反而自称为"清高";他们要扼杀人们生存权利的要求,却宣扬什么"正义"!这真是最自私、最贪婪、最无耻的道德教条。司马迁在这里从根本上给以揭露,他公开宣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为了"利"。为利并不是什么错误。要求生活过得好,这是每一个人起码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出自天性,无法制止的,只有最愚蠢的统治者才与民争利,只许自己得利,而不许别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司马迁在这里更进一步对生产发展作了初步的分析:"故待农而食之,虞(从山泽中贩运特产的人)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

①③ 《货殖列传》。

② 《汉书·司马迁传》。

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①]司马迁企图用经济原因,生产和交换的双方需要的客观情况来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与可能,并指出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各人为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而努力工作着,这种愿望既是出于自然,而又符合客观需要,这就是“道”之所在。他还论证了求富是“物之理”、“人之欲”,从而从许多实际的事例中驳斥了那些不允许人民言利的伪善者们的谎言。更值得注意的,司马迁在这里力图在经济原因中说明社会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司马迁以“求利”的观点来打击当时伪善者,并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这是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当然,他的“求利”的观点也还是唯心主义的想法。他和今天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剥削别人,危害集体的利益的思想,无论在性质上,在客观作用上都是不相同的。今天的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是反动的,不能和司马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战斗性的重利的思想相提并论。

司马迁也企图从经济生活方面寻求道德产生的根据。他继承了管子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②]问题虽然不是新提出的,但是和当时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有战斗意义的,这是针对统治者们所宣扬的“仁义”出于天性,宣扬先天道德观念的唯心主义观念而提出的反驳。统治者为麻痹人民,一再宣称服从统治者的剥削制度,叫人从思想上放弃反抗的企图才是“仁、义”,他们又说“仁、义”是每一个人生来具有的品质。

---

①② 《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谓道德仁义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统治者所要求的道德内容完全一样,因为他虽然是统治者中间不得志的人,但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过司马迁强调指出,统治者不要以为灌输一切道德教条就可以生效,首先要满足人民起码的生活要求。有了衣、食才会接受那一套道德规范。在客观上,这种学说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

司马迁进而给求利致富者以理论根据,"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①。他在韩非以后,继续提出自由竞争的思想,公开为当时的工商业辩护,他又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②他对那些为统治者死心塌地当贫贱奴才的人物进行指摘,认为那是可耻的;他对那些强取豪夺而发家致富者也进行抨击:"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③

总起来看,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在宇宙观方面,根据当时天文学的知识,并继承了先秦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因而对于当时的目的论的宇宙观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更为卓越。他根据丰富的历史材料,从事实上说明天道无知,天道茫茫,从而打击了和宗教迷信长期扭结在一起的天帝鬼神决定人类命运的社会历史观点。他并且尽可能地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身去说明自然现象

①③ 《货殖列传》。

② 《太史公自序》。

和社会现象。但是他也和古代许多唯物主义者一样，常常用自然现象来附会社会现象，用天上星象解释人世上历史的变化，因而使他的哲学思想和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的宗教迷信观念有时划不清界限。司马迁为了摆脱神权支配的影响，他力图为社会、历史发展寻找它的物质原因。因而在历史观方面有着古人所少有的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是有着一定的历史过程的。因为："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①]司马迁当时的科学发展、生产技术，以及各方面实践活动，如果和今天来比较，显然还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因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尽管达到了他可能达到的高度，如果和今天比较，显然是很不够的。毛主席早已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的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②]

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告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上的历史的变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社会历史变成为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后堵塞了唯心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2～283 页。

观方面的隐藏的洞穴。另一方面,毛主席的指示也告诉了我们,就在社会历史这一科学领域内,由于人类的实践,即使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前也还是有些片面的了解。也就是说在社会历史方面,古代的哲学家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也还提出过符合事实的见解,并不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无所知。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重新检查司马迁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和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点进行斗争时所提出的论证和论据是有历史意义的。通过对司马迁的哲学思想的初步探索,使我们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变革是和它的文化继承性有着辩证的联系,而不可以割裂的。

(原载《新建设》1956 年第 6 号)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

陈可青

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文章,对司马迁的史学作了新的探讨。通过这种探讨,我们对司马迁及其著作的研究,已经取得新的成绩,并将继续提高一步。

早些年,某些《史记》的研究者,曾对司马迁的阶级立场作过分析,认为司马迁多少不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史记》是"人民历史",作者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或者说,司马迁写某些人物和事件,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这些看法,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批评。批评者着重论证司马迁是地主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不曾站在农民的立场,更不是什么人民历史家。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批评是用否定司马迁的进步思想来立论的,转向另一个极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一样,都没有能够正确阐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 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富利论

司马迁的富利思想,最早是班彪和班固指出来的,班氏父子同声指责司马迁写《货殖列传》"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他们的批评出自封建正统主义的立场,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然而班

氏父子看出了司马迁"崇势利","羞贱贫",也就多少抓住了司马迁思想的一个关键,不过加以曲解而已。司马迁不是完全的势利论者,而是富利论者。《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指出了社会上一切人等,上起王侯君卿,下至匹夫编户之民,熙熙攘攘,奔忙不休,都只为了一个"利"字。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指出人们只要拥有大量财富,就可以比作"素封",可以"比千乘之家"。他从物质利欲出发,又提出了一个"富"字。司马迁论述许多问题,拿富利当头,这是和当时的正宗儒学"好语仁义"而闭口不言功利的思想相对立的。司马迁对于势,并不推崇,而是反对的。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讥讽当时的弊政和流俗。他对于武帝统治集团的权势,有许多不满的议论,他更强烈反对直接利用权势去发财致富。所以班氏说司马迁崇势,是曲解之辞,所说的"利"和"羞贱贫",却多少有些道理。司马迁的确是富利论者。

司马迁的富利论实质上代表着中小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从理论上竭力为"匹夫编户之民"争取求富的权利——"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贫富之道,莫之夺与";"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第二,歌颂不是滥用法外的政治暴力,而是"本分守法",通过经济剥削致富的地主和商人的事业,提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求富途径。还详细列举了本富末富的财产标准,指明达到这些标准,就可以位比"素封","与千户侯等"。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为汉代蜀卓氏等九个富者,即九个大地主商人作传,表彰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令后世得以观择"。这实际上是确立一些榜样,鼓励中小地主和商人走他们的路,成为大地主、大商

人。第三,对依恃爵邑俸禄,凭借政治权力,巧取豪夺,“为权利以成富”的权贵大地主、豪强大地主和大商人公然表示鄙视和不满。这不仅有《货殖列传》的论述,《平准书》也指出“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他们的兼并掠夺成了武帝时代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平准书》又揭露封建中央政权大规模的征调及“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造成社会经济大破坏,吏治混乱,社会动荡。因此,《货殖列传》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对策。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地主阶级的中下阶层与上层(包括皇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有政治势力的大商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地主阶级中下阶层和上等阶层的矛盾,是这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整个说来,他们是与农民处于对抗地位的封建剥削阶级。司马迁的富利论并没有超出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恰恰是歌颂了剥削。但是他非议利用政治暴力进行法外的超经济剥削,反对大地主阶级的残酷掠夺和兼并,要求给中小有产者以自由发展的余地,这种思想和主张,无论是从反对封建专制或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说,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司马迁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代表他们说话,提出维护他们利益的富利论来,这就使他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和历史产生了许多互有联系的观点。这里只举《货殖列传》的几个例证,如传首批评《老子》一书中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保守思想,指出它在近世行不通,表现了作者关于社会经济和历史的发展观点。又如他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辩护,说明农虞工商事业的重要作用,指出封建专制政权的征调和经济垄断政策违背社会经济的自然规律:“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又如他为“匹夫编户”争取求富的权利,以经济现象去解释道德:“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又如他在考察人们何以认为工商末业是最好的求富之道时,发现只有占有大量财富,才能使人卑下之,畏惮之,才能役使之,获得更多的财富:“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从财富不等看到了社会关系中人的地位不等,看到奴役与被奴役的现象。这些都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突出的社会政治观点,夹杂在他的富利论中而和富利论扭结在一起。

二　政治上与封建专制政权的矛盾

《史记》的主要部分是写汉代社会的人和事的,通过关于当代人和事的论述,表达作者的政治观点。概括这些观点,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政治上与武帝的中央封建专制政权既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这种矛盾,首先从他对于武帝所兴功业的态度上表现出来。汉朝自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击灭项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政权,到武帝即位,已经七十余年。其间,经济上逐渐趋向繁荣,政治上阻止吕氏之政变,削平诸封国侯王的反叛,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武帝继承了这样一个政权,这样繁荣的经济摊子,统治和剥削的欲望空前增大。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进行了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掠夺和“建设”事业,一切政治、法律和道德,都随着这个庞大的事业旋转。

司马迁对于武帝的功业,有肯定,也有批评。他肯定其某些

功业的本身;批评的是武帝穷奢极侈的贪欲和竭尽全国财力民力,使社会经济沦于枯竭。《汲郑列传》借汲黯之口指责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是用概括性的一句话,对武帝所作所为一个总的揭露。《大宛列传》指明武帝遣使通西域,其经济目的是想得到大宛、大夏等国的奇物,其政治目的是宣扬“威德”。《西南夷列传》指出通西南夷,并巴蜀,是为得邛竹杖、蜀布、枸酱。《历书》揭露武帝制历企图效黄帝造历而不死。《儒林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批评征贤良文学是为了笼络士人。至于武帝封禅、祭祀、敬鬼神、妄想骑龙成仙登天,《封禅书》竭其讥讽之能事。而《平准书》集中指出这些功业给社会带来了经济的破坏和政治的腐败。

>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武帝功业的是是非非,是与他的富利论相联系的。武帝“多欲”的结果,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的动荡,广大中小有产者破产,《平准书》结尾说秦亡的影子似乎又在摇晃。司马迁的政治理想,是回复到汉初“开关梁,弛山泽”,宽缓无为,与民休息,稳定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广大中小有产者都得到

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政权巩固。而武帝的做法完全不是这样,这即是司马迁所不满的。司马迁对汉朝封建中央政权的巩固与否,并不是不关心,但他从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为武帝政权祝福,也非规劝,而是采取了批判主义的揭露,他没有越出地主阶级的基本立场,但是站在当时的封建专制政权的对面,成了专制政权的反对派。

其次,司马迁通过许多人物传记,把武帝中央政权的人物划出三个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专制的黑暗面。一、与皇权有瓜葛的权贵,骄横专断,仗势欺人,如武安侯田蚡、大将军卫青、御史大夫张汤等;二、为了从皇权中分享利禄,俯首帖耳,恭谨自保,如丞相公孙弘、石庆等;三、一些正直不阿的人,总不为这个政权所容,如将军李广、中大夫汲黯和司马迁本人。司马迁这种论述,使自己在这个统一集权中扮演了反对派的角色。

第三,司马迁在法律和道德论上,与最高当政集团所实施和宣扬的封建律令、道德观念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同样带着现实的政治性质,是他与封建专制政权政治矛盾的一部分。《酷吏列传》记载武帝时代郅都、杜周等十一个酷吏,以他们惨酷的声迹,赤裸裸的言论,暴露了封建律令的虚伪和酷吏统治的黑暗。杜周逮人最多,冤杀也最多,他专凭人主的旨意和自己的意志断狱,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律令并不以成文为限,皇帝所是,酷吏们自己所是,即是实际的律令。《酷吏列传》还指出酷吏整治的对象,既是不听命的贵戚,官吏和豪强,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指出酷吏们打击了豪强大族,自己变成了新的豪强,他们是直接受武帝指使"为权利以成富"的官僚豪强地主。针对这种种情况,司马迁在这个传的序文中提出法治和德治兼施而以德治为"制治清浊之源"的主

张。对这种主张,不能只从学派的范畴——司马迁是儒家还是法家、提倡法制还是提倡德治这样形式主义地片面地去理解,必须从司马迁所代表的特殊阶级利益去揭示它的实质。如果这样来考察,就可以看到,它依然是反对法外的残暴镇压和强权剥削,与他在富利论中反对"为权利以成富"的思想一致。武帝时代的封建律令和酷吏统治,主要用来对付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打击统治阶级内部反抗中央政权的社会势力。司马迁从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揭露酷吏的黑暗和律令的虚假,同时也表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深深的同情。

司马迁的道德论,从经济关系出发把道德区别为"鄙人"的道德和"侯门"的道德,透露出道德是为物质利益服务的。"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①]。所谓侯门的道德,亦即最高统治集团和正宗儒学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司马迁看来,这种道德和封建律令具有一样的虚伪性。在外戚田蚡、大酷吏张汤、丞相公孙弘诸人的传中,记载着这些参与专制政权,仗势欺人,刻剥吏民,媚上蒙下的权贵,却又是正宗儒学和仁义道德的推奉者。实际上他们也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用仁义掩盖其贪欲。所谓鄙人的道德,主要指没有权位的布衣之侠的道德。司马迁歌颂了布衣之侠朱家、郭解等人的事迹,并把他们和豪暴之徒区别开来。"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在司马迁看来,"暴豪之徒"形式上是游侠,实际上也是"为权利以成富"的豪强地主和大商人。司马迁在道德概

① 《游侠列传》。

念上觉察到上层统治剥削集团和下层中小有产者不同。在道德的实践上又觉察到中小有产者与豪强地主大商人不同,这就划分出了权贵地主、豪强地主、大商人与中小地主的道德界限。司马迁既揭露了权贵地主虚伪的仁义道德,又批评了豪强大族的强权道德,而歌颂了中小地主及下层人民群众的言信行诚,救人之困、不爱其躯的侠义道德。爱憎取舍之间,显露出司马迁道德思想的倾向性。

以上的分析,说明司马迁在政治、法律和道德问题上与最高统治阶层的矛盾是广泛而又深刻的,而且不仅是司马迁个人的矛盾,它们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及封建中央政权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我以为对这种矛盾的理解,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主要的阶级的线索。

三　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说他著《史记》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在书中,作者处处贯穿这种目的,议论激烈独到之处也突出在天人关系和古今变革两个方面,使本书成为一家之言的著作。在司马迁的时代,天人是否相应? 皇权是不是神授? 天道变不变? 历史变不变? 封建统治秩序变不变? 这些既是学术理论问题,更有政治实践意义。司马迁在这些问题上,要树立起一家之言,提出与正宗思想不同的见解,这和他在经济上与封建主义垄断政策的矛盾,政治上与最高统治集团的矛盾,是相联系的。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司马迁面对三种皇权神(天)授的论说: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这是最带有权威性和欺骗性的理论,因为它通过皇帝当面对策,以儒家经典为根据,又为当代最大的

儒家学者所创造。二、鲁儒生的五德终始说。它本自战国时邹衍的学说,用最简单的五行数为皇权神授说教。三、方士们的神仙术。它以所谓黄帝成仙的历史证据,企图使人们相信帝王可以与神仙相通。对于这三种论说,司马迁通过具体的历史考察,通过激烈的议论,或者发出深深的怀疑,或者直接揭露其虚妄。

《孟子荀卿列传》批评了五德终始说的创始人邹衍,指出邹衍制造这个学说,是为了苟合当世,获取利禄。其方法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即是说,这种历史理论,并不是详察古今历史之变,从具体历史变化中找出成败兴衰的道理,而只是根据学者人云亦云的朝代盛衰相更替,去附会灾异祥瑞,推演出五德相胜的历史论,这是一种先验主义的理论。《秦始皇本纪》指出始皇按邹衍的学说,自居水德,"刚毅深刻,事皆决于法",最后不免导致灭亡。《封禅书》对方士们行邹衍的五德之说不通而流演为神仙鬼神之术,一语道破,并且具体拆穿了汉文帝时代关于水德、土德之争的不可信。司马迁关于邹衍及汉初五德说的批判,一方面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同时在历史理论上是一个贡献。

对于方士们神仙说的荒诞无稽和秦皇、汉武信奉神仙邪说的愚妄,《封禅书》进行了尽情的嘲笑和讽刺。方士们妄说黄帝封禅成仙,《五帝本纪》以朴实的笔墨写出黄帝的事迹,并指出"黄帝死,葬桥山",暴露了方士们的捏造。

司马迁对董仲舒的学说,没有正面评论,只在《儒林列传》淡淡提到其特点是"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而《天官书》却称"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称赞孔子,等于非薄了董仲舒,因为董仲舒是依孔子《春秋》中所载的

灾异去穿凿历史的。司马迁懂得文史星历,掌握天文学知识,但古代的天文学与迷信思想夹杂在一起,例如占星术即是,《天官书》中占星术的痕迹也是斑斑可见的。但是,我们应该区别天文学中的占星术和董仲舒神化皇权的天人感应论,前者是科学幼稚阶段的产物,后者则利用迷信成分,有意加以发展,制造出一套"说"来,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有的论者不作这种区别,笼统地说司马迁是步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并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历史学中来,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

司马迁在天人问题上不只直接评论了以上三种学说,还在全书范围内考察了天命天道的有无及其作用问题。他在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时,常常有意识地去验证天命天道,最著名的有《伯夷列传》,其余诸如论项羽的成败,评白起、蒙恬之死,述王翦祖孙三代的命运,惜李广怀才不遇,颂张良等人的功力,等等,验证的结果,常常得到反证性的结论。

《伯夷列传》反问说,好人常常饿死或早夭,而坏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天道为何如此不平呢?特别在当代,"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责难天道,有他的富利论为基础。在这里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天道决定人的命运是不可信的,可信的是贫富和势利。他看到许多豪富之徒,利用暴力和财力,侵吞并兼,富厚累世不绝。而根据他的富利论,"匹夫编户"出色的经营经济事业,也可以达到富厚。司马迁的富利论与天命天道决定人的穷富亨达的理论,在根本上是矛盾的,非薄天命天道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

在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司马迁也没有放过对天命天道的考

察,例如,秦汉两朝的统一,这是《史记》包括的历史时期内最大的两次变革,司马迁的论述,在过去和现在都引起一些人的费解和争论。关于秦统一,其事迹详略载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六国年表》序文指出秦统一的两个条件:即一、秦经历了百有余年的发奋图强,为始皇统一奠定了基础;二、六国争雄的局面为秦统一提供了机会。接着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这即是说,秦统一既不是靠德义,也不全是穷兵黩武和地理条件,"盖若天所助焉",有它的奥秘在,这奥秘不是当时的俗学浅识者所能察觉到的,司马迁自己多少是看到了,即前文所说的两个条件。司马迁虽然说了句"盖若天所助",其实并不表示相信天命。

关于楚汉相争,楚败汉胜,高祖定帝业,《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及诸传的论述偏重在"人心众望"四字上。司马迁评述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不懂谋略,不善于用人,滥杀士兵和群众,并指出"(项羽)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他认为刘邦懂谋略,善用人,讲政治影响,注意民心,所以成功。《秦楚之际月表》序文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看来,似乎狂热地歌颂高祖受命而帝,其实只说了一句话,"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看来,把高祖歌颂得神圣又神圣,其实把高祖的神圣帝业纳入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史记》形式上称道天命天道的地方,还有一些,其性质都与

前面的例子类似。当然,司马迁在一些问题上还相信命运、数奇,个别处也说过循环论的话,这是神秘主义的消极错误的东西。

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考察了古今历史的变化,往往表现出历史进化论思想,例如他以激烈的议论,大胆肯定秦统一的作用,"世异变,成功大"。指出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变化,足以为后世汲取教训,不一定"上古"。司马迁歌颂了陈胜、项羽的功绩,把他们的功绩和汉的统一联系起来,"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在这里,他把陈胜、项羽放到秦汉之际推动历史变革的英雄人物的历史地位,这和前述他把高祖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是一个道理。司马迁评述陈胜、项羽和刘邦的观点,是和历史进化观联系着的。

这里可以总述一下司马迁上述历史观和他的阶级立场的关系。第一,前面已经指出,司马迁非薄天道能决定人的穷富亨达,是以富利论为基础的,这是从中小地主阶级的富利论进到历史思想上的天道怀疑论的显著例证。第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司马迁在政治、经济上与武帝统治集团的矛盾(包括他个人的遭遇)是他的进步史学思想的基本来源,因为正是这种矛盾,使他不必向现实的封建统治集团阿谀苟合,不必为它作过分的歌颂,也就不必用天命论及其他的神学理论去美化皇权。这种矛盾反而促使他去考察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而当发现某些历史真相时,敢于承认这种真相,这就产生了天道怀疑论和历史进化论。当然,司马迁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形成,原因是复杂多端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他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他具有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利用了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他漫游全国,接触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重

大影响。然而司马迁是批判主义的史家，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择取各种思想观点和资料，而在批判取舍之间，他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现实的政治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　太史公怎样成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司马迁是武帝政权中的太史令，自称太史公，位虽不高，毕竟是朝廷的重要官吏，为什么没有充当最高统治者的喉舌，而成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呢?

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政变中的社会民主派时指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马克思这里虽然说的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情形，但对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所进行的阶级分析，是有普遍意义的，也适合分析司马迁的著作和思想的阶级性。

现在我们简单地研究一下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和他的思想之间的关系。

《太史公自序》说"苍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根据如此简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自述,司马迁的出身只能大致推想如下:他的曾祖无泽是汉初职位不高的官吏,掌管工商交易。祖父喜为空头的九等爵五大夫。父谈于武帝建元年间始为太史令,此时司马迁年已九、十岁上下,大概谈为太史令前,还在龙门以农为业(此处参考了季镇淮《司马迁》一书)。司马迁一面参加"耕牧",一面读古文。这样一个家世,颇似中小地主的家世。司马迁这种出身和亲自参加过"耕牧",可以设想为他重视农虞工商生产事业,维护中小地主阶级经济利益,批评大地主阶级"为权利以成富"的最原始的阶级思想基础。

司马迁的家后来迁往茂陵,他自己不久开始了漫游。他在茂陵和漫游途中,接触到许多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和民间的疾苦,这是他的思想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种思想变化,在《史记》中历历可见,例如他在茂陵,可能闻见豪强大族的状况和政府对待豪强的政策,于是就有《货殖列传》、《平准书》和《酷吏列传》关于豪强和酷吏的论述。他在茂陵见过郭解,他从郭解身上看到了与上层统治集团不同的道德面貌,为他作了传记,发挥了独特的道德论。郭解"家贫,不中訾",而被当作豪富,与豪富一并迁往茂陵,上从武帝起,下至一般人士,都把郭解这类人和豪强大族看作一路人。对此司马迁甚为感慨,因此在郭解等人的传记中,再三申明要划清上层剥削者与下层人民的不同道德界限,特别指出不能把郭解等布衣之侠"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

司马迁是个好古更好今的学者,他著《史记》旨在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又主要是论述汉代的事情。可以说司马迁面向现代的作史精神,幽明深察的历史见解,序传人物和历史问题的鲜明情感,生动翔实的文采,无不与切身经历联系着。司马迁几次出使和漫长的游访,便是经历的重要

内容之一。《自序》中说,他曾到过江淮、会稽、沅湘、汶泗、齐鲁、梁楚、巴蜀、昆明等地,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政治、生活、风尚,都有真情实感。惟有这种真情实感,《货殖列传》对全国各地的物产民情才能写得那样真实详明。惟有这种真情实感,才能在理论上得出许多创见,例如他在实地考察之后,了解到各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而要获得这些物产,必须从事农虞工商生产事业,四者是社会经济分工缺一不可的,是"民所衣食之源"。司马迁的这些思想,必须与封建专制政权的横征暴敛,权贵豪强的巧取豪夺发生对立,因此发出许多激烈不满之辞。

司马迁在游历中,还收集到各种历史传闻,黄帝的遗闻得自江淮等地的"长老",韩信的轶事得自淮阴人。民间的传闻,显著地影响着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观点。由此可见不论是记载现实问题,或是叙述历史事件,司马迁必不可免地把民间群众的感情和意向夹带到了他的著作中来。

司马迁后来继父业为太史令,他对这个世职感到自豪,曾经希望效忠朝廷,继父志修史,特别是汉史。他仰慕孔子作《春秋》,把《春秋》看作大有益于政治的著作,希图按《春秋》的宗旨来写《史记》。但汉代太史令的地位,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他感到某种贱迁的不安。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加深了他对法律、吏治和道德的认识,加深了和封建专制政权对立的异端思想。

司马迁出狱以后,虽然又作中书令,但是"尊宠任职",并不表示急转直下的政治地位有多少改变。他忍耻苟活,把刑余的生命全部投到《史记》的撰作上去。他仍然按照《春秋》的精神去著《史记》,但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却有了新的认识,说"孔子厄

陈蔡,作《春秋》","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把自己的遭遇与孔子的蒙难联系起来,把《春秋》看作"发愤"之作,这就和一般的正统学者对《春秋》的看法有了重大区别。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在《自序》中传述董仲舒关于《春秋》的观点,而说司马迁作《史记》的宗旨本自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思想,当然,也不必绝对否认司马迁和董仲舒的思想联系。

从司马迁的出身和经历来看,他最初带着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特点,抱着效忠汉朝,扬名后世的志向,希望为汉朝统治服务。在漫游和访问中,感到现实的状况并非完全是美好的,又带着效忠汉朝,匡正国家的期望进入朝廷,开始了在朝的政治活动和修史事业。终于遭受莫大的屈辱,绝了一切攀登爵位和"忠诚为国"的希望。于是,事情走向它的反面,司马迁站到了封建专制的对面,他的著作《史记》亦成了主要是讥刺和剖析当代的"谤书"。

(原载《新建设》1965 年第 1 期)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白寿彝

一　顾炎武提出的问题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切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顾炎武指出这个问题来，对于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

在顾炎武举的五个例子中，《平准书》末的原文是："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话来批评桑弘羊的法外剥夺、"兴利"害民的。《王翦传》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翦、王贲、王离等父子祖孙三代惟知以战争杀人为事，终于必败。《刺客列传》末："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

也！曩者吾斥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似是借鲁勾践的话表示对荆轲行刺失败的惋惜,惜其术之不精、准备的不足。《晁错传》末所记邓公语是:“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指出晁错是因忠受戮,而景帝处理不当。《田蚡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借武帝自己的话来表示武安侯罪不容诛,但却逍遥法外,而魏其侯反以武安侯之诬陷而死。除了《刺客列传》外,其余三例都不只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评论,还表达了司马迁讽刺当代政治的微旨。这几个例子,并不是《史记》中“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但都恰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恰好是位置在篇末。这在顾炎武,好像是有意把它们找来放在一起的。

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的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152~153页)曾称道《叔孙通传》寓论断于序事的笔法。确切,《叔孙通传》使用了丰富的表达形式体现了作者的论点,是很值得我们一读的。

《叔孙通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文章一开始,叔孙通就以一个面谀的人物上场。那时正当陈涉起义,反秦军势如破竹。二世皇帝诏问博士诸生。有三十多个人提出来,要发兵平定反叛。二世恼了。叔孙通上前说:

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

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这话很使二世喜欢，二世赏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还拜他为博士。司马迁对此没有明文评论，却紧跟着写道：

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

这是借秦诸生的话说出了对叔孙通的评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一次评论。

在汉高帝时期，叔孙通作的唯一大事是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

这是借鲁两生的话指出定朝仪也不过是为了“面谀以得亲贵”，这是篇中出现的第二次评论。

接着，文章记朝仪的场面和汉高帝的反应：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朝仪，服侍得汉高帝直舒服到心眼儿里去。“吾乃今日知

为皇帝之贵也”,这是高帝自己的得意忘形,也是对叔孙通的这套本事的赞叹。司马迁就借用了这一句话,作为从侧面对叔孙通的批评。这是篇中的第三次评论了。

原来叔孙通还有一批弟子跟着。司马迁写出这批人在定朝仪前后的嘴脸来。在定朝仪前,

> 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

到了定朝仪后,高帝既很得意,

>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这是借着叔孙通同伙人的话,从反面刻画出叔孙通的为人。这是篇中出现的第四次的评论了。

文章的收尾已在惠帝时期了。司马迁只记了两件事情:

> (1)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2)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这两件事都是"缘饰儒术"以逢迎皇帝。在这里,司马迁没有引用什么人的评论,却也正好符合鲁两生所谓"皆面谀以得亲贵"。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应,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在,他吸收的这些评论或反应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在《史记》的其他篇中,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曹相国世家》载百姓歌词,《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传》载赵良语,《樗里子传》载秦谚,《季布传》载楚谚,《魏其武安侯列传》附灌夫传而载颍川儿歌,《李将军传》载文帝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而《叔孙通传》是更集中地运用了这一形式。

二　最基本的形式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究竟还是历史叙述的形式。有的时候,他在文章内借用了当时别人的评论或反应以表达自己的论点,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已把论点表达出来了。对于春秋末年以后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于秦汉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表达形式是很显著的。

我们可以特别挑出《淮阴侯列传》来说。文章一开头,用韩信

的几件轶事写他早年不遇而意志不凡。接着通过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提出“如信者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与计事者”。这就把韩信在当时楚汉斗争中的可能的重要作用,被突出起来了。接着,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这指出,汉军第一次有了大将。从这时一直到破项羽以前,韩信是汉唯一的大将。这正如张良所说:“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①]在拜将以后,文章记载了韩信跟汉王的对话。韩信在这里分析了楚汉不同的群众基础、楚战略上的失计,提出了汉应有的对策。像这样针对全局的看法,不只汉诸将提不出来,甚至如张良、陈平等著名谋臣也没有提出来过。文章在这篇对话之后,紧接着说:“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就是说,这篇对话成为汉抗楚的决策。文章给了它很高的地位。后来班固在《汉书》卷三十四、司马光在《通鉴》卷九,完全抄录了《史记》这一段记载,大概对这段记载的重要性也都是有所认识的。荀悦《汉纪》卷二基本上袭用了这一段,但结以“于是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也”,而删去“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在分量上就差多了。

文章用最多的篇幅写韩信的战功。写他佯渡临晋、阴袭安邑以破魏,背水为阵、引成安君空壁而出以败赵,奇袭历下、囊沙壅水以破齐。并在破魏后写出了“破代兵、禽夏说、阏于”,在破赵后写出了“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太史公自序》说:“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司马迁是在着意写这些重大战役的,把它们写得有声有色。文章在这里,决不像写樊哙、郦商、夏侯婴、

① 《留侯世家》。

灌婴、傅宽、靳歙等的武功那样，去写斩首若干级、捕虏若干人、降吏卒若干人、所部卒斩虏若干人，定郡县若干处、得丞相、将军、二千石以下若干人。也不像写曹参的战功那样，老是写"从攻"什么、"从至"什么、"还定"什么、"从击"什么。文章写的是韩信如何指挥全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此外，文章还写了韩信对于汉王作战的支持。第一次是写汉败于彭城之后，"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使"楚兵卒不能西"。第二次是"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第三次是汉相继败于荥阳、成皋后，汉王夺了韩信伐赵胜利之军而使韩信另"收赵兵未发者击齐"。这三次的支援都是强有力的支援。可见韩信的武功不只在他自己所指挥的战场上，并且还在于投入重要力量于楚汉决斗的战场上以至于垓下的最后消灭项羽。

文章写到韩信破齐后，立为齐王，上半篇可说告一段落。在这以前，已经是"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章用具体的史实来肯定韩信的成就。到了下半篇，文章着意去写韩信对汉王的知遇之感及非其罪而死。它主要记了四件事情：二说、一擒、一斩、一烹。

二说，是武涉和蒯通的先后说韩信。武涉说："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蒯通也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他更说韩信"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之行不通，指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但文章记韩信对武涉的答复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

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韩信答蒯通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文章用这两次的对话,一方面更肯定了韩信的功高,另一面也表明了韩信对汉的心迹。

一擒,是汉高帝以计擒韩信。文章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以为淮阴侯。"文章写这一段,妙在写得不明不白。对于韩信造反,只从高帝口中说出。但紧跟着这一段记载,文章写了一句:"信知汉王畏恶其能。"这虽是写韩信的想法,但这里用一"知"字,实际上是轻轻地肯定了他这一想法。

文章在后面写韩信被斩的过程,是先写韩信辟左右、絜陈豨之手,密语反汉。再写韩信计划"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后因舍人弟告变,为吕后诱入,"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三族"。这一段写得很有破绽。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绽。梁玉绳说:"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武)涉(蒯)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英)布、(彭)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陈豨)。宾客多(陈豨)与称病之人(韩信)何涉,左右辟则絜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梁玉绳归结于"信之死冤矣。……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

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①。这话是很有见地的。《通鉴》卷十二袭《史记》所记韩信絜陈豨手密语跟陈豨造反串写一起。就大失《史记》的原意了。

文章最后写高帝要烹蒯通的故事:

>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
> 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写这段故事,也只是要写高帝对韩信之"畏恶其能"。因此,信必不可释,而教信谋反的人倒可以无罪了。方苞《望溪集》卷二《书淮阴侯列传后》说:"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征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叛于天下既集之后乎?其始被诬以行县陈兵出入耳,终则见给,被缚斩于穹禁。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其与陈豨辟人絜手之语,孰闻之乎?信之过独在请假王与约分地而后会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这对于司马迁的文章是有较好的体会的。《汉书》卷三十四的《韩信

① 《〈史记〉志疑》卷三十二。

传》袭《史记》之文而把蒯通的这个故事删去了,使全文大为减色。顾炎武认为,这使韩信传“寥落不堪读”[①]。这“寥落不堪读”,不只是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之文章上的损害,也是全传精神上的损害。

通观《淮阴侯列传》,作者只着意写历史并不写评论,而韩信的生平既跃然纸上,他在事功上的成就及他的非其罪而死也就历历可见了。但《淮阴侯列传》的更大成功还在于通过韩信的生平,写出了当年局势由汉开始拜将定策,到楚汉对峙、到汉兴楚灭的历史发展过程,写出了楚汉对抗的矛盾到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转化。写一个人的生平,决不脱离当时整个的局势而孤立地去写,这是《史记》的很大的出色之处。在《淮阴侯列传》里用了一小半的篇幅写韩信的非其罪而死,这在司马迁不是偶然的,这表现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侧面。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里,曾广泛使用了以历史叙述表达历史论断这一基本形式。他善于通过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去说明、论断历史问题。他着意去写一定时期中的风云人物。他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吴起传》、《商君列传》、《李斯列传》都属于这样的篇章。他同样着意去写虽非风云人物,但可供以集中反映问题的人物。他的《万石张叔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平津侯列传》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佳制。

三 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的问题,以见作者

---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

意指。

我们还可以《淮阴侯列传》为例。这篇文章写韩信精于用兵而疏于自全，自以为能而有功，不措意于汉高帝的猜忌。文章写定燕赵后，汉王袭夺韩信张耳军，韩信并未因此引起什么警惕。定齐以后，韩信请立为假王，汉王发书大怒骂，而韩信仍懵然不能理会汉王对自己的反应，方且以为言听计从。他不听武涉、蒯通的游说，也全然不理会功高震主的危机，方且"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灭项羽后，"高祖袭夺齐王军"，韩信由齐王徙为楚王，似犹未觉察自己处于危疑的地位。到了进谒被擒，他并不谢过，还说"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从此他才"知汉王畏恶其能"，而他自处的办法却是"常称病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甚至于在这时候，韩信还可以跟汉高帝有这样的对话：

>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
> 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 上曰："于君何如？"
> 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
>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因此，他就终不免于被害，而高帝对于他的被害也就"且喜且怜之"了。

司马迁写萧何，在《萧相国世家》里写这位"刀笔吏"出身的政治家却有迥然不同于韩信的一套办法。文章先是写：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拒)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其后,在汉十一年,

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悦。"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在汉十二年,

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悦。

萧何不只随时考虑如何解除高帝的疑忌以自全,还考虑到子孙的安全。文章说: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像这样小心谨慎，还不免于触高帝之怒，曾被囚禁于廷尉。但这在当时究还只能算是小小的风险，毕竟是跟韩信的下场有天渊的不同。“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司马迁是有意地把韩信跟萧何对照着写的。这当然是写出了两人历史的不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汉高帝统治下政治倾向、政治气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萧相国世家》是《史记》的第五十三卷，《淮阴侯列传》是第九十二卷。以萧韩相比，是隔了三十八卷的书来相比的。而《史记》卷一百零九的《李将军列传》和卷一百一十一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却只是相隔一卷而对照着写起来的。中间相隔的这一卷是《匈奴列传》，也是跟这两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两篇文章里，写出李广跟卫青、霍去病的出身不同、治军不同、战争经历不同、所享名声和下场也各不同。

文章写李广的出身是“世世受射”，“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屡次参战力征，“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卫青的仕进则是由于“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文章写道：“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后来官至大将军，自己和三子都封侯，当时有人就说青：“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霍去病是卫皇后姊子，并且是“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后来就一直青云直上，“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文章写“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文章对卫青治军，无所称述。对霍去病，则说：“少而侍中，

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文章写李广的战争经历,着意去写他的勇略。写他以百骑遇匈奴数千骑,沉着对敌,使敌卒引兵而去。写他以四千骑当敌四万骑,"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在写卫青、霍去病屡次出击匈奴,并无这样的场面,也缺少对战争的正面叙述,而他们的战功多是在诏书里提的。对于霍去病所部士卒的优越条件,一则曰:"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再则曰:"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对元狩四年的出击匈奴,写道:"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接着,写了他们的战功。最后写出:"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这似乎是说,虽有胜利,而损失很重。文章又说,此后"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原来后来竟因此而无力再出击匈奴了。

文章先后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左右以为广名将也"。"匈奴畏李广之略"。"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并记李广因受卫青督责,"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文章记卫青,则说:"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写霍去病,是写他"日以亲贵","上益重爱之"。

司马迁对于这三个人的记述,是显然有所轩轾的。在两篇列传的论赞里,他是说明了这样的意思的。他对李广的论赞是说:

>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对卫青、霍去病的论赞是说：

>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这就点明了：《李将军列传》写的是一个将才，《卫将军骠骑列传》写的是两个为君主宠幸的没有将略的腐才。这也不只是要写这三个很不相同的将军，更写的是对匈奴战争的用非其人。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论赞里就更明确地说出这个意思了。他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史记》中有不少篇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至如两人的合传，如《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和叔孙通都以"口舌得官"，而两人的为人大为不同，放在一篇文章里，正好相得益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的是两个外戚，但这两个外戚放在一起来

写,也就更可看出两人的不同来了。

四 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就表达出来了。

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开卷记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似是轻轻的一笔,却是点出了这个人物的特点。此后用很大篇幅写了吕不韦对子楚返国的奔走经营,就是写他不过是为了"奇货可居"。甚至于他使客著书,"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也是写他用了一种抬高物价式的办法。"贩贱卖贵"这一笔,可说就是对吕不韦的评价。

《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像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王,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是求"所自处"。列传写李斯全盛时,"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后来李斯跟赵高合谋立二世,"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李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都是在最紧要关头上,李斯念念不忘的全部是"自处"的利害。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

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陈涉世家》在篇末写:"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辨,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颐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这个故事是位置在陈涉起义、由首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像是可有可无。但这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在斩了这个农民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他是 这个小故事形象地写出了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用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卫将军骠骑列传》说:

>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这一方面是在写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同时也在写女宠在政治

上的作用。《万石张叔列传》说:

> (万石君长子)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
>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这当然是写石建、石庆的恭谨。但他们的恭谨对于他们自己做官,很有好处。在同一篇文章里说:

> 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
>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这可见,文章写他们那样恭谨的细节,并不只是写他们,而是要通过这些去写当时官场中的一种恭谨自保,讲究作官的政治风气。像这样的人,从不在朝廷上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从不提出对国

计民生的主张，却偏能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偏能长期的作大官以至作到丞相。文章写这些恭谨的细节，实际上是对当时官场的腐烂风气的尖锐的讽刺。

司马迁曾在好几处写到狱吏。《李斯列传》写："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曾被捕治，及出狱，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韩长孺列传》记："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燃，即溺之。"这些记载，也不只是写个人经历，而是写狱吏淫威，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这都是跟写《酷吏列传》的精神相通的。

司马迁对于细节的描写，有时也用两两对照的办法：《刘敬叔孙通列传》写了这两个人穿衣服的故事。对于刘（娄）敬是这样写：

> 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

对于叔孙通是这样写：

>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这两个小故事写出不同的品质，不同的风度。

《魏其武安侯列传》曾有多处写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人的不同，并专就田蚡对待窦婴态度上前后的变化写了两条。一

条是写窦婴当权,田蚡初起的时候:

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侄。

又一条是写田蚡作了丞相后的事: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即灌夫)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

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

这两条都是关于细节的描写,前后对照起来看,就把一个贪慕势利,骄横自恣的人刻画出来了。

以上所说,都属于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形式。司马迁的书中也有专门议论的史论形式,也有夹序夹论的形式,这就都需另谈了。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 年第 4 期)

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

——表面尊孔实则反儒

蔡尚思

关于司马迁的立场和学派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他的立场是反动的,完全是为封建地主制度服务的;有的说他是超阶级的;有的说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人民的歌手。有的说他的学派是道家;有的说他是儒家;有的说他的中心思想是渊源于其师董仲舒;有的说他是儒、道、法兼容并蓄,等等。我则认为,司马迁实际上是倾向墨家任侠的,是比较进步的,既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和法家。

一

司马迁是文史哲三学的结合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古来学者多称赞他的史学、文学,而少称赞其思想。我认为他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是自成一家的思想家和历史家。现在试据史实加以论述。

中国史学有两个体系:

一个是以孔子为始祖、以班固为大宗的非信史实录派的史学体系。我年轻时,曾写过一本《春秋研究》,指出《春秋》有褒、贬、讳、悯四个特点。孔子作《春秋》,是以礼教为目的、以历史为手

段,使历史为礼教服务,是为自己代行“王者之事”而作的。

另一个是从齐太史、南史氏开始到司马迁集大成的信史实录派的史学体系。“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

如果要说还有一派,那就是以刘知幾为代表的既主张直书,又肯定孔子的曲笔。这是由于他不敢违反名教的缘故。古来凡有名教思想者无不如此。

司马迁的思想颇复杂,古来以他为儒家者,是误认他为班固;其实,马班二人的思想是对立的。古来以他为道家者,是误认他为司马谈;其实,父子二人的思想也是对立的。连袁枚、谭嗣同下至不少近人今人,也都说“司马迁论六家要指”②,而不知论六家要指者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

康有为说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孔子也不例外。我认为,司马迁作《史记》,也可以说是托孔改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孔子,大用酷吏,高压臣民。贯彻的是外儒内法、儒法合一政策。司马迁在此时私著《史记》,就不得不于外表上突出孔子在诸子百家之上,称他为“至圣”,自称《史记》是继承《春秋》的,吹捧它为“礼义之大宗”;同时也由于“孔子布衣传十余世”,为“言六艺”的学者所宗,有如诸侯之传国③。但是,《史记》的内容,却到处与孔子的思想大唱反调,他的巧妙做法是抽象尊孔,具体反孔;表面尊儒,实际反儒。例如,司马迁特列项羽于

---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随园随笔》与《仁学》卷上。

③ 《史记·孔子世家》赞语。

本纪，与三代帝王、秦始皇等处于同等地位。孔子《春秋》能有此种正偏成败平等的思想么？吕后有皇帝的实权而还没有皇帝的尊号，司马迁特把吕后与高祖同列入本纪。孔子《春秋》能有此种男女政权平等的思想么？封建政权，丞相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司马迁对人只论德才而不论权势，独不替许多为丞相备员而"无所能发明有著于当世者"[①]立传。孔子《春秋》和后代史家能有此种朝野尊卑地位平等的思想么？司马迁特列陈胜于世家，与孔子处于同等地位。孔子《春秋》能有此种士农贵贱平等的思想么？吴越秦楚与中原各国同列为世家，连匈奴也被说是夏后代的苗裔，黄帝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孔子《春秋》与《左传》、《公羊传》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鲁而外诸夏，内中国而外四夷，有此民族平等的眼光么？司马迁写《项羽本纪》、《伯夷列传》、《蒙恬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而不为当时第一大儒的董仲舒单独立传、不录其《天人三策》，说明司马迁既反对孔子的迷信天命，也反对董仲舒的迷信神学、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司马迁特为游侠、货殖、滑稽等立传，而加以高度赞扬，这是用社会眼光与历史事实去反对孔子思想的。司马迁痛斥法家韩非的惨酷寡恩，特为酷吏立传，也含有痛斥汉武帝大用酷吏的用意。

后代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反对司马迁列项羽于本纪、列陈胜于世家；史学家欧阳修把中国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则天下降在后妃传中，这和司马迁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儒家信徒班固没有读通《史记》，就妄加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

---

① 参见《史记·张丞相列传》。

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1]不知游侠也称"任侠",出于墨家的"任"。司马迁独敢称赞民间的游侠,以与王朝相对抗,这正是司马迁的又一长处。班固反对司马迁,才真是"此其所弊也"。不知自责而妄责人,班固未免太颠倒是非了。

从班固批评司马迁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以后,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认为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代表了司马迁的思想。道家信徒司马谈认为只有道家能包括各家所长而无其短;儒家信徒刘歆、班固认为只有儒家能包括各家所长而无其短。[2] 司马迁和其父司马谈的思想大不相同,对儒、墨、道等家都有称赞。我们怎能把他们父子混为一谈以至父冠子戴呢?清冯班说得好:"孟坚云:先黄而后六经,是合父子之论而一之。"[3]司马迁敢与其君汉武帝、其师董仲舒、其父司马谈大唱反调,这是站在墨家立场上,反对儒者"亲疏尊卑之异"[4]的,也才真正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只看《孔子世家》,就会误认他为儒家信徒。如清王应奎说汉四百年尊孔子者无如司马迁[5]。刘鸿翱说司马迁尊孔孟为班固所不及[6]。陈作霖说"推尊孔子,……实自司马迁始"[7],这些都是缺少根据的。如果只看《游侠列传》,又会误认他为代人鸣不平的墨家信徒。他暗骂汉武帝,从不称赞董仲舒,这就更可以看出他的反孔反儒思想了。古代的史学批评家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详见《汉书·艺文志》。
③ 《钝吟全集·读古浅说》。
④ 《墨子·非儒》下。
⑤ 《柳南文钞·司马迁论》。
⑥ 《绿野斋文集·读史记》。
⑦ 《可园文存·驳班史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论》。

以刘知幾为第一,但他既斥项羽为"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不应列为本纪①;又斥"陈胜起自群盗",不应列为世家②,认为"迁之纰缪,其流甚多",而深信班固的谬论③。可见刘知幾也同班固一样,比不上司马迁的。扬雄论司马迁为"不依仲尼之笔"④,他哪里知道这正是司马迁超过了孔子而自成一家之言之处。郭沫若在司马迁祠院里题诗,说他"功业追尼父",不合事实。司马迁的真正思想是反对尼父的,其史学功业是超过尼父的。我同意冯梦祯肯定《史记》为"六籍以来最为钜丽"的著作⑤;最反对尤侗斥《史记》为"秽史"⑥,朱熹、钱穆以推尊左氏、司马迁者为"自欺"⑦。真"秽史"、"自欺"者,倒是《春秋》,而不是《史记》。

从东汉以后,历代王朝始终不变地以儒家孔子思想为指导,因而哲学方面,以儒家信徒董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等为道统代表;史学方面则以儒家信徒班固、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王船山、章学诚等为传统史学代表。从哲学、史学乃至文学界,就其指导思想而论,都是孔子儒家统治的天下。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思想上的儒家统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二

司马迁的思想,较为复杂。他从经济史方面总结出一个唯利

---

① 《史通·列传》。
② 《史通·世家》。
③ 《史通·探赜》。
④ 《法言》。
⑤ 《快雪堂集·新镌史记序》。
⑥ 《尤西堂全集·读东坡志林》。
⑦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巴蜀书社版,第136页。

史观,深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而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富成为各种人的目的。他说出经济的重要性,富才能强国,富才能发家,富才能行德,富才能扬名,富可“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富可使风俗改变。[①]

他从政治史方面,总结出一个唯势史观,说:“夫以汲(黯)郑(当时)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②]但司马迁是很反对这种世俗传统势利观念的。司马迁认为政治是没有多大是非可说的,所以肯定庄子的话后,说:“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③]只要窃得国家政权,包括仁义等等什么都有了。

他是非常钦佩和称赞任侠在民间为人鸣不平的,概括来说:一、任侠非常需要。如“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士穷窘而得委命”,“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二、言行相称。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三、损己利人。如“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自己“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四、只问是非,而不问亲疏。如郭解姐的儿子,强迫人饮酒,被杀,郭解认为“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他不为外甥报仇。五、自责不怪人。如郭解自我反省道:“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以上三者可以看出:墨子、游侠都是只论苦乐是非,而不论亲疏人我的。六、不自矜其功。如

① 详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 详见《史记》之《汲郑列传》、《主父列传》、《廉颇列传》、《游侠列传》。
③ 《史记·游侠列传》。

“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七、任侠与儒教对立。如“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八、司马迁独敢与皇帝唱反调。许多任侠因与朝廷对立，被汉文帝、景帝、武帝诛死，而司马迁却特为游侠单独立传，颂扬他们。九、我读《史记》一书，从未发现有一篇像《游侠列传》这样不厌其详地反复称赞纪传中人物的。司马迁赞美游侠为“盖亦有足多者焉”，“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任侠既是出于墨家，表扬任侠，也就几乎等于表扬墨家。司马迁的思想主要近于哪一家，这就不言而喻了。

三

三十年代我在南京国学图书馆读历代文集，顺便草作了《中国史学批评史资料索引》，并曾略加评语。现选出关于司马迁的一部分附于篇末，既可补本文的不足，也可供读者参考。

古来有误认司马迁为极尊孔子者，如清王应珪、刘鸿翱、陈作霖等人，都是很荒谬而不合事实的。胡应麟对各史书评定等第，认为《书》、《春秋》是上等，《左传》、《国语》、《史记》是中等，《汉书》、《后汉书》是下等；《三国志》不与，范晔殁后，“史才绝”①。这也不对。清初姜宸英认为司马迁作《孔子世家》，并非尊孔子，只是以其与诸侯同尊周②。陈沣认为这是司马迁以孔子比周公。我以为，世家者世其家也，这是孔子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地方。

又有混君权与历史为一谈，甚至认为君权高于历史，历史就

① 《少室山房类稿·读汉书》。

② 《姜西溟全集·读孔子世家》。

是君权史者,例如,明缪昌期并称天道、君道与史为三权。[1] 甚谬。史权与君权实不两立,古来只有君权下的历史而没有史权下的君主。宋杨万里、清邓廷罗等批评欧阳修隔代修《五代史》,对一切君主"皆冠以圣"[2],"予朱温以太祖"[3]。甚是。就此而论,欧阳修一类史家真不失为家奴史家。李光地以司马迁纪项羽为非,班固传王莽为是[4],是非未免颠倒了。《汉书》是断代史,不列王莽于本纪,已属勉强;《史记》是通史,怎好不把项羽、刘邦并列于本纪呢?这主要原因,也在于李光地是王朝家奴之一。

对于《史记》的评价,以鲁迅称司马迁为史圣,最公正。

叶适讥司马迁为好奇,采次异闻[5];冯班说司马迁最不好奇[6]。我则认为司马迁是好奇的,但决不至于奇出信史实录之外。《史记》当然不可能全是信史实录,这不能苛求司马迁。

说到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撰史的异同得失,古来大抵有三说:马胜班说,班胜马说,各成其说。[7] 我同意马胜班说,因为:一、思想方面,马在武帝统治下,又身被腐刑,尚且敢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真是胆识俱全;班远在武帝以后,仍认儒家优于诸子百家,而大倡三纲旧传统思想,比之司马迁,真是相形见绌。二、史料方面,《汉书》太初以前袭司马迁,以后袭刘向父子,叙传袭迁兼

---

① 《从野堂集·策第五问》。
② 《二远堂诗文集·二十一史》。
③ 《诚斋集》。
④ 《榕村全集·书项羽本纪后》。
⑤ 《水心别集·史记》。
⑥ 《钝吟全集·读古浅说》。
⑦ 参见沈德潜:《沈归愚全集·史汉异同得失辨》。

袭道。[1] 古来公开抄袭他人大量著作者,无过于班固的《汉书》。三、文学方面,班不如马的生动活泼、雄深雅健。章太炎认为《史记》不如《汉书》之简,当然是事实;但简而不明,往往有太简之病,就是失而不是得了。

司马迁为什么独能写出《史记》而为后代史学家所不及?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一、学问广博。他为史官,有当时最集中的皇家图书馆藏书可供阅读。二、实地调查。他在青年时期就到东西南北许多地方亲身调查考察。三、社会因素。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四、个人遭遇。他很不幸,身受腐刑。五、很有史才。在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流的。六、胆识双全。他有进步的思想和较大的胆量。这是他成为“中国史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总的看来,中国历代史家、史书都很多,但论史识史德史才史学四长兼而有之的却只有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都谈不上史识,李贽也谈不上史才;至于谈不上史德史学的史家,那就更多了。

(原载《学术月刊》1988 年第 9 期)

---

① 章永祚:《南湖集钞·读前汉书》。

略谈《史记》的史论

曾庆鉴

《史记》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伟大杰作，体大思精，史文并茂，论史卓实，对史论的贡献很大。本文仅就书中史论上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一 《史记》的史论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里精心著作的种种史论，在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很有研究价值。《史记》中最常见的史论，有本纪、世家、八书、列传等各篇末的后论和十表的序论，还有《太史公自序》传后对全书一百三十篇所作的论赞。以上几种方式的史论，过去历史学家统称为论赞。此外，司马迁在《史记》各篇中还作了许多夹论，尤其是作者又善于序事中寓论断。总的来说，司马迁论史的方式不拘，各得其所。

《史记》史论的种种方式，与《史记》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体例一样，它虽然是继承先秦史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左传》的史论传统而来的，但它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著论的范围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了。因而《史记》在史论上，则有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的意义。后来，编年体的史论形式，虽仍沿袭《左传》，但纪传体的史论形式，多沿

袭《史记》。当然,此后有些史著,也有所变动,但变化都不大。其实,编年体史书仅用一种方式著论,而纪传体史书则用多种方式著论了。它们著论方式之所以不同,与两种史体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纪传体史书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它的立论方式就有必要多样化。但其体例在各个部分中又必须力求做到统一,即如《史记》在史论上所使用的各种情况一样。编年体史书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便于随时随处发论,不宜逐年逐卷著论,所以也没有必要以多种方式设论,它的体例当然也很一致,即如《左传》以"君子曰"所发论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在史论上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名称各别,但在史学上的意义并没有两样,即如刘知幾在《史通·论赞》篇所说:"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多种方式著论的用意何在?它在史学上又有何意义?我认为,这与司马迁对于史学的见识及其对于编著《史记》的目的要求,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司马迁实有继承和效法孔子作《春秋》之意,他在《自序》里一再引述其父的遗教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并且他还认为:"《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而《春秋》之指,则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里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也是他的史学见解。再因司马迁先世曾掌史职,本人学识渊博,又有史才,工于制作,为继承父业,发誓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因司马迁遭李陵投降匈奴事而触怒汉武帝致祸后,更是兢兢业业,发愤著书,欲遂其志,"故述往

事,思来者”。即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及如左丘失明无目,孙子膑脚,绝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上可见,司马迁之著书立说,抱负不凡,用心良苦。所以他在《史记》中论载古今,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上下贯通,体圆用神,故其书在史学上能具有纪传体通史的特殊性质并有创始意义。

正因《史记》是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通史,所以他在《史记》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著论、述赞和作序,在史论上来说实有创新的意义,在史学上来说又有不同的作用。

一是所谓论赞的论,刘知幾在《论赞》篇说:“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于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这段话主要有两点看法:一者刘知幾认为史学家作论是为了“辨疑惑,释凝滞”,即如《左传》设论之义。实际上,《左传》的史论,其义也不只于斯。因《左传》“君子曰”所论史事的内容和实质,大都是以仁、义、忠、孝等伦理道德为准则,寓褒贬,别善恶,以评论人事上的功过是非和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宋人李石撰《左氏君子例》就认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义。……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①]故《左传》史论的史学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但大多是为了说教。再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著《史记》,篇必有论,史论成例,虽自此始,但“史论之烦,实萌于

① 《四库总目·经部·春秋类存目》一。

此"。也就是说，有得有失。不过，我们从刘知幾所论的前后文来看，他也是以《左传》的史论为准绳及其本人对于史论的见识，来评价史论的作用和评议《史记》史论的得失的。其实，《左传》虽没有逐年逐卷著论，但有些年卷则多处发论，而《史记》虽于篇终各著一论，但有些史篇也有多处立论。它们的史体不同，著论的方式和多寡也可以不同，不必强求一致。而且，它们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史体，评论它们的史论价值，应着重看其所论史事的内容和史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史记》的史论，大都是从实而发，少"强生其文"著论，而《左传》的情况刚好相反。因而，《史记》史论的史学价值是比较高的。

二是论赞的赞，它是司马迁的首创。即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所说："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司马迁作史赞的旨意，也如刘知幾在《论赞》篇所说："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每篇一条，既是篇目，又是提要，编在一起，次序井然，有如我们现在著书的目录纲要。它的作用，不仅便于读者查阅全书的篇目，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命篇的意图和要旨。我们把它结合起来看，实为一部通史大纲。条目前后相连，内容纵横贯通，文句简要，历然可观。所以，章学诚在《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中认为："史赞为古学之底蕴。"[①]这种史赞的称谓，司马迁本无其名。后来，班固撰《汉书》，才变为诗体，号之曰"述"，它仍合在一起，放在《叙传》之后。到范晔编《后汉书》，又改其"述"，名，呼之以"赞"，但分其条目，各附于篇末。对此，刘知幾大不以

① 《文史通义》外篇三。

为然,所以他才抨击"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子显)、李(百药)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①。不过,刘知幾在此也是从史书义例的角度来批评他们之失误的,但范晔本人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却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无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无论如何,对于司马迁作赞的创始意义和史学作用,我们是应当肯定的,至于后人的演变和得失,那是另一回事。

三是序论,即《太史公自序》和十表等史篇的小序。司马迁在《史记》里作此种种的序论,也是为了叙述作者著书、著篇的主旨。此种序论,实为《史记》史论的佳作,也是它的精华部分。对此,过去历史学家的评价都很高。如《太史公自序》,人们往往把它称为无韵的"《离骚》"。清人汤谐在其所撰的《〈史记〉半解》一书里就认为:"此文,系则追溯皇初,学则融贯诸家,迹则遍周宇甸,志则根柢忠孝,绪则渊源周孔,道则统承列圣,用则媲配《六经》。鸿哉伟论,拔地倚天,而文气浑沦深厚,浩荡杳冥,正如大海容纳众流,茫无涯际,其中百怪变幻。都归一片鸿蒙。宜乎二千年来,学士文人惟有之望洋向若而叹也。"汤氏之论,深有体会,亦得其要,并不过分。再如《史记》十表的序论,各篇长短不拘,史论互相结合,论述了作者著作的要旨和历史见解,它最集中地体现了《史记》史论的史学价值和作者的通变观点。刘知幾对《史记》的论赞,虽从各方面论长论短,但对《史记》的种种序论,则是充分肯定的。他在《史通·序例》篇认为:"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

① 《史通·论赞》。

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齐列矣！”刘氏这段话，既论及了史篇著序的体例渊源和创新意义，也说明了序论史文的“微婉之风”和史学特点。

实际上，《史记》的史论，都是司马迁的杰作，在《史记》中又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史论上也有其史学特色。

二 《史记》的史论特色

我认为《史记》史论的最大特点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实事求是，从实而论。且作者力求不主观武断，不任意褒贬，不附会偏见，不强加于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仅仅是就事论事，没有见识，没有是非，没有论断，而是论得其要，论出有据，史论统一，言之成理，故其史论在史学上也是一家之言。《史记》的史论，与其他古代史籍的史论比较起来，则有更多的朴素唯物论因素的特色。

大家知道，学术界自扬雄、刘向以来，都公认司马迁博极群书，“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这虽是对《史记》全书而言的，但《史记》的史论也同样具有这些优点和特色。

清代大史评家章学诚根据他平生读史研史的体会，对司马迁等人的史论更是推崇备至，评价极高。他在《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中认为：“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蒙幼初开,得其调达,正如春草初生,郁葱气象,妙于青碧有无之间,较夏器高粗,尤为美含不尽;而且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尽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务也。"①这是对四史论赞的一致好评,有助于我们深入去探讨《史记》史论之长处和特色。但是,对于编年体史书的史论,章学诚却认为:"攻编年史者,其人率多庸陋浅俗,所著议论,大抵迂拘不达事体。"②这看法,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比两种史体史书之史论的不同特点及其优劣所在。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四史的史论司马迁有首创之功,至于它们之间的异同得失,且当别论。

刘知幾在《论赞》篇对《史记》的史论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淡泊无味"。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史记》的史论在史学上没有多大意义和特色。实际上,他也是与其他史论对比而言的。在刘知幾看来,"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等。的确,司马迁的史论,没有像班固、荀悦那样用那么多的儒家"义理"教条去进行说教。这正好说明《史记》史论的史学特色及其长处。二是"事无重出"。"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也"。这点看法,是刘知幾的独到见解,也是他对《史记》史论的特别好评之处。清人牛运震在《〈史记〉评注》中称赞《史记》史论的特点就更加明确,他认为:"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参诸涉历所亲见,或征

---

①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

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千古绝笔。”这见解很全面、很深刻，评价也很高，也很具体地说明了《史记》史论的特色。

以上所述，虽然都是《史记》论赞的优点和特点。但是我认为，《史记》史论的最大特色，是紧密结合史事，从实发论，考论其真相，辨明其是非。而不是贩卖伦理教条向人们进行说教，也不是特意要为某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也不是着意宣扬某个学派的哲学理论而故弄玄虚。也就是说，它的史论，大都是司马迁从事研究大量历史文献所得的结论，以及其本人从事广泛游历和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作出的考论，他往往还把它们互相结合起来著论。为了充分论证它的这个重要特点，现在我们就按照《史记》各部分的顺序，引述数例而总观之。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于是，“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太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

祇迴留之不能去云。”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等等。

上面我们虽然从《史记》五个部分引述了一些史论例子,但是即使将类似的几十条都引述出来,其文字还不及《汉记》或《通鉴》的几条史论之长。而我们之所以要引述这些论例,是为了集中说明《史记》史论之求实精神的良好学风和特殊性质,而且也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其史论并非像《汉书》、《汉纪》的史论那样偏重于正宗儒学的条条框框,它是着重从史实方面下功夫著论,有如画龙点睛,并非画蛇添足。这正是《史记》史论的精华所在和史学特色。

三 《史记》的史论观点

《史记》的史论不仅独具一格,实事求是,颇具特色,而且它的论史观点更为重要,在史学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史记》论赞观点,与篇中史文的具体观点是一致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但是由于《史记》的史论观点很多,在此我们只能就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史学观点或进步观点,作些简要的评述。

首先,司马迁在《自序》里录其父所论“六家要指”,对孔子作

《春秋》，及本人著《史记》的论述和看法，都是学术史和历史学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学术思想和史学观点。太史公司马谈揭示了六家学说的思想实质和政治作用，并以分析批判的态度总结了它们在学术上的异同得失。他首先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接着又指出了各家学说的优劣，尤其是完全肯定了道家的主张，认为"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简直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作者对各家的评述，真是言简意赅，述其异同，论其作用，评其短长，清清楚楚。太史公这些观点很精辟，既反映了时代特色，也反映了它的阶级局限性。至于班固批判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说法，实际上则是他自己坚持"独尊儒术"的学术偏见。

司马迁论孔子作《春秋》的种种看法，也是史学上颇为重要的问题。他引述董仲舒的话，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和目的，是由于"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又认为孔子作《春秋》的主旨是"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特刺讥而已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而且，他还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历史政治作用是"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实际上就是说，孔子著《春秋》是有为而作，《春秋》又是统治者治国治民所必读的历史教科书。这是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重要史学见解，也反映了他的高明史识，而且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味道。所以，司马迁才自命要继承孔子的事业，发愤著书。其书有颂扬，有刺讥，有要旨，有微意，在史学上和政治上也都有其实际意义。因而，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

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笔削冠于史籍,题目足以经邦”。他的论见,有其一定的道理。

司马迁对《史记》的总结性看法,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史学问题。他在《自序》最后有很长一段话,不但从《史记》的编纂方法、文献资料、史学内容、思想观点等各方面说明了《史记》在史学上的成就,而且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著书论史确有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超越前人之处。总的来说,《史记》的史论观点,要之有如:作者“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论史观点,“究天人之际”的理论观点,“通古今之变”的通变观点,“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点,“富国富家”的经济观点,论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观点,以人心向背论史的进步观点,对待历史遗产和诸子百家的文化学术观点,以及所谓司马迁“述汉非”和“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是非观点等,它在史论上都有其时代特点和进步意义,也体现了司马迁论史的创造精神和独到见解,而且从他的那些观点,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具有相当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一定的科学性。所以,司马迁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祖师,《史记》也不愧为二十四史之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在《通志提要》所说:《史记》之书,“其例总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

这些仅是从大的方面,述评了司马迁在史学上和学术上的论史观点。

其次,司马迁在《史记》史篇里所著的序论、附论、夹论和《自序》赞语的大大小小论史观点,更是多姿多彩。或有继承,或有新意,或有深旨,或有微义。有些很精辟,有些颇细致,有些三言两语,有些通篇论叙。有的很有启发作用,有的还有方法论意义。总而言之,大都是形式体例不拘,论史实事求是,论点有理有据,

下面引述数端,略为评之。

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看法,虽是继承先秦历史哲学家重人事疑天命的进步倾向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当时盛行阴阳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说的历史条件下,它在史论上实有划时代的史学意义和进步意义。《史记》史论中所论及的"天",含义较为广泛,它虽然有时是指有意志的天,但往往是指自然现象、历史形势和个人际遇。如:八书论载"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内容,指的是自然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变化;《魏世家》称"天方令秦平海内"的"天",指的是战国时代的历史形势;《傅靳蒯成列传》称他们"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的"天",指的是他们的个人际遇。司马迁虽然承认天的作用,但常常又怀疑或否定它的作用,如:《伯夷列传》疑"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项羽本纪》批判项羽失败时强调"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蒙恬列传》批评蒙恬"轻百姓力","何罪地脉哉"? 等等。这些疑天或否定天意的史学思想观点,正是《史记》史论中含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精华之处。

在《史记》史论中最大量和最突出的是"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自序》中一百三十条的赞语,可说是《史记》的纲目提要,它前后相连,纵横贯通,通变观点,颇为明显。我们要是再把它与《史记》的各个部分和各篇的史论结合起来研究,还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通变的史学观点。例如十二本纪的论赞,则论述了从五帝到汉武帝时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相互交替的历史变化线索和要点。又如十表的序和赞,更是集中地论述了各个时期历史变化的特点,如作《十二诸侯年表》,是为了表达春秋时代"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作《六国年

表》,是为了"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作《秦楚之际月表》,是因秦楚之际"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此表;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是为了表达"汉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等。再如八书的论赞,论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历史变化观点,也非常明确:著《礼书》"以略协古今之变";著《乐书》"以述来古";著《律书》是因"律历更相治,间不容飘忽"(《索隐》:"言律历穷阴阳之妙,其间不容丝忽也");著《天官书》是因"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以观"天变";著《封禅书》是"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著《河渠书》是论载古今天下江河之水的"利害";著《平准书》是"以观事变"。至于世家和列传,是"委曲细事",论载史实所贯穿的通变观点,更是五彩缤纷,在此不可能一一尽举。总之,我们从《史记》"通古今之变"的论点中,不仅大略可以见到古代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而且从中还可以见到它所通变的是一些什么历史内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论历史上王朝的"成败兴坏"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也有很多精辟和可贵的历史观点。如论三代的兴废,他在《自序》赞认为:夏代,"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殷世,"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周朝,"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丰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只有几行论赞,就"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其兴废,评其得失,有因有果,有条有理,颇有诗意,一清二楚。再如论秦的兴亡,在《六国年表》的序论和《秦始皇本纪》篇

末附载贾谊《过秦论》，都是长篇之论，司马迁都有其独到的见识。他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我们从这条论见，不仅可以见到司马迁论史的卓越见识，而且他的论点还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又如论项羽的功过是非，他在《自序》的论赞认为："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又在《项羽本纪》附论进一步称赞其灭秦，指责其残暴，非议其失信，批评其不悟。项羽"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条论见，是人所熟知的名论，确实很精辟，也很可贵。

司马迁论史的观点，往往还含有微意，或有深旨。他在《自序》就认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在《匈奴列传》还认为："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因而，他很感慨地发论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晋世家》论晋文公，认为他是"古所谓明君也"，"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这些对于古代"圣贤""明君"的议论，实是以古讽今，词微义显，颇有深意。再者，他在《白起王翦列传》论其长短时，非议王翦"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没身"。在《李斯列传》批评其"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至天下"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在《蒙恬列传》也指责他不及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这些虽是对于秦代将相的公然批评，但也不是没有以古讥今之微义的。所以，他在《屈原贾生列传》才痛切地悲屈原之志，"适

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又在《管晏列传》称赞晏子之“见义勇为”,“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些史论之意,虽是微而显,婉而成章,但也反映了司马迁忠君、爱国和爱民的真实思想感情。不过,正如他在《老子韩非列传》所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总之,司马迁对史论的贡献是很大的,本文仅是从《史记》史论的史学价值、史学特色和史学观点论述了他的一些重要成就。但他也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史论也难免有糟粕。因篇幅所限,这方面就不再赘述了。

(原载《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

翦伯赞

一

司马迁的名字和中国历史学是分不开的，因为由于他的天才的创造，中国的历史学才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

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出生于左冯翊夏阳地方（今陕西韩城县南）一个世族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史学家。

司马迁曾经有过快乐的童年。在那时，他和他邻近的儿童一样，在他可爱的故乡放牧牛羊。但这样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十岁时，他父亲为了训练一个能够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就要他整天地在一间书房里读书，在那里他读了十年古文。

在这十年中，他从书本上获得了不少的知识，也积累了许多不是从书本上所能解决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就迫使他去作实地考察。二十岁时，他终于走出书房，开始游历的生活。他到过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问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的故宅；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府邸遗址；到过薛，访问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

鲁,访问孔子、孟子的故乡;此外,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他就在这样的游历中,把他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疑问,完全去掉了。

正当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漫游中国作访古旅行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地主却在积极准备为了中国丝织物的销路,而打开通达中亚细亚的国际道路。当时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知道了通达中亚细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另一条是从云南经由印度。因此汉武帝就想打通这两条道路。

不久,在长安城中,吹响了远征军的号角,而司马迁就出现为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的先锋。但他遭遇到西南夷人的抵抗,没有完成他的政治任务,就回到长安了。

司马迁回到长安时,他的父亲正病倒洛阳,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封泰山的典礼。在当时,参加这种典礼是一种光荣;不能参加是一种耻辱。司马迁赶到洛阳,他父亲已在垂危之中,不久就死了。唯一的遗嘱,就是要司马迁完成他的著作。

汉代的史官是世袭的。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继任为太史。以后,他就把写作历史当作他父亲的遗嘱而执行。他在皇家图书馆,整整搜集了五年的资料,才写定了他的著作纲领。到太初元年(前 104),司马迁便开始写著他的不朽的名著《史记》。

平静的著书生活,不过五年,灾难就从天上飞来。天汉二年(前 99),司马迁因为遭到李陵投降匈奴案子的牵连,受了腐刑。

假如司马迁有钱,也可以赎罪,但他家贫;假如有人替他向汉武帝解释,也许可以减罪,但武帝左右亲信大臣、司马迁朝中交游不为一言;因此,他的命运是决定了。当受刑之前,他也曾想自杀,但一想到他的著作尚未完成,就毫无愠色地忍受酷刑。

自从遭受腐刑以后，司马迁不但肉体变成了残废，精神也受到了最大的摧残。他往往"居则若有所忘，出则不知所之"，简直有些神经错乱的现象。但为了完成他的不朽的著作，他镇静下来，发愤著书，以至于死。

二

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这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自从有了这部书，西汉以前的古史，才第一次放出光明。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大概是没有人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他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替他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学方法写成的。

在纪传中，又分本纪、世家与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

本纪和世家、列传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本纪虽亦以人物为标题，但并不是传纪体，而是编年体。所谓编年体，即将某一皇

帝时代所发生的史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依次记录。实际上,本纪就是世家与列传的纲目,而世家与列传则是本纪的注文。

例如《汉书》记李陵投降匈奴事,《武帝纪》中只说:"天汉二年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而在《李陵传》中,则详述李陵和匈奴作战以及他投降的经过。

除纪传以外,有书有表。书的内容,是总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总序。表是排比史事或人物的世次或年代,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附录。但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

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陈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在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创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是值得赞叹的。

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例如他在《史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朝鲜;并且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亚细亚诸国。

其次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注意到表面的政治现象及文化思想宗教等,而且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演变,他的有名的《平准书》是后来各代史书的《食货志》(注:是谈社会经济的书)的典范。

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级,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人

物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地主、商人、学者、艺人写列传,也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即占卜的人)等人物写列传。

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纪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锐敏的眼光,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从《史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批判前朝的皇帝,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例如他评吕后,说她"政不出房户";评汉文帝,说"赏太轻,罚太重"。不仅批判本朝皇帝,而且指斥他的当今皇帝,例如他在《平准书》中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在《封禅书》中说汉武帝迷信神仙,把女儿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在相反的方面,他歌颂项羽,说项羽是近古以来未有的人物。他歌颂陈涉,把陈涉的起义比之于汤武的革命。总之,他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农民起义领袖,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人类的罪恶。

三

最后,说到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思想显然受到道家的影响,这从他的《史记》自序中可以看出。他在自序中说到诸子百家,甚至对于被当时统治阶级尊为正统的儒家学说,都有批评。唯有对于道家学说赞美尽致。班固批评他,说他思想有问题:因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所以"是非颇缪于圣人"。用

现代语说,就是对历史的看法,有些不合于当时的封建的正统学说,所以他就不能得志于封建皇帝之前。

司马迁因为不满当时封建统治者,敢于批判当时封建的正统学说,也正说明了他的正直。

虽然如此,司马迁的思想究竟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能跳出历史观念论的圈子,例如他说他写《史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也是为了"究天人之际"。同时他也不能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不论怎样,司马迁的劳作是不朽的。他所开创的纪传体的方法,两千年来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奉为正宗。历代以来,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甚至到现在,他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像这样天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

(原载《中国青年》1951年总第57期)

《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

齐思和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上的伟大成就。1955 年 12 月 22 日苏联学术界在莫斯科举行集会,纪念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年,这表现着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和一切伟大的著作一样,《史记》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条件的。当司马迁从事著作时,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西汉帝国达到了它最繁盛的时期。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耕种面积的扩大,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各经济中心之间进一步的联系,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标志着汉武帝初年的经济繁荣。在这个基础上,汉封建帝国进一步集中了政权。在对外战争上汉帝国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因而更扩大了汉帝国的经济市场。但是从经济繁荣得到便宜的只是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商大贾们,至于在土地兼并、高利盘剥双重压榨下的劳动人民就愈来愈陷于贫困,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到了汉武帝末年,农民起义运动在各地爆发起来。

全国各地区间的联系促进了汉帝国进一步的统一,同时在学

术思想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来。汉初学术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综合工作。汉政府对待学术的政策,在武帝以后也是要统一思想。在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便纠集学者编成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这是一部以道家思想观点来总结先秦诸子学说的综合著作。汉武帝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遂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白虎通义》便是儒家学者关于礼制的一种总结工作。

伟大的司马迁给自己提出了编辑一部通史的任务,也是在这综合、总结工作的气氛之下产生的。这个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在史学方面虽然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而且已有不少历史著作,如曾经孔子整理过的《春秋》,便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此外,《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都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些著作都只记载着某个时期,或是某些地区的历史,而不是叙述从古到今,包括全面的通史。在汉武帝时这些著作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秦汉之际,出现了一部名为《世本》的史书,此书至宋代已经亡佚。从各书所征引的看来,其中有纪、有传、有表、有世系,有作篇以纪事物起源,居篇以纪古地理,内容比较全面,体裁也和以前的史书不同,曾经司马迁参考采用。但它内容十分简单,很像一部类书。到了司马迁才独出心裁,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编写一部"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汉武帝时)",包括全面的通史。

如果我们充分明了汉初得书的困难,一般儒生的浅陋,我们便可能正确地认识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工作是如何艰难,他的成就是如何伟大。在汉初书籍多半是竹简写的,一部分用绸绢写的,得书十分困难。西汉末年,东平王刘宇以汉帝叔父之尊,要读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即《史记》),都弄不到手,一般人更不用说

了。在大学教书的博士们，也只能教授一种经书的一家解释（如《诗经》便有齐、鲁、韩、毛四家的解说），对于其他的书籍和一般历史知识，都是茫然的。但是伟大的司马迁却几乎尽读了当时所有的书籍。我们试把《史记》中所征引的书名综计一下，便可发现凡是《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司马迁时代以前的书籍，司马迁几乎都引用过了，而且其中有的是《艺文志》中所没有的。司马迁实在是西汉最渊博的学者，是古代的文化巨人。从他知识的广博而论，在古代只有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能和他相比，虽然两人研究的范围，注意的对象并不相同。

司马迁所以能有机会运用这样多的史料是和他所受的教育和后来的官守分不开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太史令，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尝著文论六家要指，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已经有编修史书的计划，并且常鼓励司马迁继续他的事业。司马迁十岁就学习古代的文字，掌握读古书的能力，青年时期又从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等学习经书的解说。司马谈死后，他继任为太史令。太史令是一个职掌天象历算的小官，并掌管宫廷的图书。修史虽不是他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保管图书的关系，遂有机会利用“石室、金匮之书”（石室金匮皆当时国家藏书之处）编写他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不但掌握了极端丰富的资料，他又是游踪极广的旅行家。他本人是生在陕西韩城县。从《史记》中看来，他西南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西昌、汉原，云南的保山、腾冲、顺宁等地；南边到过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边到过山东，游过曲阜，登过泰山，访过孟尝君的故居；西北到过甘肃，登过崆峒山；北边到过涿鹿，登过长城，足迹遍中国。到处参观历史古迹，考究民生利弊，访问故老传说，和他从书本得来的材料互相印证，这使得他对于

伟大的中国自然环境,各地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

司马迁根据大量的史料和对于现实生活极为丰富的知识,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努力,才杰出地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通史共分五个组成部分。十二个本纪,记述统治王朝与帝王的事迹,夏以前五帝合为一个本纪;三代和秦各有一个本纪,作为全书的纲领。十个表,以表列三代以来世系与年代。自三代以来,许多侯国,同时并存,各有纪年,非常复杂,司马迁列成十个表,统括了错综的年代与区域的发展,这种组织办法,是很方便的。八书以记礼乐制度,天文历法,经济水利。三十世家以记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侯国。七十列传,记述人物,其中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还有关于朝鲜、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地区的记载。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

《史记》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只有我们把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和他以后的史学发展加以比较,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他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在司马迁以前,中国虽然已经有了《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历史著作,但是这些书都被认为是《春秋》一类的书籍,大家是当作经学的一个部门来学习的。汉儒对于《春秋》,又专在"褒贬善恶"、"微言大义"上去穿凿附会,不是当作历史来研究,直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汉代国家图书馆的目录时,仍把这些书都列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包括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内),尚未把历史学认作是一个独立的学术部门。《史记》的出现刺激了研究历史的兴趣,指出研究

历史的途径,以后有许多人继他这部书,到了东汉初年,班固更用他的体裁纂修了西汉的历史,以后研究东汉的历史,魏、晋的历史,古代历史的人更多了,于是历史学遂“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晋初荀勖编辑图书目录时,因为历史书太多了,不得不单列为一类了,便从七部改成四部,把史学看做独立的学术部门,和经部、子部、集部并列。这种分类方法以后在中国相沿不废。而且在史学中尽管有编年、纪事本末等体裁,但是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体裁。所以在中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罗马的西塞录称希腊的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他自然是指着西洋的史学而言。我们可以同样说:司马迁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

当然,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在他这部著作规模的宏伟和他编排的体裁,而在于他这著作的内容,它的人民性与思想性。司马迁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先世“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种小官,自然是大人先生们所看不起的。幼年时,他曾参加过农业劳动,“耕牧于河山之阳”。他作了太史令以后,因替李陵解说,触怒了汉武帝,判处了宫刑。按当时的惯例,他若能花一些钱,是可以赎罪的。但他是一个穷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在狱中时,“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饱受了狱吏的侮辱与折磨,并且终于受了宫刑。从他自己的惨痛经验,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下所受的痛苦。因之,在他的著作中,他称赞陈胜、吴广的起义运动,将他们二人的事迹列入“世家”,以示尊敬。他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

狡诈无赖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他将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他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他表彰了椎埋屠狗出身、而敢劫杀诸侯、为国捐躯的刺客。他称赞“言必信,行必果”,仗义挺身,保护弱者,和暴力对抗的侠客。他揭露了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他揭露了武帝专制统治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恶残暴奸诈阿谀,公孙宏等伪儒的“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将军卫青、霍去病等的骄贵自恣,不爱惜士卒。他同情在残酷统治下人民的痛苦。他的爱和憎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的公论。

司马迁不仅记载了大量事实,他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和他父亲的不同。司马谈的思想是以道家为中心的,而司马迁则是一位儒家。这当然也和时代思潮有关。从汉初至武帝初年是道家思想盛行时期,从武帝初年以后,是儒家思想盛行时期。司马迁对于儒家的尊信在《史记》中充分表现出来,如列孔子于“世家’,称孔子为“至圣”,孟子、荀卿,诸大儒等都有列传,七十子、汉初儒林有汇传,儒家的活动在《史记》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对史料的甄别去取,也用儒家的标准,所谓“考信于六蓺”,而抛弃其他各家“其言不雅训”的说法。

但是,司马迁对于汉初儒家思想,并不是毫无批判地全部接收的。他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合理部分,如提倡仁义,反抗暴力,厌恶战争等思想。但西汉儒家盛行“天人之学”,相信上天直接监视、支配人间的行事,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解释成上天意志的表现。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即是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司马迁虽是董仲舒的学生,但他不相信这种迷信的说法,也没有把他的学说写到《史

记》中去。在《封禅书》中,他更充分地揭露了方士的欺诈。到了班固才给董仲舒立了专传,采录了他“天人策”的全文。并且把儒家阴阳五行的思想编为《五行志》,来补充《史记》的缺略。司马迁和班固对待阴阳五行思想看法的不同,即是司马迁高出于班固和其他多数汉儒的地方。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这种批判精神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司马迁也不满意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唯心说法,和儒家所提倡的安贫乐道、自甘贫贱的消极态度,他很重视生产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他的《八书》中有两篇是和经济生活有关的;《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此外,《货殖列传》记载一些能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这都表现了他的世界观是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的成分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条称司马迁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这种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正如苏联学者图曼所说:“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学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史记》出现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史学最为发达。正如《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条所说:‘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马迁前后,希腊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时人)的《希波战史》(如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书名是后人所加),修西底的斯(约前460~前400)的《伯罗奔尼撒战史》。与司马迁同时有希腊史家波利比攸斯(约前168~前117)。较司马迁略晚则有普鲁塔克(约47~100),他用传记的形式叙述希腊罗马的重要人物与史实。我们若把他们的著作加以比较,

便更能认识司马迁的伟大和他著作的特点。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一样,都是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行迹极广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不但记载了古希腊,而且记载了古代北非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司马迁除了汉帝国以外,也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这些亚洲国家初期历史极其重要的材料。因此《史记》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许多亚洲国家的主要史料。图曼说:苏联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时候,广泛地利用《史记》这部不朽的著作。已经逝世的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曾将《史记》许多篇译成俄文。现在苏联科学界正准备出版司马迁的选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汉学家沙畹曾把《史记》一部分(《五帝本纪》至《孔子世家》)译成法文,并加以注解。此外英、德汉学家都翻译过《史记》许多篇。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编纂了《史记会注考证》。可见世界学术界对于《史记》的重视。

和希腊史学名著比起来,《史记》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集中到一个战争,重视政治、军事。普鲁塔克的传记汇编所收的人物也限于政治家和军事家,即使是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一字提到,更没有一个关于从事于生产活动者的传记了。中国的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原载《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史学》版)

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

郑鹤声

一　司马迁的时代背景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

这便是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表示了他企图依照他父亲司马谈的志愿继承孔子《春秋》的精神而重新撰述一部历史记录所下的一个伟大的决心。但自孔子到司马迁作史时代三百七十五年中②，中国整个时代起了剧烈的变化，因为秦的统一中国，就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③。这个变化的趋势，是由分裂而归统一，由不同而归一致。正如许慎所说"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

---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② 按钱大昕说："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479～前104），凡三百七十五岁，云'五百岁'误矣。"（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其说是也，今改正。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7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①]。所谓"田畴"、"车涂",是属于经济的范畴;所谓"律令"、"衣冠",是属于政治的范畴;所谓"语言"、"文字",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但是这些变化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结果,不是秦始皇所能统一,也不是李斯所能奏同的。

汉承秦后,社会生产力更是大大的向前发展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终于在秦朝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空前无比的大汉帝国。到了汉武帝时代,更开广东、西、北三边,版图大增,到汉平帝时为止,综计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郡国一百三,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民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号称极盛。[②] 司马迁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③]。就是这个时期的繁荣现象。那些现象,反映出司马迁时代西汉政府统治力量的强大。

随着时代的进步,封建性的历史记录,也有了极大的进步。就是由简单的、账簿式的而且只有几万字的编年体历史记录的《春秋》,转变而为复杂的,本末式的而且达到数十万言的纪传体历史记录的《史记》。

但在这个新兴的大汉帝国时代里面,阶级矛盾亦是极其激烈地发展着。就全国人民的生活来说,从"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

① 许慎:《说文》序。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繁荣现象，转变而为"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的堕落状态。[①] 就首都长安的风俗来说，从"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的丰乐现象，转变而为"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的腐朽状态。[②] 再就国内外部落部族间的关系来说，自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以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因而形成"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以至"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的反常状态。[③]

在这些阶级矛盾剧烈发展的情况之下，依然充满着战国以来的旧势力——富商大贾，强宗矩族，地主豪强，特别是那些富商大贾，最为猖獗。这对于新兴汉王朝的统治上成为很大的威胁。这些现象，都是司马迁所目睹耳闻的。因此，他想从各方面来挽救或和缓这个局面，主张采用制礼仪、崇本抑末的一些办法。例如

①③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② 《史记·货殖列传》。

他在《礼书》里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①]又在《平准书》里说:“《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仪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②]这些都是对付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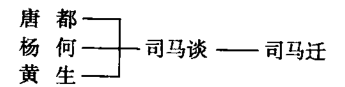
其次,关于国内外部族间的关系,他亦是非常注意的。他除亲身参加了西南少数部族生活的访问工作了解部族间的一些实际情况外,又从书面史料上,获得了一些国内外部族间的血统关系,例如在《吴太伯世家》里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之类。[③] 他一方面注意到这些部族间的血统关系,一方面又注意着部族间的政治关系,尤其重要的,他尊崇各部族本身的历史,曾大量地撰述了各部族的历史,例如“朝鲜”、“匈奴”、“大宛”以及“西南夷”、“南越”、“东越”等列传,来记录他们的生活情况,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他曾表示撰述《大宛列传》的意义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又表示撰述《西南夷列传》的意义说:“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④]因为这些部族的逐渐加入于汉族人民的生活范围,曾使他们政治的经济的组织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些列传的撰述,为我们追溯和探究中华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

① 《史记》卷二十三《礼书》。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二 司马迁的修养

司马迁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及反抗封建统治者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性格。他的学术思想是受其父亲司马谈和其师长董仲舒的影响。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①],受易于杨何[②],习道论于黄子[③]。所谓黄子,便是《史记·儒林传》中所说的黄生。黄生笃信黄老之术,曾与辕固生争论桀纣汤武之事于汉景帝前。[④]



司马谈仕于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105),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要指。这时西汉政府正在高唱"崇儒术,黜百家"的口号,严厉地执行文化思想的统治政策,禁止学者研究诸家之学,但司马谈于诸家之学,却无所不窥,并且都有深刻的批判和合理的分析。他对于当时尊为正统派的儒家学说认为"劳而少功",对于道家学说,则推崇备至,认为"无所不宜"。司马迁深受他父亲思想的影响,自然也是崇信道家学说而不崇信儒家学说的,所以后来班固对他有"是非颇缪于圣人""此其所蔽也"等讥评。[⑤]

司马迁父子虽然喜好黄老之学,但对于儒家学说,也并不是

---

① 唐都长于星历之学。

② 杨何,字叔元,淄川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杨氏易》二篇。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⑤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完全排斥的,例如司马谈虽批判了"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真相,作出了"是以其事难尽从"的结论,然而亦承认"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①]司马迁更曾从伏生诵习"古文《尚书》"[②],所以他运用书面史料的重要标准,也就是"不离古文者近是"[③],当他"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又看到"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情况下,就发生"祗迴留之不能去"的情感[④]。

说到董仲舒本是以治《春秋》公羊之学而著名的。所谓《春秋》,本是鲁史策之名,经过孔子的删定,"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⑤] 其中公羊一派,由齐人胡母生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而董仲舒与胡母生同时,并为汉景帝博士。据司马迁称:"仲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他不但精于公羊的学理,并重视实践功夫,因为"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所以"学士皆师尊之"。其"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司马迁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弟子众多,所以董氏《春秋》公羊之学,在西汉时代说来,是起了极大的作用。有的用以治事,有的用以治学。用以治事的,例如其弟子"步舒为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

③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④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⑤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之类。[①] 而司马迁就是应用董氏《春秋》公羊学，作为撰述记录历史理论上的根据的。

春秋—┬公羊—公羊高—公羊寿—胡母生—嬴公……
　　　├穀梁　　　　　　　　⋮
　　　│　　　　　　　　　　— 董仲舒—司马迁
　　　├邹氏
　　　└夹氏

司马迁深于《春秋》公羊之学，今观《公羊传》中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高子，鲁子等人名，夏曾佑以为子司马子就是司马迁。[②] 似乎是可信的。《春秋》公羊之学，“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③] 因此，凡是研究公羊学的学者，都是刊落训诂名物的末节，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的学理，他们都是想借历史事实来发挥他们政治上的一些理论。司马迁既受公羊之学于董生，所以他撰述历史记录，往往喜欢以经术作政论，富有革命的精神，具有进步的意义。

但在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史学工作者看来，是认为有问题的，例如司马贞就称：“其人（指司马迁）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④]又说“其间礼乐刑政，君举必书，福善祸淫，用垂炯诫，事广而文局，词质而理畅，斯亦尽美矣，而有未尽善者……词义踳驳……赞论粗疏”[⑤]。朱熹亦有“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的话。[⑥]

---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五《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③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自序。

④ 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

⑤ 司马贞：《补史记序》。

⑥ 朱熹：《朱子语录》。

司马迁他们的思想,既和当代"崇儒术,黜百家"的国家文化政策,有基本上的歧异,所以他们在当时政治舞台上,都是不得意的人物,他们对于汉武帝时代的政策,是有意见的。因此他们也受到排斥,甚至于迫害。就司马谈来说吧,当他正想撰次旧闻准备写一部新史的时候,不幸在元封元年(前110)因为汉武帝举行祭泰山的封禅大典①,没有带他同去(因为司马谈是掌天官之事,理当同行),他认为这是一件莫大的耻辱,终于气愤而死。就董仲舒来说,武帝即位,就出为江都相,没有能够参预中央政权,建元六年,又因言灾异有刺讥之语,下狱论死,又为当朝丞相公孙弘所排斥(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遭受忌害),郁抑不得志,因而做了一篇《士不遇赋》以见志。至于司马迁,更用不着说了,他虽然位至"郎中"之职,但在汉武帝天汉年间竟遭受到"腐刑"的迫害,身体都弄成残废了。他那种无限的悲愤情绪,除了向他的老友益州刺史任安(少卿)尽量吐露外,和他老师董仲舒一样,做出了一篇《悲士不遇赋》,来抒发他自己的悲愤:"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②便是这篇赋文的开端。

司马迁承受了他父亲和师友的熏陶,形成了一个美好的人格,大体而论,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史学工作者。他对任少卿曾有"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的话,

---

① 封禅为封建君主报答天地之功的一种礼节,以泰山为其登祀之所。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曰封;在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曰禅。《五经通义》:"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秦汉时甚重此礼,《史记》有《封禅书》。

② 《艺文类聚》卷三十,司马迁《悲士不遇赋》。

就是指他所受的家庭和师友教育而言的。他又曾对任少卿表示他自己本身的修养目标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①]可见他的抱负是不凡的。

司马迁有这样“自命不凡”的君子气概,但事实上并不能如他所期望的顺利进行着。他自受到迫害以后,曾经一度发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失常现象——企图自杀,然而迅速地恢复了他聪明的理智,发出了坚强的毅力,准备和恶势力奋斗,终于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②]因此他终于回心转意,放弃狭隘的自杀心理,一心一意地想完成他神圣的著述事业。

司马迁虽然从艰难的环境中,控制了他自己的悲愤情绪,努力从事于他神圣的著书事业,但对于所遭受的不幸境遇,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他遇到历史人物中有和他境遇相似的,就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共鸣,例如他撰述屈原、季布列传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流露了他的感想,不过他对于这两个人身上,所吸取的经验教训是不同的。对屈原是学习了他“忠贞不屈”的崇高精神,对季布是学习了他“忍辱负重”、“待机自奋”的积极行动。他在《屈原传》上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③]又在《季布传》

① 萧统:《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② 《报任安书》。

③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上说:“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矣。”因此他感觉到“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划无复之耳。”①从这些教训中,他认识到自杀是一种堕落的行为,不是善于自处之道,因而使他建立积极的人生观而向前迈进,所以司马迁是善于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

三 司马迁的政治面貌——历史观点

司马迁在政治上的地位,诚如他自己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情况②,是卑微不足道的。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却很为明确,因此他的政治面貌,也是很清晰的。

司马迁自遭受迫害后,就想积极地继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通过一定的历史事实,来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他曾经传达他老师董仲舒对于孔子作《春秋》的意义的观点说:“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③便是他企图通过某些历史事实来说明政治上一些理论。

司马迁的政治理论,概括来说,可以从班固批评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

---

①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② 《报任安书》。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利而羞贱贫"的三个历史观点来说明。[①] 班固这个批评,是根据他父亲班彪的说法。班彪曾称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认为"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②] 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极不妥当的。宋晁公武曾说:"班固常讥迁……予谓不然。""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③] 同时沈括也说:"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甚不慊。"[④]但从此可以看到班马政治面貌的不同。

首先,就"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一点来说:

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句话,本从班彪"论术学则先崇黄老而薄五经"一语而来。据张守节说:"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尊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⑤] 又据章怀太子李贤说:"黄帝、老子道家也,五经儒家也,迁序传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此谓崇黄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为薄五经也。"[⑥]又据晁公武说:"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困弊,反不如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所以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班彪传》。
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正史类·史记》。
④ 沈括:《梦溪笔谈补》。
⑤ 张守节:《史记集解序·正义》。
⑥ 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班彪传注》。

先黄老而后六经也。”[1]综括三说,都不尽然,而晁公武所说,虽较为近似,但亦没有说出西汉初年政治的趋势来。

我们知道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主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2],处士如盖公[3]、邓章[4]、王生[5]、黄子[6]、杨王孙[7]等,皆宗仰之。东方朔戒子,亦有“首阳为拙,柱下为工”[8]的话,是亦宗尚黄老之学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其意以其余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并致其不满之词,而独为推崇老氏《道德》,谓其能具有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且又特举道家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与儒者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较,以明孔不如老。

西汉初年道、儒两家的斗争,不但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而且是一种政治上的斗争。所以司马迁有“世之学黄老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的话。[9] 就事实来说,汉高祖时代“自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惠帝吕后时代“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文帝时代“好刑名之言”。

---

① 《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正史类”《史记》。

② 《汉书》卷一百上《叙传》。

③ 《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

④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传》。

⑤ 《汉书》卷五十《张释之传》。

⑥ 《汉书·司马迁传》。

⑦ 《汉书》卷六十七《杨王孙传》。

⑧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应劭注:“老子为柱下史,朝隐,故终身无患,是为工也。”

⑨ 《史记》卷六十三《老庄申韩列传》。

武帝未即位以前,因"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官待问,未有进者"。武帝即位以后,因"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①] 我们知道,西汉在武帝以前的统治者,是了解要巩固政权,必须使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采取黄老刑名的学说,用权术严刑驾驭官吏,使不敢过分作恶,儒学虽立博士,却并不重视。当时著名儒生,有的兼阴阳五行(如贾谊),有的兼黄老刑名(如晁错),没有纯粹的儒家。汉武初年,罢黜诸子百家,独尊儒学,其主要目的是在企图通过这个政策,来实行他那套阴阳五行家的运命论和黄老刑名家的专制术,同时利用儒家"三纲""五常"的学说,来钳制人民的思想行动,来符合他政治上的要求,而司马谈之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却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的。

其次,就"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一点来说:

所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这句话,本从班彪"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一语而来。据司马贞说:"游侠谓轻生死气,如荆轲、豫让之辈也。"[②]又据张守节说:"奸雄,奸滑雄豪之人也。"[③]这种游侠之士,本是战国以来中国社会上不务生产的一些游离分子,好像是能救人于困厄,济人贫乏,而且具有抱不平精神的人物,和所谓"处士""奸雄"一类人物,有着基本上的区别。至于司马迁何以重视这些人物,自然也有其

① 《史记·儒林列传》。

② 司马贞:《史记集解序·索隐》。

③ 张守节:《史记集解序·正义》。

一定的理由。但如晁公武所说:就不免小看了司马迁。晁公武认为:"武帝用法深刻,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故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邪。"[①]这不是司马迁撰《游侠列传》的本意。司马迁认为这些游侠之士,是能够为弱者解决困难问题的。如果像晁公武所说,为他个人的关系而为游侠人物表扬,那是不成其为司马迁了。

游侠之士和处士的行谊,是有区别的。司马迁对于这两个类型的人物,也曾经作了一个明确的比较。他认为:"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其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季次、原宪代表处士)。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这就是司马迁羡慕向往游侠之士的一些理由,也是他富有人民性的一些表现。

其次,就"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一点来说:

所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句话,本从班彪"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一语而来。据张守节说:"殖,生也,言货物滋生也。"[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生产的事业。司马迁对于当时国家

---

① 《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正史类"《史记》。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③ 张守节:《史记集解序·正义》。

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发展状况，是非常关切的。他为了关切国家经济状况而作出了《平准书》的伟大篇章，为了关切社会财富状况而作出了《货殖列传》的伟大篇章。《平准书》在于阐发“并兼兹殖”的事实，认为可“以观事变”。《货殖列传》在于阐发“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事实，认为“智者有采焉”[①]，而他所以关切这些问题的总目的，就在希望“富国而富民”了。晁公武认为司马迁所以“羞贫贱者，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②] 也是小看了司马迁的话。

更主要的，司马迁还认识到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提高到“甘食”、“美服”、“安俗”、“乐业”的舒适程度，这样才算是“至治”的环境，也就是说达到了理想的政治。因此，他主张必须发展社会财富，消除那些不合理的困穷现象。例如他引《老子》“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话，作出“必用此为务”的评语。同时讥评“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于无行矣”。他亲眼看到富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的剥削阶级，又看到“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的困穷阶层。又认识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社会现象。又认识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的人类心理。于是他更认识到社会财富发展的正确途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正史类”《史记》。

径,就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方针。他的重要意义,便是防止剥削。最后表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的严正态度。[①] 这种正确的理论,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某些经济矛盾的现象。

司马迁对于经济的作用,看得很重大的,从他周游全国的实际经验,他认识到当时社会财富的发展,有蓬勃向上的繁荣趋势,他把全国有代表性的社会财富划分为若干标准区域,例如关中、邯郸、洛阳、临菑、宛、陈、江南、豫章、长沙、巴蜀之类,反映出当时全国各重要地区的经济状况,他认识到祖国的资源和各地特产是非常丰富的,例如:“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未炼之铅)、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之类,都是一些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东西,都是一些饮食日用必需的物资,因此他主张由农、虞(矿)、工、商四业联合起来,共同开发,来富国富家。他曾经这样地说:“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②] 他把生产物资与商品联系起来,作了全面的观察。正是他主张发展社会财富的基本原则。

---

①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四　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

司马迁不但是个杰出的大史学家,同时也是个杰出的大文学家,他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就史学来说,他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开始撰述他那部卓越的历史记录,但起草不久,到了天汉三年(前98)的时候遭受迫害。七年之功,几废一旦。但司马迁却发挥了他坚强奋斗的精神,终于排除了一切困难,完成了这部为全世界人类所爱好的伟大作品,虽然有人认为它"是非颇缪于圣人",但却不能不承认他有"良史之才"。的确,司马迁是发挥了他的天才,创作了这部著作,他对于史学上的伟大贡献,是永存不朽的。至于说到他如何能够做成这些有价值的作品,可以从他历史材料的运用,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历史体例的创作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就"历史材料的运用"一点来说:

确定事实,积累实际材料,对于历史科学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事实——具体历史现象和事件——才能成为历史家进行科学概括的根据,确定历史上局部的和一般的规律的基础。尤其是实际材料的可靠性,是对每一历史研究工作者提出的必要要求之一,司马迁于此有很大的贡献,孔子作《春秋》往往以"空言"为褒贬,司马迁作《史记》就通过极其丰富的史料,来进行分析批判。

中国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古代中国书面史料的残缺和分歧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着的。首先是自"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之后,经过孔子第一次的整理——"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于

是"坏礼崩乐,咸得其所"。其次是"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书,纷然淆乱。陵夷踳驳,以至于秦。铲先代之迹,禁《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兴以后,虽然"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但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谬",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①] 这种纷繁杂乱的历史材料,企图以个人力量,做一彻底的整理工作,当然是很难办到的。

司马迁整理史料工作的最大贡献,就如他自己所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运用这些书面史料的具体办法第一在"厥协《六经》异传",第二在"整齐百家杂语"。[②] 据张守节解释:"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谦不敢比经艺也。异传,谓如丘明《春秋》外传、《国语》、子夏《易传》、毛公《诗传》、《韩诗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流也。"[③]可见司马迁对于书面史料的整理工作,所费的力量,是很大的。据他自己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又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

①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张守节:《太史公自序·正义》。

《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①]又说："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②]又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③]又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他对于书面史料的运用，都是经过一番考订选择的工夫。有可怀疑的地方，则存其疑，是符合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的。郑樵所谓"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⑤]的话，是不可信的。

《史记》一书，不是专靠书面史料所能完成的，更重要的，还是靠他实地采访所得的实际材料，司马贞说："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又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⑥]这些采访所得实际资料，大体说来，可分为"所见"和"所闻"两大类。关于"所见"的资料，如"吾适齐，自泰山属于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

---

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② 《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⑤ 郑樵:《通志·总序》。

⑥ 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

匿,知其天性也"[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②];"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③];"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④]之类,是不胜枚举的。关于"所闻"的资料同样不胜枚举,如"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有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⑤]。"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⑥]。"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⑦]。"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⑧]。这些实际资料,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之不足,纠正以往史籍中某些错误的记载,而且可以加深对真实历史了解的程度。

司马迁对于历史材料的运用,虽然尽其所能,但也不能说再没有什么缺点了。其书初出,班彪就这样批评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

---

①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②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③ 《史记》卷十九《李广列传》。
④ 《史记·游侠列传》。
⑤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⑥ 《史记》卷七十七《信陵君列传》。
⑦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⑧ 《史记》卷九十五《樊哙灌婴列传》。

疏略,不如其本。”又说:“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词,多不齐一。”①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后世史学工作者,曾不断地指出《史记》一书中的某些错误之处。

其次,就“历史事实的叙述”一点来说。

孔子的《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不但撰述的任务不同,就是事实叙述的注意点也有所不同。所以刘知幾曾说:“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②刘勰也把司马迁套上了“爱奇反经之尤”的评语③,事实也正是如此。

《史记》与《春秋》在传统上,虽有某些精神上的联系,但本质上是各不相干的,例如《春秋》有浓厚的“尊王攘夷”思想,《史记》则不专为尊汉,也不排斥远人。《春秋》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是不免有曲笔的记载,《史记》则是实录笔法。所以扬雄曾有“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的说法。④ 司马迁自己也曾对上大夫壶遂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⑤这就是说《春秋》是以空言见志的,不顾历史的真实,而《史记》恰恰是通过具体事实来说明问题的。所以后世学者,也多以《春秋》为经,《史记》为史。不是相提并论的。

司马迁和孔子褒贬的标准虽有不同,但以褒贬为处理历史事实的一个法则,是完全相同的。司马迁曾自认继承《春秋》的传统

① 《后汉书·班彪传》。
② 《史通》内篇《序事》。
③ 《文心雕龙·史传》。
④ 《法言·君子》。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

来作《史记》,并再三申述董仲舒阐述《春秋》的大义,如"夫《春秋》者,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们认为《春秋》对于人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更进一步地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世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①]司马迁在这种封建意识之下,运用了他自己的思想,对于历代人物,作出了一些"褒""贬",来明辨历史上的是非。

司马迁所褒扬的历史人物,是有革命性的,忠于国家的,忠于职务的,爱护百姓的,以及有节义性格的人物。第一是褒扬那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他称颂项羽,"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②]。他把项羽归于舜之苗裔,列入本纪范围。与汉高祖并列,其推崇之意,显然可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见。又列陈涉为世家,与孔子并称,并推崇其起义的首功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①]第二是褒扬拥护王室的人物,例如他称颂勾践尊崇周室的贤德说:“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②]第三是褒扬尽忠补救的人物,例如他称颂管仲、晏婴匡救的贤德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③]第四是褒扬仁爱百姓的人物,例如他称颂召公的遗烈说:“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④]第五是褒扬节义性格的人物,例如他称颂田横及其宾客的节义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⑤]诸如此类,是不胜枚举的。

至于贬斥的历史人物,是那些贪利忘义、阿顺苟合以及不爱惜民力、武健严酷的人物。第一是贬斥那些好“利”的人物,例如

①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③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

④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⑤ 《史记》卷九十四《田儋田横列传》。

他指责梁惠王好利的意义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①第二是贬斥阿顺苟合的人物,例如他述及李斯所以获极刑的真相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赵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②第三是贬斥不爱惜民力的人物,例如他指斥蒙恬所以遇诛的罪行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③第四是贬斥武健严酷的人物,例如他指责武健严酷的官吏说:“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④诸如此类,也是不胜枚举的。

虽然如此,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也并不是没有丝毫偏见的。商鞅的变法,因为贯彻执行变法的精神,曾遭受秦国旧贵族的顽抗,因为商鞅坚强地执行政策,变法事业才获得了成功。但旧贵族发

① 《史记》卷七十五《孟子荀卿列传》。
②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③ 《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动政变,把商鞅车裂,并杀害其家属,这是商鞅的不幸,不是商鞅的罪恶。而司马迁却归罪于商鞅刻薄,认为理有应得,他错误地认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1]

但是在整部《史记》当中的褒贬倾向,是能分别主要次要来说明问题的,所以他对于一个人物的观察,往往就其优缺点而比较之,而就其突出之点,加以褒扬或贬斥,作为其人的典型性格而批判其价值。这是符合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所以刘向、扬雄等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谓之实录。[2] 司马迁这种实录精神,是孔子《春秋》所没有能够做到的。司马迁也指出孔子作《春秋》的虚伪性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3]所以《春秋》的笔法,有时是歪曲事实的。而司马迁之所以被称为良史,其意义就在于此。刘知幾尝说:"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

① 《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 《汉书·司马迁传》。

③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兹避祸,幸获两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①]。所以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里的史学界中,是最难能而可贵的了。

其次,就"历史体例的创作"一点来说。

所谓创作的意义,就是能自成一家之言,而可以为法的。宋人陈傅良认为,六经之后,惟有《左传》、《庄子》、《离骚》、《史记》四书,皆前未有比,后可以为法。《左传》的特点,是在"摭实而有文采",《庄子》的特点,是在"冯虚而有理致",《离骚》的特点,是在"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史记》的特点,是在"易编年而为传纪"。以为"非豪杰特立之士,其孰能之"?[②]近人梁启超亦说司马迁"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者,《史记》千古之绝作"[③]。可见《史记》之为一种创作,为大家所公认。据司马迁自己说他撰《史记》的规格:"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约制,而构成一个整的体系的。所谓"亦欲"的意义,便是司马迁想贯彻这三方面的精神,也就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一种企图。

关于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本是古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个任务。扬雄曾有"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的说法。据李轨注:"圣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后乎天也。大圣先天而天不违,良史后天而奉天时。知其所先后,

---

① 《史通》内篇《直书》。

② 《图书集成·经籍典》第三百七十二《史记部》引。

③ 《饮冰室文集》卷五《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④ 《报任安书》。

则天人之情得矣。”[①]所以研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继承了古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种任务。司马氏本是世典天官，专以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为其主要任务的。据司马迁自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②]黎是司马氏的远祖，以序理天地为事，至司马迁仍守其职，因此司马迁父子，最精天文之学，并且最喜欢谈“天人之际”的关系。他尝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因此他把天地之间的事物，配合起来，说出“天有日月，地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之类的话。又认为“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③]。这是他关于“天人之际”的一种学说。他所撰《史记》中的八书，自称要想阐明“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道理。[④] 又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道理，来符合他三十世家的数目，也是他举例的说法。

所谓“亦欲以……通古今之变”，就是想把古往今来历史事实的变化，互相联系，找出一些因果关系来。但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是以主张“法后王”的，和孔子“法先王”的思想有所不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其思想的立脚点

① 《法言·五百》注。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近于保守派。其中明显主张法后王的便是荀子。荀子尝说:"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①]据杨倞说:"后王当今之王,言后王之道,与百王不殊,行尧舜则是亦尧舜也。""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犹言端拱,言君子审后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议,言其从容不劳也。时人多言后世浇醨,难以为治,故荀卿明之"[②]。司马迁以秦为例,阐述"法后王"的意义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③]司马迁这个理论,是符合历史事实发展规律的。据司马贞说:"以言人君制法,当随时代之敝而变易其政,则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犹胶柱而调瑟也。"[④]又据张守节说:"后王,近代之王,法与己连接,世俗之变,及相类也,故议卑浅而易识行耳。"[⑤]因此他又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⑥]又说:"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又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⑦]诸如此类,都是司马迁采用"详今略古"的手法,来贯彻他"法后王"的真实意义之所在。

---

① 荀卿:《荀子·不苟篇》。
② 杨倞:《荀子·不苟篇》注。
③⑥ 《史记》卷十五《六国表》序。
④ 司马贞:《史记·六国表·索隐》。
⑤ 张守节:《史记·六国表·正义》。
⑦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因此司马迁撰《史记》,虽上溯五帝三代之世,然这种记录的用意,是在追述汉史渊源的所在。他认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①]。《史记》之所以通纪古代史实,是在略叙汉朝立业的渊源。就是所谓“王迹所兴”,“略推三代”的意思。班固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②] 正是说明了司马迁“详今略古”的一个例证。

所谓“亦欲以……成一家之言”,就是制作自成体系的历史记录的意思。郑樵尝说:“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③]裴骃亦称“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④] 都是包涵了这个意思。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纪事两种,纪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据他自己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汉书·司马迁传》。
③ 郑樵:《通志·总序》。
④ 裴骃:《史记集解序》。

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1]山川[2]鬼神[3],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4]这个体例,组织完密,是一部富于科学性的作品,所以自从此例一定,指出了历史研究的方向,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五 纪念司马迁的意义

从上述各方面看来,司马迁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这是可以肯定的。他那部卓越的著作——《史记》,不但对于中国史学界起了转变方向的作用,起了推进历史研究的作用,就是对于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各国的史学界来说,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司马迁便成了全人类尊敬的一位国际文化工作者。在苏联早期编纂的大百科全书中,曾这样地称颂了他:"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纪元前六世纪至纪元前三世纪,中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最伟大思

---

① 司马贞:《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案兵权即兵书也。迁殁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今《律书》即略言兵也。"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山川,即《河渠书》也。"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鬼神,即《封禅书》也。"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想家之一司马迁(前145~前86)所著名为《史记》的书。"[1]他们把司马迁和欧洲多少世纪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可见他们是如何尊敬这位有功于人类文明的国际文化工作者了。

司马迁的人格是伟大的,成就是卓越的,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人民性和革命性的人物,具有热爱祖国,爱好祖国历史事业和善于运用批判方法的精神。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说明。

第一,就他"热爱祖国"一点来说。

司马迁本是——"耕牧河山之阳"——的一个朴素而且优秀的农村青年。从幽美的农村——龙门,走到繁荣的首都——长安的时候,就想抛弃那贵族式的宫廷享受,从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他自己的力量,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便是他自己所说"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的情况。[2]

当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展他游历全国的壮志,在他几度的大游历中,首先是"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这个游历时期中,明显的任务是在进行"讲业""乡射"等盛大的文化教育事业活动。于是乃"仕为郎中"。又开始了第二度的远行,在这次远行中,最重要的,是在负起了访问西南少数部族的任务,就是所谓"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3] 到他"还报命"的时

① 郭从周:《〈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② 《报任安书》。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候,司马迁已是三十六岁的壮年人了。他在这些游历过程中,因为接近了各个阶层的人民大众,观察了各项新兴建设事业,所以实际上认识到祖国的伟大,更加深了他对于祖国的热爱。

历史科学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在指出新社会关系的成长,司马迁是最爱祖国新鲜事物的一个人,他对于新兴事业特别感兴趣。

在各项新兴建设事业中,他注意了全国农、虞(矿)、工、商事业发展的情势,他把观察所得的结果,做成了伟大的《货殖列传》,把祖国社会财富发展的情势,分成为若干经济区域,尤其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便是当时全国水利事业建设的情况。我们知道水利事业的建设,既能扩大农田灌溉的面积,又能促进农作物品的生产,还能防止水旱的灾害,避免农作物的减产。但就另一方面说,如果遭受了水灾,其损失也是不可估计的。他在亲身考察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水的"利""害"关系,并且参加了治河的劳动工作,因而撰成伟大的《河渠书》。据他自己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①这是最富有实际意义的篇章,历代政府常把它赐给治河的大员,要他们从这里来汲取治理黄河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就他"爱好祖国历史事业"一点来说。

司马迁父子都是爱好祖国历史事业的,尤其爱好祖国当代的历史,据司马迁自己说:"是岁(汉武帝元封元年)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

①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子迁适使反(从访问西南少数部族归),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①这便是司马迁承受他父亲的遗命而企图撰述《史记》的开端。在这样可歌可泣的对话中,充分表现了他们父子爱好祖国历史事业的心境了。

但在司马迁著述的环境中,不幸而遭受到无情的迫害。在他"身毁不用矣"的遭遇中,对于他父亲临终的嘱咐,几乎不能贯彻了,在这个苦难环境里,他毅然决然打开生路,采取了古来圣哲"发愤著书"的前例,来鞭策自己,再度鼓起了他热爱祖国历史事业的勇气,他认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因此,他终于勇敢地举起笔来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②来完成了这部杰出的作品,表现出"有志竟成"的典型事例。

①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第三,就他“善于运用批判方法”一点来说。

《春秋》公羊学派的治学方法,本是好谈名理的,本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司马迁继承董仲舒公羊学派的批判精神,同时司马谈又是一个好论事理的一个史学工作者,更促进了司马迁善于运用批判的方法。司马谈临卒的时候,曾三番两次地希望司马迁能够运用批判的方法来处理历史的事实。他说:“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①之类。所谓“论”,就是属于批判的范畴;所谓“载”,就是属于纪事的范畴,总而言之,是想把理论与事实结合起来。

司马迁对于这种批判方法的运用,是多样化的。因此由《春秋》一字褒贬的方式发展而为《史记》全面褒贬的方式,这正是他论载史事的一个特点,而刘知幾评称:“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疑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此。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因此,他认为:“史论之烦,实萌于此。”②这显然是对于司马迁运用批判方法的一些误解。

司马迁的论赞,并不限于篇末,而是随人随地发挥其意见,所以往往散见于各篇之中,就是采用后人所谓“夹叙夹议”的叙述方法。顾炎武尝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叙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其法者鲜矣。”③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通》内篇《论赞》。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这正是说明了司马迁善于运用批判方法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样才能引导读者从这些地方去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综之,司马迁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当然是很多的,他的伟大精神和实际贡献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他也时常流露出某些相信天命鬼神以及报应循环的论调,对于历史事实作出某些片面的了解,但这些缺点都是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但不能以这些缺点来责备司马迁,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把补救这些缺点的责任放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因此我们纪念这位具有国际性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我们固然要努力去学习司马迁伟大的创造精神,并进而发挥中国过去历史学上的优秀传统,但更重要的,还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使我们研究历史的工作,沿着历史科学的轨道迅速地前进。

1955年10月22日,于青岛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第260页。

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施　丁

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经过长期的社会变革，国家空前统一强盛，封建制度业已建立的重要时期。这时，旧的奴隶制的一些矛盾基本解决，而新的封建制的一些矛盾日益发展起来。历史的大变化和新矛盾，需要一支大史笔作出历史性的总结和探索。司马迁身居汉朝太史令之职，继承家学之业，阅读掌握了大量的“天下遗闻古事”，游历寻访了很多名胜古迹，了解体察到四面八方的风土习俗，耳闻目睹了许多过去的和现实的事件，并亲身遭受封建专制的残酷迫害，感慨万千，奋笔写史，“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①，而“通古今之变”②。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一定的目的、观点和方法。现在，我们在历来学者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正于大家。

一　“以古为镜”的目的

历史家写历史有个目的。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什

---

① 刘知幾：《史通·人物》。

② 《报任安书》。

么呢？我们觉得，他不是为了说明历史循环，因而他也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以史为戒，以史为镜，纵论古今，展望未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司马迁继孔子之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太史公自序》里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提得如此之高，不仅是单纯地评价孔子作《春秋》，并且是以"继《春秋》"而写史自况的。"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这番话，就是他以《春秋》为榜样而写史作为当仁不让之事的明证。他又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这是说《春秋》的垂训作用，也是谈自己著作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说明，司马迁以严肃的态度写历史，是要把历史作为人们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教科书。但是，他又不是板起面孔，以干巴巴的教条训人，而是写出具体生动的史事，给人们提供一面镜子，俾使人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

司马迁写历史，是很动感情、颇具匠心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论时势，开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

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①]他与时代共呼吸,流露出悲叹时局的感情。对贾生深切同情的司马迁论述历史,亦因古今之变而情不自禁地流涕、悲痛、叹息。他读屈原之书,"悲其志",适屈原投江之处,"未尝不垂涕";[②]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③];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④];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⑤] 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于历史变化而发的:由周厉王而叹,是叹周室由盛而衰;由梁惠王问利而叹,是叹官府与民争利;由广厉学官之路而叹,是叹汉代儒道之穷。他悲叹屈原,是"想见"屈原忧国忧民的"为人";他自己又在由历史而忧国忧民。司马迁这种历史感情,充溢于其历史著作。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几句话有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为了以历史为镜子,作为借鉴;二是为政之道,应随俗施事,以成功为准绳,不可拘泥;三是当今的成败,有现实的原因,不能一概求之于古。这里既讲到了"志古自镜",又论及政治与时势的关系,还指出古今之区别,说明既要以古为镜,又不可混同古今和以今泥古。这可以说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朴素辩证法的原则。他在同一篇

---

① 《汉书·贾谊传》。

② 以上均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下凡引《史记》文字,只注明篇名。

③ 《十二诸侯年表序》。

④ 《孟荀列传》。

⑤ 《儒林列传》。

文字里指出:"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网)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这里提出了"古"、"今"的封侯问题,既有同,也有异。异的是,汉初百年之间,功臣侯者便由尊宠而至废辱。这是由于现实的原因,即功臣侯者"子孙骄溢","淫嬖",和汉王朝"罔亦少密"所决定的。这就不是泥古,也不是搞历史比附,而是从史实出发,评论历史和政治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志古自镜"的精神较为明显,其中尤以论述秦朝政治最为突出。他所说的"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的"古"事,不正可以作大事征伐,酷吏横行,以至民不聊生,"盗贼滋起"的"今"世的镜子吗?他写的秦朝灭亡、项羽失败的"古"史,不正可以作似有"土崩"之势[①]的"今"日的借鉴吗?

司马迁有时以古讽今。《孝文本纪赞》云:"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有些学者指出这是借歌颂汉文帝而暗讽当今君主。刘咸炘论道:"论

① 参考《平津侯主父列传》。

意不以改正服封禅为仁,讥武帝为不仁也。"①泷川资言说:"细味此数语,似太史公不慊于武帝者。"②的确如此。这种写古叹今的味道,《史记》其他篇章里还有一些。但是,司马迁决不是简单化地以古讽今,借历史内容发一下对现实政治不满的牢骚,更不想一头钻到往昔的象牙塔中去。他主要是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如他写秦朝的历史,详记秦始皇、李斯、秦二世、赵高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政治、经济、思想的动向和变化,并在《秦始皇本纪》末尾引了贾谊《过秦论》,这一方面是记秦朝兴亡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表其"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的议论,以树立起他的"承敝通变"的观点。历来不少学者觉察到这个问题。有人说:"始皇统一,对于以前为千余年未有之变局。局变,则承其变者,应有使民不倦,尽利尽神之妙。太史公《史记》究古今之变,于此尤致意,以寻其究竟。"并说,司马迁"善贾生之推言,令读史者于易变之音,三思之"③。这是知司马迁之音的话。只要把司马迁对秦始皇的一些论述,以及他对汉初"承敝易变","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④的称颂,仔细品味一下,是能体会到论者的旨意的。司马迁写当代史,指出当今之世一些弊端,目的就在于为执政者敲起警钟,告诉他们以古为镜,承敝易变。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也是这个意思。

历史告诉人们,汉武帝晚年面对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民心思乱,群臣离心的现实,乃下"罪己"之诏,"不复出军征讨",实行

---

① 见《太史公书知意》卷二。

② 见《〈史记会注〉考证》卷十。

③ 齐树楷:《〈史记〉意》。

④ 《吕后本纪》赞。

"富民"政策;[1]昭帝即位,"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2],重新振作,拨乱反正;宣帝继之,步其后尘,于是刘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号称"中兴"[3]。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节奏的出现,虽然主要是当时诸方面矛盾斗争及其暂时地部分解决的反映;但也与司马迁"承敝通变"、"述往事,思来者"的史论不无一点关系。始元六年盐铁会上贤良文学所提的一些历史论据,[4]与司马迁所发的一些议论多所吻合,并非偶然巧合。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写《史记》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写史,确是依据大量材料,记述了发展变化的史事,发表了历史变化和"承敝通变"的观点,并说明了"以古为镜"的目的,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史记》一书最大的特点是"通古今之变"。而"以古为镜"是"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为的是使人们借鉴历史,从而知道"承敝通变"。司马迁不是信口开河地讲什么微言大义,而是通古今之变,提供人们"以古为镜",此其比先秦秦汉时代诸子略胜一筹之处,也是他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所贡献之点。

二 着重考察几个历史变化问题

中国从远古时代到秦汉之际的历史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特别是战国以来的历史变化尤为显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必须

---

① 参考《汉书·西域传》。
② 《汉书·昭帝纪赞》。
③ 《汉书·宣帝纪赞》。
④ 参考《盐铁论》。

对这个问题,尤其要对战国以来的历史变化作出总结。他对古今之变写了什么主要的内容呢?从《史记》看来,司马迁略古详今,对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记述简略,稍事勾勒,而对战国至秦汉的历史则条分缕析,记述较详,特别是对秦汉时期出现的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等新的历史事物,不惜花费较多笔墨予以记述和评论。这是值得十分注意和认真分析的。

(一)写战国时代的变法,尤其是写秦国商鞅变法,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战国时代的变法,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是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它的意义就在于,在各地区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些诸侯国先后通过变法确立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标志着中国从此逐渐步入封建社会,直接影响着秦汉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对于战国时期的变法事件,当时和稍后的一些史籍和子书虽然都有所反映,但是大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而司马迁对这一问题尤为注意,用不少篇章来记述各国变法的情况,例如,他在《商君列传》中详细地记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原委,其中不仅写了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变法的富国强兵的客观效果,而且还写了商鞅多次与甘龙、杜挚、公子虔、公孙贾、赵良等围绕着变法的一系列斗争。当时很多政治家的夸夸其谈,纵横家的雄辩之词,著作家的大块文章,都不能给人们提供了解关于变法的翔实内容;而司马迁以一篇文字并不太长而内容十分充实的《商君列传》,向读者认真地报告了历史上这一巨大变革的真实情况。这是他通古今之变最为突出的一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写历史变化最为杰出的一个例子。

(二)记述先秦氏族贵族到汉初的布衣将相的变化,是司马迁着重考察的又一重要问题。他在记述吴、齐、鲁、燕、管蔡、陈杞、

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的篇章中，记述了很多先秦氏族贵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真实地反映了那些氏族贵族在自身的发展中，到了战国时代已日益衰落下去，或者改变面貌而逐渐成了新贵。战国时代游士的奔走活跃，客卿的纵横捭阖，已是社会一种新的气息。这是当时私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这种时代新气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更由于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推动，到了汉初竟蔚然成风，于是开了布衣将相的新局面。有人从汉初布衣将相的情况中看到了历史的新事物，因而作出“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1]的定论。此论，主要是根据司马迁《史记》描述的具体内容提出来的。凡此论所举及的，古代诸侯各君其国；战国时期的徒步为相，白身为将；汉初的布衣以取卿相；以及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等，无一不是主要取之于《史记》。此论所说的“三代世侯世卿”，《史记》中所记先秦一些“世家”中有具体记载；此论所说的“游士则范睢（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史记》中则有这些人的专传可资参考；此论所说的汉初君臣“多是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史记》中有关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樊哙、周勃、灌婴、娄敬等人的传记是可靠依据；此论所说的“诸侯王唯得食租衣税”，《史记》中的“诸侯独得食租税”[2]是其蓝本。可见司马迁论述先秦秦汉间政治人物的身份变化较为详尽，影响亦大。没有司马迁的具体通变，后人是很难清晰地了解这一大变局的。

（三）秦汉统一的历史是司马迁十分重视的问题。《史记》中

---

① 见《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② 《五宗世家》赞。

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篇章，以及有关的诸侯、将相、游士、刺客等传记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战国至秦汉历史的统一进程，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统一六国和刘邦的再次统一，描述得很生动具体。《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等简要地论述了自西周末年至战国时期，诸侯称霸，兼并战争，以及统一的发展趋势，由于强国兼并弱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主要只是七个大国了。而战国七雄中，东方六国的各国内部矛盾重重，死的拖住活的，发展缓慢；秦国后起居上，势力逐渐膨胀，并在统一趋势中逐渐蚕食六国，以至一统天下。《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则论述了由秦到汉，在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过程中，统一走了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其间有项羽“分裂天下”，封十八王国的事。但是，在司马迁笔下，写出了统一是历史的趋势，从古之诸侯割据称雄，到今之天下一统，是任何力量所难以抗拒的。他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篇章中，通过写项羽和刘邦等人进行的楚汉相争，生动具体地描写了汉朝再次统一的历史。

司马迁还在一些纪、传中(例如《秦始皇本纪》、《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等篇章)记述了中国古代汉族同许多少数民族关系的历史。这些记述，虽然暴露了当时由于汉、匈等族都是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发生了一些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令人很不愉快的矛盾和战争，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族之间互相往来、祖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的面貌，反映了中国秦汉时代特别是秦皇、汉武之世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局面的真实情况。

(四)封建中央集权制是秦汉史上的一大特点。在秦汉统一的过程中，恰恰是中央集权制加强的重要阶段。照司马迁所写，

这时的中央集权制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郡县制逐渐在代替着封建(封侯建国)制。汉时期是既有郡县又搞分封的所谓郡国制度。但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对中央王朝是直接的隶属关系，诸侯对封户主要是衣食租税的经济方面的关系，而不同于往昔"分民分疆土"的封侯建国，诸侯对王朝是相对独立的状况。二是公卿官僚制逐渐代替了世袭贵族制。秦汉时期虽然有了新贵，汉仍保有世袭贵族制，但中央的公卿和地方的守令，一般来说都不是世袭贵族，而是可以随时任免的官僚。司马迁写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过程，发挥了"原始察终"的通变办法，把历史事变写得十分具体生动，例如，《秦始皇本纪》中两次关于立郡县与搞分封的争议，《袁盎晁错列传》等篇记述汉初分封与"削藩"的斗争，就反映了当时政治制度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复杂情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更论述了这一历史趋势，给人们以新旧之争的结局必然是除旧布新的深刻印象。

(五)司马迁在写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史中，独具慧眼地点了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秦始皇本纪》记录侯生和卢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那段议论，是写秦始皇专制的点睛之笔。这要比《殷本纪》中写纣王独裁行为，更具历史特点。而《史记》写汉武帝专制，则比秦始皇更发展了一步。《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奉法遵职"，不敢招士；《万石张叔列传》写石建、石庆等公卿大臣都是对君主唯唯诺诺的"恭谨"之徒；《平津侯主父列传》写丞相公孙弘对皇上阿谀奉承；《酷吏列传》写御史大夫张汤等专看武帝的眼色行事；并记御史大夫杜周之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汉武帝的专制，说明他的意旨就是法令。在这

种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公卿大臣无所作为,“为丞相备员而已”①,甚至生命难保;士人学者噤若寒蝉,只好钻研儒术②;游侠之士触犯法网,横遭杀害③;诸侯王也朝不保夕,“坐法陨命亡国”④者众多。司马迁这些记述,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阴暗面。至于《酷吏列传》记述汉武帝专制,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至“盗贼滋起”,“盗贼浸多”,弄得天下不宁,更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严重恶果。

由此可以看出,自先秦到秦汉,变法在促进着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布衣将相取代了先秦氏族贵族,君主专制伴随着中央集权发展起来。司马迁抓住这个时期历史发展中政治方面的几个重要特点,写出了它们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中突出的成果。

(六)司马迁写历史变化,往往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整个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经济上的古今之变,司马迁主要写了秦汉国家经济的盛衰。他写当时经济的盛衰,较紧密地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秦之强也,自商鞅变法开始。《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又说,经过变法,“秦人富强”。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经济日益富足,为统一六国准备了物质条件。《河渠书》中记述秦修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

① 《张丞相列传》。

② 参考《儒林列传》。

③ 参考《游侠列传》。

④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侯"。这说明秦兴修水利,使得农业丰收,就"富强"起来,从而才能并吞六国"诸侯"。这使人看到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识到秦的强盛不是凭空产生,而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写秦在统一之后,虽然表面上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男乐其畴,女修其业"[①]之说;但是,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统治之时,由于大事兴作,不断用兵,穷奢极侈,"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②],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生活搞得很糟了。因为"财匮力尽,民不聊生"[③],"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④]。秦朝就是在国家经济破产,人民起而反抗的情况下垮台的。司马迁指出:"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⑤]还写过"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⑥]的话,说明秦朝经济上破产导致政治上失败。经济上搞得男耕女织而不得维持衣食,哪有天下不乱之理,哪有在这种形势下的统治政权不垮台之事!

司马迁写汉代经济,自汉初到武帝之时也有变化。《平准书》就是通过记述汉代财货和财经政策的情况,而观察汉初百年间经济上"物盛而衰"的。汉代经济为什么在武帝之世"物盛而衰"了呢?司马迁指出,权贵豪富对人民剥削和压迫,及其奢侈浪费,造成社会矛盾。同时,又指出,汉武帝南征北伐,大动干戈,使得"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财赂衰耗而不赡"。这样一来,把社会

---

① 《秦始皇本纪》。

②④ 《李斯列传》。

③ 《张耳陈余列传》。

⑤ 《太史公自序》。

⑥ 《平准书》。

的安定破坏了,把积存的财货用光了,把人心也搞乱了。社会的不安定,人心的混乱,是由于经济衰败引起的。而经济上由盛转衰,除了当时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而外,主要就是政治上的因素了。这是司马迁于叙事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同时,他写汉武帝面对“物盛而衰”的现状,不是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不是改道易辙,而是继续干下去,用兵不断,严刑峻法,兴利不已。结果,不是促使经济繁荣,百姓富足,而是百姓倾家荡产,流民成群,以致“盗贼滋起”。司马迁还在《平准书》等篇里揭示出,国家经济越是衰败,社会矛盾就越是复杂,政治生活就越是腐败,道德风尚也就江河日下。这样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经济盛衰,与当时政治成败密切相关,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压榨百姓,不顾民生困苦,使得国穷民困的罪恶。

(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平准书》,写春秋战国至汉初一些商人和盐铁手工业者在社会发展中的发家致富,及汉朝官营盐铁,大搞均输、平准等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一些农牧工商业的面貌。但是,他却没有一点笔墨述及汉武帝时期民营工商业者活跃的情况。这是于无文字处表明:因为汉武帝“与民争利”,在经济上也搞封建专制,使得民营工商业遭到摧残而凋零得不可言喻,故无啥可记。司马迁称那些“以末致财”的人为“贤人”,还说“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人得以观择焉”;又说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那么,奸富是谁呢?是“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者,就是当时汉武帝一手提拔和信任的大搞官营盐铁、均输、平准的桑弘羊之流,是与民争利的官府。司马迁肯定“末富”,否定“奸富”,并认为官府与民争利使得民生困苦,国家衰败。这就是说,封建专制渗透到经济领域,是经济衰败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上古今之变最值得注目的重大问题。司马

迁写《货殖列传》反对官府与民争利及其于《史记》全书强调“礼”、“义”的观点，未为历代统治者重视和采纳，未为后来的“正史”作者所重视和效法，他那反对官府与民争利的思想未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开花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这也证明司马迁这种历史思想异乎寻常。

从司马迁在经济上通古今之变中可以看出，他把民生困苦与否视为国家经济盛衰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把封建专制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同时还把经济盛衰视为国家兴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这是朴素的唯物观点，很能说明历史上一些政权成败与经济盛衰的关系。

（八）司马迁还生动地描写了历史上思想潮流的发展倾向。这从他所写自先秦到秦汉有关儒法历史的一些篇章中，可以窥见一斑。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有儒、法两种思想。这两种思想随着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到汉武帝之时出现了合流现象。先秦的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孔孟思想代表者对当时剧烈变化的现实颇为不满，多所针刺，想要拨乱反正，它一方面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另一方面又违时地提出了“复古”的救世药方。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等篇章中记述了孔、孟的言行，并论道：“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①“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基本上说明了先秦儒家孔、孟不切时宜的“复古”的政治思想面貌。《孟

① 《太史公自序》。

子荀卿列传》记述:"荀子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司马迁在这里指出荀卿综合分析和批判各家学说而自序其言,是有见地的。这说明司马迁看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荀子的儒学已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儒学,荀子的思想也与孔、孟思想有所不同。《李斯列传》详细记述了李斯"辞于荀卿"的一番话,对于李斯这种驰骛世俗的思想,并不是予以赞扬,而是热辣的讽刺。他评李斯道:"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这是说李斯和孔、孟、荀等不一样,不是拯救世敝,而是"阿顺苟合";不是遵循六艺,而是"严威酷刑";不是追求儒家理想,而是"持爵禄之重"。这实际上是把李斯视为鄙儒。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写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文质彬彬的儒生为什么参加揭竿起义的队伍了呢?"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儒生在没有出路时,也会铤而走险的。

儒学在汉代有个发展过程。《儒林列传》记述,汉兴之时,儒学虽有,但不时髦。当时统治者提倡黄老刑名之术。到了汉武帝即位、窦太后去世之后,"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提倡儒术,天下风气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汉代的儒者,以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为代表。这时大多数儒者已不是孔甲在秦末那时的处境,已不同于孔子的政治态度。他们不是违时而是趋时,不是嫉俗而是随俗,不是追求理想而是争逐利禄。司马迁写过,秦廷博士周青臣

同淳于越有过搞封建还是立郡县的斗争，汉初鲁两生同叔孙通有过"面谀以得亲贵"和"真鄙儒"之相讥①，然而，他所撰写的汉朝儒林，虽有所学之不同，却无一不在追求利禄。例如，写叔孙通创礼仪，对皇上献谀，"知当世之要务"，讨得汉高帝刘邦的欢喜。写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② 在司马迁笔下，汉儒虽然崇奉孔子，宣扬六艺，似乎是儒家的忠实门徒，其实那都是"缘饰以儒术"的表面文章，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他们对权势者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企图达到获得利禄的目的。方苞读《儒林列传》体会到，"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③。这话的意思是，儒学发展到公孙弘之时，已是旧瓶装新酒，在社会政治上能吃得开，然而其原来的精神却丢弃得一干二净。这话是符合司马迁原意的。的确，司马迁评儒，不是笼统地反儒，更没有反孔；而是讽刺儒学末流、反对汉儒。他在表白自己有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而同汉儒则不是一个调子。司马迁只在《儒林列传》中提到董仲舒，而未为其立专传。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而论司马迁鄙视董仲舒，或曰司马迁为乃师董仲舒讳。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来看，他对董仲舒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摇旗呐喊，可能不会满意；而对其主张与匈奴和亲、盐铁皆归于民，等等，则是灵犀相通的。在司马迁笔下，董仲舒只是春秋公羊学专家，而不是公孙弘那样的汉儒的代表。

司马迁对先秦的法家，有所肯定，也有否定，如评商鞅，一方

① 参考《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 《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 《又书〈儒林传〉后》，见《方望溪文集》卷三。

面肯定其实行变法使得秦国“家给人足”、“秦人富强”，从而称霸诸侯，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批评其“天资刻薄”，伤害了一些人，终于名声不好。他对秦始皇的评论也如此，既指出其尚法，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又揭露其严刑峻法，残害天下，触怒百姓。《秦始皇本纪》末尾引贾谊《过秦论》，实际上是借贾生之言以评秦，其中就包含有肯定秦始皇促进社会发展之功和批判其危害天下之过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司马迁除了指出其著书以明法等内容而外，颇有意味地记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样的琴一弹，秦王与韩非思想相通的弦音就清晰地传扬了。

他对汉代的尚法人物，并不以先秦法家继承者待之，而是目其为残酷之吏，例如，把晁错、张汤等都列为酷吏。[①] 在司马迁看来，张汤兴利，较之商鞅变法，不仅不能收到“强霸”国家的效果，而且搞得“百姓不安其生”，危害甚大，以致朝野上下，对其都很不满。所以，张汤死，只有“上(即武帝)惜汤”[②]，“而民不思”[③]。可见，司马迁对张汤，就不是像对商鞅那样既批评又肯定，而主要是揭露和指责。司马迁还写道：“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

①② 参考《酷吏列传》。

③ 《平准书》。

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①]又写：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②]。“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③]。这些记述，实际上是把汉儒公孙弘和酷吏张汤等同起来，儒者能酷法，酷吏傅古义，他们都会兴利，都会外施“仁义”，又都是残酷之徒。这种卓越的见解，乃是对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合法思想最精采的揭露。他以史实记录明确地告诉人们，儒家和法家，在先秦时分歧殊途，有嫉俗和趋时、“复古”和“是今”之别；到了汉代，便已同归一炉，都“骛于功利”了。

由此看来，司马迁在政治、经济、学派思想等方面通古今之变，注意抓了历史的特点，写出了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当时天下一统的形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封建专制的强化的情况。在史学上，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内容，无论是从反映历史的广度，或揭示历史的深度来看，都是成绩卓著，超越前人，遗泽后代的。一个古代史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具体地创造性地写出中国古代数千年特别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内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三　历史变化的观点

司马迁不仅注意到了历史的矛盾、特点和变化，而且还论述了古今之变的原因和轨迹。

---

① 《平准书》。

② 《平津侯主父列传》。

③ 《酷吏列传》。

历史是很复杂的。造成历史复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迁很注意这个问题。他论述历史变化原因,曾提及天命、形势、人事,等等。

《天官书》后段讲到天变影响历史变化,曾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于是得出结论:"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也就是说,天变与人变有关,或天命决定着人间的事变。这说明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天人感应"的影响。

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形势决定论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察《史记》,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论述历史变化之处提到了形势,甚至有时把形势放在决定性的地位,例如,《周本纪》和先秦一些"世家"篇章记述:周初,武王伐纣至成康之世那段时间里,王室强盛,分封诸侯,诸侯拱卫王室;及至西周末年到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诸侯称霸,不遵王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周天子想要"正"天下,但始终拗不过形势,周王室日益衰落下去。《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这话的意思是,周初,王室强大,诸侯封地小、势弱,所以拱

卫王室；西周末，王室衰微，诸侯强大起来，故不听命于王室，周天子对诸侯无法摆布。这不是周天子的思想道德所能左右的问题，而是周室“形势”衰弱的原因。至于“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勇怯，势也；强弱，形也”[①]等言论，更是讲历史大势和形势决定作用的。

但是，司马迁既不是唯天命论，也不强调形势决定论，他谈历史变化原因主要摆在人事方面。《郑世家》末尾论道：“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些话着重指出，事变围绕在“权利”上面，讲的是人们争权夺利之事上的变故。

正因为如此，他讲“天命”时，也强调人事，如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②]。这些话的意思是，人事可以影响或改变“天”意。《史记》中有不少因果报应的记述和说教，这当然是迷信思想，但它也主要是强调人事因果。至于司马迁批判项羽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③]这更是把政治成败当作人为的事，而否定天命论的著名论断。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同董仲舒天人

① 《报任安书》。
② 《天官书》。
③ 《项羽本纪》赞。

感应论的不同点,就表现在这种地方。

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述论,可以清楚地觉察到,他将帝王将相当作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他把王迹的盛衰,国家的强弱,政事的成败,都系之于这些"英雄豪杰"。凡所谓暴君、奸臣、小人,如桀、纣、厉、幽、秦二世、赵高等在位,便破坏政事,毁灭王迹,导致国家丧亡;凡所谓圣君、君子、大人,如禹、汤、文、武、周公、汉高祖、汉文帝等人物执政,就使得政事成功,王迹兴盛,国家强大。他曾强调过:"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①]"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②]这都是司马迁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言论。

司马迁虽然强调英雄的作用,但是并不歌颂君主万能,并不崇拜专制主义。他记述历史时,很注意历代用人问题,如论战国七雄的兴亡,楚汉相争的成败,汉文帝与汉武帝的优劣,都很明显地包含有这种内容。所以他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之叹。他还论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③]这里所引之"语",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历史不是个人所能创造的,政治不是个人所能办好的道理。司马迁通过"刘敬脱輓辂一说"这事,引用了这

① 《楚元王世家》赞。

② 《匈奴列传》赞。

③ 《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个“语”作为自己的评论，来说明刘邦靠赖众人定天下的问题，确有一定见地。司马迁无疑是英雄史观，但是他不曲意歌颂专制主义的孤家寡人，而是强调贤能之士协助帝王促进历史的作用，这就有合理的成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还记述及人心向背在历史中的作用，例如，他论秦楚之际“八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变幻风云，就很强调：秦朝因为暴政，失去民心，“天下苦秦久矣”①，“天下不听”②。因此，陈胜计谋起义时，自信“为天下唱，宜多应者”，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③项羽随其叔父项梁起义反秦时，从者甚众，但他后来杀降卒，“所过无不残破”，使得“秦人大失望”④，“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⑤，终于因“暴虐”而众离亲叛，至于垮台；刘邦始终注意笼络民心，在率领起义军向关中进军时，“诸所过毋得掠卤”，使得“秦人喜，秦军解”，而且到了关中“约法三章”，使得“秦人大喜”，于是得到百姓支持，百姓“争持牛羊酒食献给军士”，“惟恐沛公不为秦王”⑥，结果“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⑦。尽管司马迁还不可能具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但是他述及人心向背在历史中起到一定作用，确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司马迁热情地肯定陈涉起义，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

①③ 《陈涉世家》等。

② 《李斯列传》。

④⑥ 《高祖本纪》。

⑤ 《项羽本纪》。

⑦ 《秦楚之际月表序》。

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①]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②]这是承认人民起义在推翻暴秦统治之中的首创之功的著名论断,客观上说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样的历史宏论,可以说震古烁今。

司马迁还论及政治应该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问题。《高祖本纪赞》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是司马迁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根据“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一点,以为司马迁把历史看成循环往复,从而肯定他是历史循环论者。我觉得,对于司马迁这句话,不能简单地从其运用“循环”这个概念来理解,而应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来分析。照《史记》旧注的解释,司马迁这段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夏代的政治“质厚”(朴实)。质厚的坏处,使得人民“少礼节”(粗野),所以殷代承继之后,政治一变而为敬帝、敬祖先。敬的坏处,使得人民“多威仪,如事鬼神”(迷信),所以周代承继之后,政治转变为讲究“尊卑之差”(礼节)。它的坏处,使得人民“苟习文法,无悃诚”(只讲繁琐的形式,无一点诚意),所以挽救此弊病只有转变为“质厚”。三王之道好像在循环,变过来还得变过去。可见司马迁在这里讲的“三王之道”的“道”,并不是讲的历史发展道路,也不是讲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是讲的政治之道,治理国家之道,讲的是政治问题。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实际上说的是,夏、商、周的政治各有弊端,搞来搞去,还是“忠”的政治为好。司马迁在通古今

① 《自序》。

② 《陈涉世家》。

之变中，看到了历史上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他知道社会矛盾在发展，政治在变化，政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他承认这种变化，只是希望政治变得好一点。据此，我认为司马迁在这里讲的是，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政治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政治应该“承敝易变”，改变周代政治“文之敝”的最好办法就是恢复“忠”的政治。所谓历史循环论，是一种鼓吹人类要回到最初阶段去的历史观念，是主张历史车轮倒转的反动观点。司马迁的《高祖本纪赞》只是希望实现“忠”的政治，并无回到夏代社会去的意思，怎能断定为历史循环论呢？有人评《高祖本纪赞》道：“历数世代变化之迹，示人作史之意，与读史之法。所谓通古今之变者。汉高帝以来而为天子，视秦人之以国并国，其局又变。然则统一时代则一。其言承前敝，即示人以继续通变之意。”[①]这个评语说得好。因为论者已明白司马迁继续通变之意，而不是纠缠在“循环”那个词上去钻牛角尖。

我们再看《平准书》末这段话：“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

① 齐树楷：《〈史记〉意》。

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尚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也是司马迁重要的史论。这段话里,所谓"事势之流",是指历史变化的形势,所谓"礼义"、"利"、"诈力"、"仁义"、"功业"等,是指政治、经济和道德;所谓"物盛则衰,时极而转",是指国家的盛衰之变;所谓"承敝易变",是指政治要针对时弊而有所变通,以达到大治;所谓"一质一文,终始之变",就是说的不同的政治,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互相更替。他在这段话里,举了许多历史上的世变和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讲了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治道,治道都是随世道而变化的,也没有永久巩固的政权,政权都是有盛有衰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转",只是指国家的盛衰之变,并不指历史循环。"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变",只是指不同的治道随历史变化而变化,也不是指的古今往复之转。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并没有把古今视为一个样,也没有说汉初的历史已回到了夏代,更没有说汉代一定要退到夏代那个样子。他只是在论证古今之变时,感到三代的政治都随世道的变化而变化,秦承周"文之敝",没有随时应变,受到历史的惩罚;汉初接受历史教训,适时而变,才符合历史的要求。因此,他在《高祖本纪赞》论三王之道的下面,紧接着否定秦朝政治,而肯定汉初政治,论道:"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张守节对这几句话的理解是:"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如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①]这个理解是对的。《史记》中还有一些地方论及汉之

---

① 《史记·正义》。

代秦,"承敝易变"。如,《酷吏列传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①],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此观之,在彼不在此。"《萧相国世家赞》云: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相国世家赞》云:"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这些都可证明司马迁"承敝易变"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历史在变,而不是宣扬历史循环,说明政治要随时应变,而没有宣传一成不变的政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述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其中介绍和推崇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无为,又曰无不为","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的学术思想;在《货殖列传》中强调"善者因之",宣扬"因俗施事"的政治学说,也说明其政治与历史互为影响和变化的朴素的辩证观点。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历史变化观,而不是历史循环论。而且从司马迁反对小国寡民思想[②],承认"世异变,成功大",主张"法后王"[③]等的观点来看,他的历史观中还有一定的历史进化论的因素和成分。

当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曾受到当时自然循环论和天人感应论的影响,有一些形而上学的疵点。如他所论"夫天

① 《史记·索隐》:"昔天下之网尝密矣。案:《盐铁论》云'秦法密如凝脂'。"

② 参考《货殖列传序》。

③ 参考《六国年表序》。

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①就反映了他的思想局限。但我们不能因他思想上有此瑕疵,而断言他是历史循环论。

四 撰写历史的基本方法

对于古往今来数千年变化着的历史,历史家如何写它呢?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问题。

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反映历史的变化,这是司马迁撰写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他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②从这句话看来,《史记》中记述先秦、秦汉历代帝王的十二本纪,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科条",换句话说,主要是通过以历代帝王为中心的"王迹"盛衰而通古今之变的。所以,他记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至"今上"汉武帝为止的十二本纪,实是通古今之变的大纲。他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③从这几句话看来,司马迁是把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围绕着十二本纪,纳入于通古今之变的"科条"之中。"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④,"世家"则细大兼具。这样,《史记》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都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记述来反

① 《天官书》。

②③ 《太史公自序》。

④ 《史通·二体》。

映历史。例如,《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王翦列传》、《蒙恬列传》等,通过记述秦始皇、李斯、王翦、蒙恬、赵高等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了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严刑峻法,劳民伤财,以至垮台,这重要的秦朝兴亡史。又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和《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张耳陈余列传》等篇章,通过记述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等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了秦末人民揭竿起义、推翻秦朝、楚汉相争、汉朝建立等秦汉之际的历史事件。再如,《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叔孙通列传》、《平津侯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通过记述孔子、孟子、邹衍、荀子、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先秦至秦汉各种学术流派的发展与变迁。《货殖列传》则通过记述范蠡、子贡、白圭、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刁间等工商业者,反映了春秋末年至秦汉时期的民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概貌。《游侠列传》是通过记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人物,反映汉代社会的民间习俗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日益加强。如此等等。

人的社会活动是历史的一个基本内容。一定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更与历史有紧密关系。因此,写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特别是写一些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身世和社会活动来反映历史,反映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反映各种人物不同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并不是为历史人物开履历表,或作起居注。这是有一定长处的。

司马迁除了写历史人物之外,还通过“表”、“书”等的形式反映历史变化。他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十表。其实十表不仅提纲挈领地列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和大事,以反映古今之

变,而且有些表的序文,还概括地讲到了一些古今之变的大势。如《十二诸侯年表序》有云:“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这就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的周王室衰落、诸侯恣行,五霸迭兴等政治形势和历史特点勾画了出来。《六国年表序》论战国时期的历史大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论秦末和楚汉相争时期的历史变化,《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论西汉前期诸侯王的盛衰之变,都较为精采。司马迁把汉初百年间的封侯之事,分了《高祖功臣侯者》、《惠景间侯者》、《建元以来侯者》、《建元以来王子侯者》等四个表,这是标明封侯之事虽同,而其实质则异。因为,高祖封功臣为侯,以臣有“功”;惠景间封侯已不尽然如此,而有王子侯、外戚恩泽侯了;建元以来所封之侯,乃是“外事四夷”的“功臣”;再就是分王子弟的王子侯。从四个侯表,可以看出汉初封侯的不同的历史内容。

《史记》的“八书”在论述典章制度的同时,概述了有关制度的历史变化。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曾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并说了“略协古今之变”,“切近世,极人变”,“以观事变”等话。这说明他要在八书中写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军事、天文、水利、迷信活动等方面的古今之变。如八书的第一篇《礼书》的序,在讲了权力不是“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万能工具,“缘人情”、“依人性”的礼仪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作用之后,接着就讲:“周衰,礼废乐坏”,孔子想要“正

名"，然"孔子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到了秦统一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依古以来的形式，"尊君抑臣"的实质，说明礼是压迫臣民的工具。再就讲汉礼，"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就是说汉用的是秦礼。司马迁说秦礼"虽不合圣制"，就点明了古今之礼不同，秦汉之礼已变了。文景之时，未及言礼。"今上（汉武帝）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君主下旨意，"追俗为制"。于是，"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这种东西，简直同"缘人情以制礼，依人性以作仪"，风马牛不相及。古今之礼已大大变化。

用"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等办法记述史事，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又一基本方法。所谓"综其终始"①和"原始察终"②，就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都摆出来，考察一番，进行全过程的综合分析，不是顾首不顾尾，或知终不知始，更非以偏概全。《史记》无论传人或记事，都尽可能把终始情况交代清楚。他写《十二诸侯年表序》，就把春秋时代的周王室和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等十多个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等大事列了表，使人可以考见春秋时代周王室和诸侯国的盛衰大势。他特地说明："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

① 《十二诸侯年表序》、《报任安书》。

② 《太史公自序》。

要删焉。”①这里指出社会各家的缺点,尤其是批评了儒者“断其义”,随便发论,数家“隆于神运”,胡说天运,而不能对历史事件自身的全过程进行综合分析,这样就使读者不能了解历史的概貌。司马迁在考察事件始终这个问题上还说过:“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②这话的意思是,在“综其终始”时需要细心谨慎,明者著之,疑者阙之,不能勉强,更不能乱搞。这种忠于史实、宁缺毋滥的信实态度,是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所谓“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就是对历史事件力求从盛世中看出衰象的苗头,从毛病中透视其变化,也就是说要在历史进程中察见其矛盾和变化,不能僵化,不能片面,不能把历史现象看成一成不变的静止事物。《史记》记述三代至秦汉的史事,不仅写出其发展变化,而且往往指出敝则必变,盛中有衰的情况。写秦汉之际的历史,就先写秦朝之敝,然后写到汉初之变,使人从历史的矛盾中看到了变化。司马迁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③这是说秦始皇称帝之后,担心战乱不休,想要传之万世,便不分封诸侯王,使出了一系列维持集权统治的暴力手段;然而事与愿违,天下大乱,二世而亡,刘邦做了皇帝。秦想保住江山,无“尺土之封”,但是,“安在无土不王”,秦想不变,历史还是变了。这在一

① 《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③ 《秦楚之际月表序》。

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见盛观衰”这一点，司马迁在《平准书》里写得很出色。他先写汉初之盛，把汉初数十年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安”、思想上的“德”写了出来，突出一个“盛”字。但是，他又从盛看到了衰，指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其意是说事物发展在走向反面，盛极则衰，这是变化规律。司马迁是善于在“盛”中观“衰”的。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表面看来功业煊赫，国家强盛，似乎是个盛世；然而只要进行仔细观察，觉得此时的问题可不少，“兴利”带来很多弊端①，任法而犯法者众，“督盗贼”而“盗贼浸多”②，“外施仁义”而愈益虚伪③，等等。这就说明，此时不是什么“盛世”，恰恰相反，只是虚有其表。因此，他“承敝通变”，从衰象中预感到还要变化。

可见，司马迁写历史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藉人以明史，原始而察终，见盛以观衰。因此，他才能较好地写出古今之变来。这种方法是可以借鉴的。

秦汉时代波澜壮阔的时势造就了杰出的历史家司马迁，司马迁肩负时代的使命而通古今之变。中国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孕育了《史记》，《史记》为发展祖国史学真正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司马迁在这个史学的里程碑上，写下了古代数千年来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作出了通古今之变的杰出成就。因此，在中国

---

① 参考《平准书》。

② 参考《酷吏列传》。

③ 参考《平津侯主父列传》。

史学史上,有“迁书通变化”[1]之称。他通古今之变,说明历史在变化,是要“以古为镜”,“述往事、思来者”,不只是回顾过去,而且还寄希望于未来。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当然,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司马迁对历史变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总结,也不可能为人们展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继承司马迁的史学遗产,就应该不取其貌而求其神,争取做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原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张维华

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中,提出了他作《史记》的目的,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两句话很重要,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有值得说明的必要。这两点可以分着看,也可以合着看。分着看,“通古今之变”,是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究天人之际”,是研究历史上“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合着看,是说历史上人世之间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受天意的支配和控制,这样就把这两句话算作是一回事了。看来,后面这一点,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是很值得推敲的。“究天人之际”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术语。那时,由于人对于自然界的了解缺乏应有的知识,人们各方面的活动,都笼罩着极为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因而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不能解释的事物,都推到天意或神道方面去。这不独中国为然,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史记》一书中的《历书》、《天官书》、《封禅书》以及《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都带有一些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不过这是当时历、卜、星、相等方面的“天人之际”。司马迁在给任安信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是有自己一定范畴的。他所说的重点方面,不是由于对自然现象不理解而产生的“天人之际”观,而是由于对人类自身活动尤其是有关政治上重大问题的活动不能理解

而产生的"天人之际"观。不能想象一个写历史的人,不以人们自身活动为主要目标。在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芸芸众生所有的活动那么多,不能事事都有必要用"天人之际"去解释,必然去寻找代表人们活动的一个重心。这就必然要推到代表芸芸众生的帝王身上去。那时的宗教思想是多神论,是万物皆有神论,而在百神中也有一个代表,就是天,就是天帝。这样在天就是天帝,在人就是帝王,"天人之际"就成为天帝与帝王之间的关系了。

"天人之际"实意是天人感应,天的意志如何表现在帝王身上,帝王的行动如何反应到天帝上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感应,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这不光是司马迁的思想,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思想。不过天人交感,也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有次,有畸轻畸重之分。也就是说,是天占主导地位呢,还是人占主导地位。说天占主导地位的,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公羊春秋》的"三统"说。"五德终始"说,见后文,"三统"说是黑统、白统、赤统,把历史上王朝的演变说成是由于这"三统"的顺序来演变。说人占主导地位的,有正统派的儒家思想和董仲舒的灾异说。"五德终始"和"三统"说,从这种思想本身的思想系统看,是说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都是天意直接支配着,人只能随从天意,不能违背天意。试举历史上一些史实来说明。当西汉末年王莽准备篡夺政权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属于谶纬的一些离奇古怪的异说异象。这些异说和异象,总之是说汉运将终,要完了。另一方面是说王氏之运将兴,要取得政权,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些异说和异象散见《汉书》各篇,人都知晓,无待详举。自然这些都是假造的,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出于方术等士,还不奇怪,有些正正经经的儒生,也随着这样说。《汉书·眭弘传》载:"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

君,不害圣人之受命。"这是当天发生异象,暗示当时王朝气运已衰,虽当政的帝王,是个圣明的贤主,也要举行禅让,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他人。因为天意如此,人不能违背。这就明确指明,历代王朝的兴废,是由天意来决定的,人只能受天的支配和控制。"五德终始"和"三统"说,主要就是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因之用在历史上就是宿命论,就是天命决定论。

另一方面,则与这种天命决定论有些不同,它主要是说人们的行动善恶与否,上感天意。善的,上帝就使之兴,恶的,上帝就使之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古传尧、舜之兴,是以仁德感天帝而受天命为天子,桀、纣是以暴行触天帝之怒而亡天下。这两个例子,都是以人的行动为主,天根据人的行动以善恶而显示出有赏有罚的天意,这与天帝决定论颇不相同。

为了阐明这一点,不妨研究一下在汉代颇有影响的董仲舒的思想。代表董仲舒思想的,今有《春秋繁露》一书。这部书很有问题,在思想上很混乱,有些说法仿佛脱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而流于方士阴阳家人们所说的话。很早就有人说,这部书经过后人篡改的地方很多,不能代表董仲舒的主导思想。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董仲舒究竟是属于儒家这一派,只是他在承继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大大发挥了《公羊春秋》的灾异说,在儒家思想上另开一个门面,而独树一帜,因此,后人称之为新儒家。《春秋繁露》既然很杂乱,很难用以说明董仲舒的主导思想。代表董仲舒主导思想的,恐怕要推《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他的天人三策。因为这三个策,是班固据实录下来的,不会杂有他人的思想。

诚然,董仲舒在史学观点上,也有天命决定论的看法。《春秋繁露·符瑞》载:"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这是以西狩获麟为符瑞,其所以出现,纯由天意。又《三代

改制质文》篇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通以已受之于天也。”“通以已受之于天”,就是说,一切都由天来支配,人只能照天意来办。从这两段话和上引眭弘的话看,董仲舒是有天命决定论的思想。姑且不论这两段话是否真正出于董仲舒之口,我觉得就是真的出于董仲舒,也不是董仲舒的主导思想。他的主导思想,应当从他的天人三策里去寻取。天人三策有多处提到“天人之际”。第一策中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是说王朝兴衰,是以帝王行为之善恶为主,而天意只是起着反应的作用。又说:“……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这里明确指出“治乱废兴在于己”,即在于帝王本身。第三策中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天之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这是说孔子作《春秋》言人事亦言天变,天变之所由起,是以人事之善恶来定,不能专言天变而不谈人事。以上所引的话,才是董仲舒所言“天人之际”的主旨。

董仲舒有时也谈《公羊春秋》中的“三统”说，但他谈这方面问题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人事之变感应于天，非专言天意，与这里所说他的主导思想是相合的。

司马迁作《史记》，以上述这一观点来说，可以说大体是同董仲舒接近的。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基本上是想阐明孔子作《春秋》的意旨，司马迁也是如此。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多次标榜过《春秋》，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又说：“《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司马迁不仅高度地评价《春秋》经，而且自己也想继承孔子的事业。《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从此看，司马迁作《史记》的主导思想，虽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改变了旧有的历史范围和旧有的看法，但基本上还是以谈人事为主。有时也谈天意，这是受过去和当时的影响所必然造成的，不是他的主题。经与史都是起经世致用的作用，不如此，则经不得成为经，史不得成为史。司马迁的史观在此，其申明“天人之际”的意义也在此。统治政权是上层建筑，它能否适应经济基础，是历代王朝兴废的原因之所在，从这个观点看，董仲舒和司马迁在这方面所说的是有道理的。

接着再谈谈司马迁的“天人之际”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究竟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史观，来源于邹衍的学说，他把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变作自己的历史哲学史观，我怀疑这种说法。

邹衍是战国末年的人，生于齐国。班固《汉书·艺文志》把他

划归阴阳派。他的著作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见《艺文志》。《终始》就是《五德终始》。其实邹衍不只是阴阳家,也是燕、齐之间海上的一个方士。《汉书·刘歆传》载:"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从邹衍"重道延命方"一语看,邹衍也是一个谈"神仙方术之事"的方士。有人说邹衍是儒家者流,恐不甚合。邹衍的书,后世无多流传,其说被后人煊染,窜入各书中,真伪难言。《史记》未为邹衍独自立传,其事迹和学说,附见于《孟子荀卿列传》,为了研究方便,兹录其主要的一段于下:

> ……齐有三驺子。……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这段记载,人们所注意的是五德转移,即五德终始说。五德即金、木、水、火、土,就是前人所说的五行。说代表人间世的历代

王朝,是按这五行的相剋之序,此散见于《春秋繁露》一书,兹不多叙。像这种学说,纯属个人臆想,毫无科学根据。可是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这是古代人们的宇宙观,是古代人们看作是历代王朝变化的规律。司马迁接受了这种学说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哲学史观,这就值得推敲研究。

首先谈谈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渊源。有人说,这种思想来源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的话是用来光大孔子,把孔子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历史上的地位等同起来。在孟子看,孔子有德无位,很是遗憾,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把尧、舜与孔子顺序排下来,便使孔子成为有德、有位的素王了。另一方面,也是说明道统的传递自尧、舜至孔子是一脉相承,用来光大儒家的学说。司马迁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前文所引,是用来光大自己作《史记》的意义。所谓五百岁,是虚推出来的,不足为据。日人《史记会注考证》引清儒崔适的话,说:"云五百岁者,此以祖述之意相比,所谓断章取义,不必以实数求也。"[①]就是这个意思。看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两个思想系统,不能混为一谈。邹衍的五德既然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说,《尚书》、《箕子》、《洪范》中已有明文。即推而远之,殷商时已有五行说。邹衍继承洪范五行之说而加以扩之,是很有可能的,是很容易想到的,不必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相联系。

至于司马迁对于邹衍"五德终始"说是否相信或者相信到什么程度那也是比较容易见到的。在前引司马迁记述邹衍的话中,就有"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其言虽不轨"等语,这

---

①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决不是重视或推崇邹衍"五德终始"说的评语。《史记·五帝本纪赞语》,有"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之语,索引曰"《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此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五帝德》、《帝系姓》两篇,是否出于儒家学派,总之是属于邹衍"五德终始"说之类的书,司马迁认为"儒者或不传"也是有不甚重视的意思。邹衍之说在秦汉时代确实起过很大影响,当时甚为流行的为封建王朝服务的"符瑞"、"受命"、"改制"等说,大都与邹衍之说有关。降至西汉末年,向、歆父子之流,受它的影响更大。司马迁生在那个时代,不能不受这种学说的影响。但他似乎没有发展到接受这种学说,而成为自己的历史哲学史观。

再从《史记》一书所载的与五德终始有关的一些记载来进行考察,《史记》中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事,"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后《殷本纪》亦有类似的记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周本纪》亦载:"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高祖本纪》载:"……乃立季(高祖名)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文帝本纪》载:"是时(文帝十三年)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

之。"《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上述各段，《史记》中有重出之处，不备录。三代时事，是司马迁根据古文献录下来的，秦改制，是秦一代皇皇大典，不能不录入史文。汉初几十年，对于汉应五德中那一德，争论不休，终未作出决定。司马迁作《史记》，对于这些历史事实，不能不收入史内，这是作史者必然的态度，不足说明他是根据邹衍"五德终始"说来写历史的。汉人有根据"五德终始"说写历史的，那是《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作的《世经》那一段，始自太昊帝，终于光武，都是袭用邹衍之说写出的。刘歆才是相信邹衍之说的。司马迁作《史记》，虽所重各有不同，但相比之下，他没有这样做，说明他是重视历史事实，并不笃信邹衍之说。

司马迁在汉初几十年所有改制中，他没有申明过自己的意见，只有在太初改制这件事上，班固说他主张过这时汉是土德之应。《汉书·郊祀志赞》云："孝武之事，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这是说司马迁在太初改制这件事上，他曾主张汉是土德之应，要改制，应照土德行事。我经过研究之后，觉得班固之说，是自己设想出来的，并没有实在的根据。太初改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又见《汉书》《儿宽传》，云："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当作何字)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又见《汉书·律历志上》，云："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

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此三段记载,均言太初改制,重在历纪坏废,更订历法。而未提及要应土德改制的事。班固言儿宽、司马迁主张秦为水德,汉当以土德克之,因而改制,实令人怀疑,纵司马迁在这件事上说过汉是土德的话,也是随时俗而言,不足说明司马迁是据邹衍之言而办理这件事的。

从以上这段论述,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受过邹衍之说的影响,但对其说信疑参半,不曾达到据其说以写史的地步,自然也就谈不上以其说为自己的历史哲学史观。总之,汉初阴阳、五行、方士之说甚盛,时人不受其影响者甚鲜,司马迁是受这种乌烟瘴气学说影响比较轻的一个人。

(原载《文史哲》1980年第5期)

司马迁的历史变化观及其对人物的评价

陈可青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提出的撰写《史记》的一个宗旨。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两千多年以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便是一个创举。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口号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只就《史记》的若干论述，约略地谈谈司马迁关于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关系。

司马迁在“贯通”的问题上是下了很大功力的。十二本纪，吴、齐、鲁、蔡、陈、卫、宋、晋、楚、越、郑、赵、魏、韩等世家，十表，按世系、年代记叙五帝、夏、商、周、秦、汉各王朝及诸侯国分合盛衰的过程；八书分别记叙古今各项制度的变化；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记叙边远部族或国家兴起发展及它们与汉族国家的关系变化；《儒林列传》记儒学各流派的演变；《货殖列传》记近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关人物的世家、列传，又和本纪纵横相连接。所有这些，使得《史记》全书从体例到内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部规模巨大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认为社会历史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他明确地反对那种用固定不变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观点：《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

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社会如果永远停留在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水平上,并且硬要用这种观点去“涂民耳目”,向人民说教,那是极其荒唐的。司马迁整理史传,著作《史记》,就是要阐明古今历史的变化,证明这种观点的虚妄。“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这就是说,司马迁考察了古今历史的变化,认为自从黄帝以来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所需所好,总是孜孜以求,这种追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加以改变的。不仅如此,他在分析和列举了各地的物产之后,还发挥了以下深刻的思想:

>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
>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以上所引的几段文字,都是作者依次写在《货殖列传》卷首的议论,我们不必加过多的分析,只要把前后文连贯起来,就可以看出,作者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基于人们物质利益

的需要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基本前提。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司马迁的历史变化观，是实实在在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

司马迁很重视古代历史的整理和研究，但他对于远古及夏商周三代“先王”，并不像儒家那样无端的加以美化和讴歌，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就他所及）“不虚美，不隐恶”，给以实录。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大夫所谓的僭越篡弑行为和兼并战争，他尽量避免作主观的褒贬。在他看来，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专政，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兴叹也。……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司马迁这里的观点，和儒家哀叹春秋时期的变化是什么“世衰道微”即历史的倒退完全不同。在齐、晋、楚、宋、吴、越诸世家和《秦本纪》等篇中，司马迁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及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霸”，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齐“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等。司马迁着重写出他们所以得以称霸，是由于他们个人品德贤良，重用贤臣，政治修明，内政外交搞得好，经济发展，国势强盛，所以他们被推为盟主有着历史的必

然性。

司马迁反对复古倒退和以古非今的历史观点,强调“法后王”,认为后王的历史经验比先王的传闻更切近现实。“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些话,写在《六国年表·序》中,反映出他高度重视战国时期的历史新变化。在具体的记述中,他肯定商鞅变法、吴起变法、赵武灵王的改革,这些变革推进了战国时代的社会进步。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商君列传》)。称吴起变法的结果,“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评价是很高的。他还详尽载录了变法的言论,如赵武灵王论改革,“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赵世家》)。

司马迁看到了历史变化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是由渐进逐步发展到急变的,任何重大的变化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例如关于秦统一六国这个重大事变,他写道:

>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

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六国年表·序》）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楚之际月表·序》）

作者指出，秦是经过了襄公、文公、穆公、献公、孝公等英明君主的苦心经营，历时一百多年，才从一个"比于戎翟"的偏远小国，由弱变强，与诸侯争雄称霸，直到秦始皇执政，又经过十年艰苦的兼并战争，最后才取得全国的统一，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间包括着无数政治上的谋划和武力的征伐，绝不是单靠某一个君王个人的才干所能完成的。这里，司马迁用了"盖若天所助焉"这句话，似乎借天命来解释统一，其实不然，所谓"天所助"，按它的实际意义，是对秦统一的一种夸奖。事实上，司马迁不仅否认秦统一是什么天命所归，也不认为秦统一是孤立的偶然现象，在他看来，秦统一六国是战国时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只须读一下《六国年表·序》全文，就十分清楚了。他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年表·序》）

在汉初，统治者几乎异口同声谴责秦的暴虐，根本看不到它的历史功绩。就连贾谊这样对秦亡的原因作过比较深刻论述的学者，也不免持这种片面的见解。至于董仲舒之流，则更是把秦骂得一

无是处。相比之下,司马迁的评论就公允得多,因而也深刻得多。

司马迁上述评论,在历史学上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评定一个王朝的功过,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司马迁认为秦统一中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功绩,应该肯定。不能因为秦的暴政,王朝的短促,就一概骂倒,或者嘲笑了事。二、评论历史事变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所谓法后王、法先王就包含这个意思)向前看,就要法后王,因为时代接近,变革相类,其历史经验比之古代更切近于现实。秦的统一和迅速灭亡对后世都有重要意义。三、是割断历史,孤立地看一代兴亡,还是"察其终始",历史地总结一个王朝的盛衰。作者尖锐的批评了那种"不察其终始",孤立地肤浅地看问题的态度,认为这种态度就像用耳朵吃东西一样的可笑和可悲。

在司马迁所处的当时,所谓的历史变化,莫过于秦汉之际的大变化了。这一变化,影响是如此之深,西汉王朝的建立,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已近百年,但在人们的头脑中,好像一场大地震之后,余波还未消尽。事变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人们依然迷惑不解。统治阶级的各种人士都在探究其原因,寻找各种答案。司马迁自己也不觉惊叹"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司马迁不愧是大史学家,他在惊叹的同时,作出了概括而精辟的判断:"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序》)

在这里,作者是把秦亡到汉政权的建立,作为一个全过程来看的。作者紧紧抓住了陈涉、项羽、刘邦三个反秦集团在亡秦战争中各自的作用,又把它们依次连接起来。作者显然认为,刘邦所以能够完成推翻秦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大业,刘邦本人的雄

才大略，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事情并不尽此，其中还包括着陈涉、项羽为首的一大批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首先高举义旗，崛起作难的是陈涉。陈涉振臂一呼，天下群雄响应，开创了反秦斗争的局面，造成了天下共亡秦的有利形势。在群雄逐鹿，波涛汹涌的反秦浪潮中，实力最强，声势最大的是项羽；消灭秦军主力，把反秦战争推向高潮的也是项羽。但是项羽残暴，在推倒秦王朝之后又分封诸侯，从而引起了新的纷争。最后，汉王"拨乱诛暴，平定海内"，使全国重归于统一。司马迁这个评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因此是十分深刻的。

司马迁杰出之处，还在于他敢于干预现实，大胆揭示了汉代社会的矛盾变化。可以这样说，写出汉初一百年间的社会变化，是作者"通古今之变"的最重要的课题。《史记》全书中大量的篇幅正是记载和论述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的。其中《平准书》和《酷吏列传》比较集中地写了汉武帝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

《平准书》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在叙述了汉初经济繁荣之后，指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作者这里说的"物盛而衰"，本是事物自身转化的趋势，而在当时，加剧这种趋势的是汉武帝内外一系列政策。作者接着记述了武帝招东瓯，平两越，通西南夷，灭朝鲜，以及频繁的讨伐匈奴，连年大规模的战事和兴作，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为了解决庞大的

开支给养,武帝又实行种种严厉的财政措施和严刑峻法,使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出现了动乱。于是"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西汉王朝由强盛繁荣落到了如此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地步,再不改弦易辙,秦亡的历史又要重演了。以上这些就是司马迁要着重写出的当代社会正在酝酿着的重大变化。

司马迁肯定历史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因此,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与一般的封建史家的观点不同,表现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进步性。

第一,他不以成败名位论人,而着眼于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例如,前面说到的他对陈涉、项羽的评价就很突出地说明这一点。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作本纪,从体例的安排上,突出两人的地位。《陈涉世家》对大泽乡发难以及它对整个反秦斗争的推动作用作了生动翔实的记载,又着重指出"陈胜虽已死,其所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项羽本纪》把项羽写成一个咤叱风云、英气盖世的人物,纪中关于项氏起事,项羽击秦救赵,鸿门宴,垓下之围,写得栩栩如生,充满作者对项羽这个英雄人物的激情,评论说"羽非有尺寸,乘埶(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又如淮阴侯韩信,在汉初已作为叛臣而被诛,司马迁作《淮阴侯列传》,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写得非常出色。他写韩信小有奇志,借萧何之口称赞韩信"国士无双"。写汉王拜韩信为大将,"一军皆惊"。对韩信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出奇制胜屡建奇功,作了详尽的记载。列传还写了刘邦畏恶韩信的才能,从百般牵制到监视韩信,最后置韩信于死地。全篇满含同情和惋惜之情。最后评论:"(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

之徒。”

第二,注意时与势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司马迁从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确实觉察到了许多原来并不出名,政治地位很低,甚至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等,如皂隶、役卒、乡吏、罪徒、群盗、屠狗买缯者流,在汹涌的急流中纷纷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显赫的人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司马迁对这样的人物,着力地记述了他们地位的变化,称赞他们的智勇才干,歌颂他们的业绩。例如彭越,“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率众起义后在楚汉相争中成了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之一,评论中说“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魏豹彭越列传》)。英布先为布衣,后坐法为骊山徒,后又亡为江上群盗,先随项羽击秦,后又归汉击项羽,破项羽垓下,史称英布与彭越、韩信三人“同功一体”,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评论道:“英布者……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对英布由刑徒而王表示惊叹。其他如相国萧何、曹参,原是沛县小吏,绛侯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彊”,舞阳侯樊哙“以屠狗为事”,滕公夏侯婴为“沛厩司御”,颍阴侯灌婴为“贩缯者”,司马迁记叙了他们在反秦灭楚,建立和巩固汉王朝事业中的不同作用。对于这些人的隐显成败,司马迁很强调时势的影响,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萧相国世家》)。说“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以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绛侯周勃世家》)。又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

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司马迁的意思是说,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这些人出身微贱,也没有“奇节”或者特殊的才能,只是他们追随刘邦,赶上秦汉之际的大动乱大变化,因时顺势,结果做出了重大业绩,成为历史上的名人,这种由隐而显、由贱而贵的变化,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想象不到的。

第三,对于重要人物的功与过,根据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实际的作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作出符合于历史真实的结论。例如李斯这个在秦政权中居三公位的重臣,司马迁记载了他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多方面作用,也记载了他与赵高合流谋杀扶苏,另立胡亥,使赵高专权,终至于迅速灭亡的劣迹。评论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李斯列传》)。这里,功过分明,褒贬切理,并未因其过错而淹没其功绩,或夸大其功绩而忽略其过错。与司马迁同时的公孙弘,再三被汉武帝重用,由左内史擢为丞相,被封为平津侯。此人最善于阿谀奉迎,沽名钓誉。公孙弘居丞相位,然而故意“为布被,食不重味”,装出一副节俭的样子,实际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因为“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儒术”,加上一贯投主所好,深得武帝器重。司马迁给以辛辣的嘲讽,并指出“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治,稍骛于功利矣”(《平准书》)。

第四,历史的发展为众多的人物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撰述史传,评论人物,不应局限于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应该广罗各方面的人物。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

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但是《史记》一书所记人物的事迹,却远远越出了这个范围,他所称赞的不仅有历代圣君贤相,功臣名将,而且包括许多名位不高的中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日者、滑稽、名医等,他还为治理生产的商贾富人列传,这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关于司马迁论述游侠和《货殖列传》中的生产者,过去许多人已作过较多分析和评论,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司马迁在关于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提出了许多创见,发挥了卓越的思想,但不可避免的也表现了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他的基本思想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却又往往因袭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某些循环论说教。他难能可贵地看到并揭示了历史发展是由众多的英雄豪杰所促成的,而英雄豪杰往往受着时势的影响,却又无法摆脱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大胆揭露一切人等(从高贵的圣贤到卑薄小人)无不为了追求物质财富,从而撕破了封建政治道德的虚伪纱幕,但这种观点又是从自然主义的绝对人性出发的,把牟取个人物质享受视作人们一切行为的唯一推动力,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局限。总之,司马迁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新时期中,在三十年来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总结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成就,把这项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北京师院》1980 年第 2 期)

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形成

朱钟颐　罗炳良

《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代以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意识受到高度评价,然而《史记》关于天人关系的历史理论,尚未得到应有的阐发。弄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形成,有助于认识《史记》一书的编撰目的,全面理解司马迁的思想。

一　天人相与观念决定了司马迁的理论宗旨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际"字,是先秦以来常用的一个概念。许慎《说文解字》释"际"为"壁会也"。段玉裁注曰:"两墙相合之缝也。引申之,凡两合皆曰际。'际,取壁之两合,犹'间'取门之两合也。"可见"际"原意为两壁会合之处,后来引申为各种事物的两相交会。《易·泰卦》说"天地际",《坎卦》说"刚柔际",是指空间上的交会;《史记·孔子世家》说"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是指时间上的交会。所以"天人之际"就是天人之间交会,也就是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天人之际"是一种什么关

系呢?

西汉时期,天人相与学说是社会上的一门显学。这种学说是儒家学派吸收了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就是儒家的公羊学派。当时传《春秋》的齐人胡毋生、广川人董仲舒是研治《公羊春秋》的著名学者,成为这一学说的集大成人物。《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他应诏答汉武帝的三篇《贤良对策》,即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解释是:"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国家的治乱盛衰,上天都要预警以示吉凶,世间帝王根据天示吉凶,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使天与人达到和谐一致的效果。《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的汉武帝时期另一位大儒公孙弘也主张"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甚至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淮南子·要略》也强调"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可见当时天人相与学说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和深远!

既然天人关系问题是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每一位有作为的思想家势必都想提出自己的见解,阐述一家之言。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司马迁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过去研究《史记》的学者习惯于把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先秦诸子百家联系起来,争论司马迁的思想属于儒家还是属于道家。其实司马迁是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总结秦汉之际历史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对当时的天人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史记·天官书》是司马迁对天人相与关系的集中表述,其中写到: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把《史记·天官书》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内容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在理论宗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董仲舒说得比较概括,而司马迁则说得非常具体。司马迁是用具体的事例为董仲舒的学说作了注解。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家之学各有特色,同源异流,共同丰富了西汉时期的天人相与学说。

二 职掌天官影响了司马迁的理论认识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职掌天官所造成的。司马迁在《史

记·太史公自序》中叙述其世代相传的职业时说：

> 司马氏世典周史。
>
>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
> 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司马氏家族的职业是太史。秦汉时期太史有两种职责：一是职掌天官。这里所说的天官并非《周礼》中的冢宰天官，而是天文。两汉时期之所以把天文称为天官，正如《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所说："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当时的人们从天人感应的观念出发，妄以星座附会人事的结果。二是职掌修史。太史既典天官，又典文史，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自己的官职时，把"文史星历"合而言之。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中说："汉太史令之职，掌天时星历，不掌纪事。"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司马谈临终时，以未能完成编撰史书为没齿之恨，谆谆嘱托司马迁必须实现他的遗愿。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见司马氏父子是把太史修史作为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看待的。

太史职掌天官和文史，乃是由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的。因为记载古今历史，必须要精通古今历法，所以古代史家试图在

天象变化与历史变化之间寻找某些联系。换言之,欲通古今之变,必究天人之际。古代的太史掌管天官,研究天文,固然也像近代天文科学一样,研究天体中星辰分布的位置、形态结构、运行规律等天文现象,例如《史记·天官书》就把周天划分为中、东、南、西、北五大星区,九十一个星组,包括五百多颗恒星;又记录了九颗彗星,九次日食和一次陨石,成为研究西汉以前天文学的珍贵文献。但是,《天官书》并不是对天象作客观的描述,而是把天文现象和人事结合起来,通过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阐述天人相与学说。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说:

>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这就是说,当天空发生日月星变等现象时,人间的统治者就应该修德改制,以保持政权的稳固。只有达到天人相符,才能使职掌天官的使命完备。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类似的言论:"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班固说天象的变化表示吉凶,帝王应该根据这些天变的预示,修明政治。由此看来,两汉时期的历史学家,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对天人相与关系的理论认识是相同的。

三 家学师承奠定了司马迁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形成,除了与其职

掌相关以外,还与他的家学师承有密切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司马谈的学术渊源时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三家都讲天人相与之学,而对司马氏父子影响最大的则是唐都与杨何。

《史记》中提到唐都的地方,除上引《太史公自序》以外,还有《历书》"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天官书》"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另外,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说到司马迁、壶遂、公孙卿三人奉诏制订《太初历》,唐都和落下闳也曾参与此事;《汉书·艺文志》中把唐都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天历专家并称,于两汉的数术专家独推唐都。可见唐都是西汉一位著名的占星天历专家。

《史记·天官书》所论究竟源于何人之说,清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与梁耀北论〈史记〉书二》中说:"《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石之传。"认为司马迁的观点出自战国时期齐人甘公、魏人石申学说。今人研究《史记》,在这个问题上多沿袭钱氏之说。我们认为,《天官书》虽然提到甘、石"言天数",但绝大部分内容与唐都等人的天人相与之学有关。《天官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至"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详叙天空中所见星体,分其部居,并与人事相比附,分别代表世间的帝王将相,星体的运行变化决定着人间的吉凶祸福。这部分内容当源于《天官书》所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的学说。第二部分从"凡望云气,仰而望之"至"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诚然",讲的是望气术。望气家认为天上云气的色彩、高低、聚散、形态的变化,都表示人世间一定的吉凶祸福。这部分内容当源于《天官书》所说的"气则王朔"和

《封禅书》所提到的"望气王朔"的望气之术。第三部分从"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至"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讲的是占岁术。这种占岁方法就是在特定的日子里观测风向和岁星的位置,藉以测定年岁好坏,有无兵凶祸事等。这部分内容当源于《天官书》所说的"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的魏鲜占岁术。第四部分从"太史公曰"至文章结束,是司马迁对唐都、王朔、魏鲜三家之说所作的综论。把上述事实和《历书》说汉武帝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司马迁又明言其父"学天官于唐都",《天官书》中分天体为五大星区与《历书》之说正相吻合联系起来,可以说《天官书》的思想源于唐都等三家之说,较为合适。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西汉杨何是孔子之后第八代传《易》大师,所以司马迁说"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易》原是先秦一部卜筮之书,属于子书之列。历代传《易》者不断对它作出解释,所以《系辞》、《文言》等《易传》中就融合了阴阳、儒、道三家之说,其中包含着浓厚的天人相与思想和深刻的穷变通久思想,例如《易·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种学说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史记》的《天官书》和《封禅书》中,甚至在《乐书》中也有所表现:"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这种天人相通意识,标志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形成。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还得益于他父亲司马谈的言传身教。学术界大多认为司马谈的思想属于道家,而忽视他与司马迁儒家思想的联系。这主要是依据他的《论六家要

指》尊崇道家和班固对司马氏父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而未考察司马谈的全部思想。《论六家要指》虽然推崇道家,但却是把阴阳家列于首位,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推崇备至。事实上,司马谈和西汉的儒家学者一样,笃信天人相与学说。《史记·封禅书》记载了他以太史令的身份两次参与汉武帝郊祀典礼的讨论。公元前122年,汉武帝行猎时捕获一只独角兽,认为是天降祥瑞而获麟,于是改元元狩。次年,又亲到雍地举行郊祀,司马谈同祠官宽舒等讨论商定了祭祀典礼规模。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在冬至日郊祀太一神,据说有人发现"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于是司马谈及祠官宽舒等人建议:"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从这两件事来看,司马谈相信上天有什么预示,人间就应该有相应行动,天人之间相互沟通。正是由于司马谈的影响,司马迁才继承先人之业,宣扬汉家受命。《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通过探究天人关系,论证了西汉王朝受命于天的皇权神授思想。

四　余　论

上述分析表明,司马迁的职掌与师承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思想属于儒家公羊学派,具有浓厚的天人相与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指出司马迁具有天人相与的思想,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与西汉正宗儒学以阴阳五行和符瑞感应粉饰太平的官方学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需要正确认识。过去研究《史记》往往

把西汉官方儒学和司马迁思想对立起来,武断地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愿承认司马迁的天人相与思想。须知天人相与学说是西汉时期的显学,这种思想并不是司马迁一人所独有,而是西汉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共有的思想,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窠臼。即使今天学者们推崇的东汉无神论者王充、张衡等人,也讲天人感应。王充《论衡·宣汉篇》说:"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变,治未平,气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太平之应也,治平气应。"《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引张衡之说:"众星布列,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天人相与学说包括讲符瑞感应和阴阳灾异两个方面,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前者属于有神论范畴,妄意附会,对人事和社会没有价值;而后者讲天人关系,强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一致,实质在于注重人事,对于适当调节封建社会政治运行机制具有良性影响。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和董仲舒"观天人相与之际",都是要探究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西汉政治服务。所不同的是,董仲舒是经学家,主张通经致用,把休咎感应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提出全面改制的主张。而司马迁是史学家,通过对天人之际关系的探究,用以解释历史的演变,试图总结前代治乱盛衰,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司马迁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最终能够"成一家之言",其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原载《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
第21卷第5期,2000年9月)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杨燕起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理”与“势”

司马迁所要考察的历史上成败兴坏的“理”，在他看来，就是要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综合概括，以便从中找出对现实与未来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的一些原则，所以“理”或称“纪”，即“纲纪”，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规律”。然而司马迁对这些原则、纲纪的探求，是建立在对事势观察分析的基础上的。

《史记》是纪传体，其纪与表的部分在体例上都起着“纲”的作用。张守节《正义》引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来解释本纪，是《汉书》以后正统史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符合司马迁作史体例的原意，应该说，司马迁为之立本纪者，着眼点不在“天子”，而在“主宰天下的大势者”。对这一点前人是有所评

述的,如宋人林駉说“子长以事之系于天下则谓之纪”①,直接回答了刘知幾对于《史记》本纪这一体裁的“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②的批评;刘成炘说“本纪者一书之纲,惟一时势之所集,无择于王、伯、帝、后”③,也指出立本纪者是一个时期内能够集掌天下大势的人;近人吕思勉也指出:“必天子而后可称纪”等的“正统僭伪之别,亦后世始有”④,直接否定了除正宗天子之外谁也不能入于本纪这种曲解司马迁创例意图的偏见。

《史记》的本纪是记述某一历史时期事势主宰者事迹的一种体裁。十二本纪中历来有争议的有《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四篇,而这四篇正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着眼于天下大势的思想。黄帝是中国历史大势的开创者;秦是中国历史由德治转变为力治的突起力量与完成者;秦楚之际虽有名义上的天子义帝,但项羽却是当时事势的实际主宰者;吕后虽是妇人,但她却是刘邦去世以后一个时期内汉朝政权的实际控制者。所以刘成炘说“古之纪仅取事势所归,以为一时之纲领,初无正统之辨”⑤,正是概括地表述了这一思想。

司马迁从本纪中所提挈的这个天下大势的纲中,所要考察的“理”是什么呢?总括起来就是“德治——力治——德力结合、以德为主”这样一个概念。五帝三王纪重在德治,尧舜以德让,禹汤文武以德立国,桀纣厉幽失德而丧国;《周本纪》借祭公谋父谏穆

① 《古今源流至论·史学》。
② 《史通》《本纪》和《杂说篇》。
③ 《史学述林·史体论》。
④ 《史通评·内篇·本纪第四》。
⑤ 《〈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和《序论三·挈宗旨》。

王的一篇议论，申述先王耀德不观兵之所以盛和穆王以后不耀德之所以衰。《秦本纪》借秦穆公与由余的一段议论，申述儒家的《礼》、《乐》、《诗》、《书》即使在黄帝创设时也"仅以小治"，到了当时，反不如夷狄之没有《礼》、《乐》、《诗》、《书》为好，这是说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儒家学说已经逐渐不能适应天下大势的变化了。在诸侯争霸中，秦国以力兴起，统一中国后，还酷刑罚，以致短祚而亡。项羽代之，沿而不改，故使"仁义长者"刘邦得"天统"而建汉。随之吕后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初社会又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总之，司马迁认为，随着天下大势的变化，治理国家的政策主张也必须相应变化，就总的趋势来说，用单纯的儒家、法家学说都不能长治久安，而完全放弃哪一种学说主张的做法也不可取，最后外柔内刚的"道"应运而生，说明必须注意施德于民，而决不可一味逞力以行，这就是"理"。这个"理"为他在表序和其他地方的记述与评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司马迁对历史的论述就局部的情况来看也是在贯彻上述"纲"的意图的。如《齐太公世家》，吕尚辅佐周西伯"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协助武王建周有功封于营丘，他"修政"使"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得管仲之佐，"修齐国政"，而为春秋始霸，与此相应记载，"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到景公时，则记晏婴使晋与叔向的私语，说"齐政卒归田氏"，同时世家记鲁有阳虎之乱，晋有六卿之乱；再后有田乞立悼公，田常执简公，立平公，"专齐国之政"，平公后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康公二十六年"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强于天下"。十二诸侯各世家，都是这样在相应表述春秋战国时期大势的情况下，详细记述了各诸侯国发展变化的情势，据此司马迁又将这些内容表列为十二诸

侯、六国两个年表,咫尺之间,将诸种事势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世家、表体也重在以本纪为纲表述天下大势。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齐太公世家》的论赞中,从地理,民俗、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提出齐桓公在春秋时的称霸是有其合理性的,明确表现了司马迁评述历史立足于“自然之势”的观点。

同样,列传也有在更小范围内表述天下大势的作用,如《伍子胥列传》,通过伍员一生的政治作为表述了吴楚越各国的“存亡之势”,并兼及包括秦、齐、晋等国的春秋末年的天下大势。《仲尼弟子列传》指出“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无疑也是着眼于春秋末年涉及鲁、齐、吴、晋、越变乱的时势。其他列传也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表述了天下之时势。

综上所述,司马迁所讲的势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指带有纲领性,规律性的事势发展的总的趋势;另一个方面是指某些政治人物在他的活动期限内作为他的历史背景的具体的时势。时势是历史总趋势链条中的一环,是历史发展的横断面,因而更具有现实性。所以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角度来说,“势”也自有规律性和现实性的程度与性质的区别。因此,《史记》的所谓“势”,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各种客观条件的交替综合,是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与概括。我们不能要求司马迁用今天的社会历史规律性的见解来阐述他的“理”,但他对历史发展趋势和具体形势的许多分析与论述,还是反映了从远古传说至汉初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其中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等内容的很多认识是深刻的,在思想上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天”与“势”

《史记》中关于“天”的含义大致有三种：

一、指自然的天，如《天官书》所记之“日月星辰”、“天变”。司马迁是古代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在认识自然天象与历数方面有很重要的创见。

二、指“天”意，天命，天道，如《天官书》所叙的“形见应随”，《项羽本纪》中引项羽所说的“天亡我”以及《伯夷列传》有关对天道的评说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中，除借天命之说寄寓讥刺之意以外，也表明司马迁受着“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影响。但这并不是主流，因此他也常结合具体事例对天道提出大胆的怀疑与质问。

三、在极大多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所指的“天”，乃是指天下事势及其发展的总的趋势。剖析几个大家熟知的事例，可以看到司马迁的代“势”之“天”，包含如下的重要思想内容。

第一，在一个长时间里由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因素逐渐积聚而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如一种潜在的社会客观力量在左右人间世事，并对重要的社会变革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六国年表序》讲秦的“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这个“天”就是指的历史事势发展的总趋势。《史记》记述当把秦国“比于戎狄”之时，中原地区正开始经历礼崩乐坏、天子权力下移的过程，致使秦穆公迅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当“海内争于战功”时，秦却在献公之后经过商鞅变法而“常雄诸侯”，在法家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情势下，善于谋诈的秦自然会因利乘便，吞并天下。这样的“天之助”，就是指客观历史发展趋势在秦统一事业中所起

的实际推动作用。

第二,当社会处于急速变化的时期,历史的进程有可能突破它固有的格局而呈现某种奇迹,于是事势的发展就会将一些本来不怎么显著的人物推上历史舞台,甚至使他们成为时势的主宰者。《秦楚之际月表序》称:“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所谓“大圣”云云无异是司马迁对刘邦此人没有真本事的深刻嘲弄。刘邦起于布衣,是“无土而王”。他之兴,既不是因为积“德”,也不是因为累“力”,只是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情况下拣了一个便宜,恰恰是秦的没有分封,“堕坏名城,销锋镝”,为他的登上帝位扫除了障碍。一句话,刘邦是借助于历史参错扰攘急速变化的形势很快成就了帝业,这里的“天”、“受命”,就是指承受了社会有利的客观条件,顺从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寓讥刺之意。

第三,历史趋势变化积聚的过程往往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只有真正贤能的人才有可能注意到事势的“幽明”状态,并能根据自己的观察以某种方式适当地预见到事势未来发展的某种结果。《田敬仲完世家》的论赞讲:“《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并说田氏之所以“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中国古代以《易》术为基础的占卦,具有它既可知又不可知的神秘性,但是揭开它的神秘外衣,在某些情况下显示出来的就是一种事势的必然,因此它包含着一定的能够预卜社会事物发展的合理成分。这是因为古代的占卦在它的臆测、迷信之中,也积累着方士们对社会现实事物潜心钻探、揣摩、估量的经验,常也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因此,占卦内容的神奇,却也正是“事势之渐然”在占卦者头脑中的反映。当然把占卦说得那么准确,其中自有妄人的附会、渲染,但不可否认,《易》术还是有它

现实的可取的一面。这就是说田氏之篡齐不仅是事势本身逐渐演进的结果,而且好像也是遵循人们早先预料的那样来发展的。司马迁出于他对《易》术幽明的认识,从而肯定了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观察的某些预测,是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种发扬,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一定的带有规律性的事势发展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人们的行为不适合它发展的要求,即使是贤能的公子贵族、英雄豪杰,也是不能成就事业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魏世家》论赞说:"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这是说,信陵君虽贤,但他也阻挡不住秦国要完成统一六国大业的潮流。在这里,除了司马迁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之外,"天",正是他援以表述事势发展的借用语。

总之,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天"要作具体分析,在涉及社会历史的具体问题时,《史记》的"天"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指事势及其发展这样一个人为的主观因素之外的客观存在。对此,刘成炘曾说:

> 至其所谓天人之际者,亦非难解。史公虽承教董子,而所谓天人者实道家之言。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天,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天助,项之兴则疑为舜裔,后妃之事则委之于命,此皆谲词,以明古今大变,有不可全以人力解者,势之成也。天人参焉。故曰际也①。

---

① 《〈太史公书〉知意》、《秦本纪》和《序论三·挈宗旨》。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势成即为天。古今变化的大事,凡不能完全用人的力量来解释说明的,那是因为事势发展的结果所促成的。对司马迁讲的天助、舜裔、天命一类的话,决不可确信而为真正的"天意"。司马迁在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唯心的外壳中,盛装的却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社会历史观的内容,以致往往不容易为人们所鉴识,而遭到认为他过多依赖于人格神的指责。

"通变"与"势"

在"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指导下,司马迁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也是就事势发展的终始、盛衰而立论的。

《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是互相贯通、相辅以成书的。如果说本纪勾画了从黄帝到汉武时代事势发展大纲的话,表则就这个大纲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作了综合性的序列和论述。十表最突出的是展示了各个历史阶段事势发展的规模,而其中的表序则就这个规模中所反映的客观情势进行了切实的理论性剖析,更明显地表现了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从十表看,司马迁将他所写的中国通史是划分为春秋及其以前、战国、秦楚之际及汉代四个阶段的。他明确论述了各个阶段事势的特点,以其深刻的观察力,创制了十幅使人"阅文便睹,举目可详"的表式,纵横交错,经纬分明。顾炎武曾说司马迁"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①,但他用以举例说明的只是《史记》描写战争形势之"曰东、曰西、曰南、曰北"②的表面,殊不知十表的创制更

①② 《日知录》卷二十六。

能表现司马迁胸中的天下大势。宋人吕祖谦说,《三代世表》是"所以观百世之本支",《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是"所以观天下之大势",《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四表,是"所以观一时之得失",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所以观君臣之职分"。[①] 其实"百世之本支"、"一时之得失","君臣之职分"都是一种事势。《三代世表》除了表现"百世所自出"[②]之外,从所表列的夏、商、周三代世系的详略内容中,也可看出标志当时事势的某些发展变化,特别是此表的后半部分所列周代分封,成为十二诸侯的基础,更是关系事势的重要内容。汉初四表所谓"一时之得失",中心是讲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势力的形成、矛盾及其相互斗争,这正是系于当时事势的突出政治问题。斗争的结果,至汉武帝以行推恩令将侯王势力彻底削弱而暂时平息,中央政权是加强了,但司马迁认为其间所"得"之手段是不高明的,故总结说"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③],"一人有庆,天下赖之"[④],实寓批评讥刺之意。《将相年表》中"君臣之职分",就是讲以君驭臣之事势。吕祖谦特别标出《十二诸侯年表》以下四表是讲天下大势的。这说明从事势的发展来看,此四表又是表的核心部分。由此也可以证明司马迁所讲的事势有如前所说:一是讲整个天下历史长时期内起根本作用的事势,一是讲某一历史时期、或在某种范围内起局部作用的时势。据此,近人齐树楷将前者称之为"必至之势"或"根本盘固之定势",将后

---

①② 《大事记解题》卷一。

③④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和《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序》。

者称之为"一时之趋势"或"偶然之势"①。

事势就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的无形力量,即"势自有力存乎其间"②,而这种"客观的力量……是物质的自然和人为的(文化的,历史的)活动所加在一起而构成的"③。《史记》处处是注意到这种力量的表现的。比如称礼、乐之随时代不同而变化为"自然之势也"④;讲经济问题时,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将势表述为"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说明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富欲望的产生,都是事势之必然;其次又将势表述为"物之理",指出在农业社会经营商业要注意观察天象,财货占有的差异对社会等级的形成有决定作用,也都是势之必然。司马迁特别强调"定势"之不可逆转,认为想把流通经济非常繁荣的社会倒退到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时代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司马迁提出"善者因之",或者"承敝通变"⑤"顺流与之更始"⑥等,就是主张人们顺应事势发展的自然来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以求得社会历史的正常发展。

司马迁从历史经验中看到了物盛而衰、物极必反的许多事实,认为如果不能顺应事势的发展就会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平准书》的论赞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的观点,指的就是秦统一天下之后,不注意发展生产,而一味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结果耗尽了民脂民膏,把民众逼向死亡的境地,秦王朝本身也在民众的反抗声中被推翻了。原因就是它违反了事势发展的必

①② 齐树楷:《史记意·读法一》。

③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219页,开明书局1948年9月版。

④⑤⑥ 《史记》之《乐书序》、《平准书》、《太史公自序》和《萧相国世家赞》。

然,以致使事态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在这里,司马迁是对应《平准书》开头叙述汉初繁荣之后而转变为武帝的好大喜功时的"固其变也"的情况而说的,无疑是企图从理论性规律性的高度,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最高统治者敲警钟了。

司马迁还注意到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也有它自己的必然。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合传,历来引起学者争议,为什么将两种表面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学术思想标合在一起呢?其实,司马迁还是在揭示事势之必然。关于这一点,清代学者们有过一些很好的意见,如高嵣说:"老庄之弊必至于申韩,道德之祸必流于刑名,乃时势相激使然。……史公合载一传,卓识千古。"[①]尹继美说老子之术"险",庄子之术"忍","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并说这也是"自然之势","自《史记》合传作,然后知流异而源同"[②]。杨琪光则从政治方面着眼,指出:"夫无为必不务修明其法制,官事寖以耗弛,而民玩盗恣,非严法乌足以已之。汉文景尚黄老,武帝时而酷吏兴于治,虽罔密务诋严,亦势使然哉!"[③]也说是事势发展的必然。刘匹熊同样从汉初现实政治的角度指出"老子之无为,所以流为韩非之刑名也"[④],所谓流,就是自然发展的趋势。高嵣、尹继美是从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说的,杨琪光、刘匹熊则着眼于政治措施的转换。或流或势,旨无二异。

---

① 《史记钞》卷三。

② 《鼎吉堂文钞》卷一。

③ 《读〈史记〉臆说》。

④ 《经心书院续集》卷三。

司马迁作传重在社会政治,叙学术也与政治的变迁相关。老庄申韩合传,实际是告诉人们,汉初政治所谓文景时的黄老之治与汉武帝时的严刑峻法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后者的出现是前者发展的必然。《平准书》讲武帝即位前后的变化,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阐述与发挥。《史记》记文帝时绛侯周勃出狱后说的"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1]以及记景帝时条侯周亚夫之饿死狱中,无疑是对道家政治险与忍的合理揭露。

同样,《孟子荀卿列传》之重在写邹衍,其用意正在于揭露那些政治上的阿顺苟合之徒。此等人物抛弃儒家的学术原则,追求利禄,为乱于世,与真正的孔孟学说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司马迁感叹:"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如果说汉武帝、董仲舒、公孙弘一齐进了司马迁此传隐面的人物谱,大概不为过分吧!其实质,司马迁讲了儒术的古今变化,而且说明这也正是一种事势发展的必然。

"存亡"与"势"

《史记》中多有审度事势以影响天下存亡的记叙与评述,在这个如何对待与处理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的客观力量的关系问题上,司马迁杰出之处是强调了人谋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秦国的历史在《史记》中占有重要地位。商鞅变法是司马迁所充分肯定的,他将商鞅作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载入列传,也是战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第一篇专传,突出了商鞅在当时历

---

①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秦本纪》中司马迁记载秦孝公下的求贤令，显示了当时事势的发展对秦国的利害关系，商鞅入秦后与秦孝公的议帝、王、霸道及强国之术，以及与甘龙、杜挚的争论和后来与赵良的答对，都显示了商鞅的政治识见。秦国在处于或被六国所灭、或将六国统一这样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商鞅审时度势，推动秦孝公下令变法，打下了秦国强大的坚实基础，对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商鞅变法促使秦国强大以形成统一六国之“势”，就是司马迁评述商鞅的主要立足点。

李斯在《史记》中是一个既受高度赞扬又受严厉批评的重要人物。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审察时势，看准了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乃遂西说秦王，主张握“机”、“因瑕衅”、不失“时”而“急就”，建议秦王“乘胜役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加上谏逐客、议焚书，从政治、组织、思想上为秦国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帮助秦始皇实现了天下的统一，有功于世。后因他“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听从赵高篡权，司马迁不能不对他有所贬斥；但对他“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还是充分肯定的。这正是立足于实现了天下统一和促使秦短祚亡国之“势”方面来评论李斯的。

韩信拜将后给刘邦作的对天下形势的分析，是审度事势的一篇精辟议论。他指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其强易弱，而其中心的一点是“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指出人心向背是楚汉成败的关键，建议刘邦反其道而行之，顺应民心、军心和乱世英雄之心以争取胜利。刘邦特别欣赏并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历史的发展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设想实现的，所以司马迁在军事谋略之外更加赞赏韩信的政治识见，并把这篇议论当作他作史时剖析楚汉相争形势的一个总纲。

司马迁称赞刘敬的脱輓辂一说是建万世之安,在这一点上谋多智广的刘邦也比不上刘敬。在选择建都地址的具体问题上,刘敬从历史沿革、政治演变、地形险阻、行为主动等几个方面,论述汉代只能建都关中,而不能建都洛阳。而其论述的意义不只于建都地址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对周的先代以来到汉代立国时整个历史事势发展趋势的恰当分析,指出事势不同,对问题的处理也应各别,说明刘邦的得天下,“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是万万不可能的。刘敬关于选择都址必须注意“德”、“力”转化的总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正是司马迁给予他以充分肯定的重要思想依据。

这都说明,司马迁注意从“势”的角度评论历史人物,并以此衡量他们在关系天下所以存亡中的不同作用。司马迁认为,在象征着“天”的社会历史事势发展所形成的这种客观力量面前,人并不是被动的,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人们通过对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政治现实的比较分析和通观研究,完全可以认识到这种客观力量的实际存在,并根据它的发展状况和自己的需要,提出正确处理当前紧迫问题的对策,以此在历史上建立功勋并推动社会继续前进的。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客观力量,或者可能采取一些错误的政策措施,结果与事势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样,社会历史就会出现另外的局面,人们的努力就会遭到失败。司马迁借用贾谊的《过秦论》作为《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的论赞,正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对秦国来说,其历史之所以出现“攻守之势异也”的不同结局,原因就在于它是顺“势”还是逆“势”。司马迁从关系天下所以存亡的角度,在寻求正确认识“天”人之际这个命题的经验教训中,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思想和长远的有益借鉴。

司马迁认为,虽然人的智谋能认识并服驭事势发展,但历史

并不都为一切具有智谋的人提供合适的条件。相反,有些平庸之辈却可以在事势发展的激流中成为历史的英雄,因此可以说,司马迁亦有所谓“时势造英雄”的思想。在《范睢(雎)蔡泽列传》的论赞中,司马迁说:“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睢(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能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范睢(雎)、蔡泽二人的智慧司马迁还是肯定的,但他无意中揭示了事物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在偶然性中包含了事物的必然性。司马迁指出,由于“强弱之势”的不同,使这两个人功成名遂,虽然在“偶合”中也有他们主观上的原因,更主要还是由于事势发展的推动。类似的看法,司马迁也表现在对其他人物的评论上。如说项羽“无尺寸,乘埶(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魏豹、彭越“喋血乘胜”,韩王信、卢绾“徼一时之权变……遭汉初定”,以及萧何的所谓“依日月之末光”,樊郦滕灌“附骥之尾”,和后来袁盎“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公孙弘“遇时”等,其中有的确系称述,有的微寓讥刺,尽管用辞不同,但总起来说这些人都因乘势而立功的意思却是一样的。这些英雄人物在天下存亡之势中建立了业绩,而天下的存亡之势也使这些人成就了功名,应该说,司马迁对人物评论的一些认识是现实的、辩证的。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是对先秦诸子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比如《易经》、《老子》、《荀子》等的关于世界的事物都在变化,具有发展阶段、都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天”是物质的,“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以及将天道自然无为的自然观与适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相结合等的思想,都对司马迁有过深刻的影

响,重要的是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思想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并根据他对现实社会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历史发展认识的独到见解。司马迁《史记》的撰述,为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经验,因而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接近于形成一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当然这个"规律性",绝不会具有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科学内容,但是他关于在人的主观因素之外存在着社会历史的客观力量、这种客观力量对历史的实际发展具有一定的支配作用、人们只有顺应这个客观力量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和发展,以及人的智谋既可认识又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用于这个客观力量的见解,都是较为深刻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反映了在处理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中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建立稳固统治的愿望,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原载《人文杂志》1983 年第 5 期)

《史记》对历史盛衰认识的哲理性和时代性

吴怀祺

《史记》对历史盛衰的认识,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深刻的见解,同时也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时代责任感。《史记》,不是停留在描述历史盛衰波动的现象上,而是思考历史盛衰变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他不满足于从某些历史事实和现象中总结出盛衰兴亡的具体的经验,而是注重考察影响盛衰变化带有原则性的东西。司马迁用对历史盛衰的认识,去分析汉代社会的现实,这里面又凝含着他对历史趋向的看法。

一　学术的总结和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说:“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这个论点很重要,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概括。我认为一个大史学家对历史的总结的意义是双重性的。一是时代提出总结前代的课题,史家的总结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二是史家在总结前代历史的过程中,特别是批判总结前人的学术遗产中,思想得到升华,使自己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完成总结前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对前代学术的总结,吸收了前辈思想的资料,融合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他能写成“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的条

件,可以说,“一家之言”是“史家之言”,史之成家,应该是始于司马迁。

这种学术总结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完成的。具体来说,是三个方面的总结。一是对前代历史著作和有关历史认识的考察,二是对诸子学术的总结,这中间又有两个方面,即对诸子学术的比较和对儒家“六艺”的分析。另外,司马迁对前代天文学认识的继承,也影响到他对人事历史的看法。

第一,对前代历史著作和有关历史认识的考察中,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宗旨。《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司马谈、司马迁对《春秋》的看法。司马谈的看法是“《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司马谈是不同意把《春秋》当作专门进行道德说教的一种“刺讥”的作品。司马迁在同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中,论说了对《春秋》的看法,其中有一段话说明了《春秋》记载亡国弑君事实的意图,他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司马迁认为《春秋》记录诸侯国衰灭的变动,为的“察其所以”,探究历史兴灭的原因。至于《春秋》道德垂训等功能,不过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有一段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司马迁对先秦的史著和人们探索历史动机的看法。除《春秋》、《左传》外,司马迁还评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他说:

>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

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这一段话说明了先秦史学家的兴趣和思想家的历史眼光。他们关注历史,“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用以“采取成败”“观近势”。这成了当时史学的风气。写史应当继承这种传统。丢掉这种传统,就不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变动的过程。司马迁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他谈到作史表的意义,反映了他对修史的看法,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1]这里说的“盛衰大指著于篇”和司马迁说写史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纪”[2],“著诸所闻兴坏之端”[3],都是一样的意思,修史当观盛衰兴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明《史记》撰修的宗旨,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种认识是在总结前代史学基础上得到的。

第二,对诸子学说的总结、继承,以变通的观点认识历史的盛衰。这里我们不详细分析司马谈、司马迁对诸子学术的评价,只是说明司马迁在诸子学说的比较和对儒家“六艺”的分析中,获取了怎样的思想资料;这些东西对他观察历史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要说明司马谈继承的学术状况对司马迁治史的意义。《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 《报任少卿书》。
③ 《史记·六国年表序》。

于黄子。"他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的事业"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谈学术的特点。其一,《周易》,《老子》是中国古代最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著作。应该说明,把《易》的思想和《老子》的观点结合起来,使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达到新的境界。《老子》谈盈虚变化,主张"不盈",说:"夫唯不盈,故能蔽复成。"[①]认为治与乱是相互联系的,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②]论对立矛盾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③]同时又说:"天乃道,道乃久"。[④] 但《老子》书中辩证的思想的主要缺陷在于讲变化,不强调变化需要一定的条件。《周易》谈消息盈虚变化,注意条件的意义。从六十四卦到每卦的卦爻的解说,都结合条件作说明。同时《周易》含有一定的历史进化观点。所以在儒家六艺中,《易》"长于变"[⑤]。《周易》和《老子》辩证思想的结合,对治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司马迁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对历史盛衰认识的变通思想更有特色。

其二,司马谈要司马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这些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把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社会状况的分析结合起来,把写历史和对历史作哲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三者为一体。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旨意:"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

---

① 《老子》第十五章。
② 《老子》第六十四章。
③ 《老子》第五十八章。
④ 《老子》第十六章。
⑤ 《太史公自序》。

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①]这里说的"弗敢阙",表明了司马迁要全面完成先人的事业。

关于诸子学说的总结、继承对司马迁治史的影响,要作具体的分析。《六家要指》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作比较,是学术上的扬弃吸收。各家学说之长,对现实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成了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一种依据。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主张"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的精要,不在于具体的主张,而在于他的思考、行事的思维方法,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以就治理国家而言,六家学说都有可取之处,他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②]就思考问题的精神、方法而言,司马谈推崇是道家。《史记》评论历史盛衰中的人物、事件,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应当说明,司马迁对道家学说没有全盘接受,他对先秦道家"无为"思想中消极的东西作了扬弃,摒弃"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等主张。如前所述,道家《老子》书和《周易》中的辩证思想,对司马迁把握历史盛衰过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刘咸炘说:"《报任少卿书》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序》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此尤要旨也,而昔人皆不能解。盖史公承其家学,本于道家,道家之术以观变知终始为贵,《七略》所谓'道家者流,

①② 《太史公自序》。

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者也。"①司马迁之家学不仅是道家学术,此其一。其二,司马迁不只是一般"观变",更重要在于以辩证观点看历史盛衰之变,这在下面将作详细分析。

第三,司马迁对天文学知识的总结,也影响到他对人事的历史的看法。中国史官除记时书事外,还担任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任务,这给中国史学带来两重影响:一是史官纪"天"与"人"联系起来解说问题,史官把自然现象变化和人事变动相附会,就成了天人相关的理论依据;二是从四时、天象的往复变动中,得到启迪,悟出社会人事也在变,这与以静止观点看待历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相对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精通天文学知识。司马迁是史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他的思维也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他没有摆脱天人相关理论的束缚,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他强调社会历史在"变"。《天官书》中说"天人之际续备",其内核是"变"。他否定"星气之书"的"机祥"之说。因此其"究天人之际"的命题,第一是说天人感应说没有根据,第二,天象四时都在变,社会人事也在变,"天""人"之际,"变"为共有的特点。第三,天变有"道",社会人事之变也有"道",《货殖列传》说人事社会变化是一个必然,"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司马迁从"天"的运动中得到对人事历史变迁过程的理解。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司马迁是当时懂得自然科学的一位学者,他研究过天文星历,他参加过武帝时代修订历法的科学工作。因此,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他的科学知识相联系在一起

① 《太史公书知意·序论》。

的。"①同样,司马迁对历史盛衰认识的变通观点,也和他的科学知识相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在对前人学术思想的具有批判性的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把司马迁说成是新道家或者别的什么家,都是不妥帖的。另外,从司马谈的学术到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恰是把《老子》、《周易》和"天官"学中的辩证思想集中起来,司马迁的历史观富有辩证法的特点,使他对历史盛衰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对历史变动过程的认识

司马迁把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他强调要从终始的完整的历程去认识历史。《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著史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自己发愤修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惠景间侯者年表》对"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功臣侯者的盛衰荣辱,"咸表其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② 不综终始,就难以找到盛衰的原因。不察终始也不能对历史变动中的人物与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司马迁分析一些学者对秦始皇评价产生错误的原因,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③因此,原始察终是史家认识历史的要求,是分析盛衰

①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34页。

②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序》。

③ 《史记·六国年表序》。

变动原因、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要求,也是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要求。

综其终始、原始察终以达到通古今之变,是《史记》鲜明的特色。《史记》写《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是把秦的兴衰作为一个全过程来看待。后世学者对司马迁写《秦本纪》多有非难,刘知幾说这是体例混乱"疆理不分"的表现,说:"……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①这种批评可曾着到一点边际?他们何尝能体察司马迁修史的用心?《秦本纪》写出秦王朝兴起的历程,《秦始皇本纪》写出秦一统天下,又从盛世走向衰落的过程,写到始皇死,二世自杀,并叙述到项羽"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② 这样就把秦"起于襄公,章于文、缪、献、孝"到"蚕食六国,百有余载"③,始皇一统天下,二世自杀,项羽灭杀子婴的全过程展示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兴衰迭起,风云聚会。汉代思想家纷纷探讨秦亡汉兴的道理,司马迁从前代思想家那里吸收了营养,通过对历史过程完整的思考,总结出认识来。

历史过程由于盛衰的变动显示出阶段、时期的区别。司马迁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④这是把黄老思想、《周易》中物盛必衰的观点运用到对人事历史的研究中去。但是一个王朝,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只有盛、衰两个阶段组成的。盛衰变化是复杂的,也贯彻全过程之中,并且历史因此表现出阶段性的不同 殷本纪》

① 《史通》卷二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④ 《史记·平准书》。

叙述汤以后的历史是这样的:帝雍巳"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帝戊"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河亶甲"殷复衰";祖巳"殷复兴"……帝阳甲"殷衰";帝盘庚"殷道复兴";帝甲"殷复衰",帝乙"殷益衰";帝武乙"殷益衰";纣,殷"亡"。殷代历史是兴、衰、复兴、复衰、复兴、衰、益衰、亡的不断变动的过程。司马迁的历史盛衰观,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阶段的思想。太史公笔下,大到一时代、一个朝代,小至人物遭遇,都是一个盛衰荣辱变动的各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司马迁写史叙事,波峰迭起,文有奇气,就在于他把握住历史盛衰的变动。没有这等通变的观点,文章只能平淡无奇。文风是思想之反映,这当作专篇论述。

司马迁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盛衰。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总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发展的。司马迁观察历史盛衰精彩处,在于他以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变动,从而繁纷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十二诸侯年表》在实际上是把各诸侯国的兴衰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而十二诸侯国与周王朝的兴衰又有关联,所以在诸侯年表中又列周王室的衰微过程的史事。十二诸侯年表除载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十二国大事,又为吴国列表,但此栏纪事是始于寿梦。吴王寿梦以前之事,栏中未列,其原因是"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犇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始通于中国"。[①] 这就是说在春秋后期,吴国的兴起影响到"中国"的诸侯国的盛衰。用盛衰相互联系的观点读《史记》的表,才看出司马迁是何等样的历史眼光。《十二诸侯年表序》写出春秋时期的历史特征,司马迁说:

---

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这段话说明春秋时期的三种盛衰的联结,一是周室衰"微甚"和诸侯国兴,"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二是齐、晋、秦、楚的霸业之争的相互的制约。三是秦兴盛与其他诸侯国的衰落的关联。"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司马迁用简明的语言把这种错落有致的历史变动的特征交代出来。宋代吕祖谦"宗太史公之学",发挥这种盛衰关联的思想,提出"相为盛衰"说。[①] 近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盛衰连环"观点[②],可以说是司马迁观察盛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见盛观衰"的思想说明"盛"与"衰"两个对立面是有联系的,相互依存在一个社会的共同体中。《史记·平准书》考察了汉兴到武帝七十余年的历史。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武帝时的社会是盛世景象,但盛世的局里又潜藏着衰败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露出衰败的征兆。汉武帝时代是如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是如此,项羽西向入关时也是如此。同样,衰中也有可"复兴"的因素。"见盛观衰"的思想把历史发展的逻辑根据揭示出来。

① 参《左氏传续说纲领》。

② 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平准书》说"物盛而衰,固其变",显然和《老子》讲对立面转化、《周易》中的变通观点,有着思想渊源的联系。司马迁讲盛衰转化的趋向,很重视条件的意义。历史由盛转衰,或者由衰而复盛,社稷由存到亡以及个人的荣辱升降,都是一定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史记》叙述每一个大的盛衰转折时,突出交代人事的作用在历史盛衰过程中的意义。这种人事作用,在《史记》里,主要体现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是人谋、政事、征战。《高祖本纪》写出汉兴的过程,述刘邦只是一条线索,而实际是写张良之"谋",萧何之"事"与韩信、曹参之"战"。这是刘邦得天下的缘由。刘邦自己也承认"吾所有天下"的原因,在于能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①] 时人也看得清楚,所谓"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②]

《史记》尤其强调"人谋"的作用。《齐太公世家》写吕尚,突出吕尚之"谋"。《越王勾践世家》说越之灭吴是"谋之二十二年"的过程。战国纵横家、食客发生作用,在于其计谋,这些人是"倾危之士"。《高祖本纪》写张良之谋,绘声绘形。张良一谋,下宛城,解除入关的后顾之忧。二谋袭武关,奠定入关之大势。三谋止军霸上,得关中民心。四谋赴鸿门宴,化险为夷。五谋烧绝栈道,得休息转机。六谋以黥布、彭越、韩信经营河北,定争夺关东大局。七谋止刘邦分封六国之后,削除后日隐患。八谋暂封韩信,稳定军心。九谋汉王于广武强行劳军,以安士卒。十谋追项羽,扩大战果。十一谋集韩信、彭越兵力决战垓下灭项羽。十二谋封雍齿,稳固初建的政权。十三谋,确定娄敬之谋,入都关中。

---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此外,张良以谋,止刘邦废太子等,在《留侯世家》中有记载。可见强调人谋的作用是司马迁重人事观点的一个特色。

人事作用的发挥同样是有条件的,司马迁把人事作用和历史形势联系起来观盛衰。下面引文是贾谊等人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司马迁的看法,贾谊论秦的兴起的原因,说:

>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①

可见,形势是指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包括地理险阻这样的条件,此其一。其二,"安土息民",得民心,民心之向背成了历史形势的趋向,是能"得意于海内"的前提。武帝时徐乐论历史形势,具体地说明支配历史兴衰的有土崩之势和瓦解之势的分别。这种分别在于是否得民众。失去民众,即使像陈涉这样"起于穷巷"的小民也能摧毁强秦。徐乐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如果未失民心,"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矣"[1]。徐乐是把贾谊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司马迁以贾谊的论述为《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的内容。《史记》详细记载主父偃、严安、徐乐关于历史盛衰的见解,足见太史公之旨意。司马迁把贤相良将的人谋、政事、征战的作用和民心所向结合起来论人事作用,又把人事作用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说明人事作用的意义,这样的重人事的历史盛衰观有了新的内容。

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盛衰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盛衰因素对立而又互为联系地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盛衰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消长状况使历史的运动表现出一定的趋向。司马迁展示出历史盛衰的变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三　承敝易变: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变革和现实运动的思考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变,而且是盛衰之变,"物盛而衰,固其变"。社会人事的盛衰变动,司马迁称之为"承敝易变"。《史记·平准书》说:

>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

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写的"太史公曰"说:

>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

①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关于"承敝易变"的思想在这两段话中说得比较明白。第一,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变"是一种必然。"物盛而衰"之"盛","时极而转"之"极",承敝易变之"敝",都是说事物到达这样的阶段,就会产生变动。《周易·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思想是一致的。事物经过一定阶段变化达到"盛"、"穷"的地步,就会发生阶段性的变化。人事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时期,至于"敝"的境地,也就要变。事物变则通,人事社会"承敝"而变,方顺应自然。司马迁用他的宇宙观去分析历史上的变动。司马迁提到的文质之变、三五之变,以及忠、敬、文的终而复始之变,这些说明他的通变观有局限性,有循环论色彩,但他的历史观根本点强调历史之变是一种必然。

第二,"承敝易变"观点实际上说明了社会历史之变和自然之变有不同的地方。一是社会历史变化起作用的是人事,而人们能够顺应历史去行动,可以"承敝易变"。二是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有意志的。人们有选择行动的自由,但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承敝易变,"得天统";已敝而不知变,司马迁说这"岂不谬哉"。

《史记》写了历史上的许多变革,如秦之由余变革、商鞅变法,齐管仲变革,楚国吴起变法,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新政,越国图强措施,乃至汤武革命,汉初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等。这些变革成功处是因敝而变,承敝易变。

根据敝的具体情况进行变,这是承敝易变思想的一个重要方

面。夏、殷、周三代发展,各代之敝不一,变的内容因之不一样。根据前代之敝而变,不可拘一定之成规。承敝易变思想另一个方面,变前代之敝,往往又和"修先王之政"相联系,这是继承前代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秦的兴起,司马迁写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余、商鞅这些变革家的革故鼎新,一方面是修先王之政,接续前王成功的治理和变革取得的成果。如秦孝公时,一面"修缪公之政令",一面用卫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①。这两者又有联系,孝公不"修缪公之政令",没有那种用人的政策和气魄,商鞅也难施展才华。"承敝易变"之变者,是变其敝,变其所当变,不是割断历史联系。司马迁说:"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②"殊礼而异务"是变。变得对,还是不对,"要以成功为统纪"。

"使民不倦",是司马迁的"承敝易变"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可以说"使民不倦"是变革成功的重要体现。《史记》写变革突出这一点。商鞅变法"秦民大悦","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于是法大用,秦人治"。③开初百姓不习惯,但变革结果,是国治民丰。又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④燕昭王行新政"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⑤。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着眼

①③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④ 《史记·商君列传》。
⑤ 《史记·燕召公世家》。

点是“利其民而厚其国”①。此外如齐桓公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溪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②。所以司马迁把“使民不倦”与“承敝易变”联系起来,是对历史上变革的总结。“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国强而民富,开一代之盛世局面。

“攻守之势异也”③,是“承敝易变”思想引出来的一个结论。以征战争天下和得政权治天下、守天下,是两种不同的局面。形势改变了,也就要“承敝易变”。陆贾就说:“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取与守不同。系统阐发这一点,并且为司马迁引为“太史公曰”的,是贾谊的论说。贾谊论秦亡的原因,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与山东诸侯国争天下,和秦灭六国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始皇统一天下后,“士民罢敝”“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这样的形势下,当承敝易变。但秦始皇“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三主不悟的东西就是不知变,就是贾谊说的“攻守之势异”,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汉武帝对严安说:“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变之患也。”④也是说敝有不同,只有承敝易变,才是长久之术。贾谊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系到历史盛衰问题的关节,司马迁体察到贾谊提出问题的重要性,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

① 《史记·赵世家》。
② 《史记·齐太公世家》。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所以,"承敝易变"思想是司马迁对历史上各种变革进行总结得出的认识,是司马迁对历史盛衰经验的总结。他提出了关系历史盛衰的带有原则性的东西,并且又用这样的认识观察现实,讨论现实社会问题。

汉代的人们关注历史盛衰问题的讨论。刘邦置酒雒阳南宫,问臣下"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①]他要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之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②] 文帝时,张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③] 贾谊、晁错等思想家关于历史盛衰的认识,表现了他们的才华。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对历史盛衰问题发表了系统的见解,武帝听到这些言论,受到了震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④]

应当看到,汉初,君臣讨论秦亡汉兴的问题,为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秦亡的教训,恢复生产,开创盛世局面。汉武帝时,人们也在讨论秦亡汉兴问题,为的是解决面临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寻求现实的出路,用司马谈的话来说,是"绍明世"的问题。

《史记·平准书》实际上是一篇汉代前期历史总结性的文字。"汉兴,接秦之敝",君臣无为,与民休息。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武帝即位时,社会是另一番景象。司马迁说:

>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

---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史记〉评议》卷二《平准书》。

③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④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 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武帝即位初年,是升平盛世景象,民则家给人足,国家财政充裕,然而在盛世中已显现出衰败的兆端,豪强兼并之徒,横行乡里,武断于乡曲,统治阶级奢侈无度。“敝”已出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是司马迁对现实运动趋向的看法。此后,武帝一系列的政策和行动,非但没有“承敝易变”而兴利之臣搜括,富商大贾“踣财役贫”,“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严刑酷法,吏治败坏,水旱灾害,边事用兵。情况是严重的。司马迁在篇末“太史公曰”中重提秦亡的教训,说:“……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武帝把汉朝推到怎样的一个境地,司马迁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李景星评《平准书》,说:“赞语从历代说到秦,更不提汉事,正与篇首‘接秦之敝’遥应。其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①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提出“承敝易变”,说:“……故《书》道

①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历史是盛衰不断变化的历史,"一质一文终始之变"和"承敝易变"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历史盛衰变动的特点和内容。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司马迁没有具体的说明,而"承敝易变"反映出他对现实出路作的思考。司马迁对历史盛衰变动的总结,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

瞿林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从汉代社会来看,尤其如此),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从现代的学科分类来看,不论是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还是天文学、地理学等,都可以选择一个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而且也都可以总结出来司马迁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并对我们有所启发。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都具有科学史研究的价值。但是,《史记》毕竟首先是一部史书,是一部通史著作。从史学的本来的意义和主要的目的来看,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本身所意识到的肩负的历史责任来看,我认为《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而且也是生动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是司马迁奉献给当时的特别是后来的人们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和蕴含丰富的历史智慧。

司马迁对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上起秦国的兴起,下迄武帝时的强盛,内容极为丰富。概而言之,我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订了什么样的国策？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有的则是属于他那个时候的当代问题。司马迁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重大问题，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一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作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就是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全文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显然，司

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贾谊《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之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曾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有论述。贾谊是较早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思想家,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就是最先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二是能用人,"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秦国国君善于广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之前,已有人作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

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①]这是讲的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的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横)而斗诸侯。关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李斯已有评论。从秦国的历史来看,商鞅变法是许多重大事变中最重要的一件,所以司马迁说: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②]。把这个评价同上文所引李斯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后来的富强确是起了关键的作用。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时,"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帝国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做"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订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商君列传》。

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王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最后导致秦王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他写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二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的。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依我的浅见,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

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而这种赞赏，在《项羽本纪》中随处可见。如：

(汉四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指挑身独战——引者)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我宁斗智，不能斗力。"

项羽的直率(甚至略带几分天真)跃然纸上，这同刘邦的冷静和老谋深算比起来，相去何止千里！又如：刘邦父母、妻子为项羽所俘，置于军中。后刘邦派人同项羽讲和，"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羽的诚意亦跃然纸上，但他的这种诚意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邦已经部署好了对项羽的袭击。

从垓下之战至项羽乌江自刎的一段记述，是司马迁对项羽深寄同情之心最突出的地方，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大惊曰："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乃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面！后人据此编写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搬上舞台，广为流传，当非

偶然。接着,司马迁写了项羽不愿一人渡江(“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诚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赐马亭长(“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自刎于故人吕马童之前(“吾闻汉军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等。司马迁的史笔可谓写尽了其人的性格与气质,有很大的感人力量。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罗织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等,都是予以否定的。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二十八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我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要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战之”,以“今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

正因为项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后论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得谋略,“放逐义帝而自立”;迷信武力,“自矜功伐,奋

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不知何以失败，至死不悟，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这个悲剧恰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刘邦的喜剧。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失败，以致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司马迁虽然没有如同《项羽本纪》后论那样，集中地、明确地写出自己的看法，但通观《史记》全书，他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如《高祖本纪》后论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说的"承敝易变"，指的是变秦苛法。关于这一点，《高祖本纪》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 (汉元年十月，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诸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这应当就是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的主要内容。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于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

更始”。这里,“顺流”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善于用人,是刘邦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许多论著讲得不少了,这里不再重复。

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际的重大事件,其间得失成败当然不只是项羽、刘邦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性格的较量。唯其如此,我们从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一出历史悲剧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而对于刘邦来说,楚汉战争中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成功;他的更大的成功,是要在完成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之后才能获得。

三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得最丰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总结得最深刻的部分。因此,本文不可能对司马迁所作的这一总结作比较详尽的评论。这里,我想指出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司马迁对汉初统治者所制定的并历经几代连续贯彻的基本国策的记述与评价。

我想先讲一讲陆贾这个人,因为他跟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的关系。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的信任。司马迁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汉初定)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迺

> 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话，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的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陆贾《新语》十二篇，今存。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但也有认为是大致可信的，我倾向后一种说法。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

①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是否可以认为,"无为"、"宽舒"、"中和",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但"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却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以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等,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1] "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2] 司马迁这样

---

① 《史记·孝文本纪》后论。

② 《史记·孝景本纪》后论。

盛赞文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对于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写得平实、感人，使人能于细微处见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风度，兹录于下：

孝文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便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①

从这里所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贫困局面。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四十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定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

① 《史记·文帝本纪》。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国策的延续性在大臣中的反映。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①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从刘邦的“承敝易变”、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到惠帝、吕后的“无为”和曹参的“遵而勿失”,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皇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和稳定的统一。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然而,司马迁的这一总结并不限于此,他还引用当时的民谣来说明上述国策的连续性在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颟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说:“曹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②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思想与做法,是历史经验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的统一。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经验,并在《史记》中一再反映出来,其深意所在,可以想见。这就是他总结历史

①② 《史记·曹相国世家》。

经验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历史，他还以此来观察现实，他对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的认识，正是他上述历史认识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四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①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于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当从《史记》的《今上本纪》、《封禅书》、《平准书》等篇中看得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纪》已佚，今《史记·武帝本纪》为后人以《封禅书》所补，所以我们只能以《封禅书》和《平准书》作为主要根据来考察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八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揭露方士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祠官的虚妄和笃信鬼神的帝王们的荒诞。《封禅书》除记述了历代的封禅活动外，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篇中说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后为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的一再耍弄而执迷不悟，以至于“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亦遣，冀遇之”，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是：“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这无异是说，入海求仙，不过是一出出闹剧而已。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抱着希望，能够见到神仙。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愈来愈多，但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

显而易见，司马迁正是通过《封禅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盛世表现背后的阴暗面，汉武帝的这些愚蠢行径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的历史变化。这种历史变化，已不只是表现为对于神仙的笃信和求访，而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的反映。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描绘了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而达到的繁荣局面，可谓一派盛世景象。但他接着就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这种变化，即他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正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武帝不同于高祖、文、景，因为他处在这个矛盾发展的新的阶段上，从

这个意义上说，最高统治者的变化，不应看作是上述变化的原因，而恰恰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但是，最高统治者的变化因其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他的变化必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司马迁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毕竟是十分敏感地观察到了这两种变化。他在概括地描绘了社会的变化之后，又从一些具体方面揭示了“物盛而衰”的种种表现，如：由于通西南夷道和筑卫朔方，弄得“府库益虚”；由于对匈奴的连年用兵，“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由于置赏官武功爵，“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由于“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由于“有腹诽之法比”，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以及“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等。这些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却没有显露得如此突出。当然，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比惠、高、文、景时代的西汉社会是向前发展了，于是新的社会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来说明他看到的这些变化，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他当然还不能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他毕竟敏感地揭示了社会的变化，于盛世之中看到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因不可完全视为盛衰之变，但也确实包含着盛衰之变。唯其如此，司马迁才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思考的历史课题。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仅能够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历史，也能够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

他的思想上无疑还带着历史循环论的印记,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从不感到惊奇和困惑。——他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要之,司马迁所总结的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陈其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通史著作，尤其是司马迁在把握和叙述历史大势方面的成就，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这些篇的设立，体现出司马迁将上古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之演进阶段的看法，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深入研究这些表的价值，并与相关的本纪、列传联系起来分析，即可以明了：司马迁著史做到对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演进趋势有准确的把握，了然于胸，并且生动翔实地叙述出来。而把各个历史阶段贯通地考察，便是司马迁所出色地做到的“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先生讲过：《史记》写得最详细和最精彩的是汉朝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当代史。[①] 这个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汉朝上溯，中国怎样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秦又如何由强盛到骤亡，这一历史阶段是司马迁的近代史。司马迁不愿做纯客观记载的超然的历史学家，他要“成一家之言”，写出自己对历史变迁和当前社会的看法，主张“法后王”，因此对于撰写这段近代史，同样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从中总

---

① 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第 720 页。

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考察《史记》对战国时期和秦的历史的记载、评论,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历史思想和编撰成就,无疑将有所裨益。

一 《六国年表》所表达的历史大势

"表"是司马迁创立的五种体裁之一,紧依于"本纪"之后,它对于反映历史发展大势有重要的作用。然则,自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始,学者们对《史记》中"表"的价值的认识,却经历了很长过程。刘知幾曾把"表以谱列年爵"列为《史记》长处之一[①],又称"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内雁行有叙"[②]。这些话,肯定表在整理帝王、诸侯世系和谱列各国异世同时的年代,使之眉目清楚上很有作用。但《史通》在另一处又说,将表"载诸史籍,未见其宜",认为既有本纪、世家、列传所载互相考核,史实已经清楚,而再"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③]这种看法失于片面,且与前者相矛盾,后代学者几乎无人赞成。宋以下,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肯定《史记》十表的价值。郑樵称作表是司马迁之功。吕祖谦认为表的形式,可以观天下大势和寓经世之意。顾炎武则认为表中所记人物可补"传中有未悉备者","年经事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④]。这些学者的看法对于后人有所启发,惜其往往仅是点到而已,因而需要作进

① 《史通·二体》。
② 《史通·杂说上》。
③ 《史通·表历》。
④ 《日知录》卷二十六。

一步的研究。

在当代学者中,白寿彝先生对《史记》十表予以充分重视,他在《史学史教本初稿》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 《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其中,如《十二诸侯年表》,是要表达"周室衰微,诸侯专政","王霸更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是表达"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这跟本纪、世家、列传之写汉初的风云人物由布衣而帝王将相,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①]

这段话,精到地论述了《史记》十表表达西周以后长时期中历史发展大势的特殊价值,较前人的见解远为深入。笔者在本节中冀图在以下两点发挥先生的论点:其一,《六国年表·序》的精华在于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其二,由此决定了《六国年表》记载大事明显地以秦为主干。

西汉王朝代秦而立,拨乱反正,逐步达到国家的强盛,就是反复地以秦朝的过失为鉴戒而实现的。汉初人士自陆贾起,此后有贾谊、贾山、张释之、主父偃、徐乐、严安,直至东汉的王充、班固

---

① 第二篇第一章"司马迁"五"'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885~886页。

等,都严厉地谴责秦朝不行仁义、滥施刑罚……的种种罪过,论证汉朝继立的历史必然性。概言之,用秦的暴虐来反衬汉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功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过头的看法,如贾山《至言》中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仁义,故天殃已加矣"①,把用暴力"并吞海内"与"天殃"即灾难报应联系在一起,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统一。《汉书·王莽传·赞》中,班固把短促的秦朝与短命的"新朝"并提,称它们为"紫色蠅声,馀分闰位",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不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王充论历史,直斥为"亡秦"或"秦无道之国",又将它与蚩尤并提:"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②真是"墙倒众人推"。按照这类言论,秦简直成为历史上"恶"的势力的代名词。

司马迁写通史,以总结中国历史客观进程自任,做到"通古今之变",他把秦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考察,既看到秦负面的作用,更看到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作用,提出了迥异别人的卓越看法。

《六国年表·序》提纲挈领,中心是论述秦的历史作用。首先指出,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晋文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后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纷争不已。"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最后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其次,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论衡·寒温篇》。

获得成功的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其中主要价值,显然在于把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这是在前一层评论秦兼并天下"盖若天所助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的历史地位。进而,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不察其终始"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有的论者曾将"盖若天所助"理解为迷信的说法①,其实,这里的"天所助",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司马迁另一处论秦的统一符合客观必然性,见于《魏世家·赞》:"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以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两处讲"天",都是指明秦的统一行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的论断,以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以其对复杂问题作辩证分析的深刻性,以其勇于辟除俗议坚持正确见解的气魄,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卓识!

《六国年表》记载战国时期255年间大事的方法,是以秦为主干。秦在表中的位置,列于六国之上。记载秦国史事独详,如:秦灵公四年,作上下畤。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初租禾。献

---

① 如刘知幾曾谓:"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其理悖矣。"见《史通·杂说》上。

公二年,城栎阳。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凡显示秦逐渐强大的事件均有明白记载。又,战国时期的异常天象,如日蚀、彗星、蝗灾,也一律记在秦国栏目之内。六国亡后,又继续记载秦朝14年间史事,直至子婴降,表示记载自秦国兴起至秦朝结束,首尾完整。

以上所举证据,都足以证明《六国年表》记载史事的确以秦为主干。实际上,前代学者评《史记》,已有人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清人汪越论《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云,前表"以周为主",后表"以秦为主"。又谓,《十二诸侯年表》"断其义不骋其词,非独具年月世谱而已",旨在显示"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势"。[①] 推而言之,则《六国年表》旨在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之势。方苞进而认为:"(《六国年表》)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他强调司马迁议论之精彩,正在于把握到战国之情势已异于古代的特点,秦适应时势变古之制,故不仅能取得统一天下之成功,非侥幸所致,而且秦的政制因其符合近世的特点,故多为汉所沿用。故云"迁之言亦圣人所不易"[②],年表以秦事为经纬更有充分的道理。方氏这段议论,在前代学者中是相当突出的,因它已实在地触及《六国年表》表达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实质性内容。

---

① 汪越:《读史记十表》。

②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书史记六国年表序后》。

二　如何评价秦的历史地位

《六国年表》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内容密切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更有助于认识司马迁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的非凡史识。

《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这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然则前人对《秦本纪》的设立却有不同的看法。刘知幾根据"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的标准，批评《周本纪》记文王以前和《秦本纪》设立不当："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逮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篇，此尤可怪也！"[①]《史记索隐》也有类似的指摘："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②]蒋湘南也批评太史公以秦之先世僻在西戎者，亦称本纪而不称世家为"自乱其例"。[③] 刘知幾、司马贞等拘于"本纪"只能用于天子、表示至尊这一"史例"，要求削足适履，让内容去迁就形式。司马迁创立"本纪"，固然用以代表帝王

① 《史通・本纪》。

② 按，《索隐》此条为中华书局排印本所无。兹据《〈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及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引录。

③ 《七经楼文钞》卷三《读史记六国表书后》。按，蒋湘南《再书〈史记六国表〉后》中又论云，"三代之运已终，一统之局非变，因生始皇，以雄才大略创之。而儒者犹以灭古为始皇罪也。世异变，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也。"此则有见到的地方，不可埋没。

为中心,而更重要的是,本纪在全书中起到史事总纲的作用,故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①]科条者,即整理记载历史事件之大纲目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秦本纪》撰述义旨所言“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已经点明昭襄王时,秦之帝业已成,这是作《秦本纪》的原因所在,他们也未加细察。故牛运震对刘知幾、司马贞的说法予以驳正:“以《史记》之编次条理考之,则有不得不纪秦者。……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政不知从何处托基,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至《史通》以姬嬴并伦,惜徒为局外闲观而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也。”[②]

让史例服从史实,或反过来要求史实适应于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够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较前人有所前进。以下即从三个方面加以申述。

第一,《秦本纪》起到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

秦在战国初期开始强大,在春秋时期,它的国势尚未足与此相比,为何也具有春秋时期史事总纲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春秋、战国具有共同特点,各国纷争,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历史总纲的作用,乃只限于西周时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评注》卷一《秦本纪》。

期。司马迁在《周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之间安排《秦本纪》，作用即在于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试以周惠王元年至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76～前619）间约六十年史事为例证明之。

此六十年间，《周本纪》只记了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与戎狄之乱及晋文公召襄王三件事，大致只限于记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对诸侯各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则除记载秦国大事（秦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秦穆公得贤臣百里奚、蹇叔，穆公运粟救晋饥荒，助重耳归晋，秦军兵败于殽，秦穆公得由余、霸西戎等）以外，还提挈了各国大事，如：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纳子颓而入惠王。成公元年，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穆公四年，齐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晋骊姬作乱，太子出奔。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可见，《秦本纪》不仅突出记载秦国自德公至穆公崛起，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而且兼及此六十年间周王室、晋、齐、郑、楚等国大事，显然起到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总纲的作用。

第二，《秦本纪》又一撰著特点，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

司马迁重笔浓彩记载秦孝公对奠定帝业的重大贡献，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他的出生，司马迁即郑重载入史册："（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六国年表》也破例记载，同是寓含微言大义的史笔）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则表明孝公即位富于春秋，正是大有作为之时。紧接着叙述秦孝公面临的形势："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

诸侯力政,争相併。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七国并立,攻战不已,而秦僻居西隅,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孝公乃励精图治,“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作为建立帝业的重大步骤,孝公招募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予以重赏。于是卫鞅西入秦,助孝公变法。

由于孝公君臣奋发有为,使诸侯各国刮目相待,而变法获得显著的成效,更使秦的国力迅速增强。至孝公十年,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秦徙都咸阳。秦的疆域向东越过洛水。十九年,天子致伯,承认秦有霸主地位。二十年,诸侯毕贺,秦率师在逢泽会诸侯,朝天子。仅二十年间,秦即由“夷狄遇之”的受歧视处境,一变而为合法地取得号令诸侯的地位。此后,孝公二十三年,虏魏公子卬,二十四年,又败晋于雁门,虏其将魏错。故虽然此年商鞅被诛,秦已形成的对诸侯各国支配的地位已不可逆转,惠文君刚即位,“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入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秦本记》所载秦历代国君奠定帝业雄厚基础之奋发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大事情。显然,只有把这一篇设置为记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的本纪之一,编撰体例才能与内容需要相一致。

第三,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结构上的特殊处理,看司马迁对秦之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这两篇本纪在结构上的特点是紧相衔接,联合照应。《秦本纪》的末尾,记载秦攻六国接连取得胜利。昭襄王三十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五十一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国,韩献成皋、巩,秦东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三年,攻赵,取三十七城,

北攻上党,初置太原郡。最后更归结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而《秦始皇本纪》开头,即概述秦始皇登位时秦国已有包举天下之势:“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上下两篇针线缝合,互相紧密呼应。这种结构在《史记》全书中也很特殊。司马迁如此精心安排,是为了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共同主线:历史的趋势,是由各国分立攻战逐步走向统一,而秦历代国君苦心经营,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担负者,最终实现天下一统。这正代表了司马迁对秦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所以《魏世家·赞》中又称“天方命秦平海内”,而《六国年表·序》更将秦与其他四个重要朝代并列。这同汉代人士动辄称“亡秦”,列之为闰位,排斥在“正统”以外的观点相比,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

总结上述三项,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运匠心之安排,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需要而对于手创体例的有意突破,决非“自乱其例”。在十二本纪中,秦占了两篇,唯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对于认识《史记》全书是一个体现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撰体例之辩证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三 记载人物活动以反映历史大势

《史记》把记述秦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作为全书又一重点,读史

者于此切不可轻轻放过。司马迁为众多的有功于秦的帝业和统一的人物立传,有商鞅、张仪、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王翦、范睢(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占有汉以前人物列传很大的分量。这些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的活动,汇集起来,便构成秦由小国崛起到一统天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商鞅佐孝公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张仪富于权智,成功地实施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范睢(雎)劝说秦昭王内废擅权之太后、穰侯,外陈远交近攻之策,蚕食诸侯;白起率大军一举攻取鄢陵,再战南并蜀汉,又接连击败韩、魏、赵之主力,为秦攻取七十余城;王翦以不可阻挡之势,先后破赵、破燕,又率六十五万之师大败楚军,平楚地为郡县:司马迁笔下这些秦国文臣武将的活动,都构成战国时代空前历史变局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司马迁做到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来写,并进而从哲理高度回答"人物活动与历史时势"二者之关系问题。《范睢(雎)蔡泽列传》篇末赞云:"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睢(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总结范、蔡二人入秦前后的经历,指出他们所以获得成功,凭借的主要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秦所具有的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走向统一的"势"和秦能够统一的"力",为二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历史舞台。正因为司马迁深刻地把握到战国分立必将走向统一这一历史动向,他才可能对个人作用与历史时势的关系作出如此发人深思的阐述。此一认识,也应视为对所有有功于秦统一大业的将相人物之总概括。司马迁也讲到"偶合",即历史的机遇:"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

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机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在众多才能之士中,正好范睢(雎)、蔡泽二人先后得秦昭王任用为卿相,这当中自然有偶然性在起作用。然而二人因先遭困厄而发愤,故入秦以求立功成名,这又说明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司马迁对历史趋势的洞察力,还在于清楚地区分秦统一中国之功和实行暴政而致败亡之过。在历史现象极其复杂、功罪集于一体面前,司马迁相当清醒地运用符合于“二分法”的分析方法,不仅体现于记述之中,而且作了理论的阐发,这是很可贵的。《李斯列传》、《蒙恬列传》诸篇,都明确贯串了这一基本观点。

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中,他都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故《李斯列传》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互相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熏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串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头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已为全篇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破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陈述“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众;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道理,警告若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弃黔首而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

侯”,断送统一事业,并使秦处于危险境地。此后二十年间,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王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的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容,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是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此为秦二世二年七月,反秦烈火已经遍地燃烧。《李斯列传》撰述的义旨,是借李斯三十年的政治经历来显示秦政权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传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迫令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子婴自系其颈迎降,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

篇末论赞中肯地评判了李斯的历史功过。认为李斯入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若按其佐秦统一大业成功的功绩而论,几乎可与辅助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相侔列。同时严厉谴责李斯的罪过:背叛所学儒家学说,“不务明政而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又驳斥俗议所谓李斯对秦极忠、被五刑死、死得冤枉之说,指出李斯何尝称得起“忠”,从个人来说是咎由自取,从大局来说则对秦亡负有直接责任。司马迁的卓识,正在于他洞察历史时局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住秦统一之后治

国政策应该转变这一关键,故对于助秦实现帝业的名将王翦、蒙恬的功过,也有切中要害的评价。他论王翦:"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①又论蒙恬:"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②不因秦行暴政导致灭亡而否定秦统一天下之功绩;又不因秦实现"平海内"之历史使命而减轻对其弊政的谴责。忠实于客观史实,正确地评判历史的功过,使他运用辩证法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峰。

综观《六国年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及这些文武大臣的列传,司马迁记载的"近代史"场面广阔,事件演变复杂,人物活动多姿多彩,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又了然显现于读者面前——由分立政权到中央集权,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秦政权则由推动历史前进变成历史发展的严重阻力,新的时代变局已经到来。所有这些都证明: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历史发展的大势,正是《史记》最大成功之处。

四　大一统历史观与"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表达历史大势的卓识,同他的大一统历史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历史很早就出现统一的趋势。这种历史特点,是由于中国大陆广袤,周围有高山、沙漠、大海与外界阻隔,中央有富饶的平原这种地理条件形成的。古代政治结构和古代思想也都突出

---

①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赞。

② 《史记·蒙恬列传》赞。

地反映出这种统一的趋势。西周建国后,以周天子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各诸侯国臣属于周王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而大大推进了中国统一的规模和程度。周代诗人吟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表达的就是歌颂统一的思想。至东周以后,王室衰弱,地方分权的倾向发展,出现春秋十二诸侯和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相互斗争中,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上起主导作用。因为人民大众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造成生产、生活、交通等的困难和痛苦,更反对战争造成的惨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总是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分立,实际上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统一。《周礼》、《禹贡》这些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典籍,都反映出天下共归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孟子主张统一的思想,更直接被司马迁所继承和发扬。

孔子修《春秋》,用褒贬笔法,贯彻正君臣名分的原则,对诸侯国无视周王室的僭越行为严加挞伐。司马迁对此极为尊崇,称:孔子修《春秋》,乃因愤慨于“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故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的“道”,即根本原则或政治理想,就是实现统一的王权,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对此而“惧”的“乱臣贼子”,则是僭乱而破坏统一秩序者。孔子主张“从周”、梦见周公、志在“为东周”,都是愤慨于当时各国互相攻伐的纷乱局面而倡导统一。孔子的主张虽有保守性一面,但其思想内核和在

① 《诗经·小雅·北山》。

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在于呼吁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大一统成为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以后历代王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孔子被尊为"圣人"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联系到统一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意义,我们对此应当得出新的结论。以往有过的将孔子主张"王道"、恢复周礼肆意谩骂的做法,不过出于对历史十足的无知。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征伐,赋敛残酷,民众痛苦不堪。孟子痛感时事之非,要求"解民于倒悬",他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先后游说魏惠王和齐宣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用。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及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①]这两段话,可以视为《孟子》全书的纲领。孟子鼓吹"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仁政,减轻剥削。二是"王天下",反对霸政,反对尚武勇战,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并明确预言:"不嗜杀者定于一。"[②]断言战国纷争局面终将被统一所取代,而且预见最终由"不嗜杀者"来统一。孟子表达的对历史前途的看法,正好被战国至西汉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汉代的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是孔孟大一统主张的继承者。董仲舒(以及公羊学派儒生)主要是进行经义的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

从纵向说,记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断加强的统一趋势,构成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史记》首篇《五帝本纪》

---

① 引文均见《孟子·离娄》上。

② 《孟子·梁惠王》下。

载:轩辕之时,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侵凌诸侯的炎帝,又擒杀"作乱不听帝命"的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称黄帝为"天子",显然是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在传说时代的投影。司马迁又整理出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的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社会史角度看,如此整齐的古帝先王系统无疑是后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①

司马迁之所以具有远远高于俗儒的见识,高度评价秦的历史功绩,撰写出"近代史"的出色篇章,就因为他确实做到"察其终始",把秦实现帝业放在中国统一的历史长过程中来考察,看到由商周王权到秦的中央集权是统一之规模和程度的飞跃,又看到秦的统一为西汉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把《史记》有关汉代的几篇表合起来看,即表达出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越来越发展的趋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认为汉高祖"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实现西汉统一,是建立了"轶于三代"的空前功业。《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概述自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一步步战胜封国势力,强干弱枝之势已成,"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则肯定汉武帝解除边境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威胁,"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

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23页。

篇也对西汉实现经济上、政治上空前统一局面表示由衷赞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从横向说,司马迁为春秋各诸侯国立了“世家”,表明春秋各诸侯国是兄弟或亲戚关系。鲁、晋、蔡、卫、郑各国原来都是周王室成员所传下,燕、陈、杞、楚、越等也都是黄帝之后。古代的荆楚是“蛮”,偏处于东南的吴也被视为落后居民,司马迁却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①]《史记》设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背景极其广阔地描绘出周边民族围绕中原政权整齐有序的图画。司马迁大力肯定周边民族与汉政权关系的加强,《太史公自序》论述上述篇章的撰述义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著史最重要的撰写要求。通过分析《史记》中记述战国、秦、汉的有关篇章,证明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由周初的分封,春秋战国各国分立,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发展大势,确实有深刻的洞察力;因此也推进了我们对

---

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通古今之变”内涵的认识。司马迁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两个层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承敝通变,见盛观衰”,国家政治的成败,民心的向背,是导致朝代更迭、盛衰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层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之“变”。二是中国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秦的统一天下是一大成功,而汉的文治武功又把中华民族的统一推向空前的规模。这一层是总结统一的趋势不断发展的“变”,揭示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久远源泉。

由于《史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因而才成为具有宝贵历史价值和高度思想价值的不朽巨著。白寿彝先生最近一再谈到:中国古代史书体例很多,但主要还是通史。司马迁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为最重要。中国史学,以通史成就为最高,过去对这一点不大清楚。有些形式是断代史,但也是有通史的方法和见识,不做到“通”,怎样看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汉书》的内容,一直写到当代,也是通史。唐初修八史,八史合起来是一部书,故也是通史。中国古代史学中“通古今之变”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讲的道理接近,掌握其精华,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更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要求考察历史的发展运动。我们今天写通史,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是一个考验。不仅是体例问题,而且是如何体现历史发展趋势问题。(大意)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对于改进今天的历史编撰显然是大有启发作用的。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程金造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的《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①。后世学者读《史记》,循守裴氏等三家的观点,就多有看《史记》是纯粹史事的记录。因此遂使太史公绍法《春秋》为"拨乱反正"而著书的目的,湮晦数千年而不彰。

应当指出,后世学者,认为一切史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迹象,是千万人行事活动的记录,而不是某一人的政论记载。这是后世人的看法,而不知在太史公以前,却不如此。在太史公以前,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②,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可是《尚

---

① 见裴骃《〈史记集解〉叙》。

② 《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幹:《中论·虚道篇》亦曰:"先王之礼,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而《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则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与前两书不同。左史记动,自是记事可知。

书》、《春秋》记言记事,虽然有所不同,但它都是古代一君一帝一王统治者的政教设施,两者性质是相通的。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说:

> 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氏认为六经性质一样,《春秋》虽然记事,而事中有理。五经虽然言理说道,而理不空发,道从事见。在章氏之前,明代王守仁也曾有此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有与其弟子徐爱问一段对话。徐爱问说:"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有异。"阳明答说:

>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理)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阳明此言,当是深知群经虽然传自上世,但由于为孔子所承受,且加以删改,六经已成为孔子一己的政治理论。《春秋》与五经,其目的与政理,是一致的。

太史公是深于《春秋》之学的。《史记·太史公自叙》曾借董生之言,说明孔子所以作《春秋》,是"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又借壶遂之言,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这表明孔子不是王、无地位,但有一套"拨乱反正"的政见,就借鲁史《春秋》,加以删改,把《春秋》原文所书之事,是者褒之,非者贬之,以说明孔子自己的主张;所以说"达王

事”,“当一王之法”。也就是当作一君一帝的政典,用以垂教后世。而《太史公自叙》,也曾述其受刑不得用,就网罗数千年的放佚旧闻,撰成《太史公书》——今之所谓《史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不过,《春秋》之明道,是孔子作了一字义法的褒贬而成为“一王之法”的。《太史公书》的“一家之言”,却不拘泥于《春秋》的“义法”方式,多似史事著录,其表明出的褒贬是非方法,与孔子判然有别。大约凡《史记》中所著录的史事,都有太史公的一种看法。《史记》是寓理于事的书。《太史公自叙》曾以鲜明的语言,借孔子言以自喻说: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这就是表明其“一家之言”是太史公一己对事对人的意见,是理不空发,而以事见的。所以我以为《史记》不是纯史事的记录,而是太史公以事见其道的书。然而此道是太史公一家之道,是司马迁一己之意[①]。因此,太史公述其著作之“成一家之言”,如果以孔子作《春秋》来相比,就等于孔子的“当一王之法”。

但是,孔子之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其内容不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而太史公著《史记》,其“一家之言”,内容却恢弘伟大得多。可以说,广之如王政之大本,细之如一人之行己立身,其为善为恶,是正是非,正面反面,太史公都著以具体的事端,表出其义,以明其理,它不同于孔子的一字论断。然而《春秋》的一字论断,其大义微言,有其徒以传于后世。后世解经,述孔子之意,虽有师说家法之不同,但总其大旨不甚相违。至于

① 一家言,言犹意,即扬雄所谓心声也。

太史公著书,虽然在其《自序》中也曾说“传之其人”,而史书所述,只有其外孙杨恽宣布其书,而杨恽后又以事诛死,于是太史公这“一家之言”的具体真义,我们无法得知。我的初步意见如此,希望海内同好者,共同讨论,以明太史公拨乱反正之具体意见。

(原载《人文杂志》1983 年第 4 期)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吴忠匡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杂禨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他对天道人事的规律有自己的解释，认为：“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①很清楚，是就天道（即自然）对于人事（即社会），和人事对于天道这方面的因果关系说的，可说是科学的自然史观，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就是企图通过他掌握的众多的历史事实和“网罗”的“天下放失旧闻”，从事实出发，进行探索和研究，形成观点，作出论断，来阐明“古今成败兴坏之理”即其规律性的。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作史的主要宗旨。“家言”原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民主思想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纲领

① 《伍子胥列传》。

性的提法是有着它的鲜明立场的。《荀子·大略》篇:"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者也。"杨倞注:"家言,谓偏见自成一家之言也。"《史记》全书论载先秦诸子之学特详,孔墨而外,有孟荀三驺,老庄申韩,管晏虞卿,苏张孙武吕不韦之徒,论次其著述,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三致意焉。先秦诸子各派学说的一个共同的时代特征是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状不满,迫切要求改革,从而实现社会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他们蔑视历来的权威,他们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尺度,不仅重新认识和评价人生,而且重新认识和评价古代历史和先王经典。他们不肯安然满足于旧的传统和原始的敬天宗教所灌输给他们的伦理观念,从而各自阐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伦理和宗教的理想。荀子站在自己儒家的立场,指斥他们为"家言"、"邪学",是毫不足怪的。

《太史公自序》记述他父亲司马谈任职太史令时期,就已想望"论载汉兴海内一统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力诵圣德",求"无忝厥职"。看来,司马氏父子从一开始是怀着编修官书这一美好愿望的。所以当司马迁继任父职太史令时,仍然认为"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于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史记》的编撰过程中,也必然和后来班固的编写《汉书》一样,将"所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①,俾朝廷定其去取。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有"臣迁谨记"的题署,这显然是作者初稿时的手笔为后来定稿时所删汰未尽的,完全可以证实在作者未被刑之前想望成为官书的一个见证(曾见清末学者俞樾家藏《史记》本,在此表上有朱笔批识云"此表称'臣迁',盖初稿当未被刑

① 《后汉书·班固传》。

时,欲为官书也"。也许前人已曾指出并论证过)。后来由于在恭呈圣览的《景帝本纪》中秉笔直书,"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①,再加上为李陵的生降辩解,受刑下狱,成了"罪人",他的著述自然已不可能为朝廷收录成为官书了。作者被刑以后,改职中书令,供事内廷,这就完全丧失了继续进行创作的条件来完成他父亲的遗志了。毫无疑义,司马迁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著述要成为官书,已经完全无望,他的以古史家的秉实纪史的原则,也决不可能见容于汉王朝钦定的国教和传统的观念,于是他退而负责地、严正地用"一家之言"这一词义来表明他所持的"颇识去就之分",只"欲以文采表于后世"的创作态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这是一个伟大史家"尽其天而不益以人"②的道德倾向的公开宣言。

司马迁正是从先秦时期百家论争与其著述中继承了他们抒发"家言",不趋附时君之旨的政治学术思想,本着他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对人生的责任感,本着自己对历史的深睿观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即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③,既以古为鉴,而又不拘泥于古,本着这一通古今之变的朴素辩证原则,司马迁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来总结"古今成败兴坏之理",来解释、论证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点。这原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在当时因不见信于人主而不得行其道,为求见信于后世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司马迁在《自序》的最后所宣称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的提法,和先秦诸子著书立说的

① 见卫宏《〈汉书〉旧仪注》。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篇旨。

③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用心是一致的。

司马迁就是这样以刑余之身,"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的心情,从事"天下之史文"的。残酷的刑僇不仅没有改变他继承其"先人所欲论著"的遗训所怀有的神圣感情,相反更加深了他对封建极权主义统治的认识。他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所叙次的自文王、孔子以下到吕不韦、韩非诸人所为发愤著书的故事,正是出于情之所激,喷薄而出,奋笔直书,用来为自己的"亦欲""成一家之言"作比况和写照的。这正是司马迁《史记》一书的创作特色和精神特色。清末梁启超氏曾论述说:

> 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涵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史记·太史公自序》首引董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①

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人们的任何行动、思想和感情,都是和

---

①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社会生活、社会斗争和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二千年前的司马迁未必能自觉地认识到，然而"社会实践的继续"，最终还是能够"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从选材开始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他对现实的态度，以及他想望指明的社会理想。这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的作品都有他们自己的倾向性，是他们的"一家之言"。对于司马迁，却是用流血和屈辱的悲剧性的牺牲换取来的。

司马迁的"一家言"，首先表现在它的体制上，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在后人看来，显然是自乱其"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这一定例的（唐司马贞、刘知幾，宋王安石，金王若虚等对此都有意见），然而就司马迁说，则确然认为其义例理应如此。他认为："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推论孔子有拨乱反正，存亡继绝，创业垂统的巨大功勋。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不能侪之匹夫的行列。对陈涉，他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①]。把陈涉比作汤武，当然也不能侪于匹夫的行列。但陈涉的功勋仅止于"发难"，不如项羽的战胜攻取，"虐戾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之可以列之本纪；不编入世家，又如何处置这位"首发大难"，"至今血食"的英雄人物呢？近人曾星笠先生读《太史公自序》，对此阐述说：

---

① 《太史公自序》。

> 匹夫而操黜陟帝王之权，自孔子始。匹夫而革帝王之命，自陈涉始。故史公比陈涉于《春秋》与汤武也。余谓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百世之下，陈涉创匹夫革命之局于二千年以前，岂独当世其家哉，虽世天下可矣。

极其精辟地揭示了《史记》自“成一家之言”的主体性思想，触及到了司马迁创造制《史记》的政治倾向的要害处，是极宏通的议论。

《史记》著项羽于本纪，于表又著《秦楚之际》，班固讥刺它把大汉王朝的开国大皇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①]，这无疑是抵瑕蹈隙，来为自己创制《汉书》作张本。然而这是通史的体例，是作者“一家”的“微文”，用来表明他的同情是在项氏一边的。《高祖本纪》所罗列的这位大皇帝的事状，完全证实了作者并无推尊本朝的用心。

《高祖本纪》记载了当时官方所编造的大量荒唐离奇的神怪故事：刘邦未出生前，其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未发迹前，则每“醉卧，其上常有龙”，“所居上常有云气”。又记录了“白帝子化为蛇，今为赤帝子斩之”的谶语。还在《项羽本纪》记范增语：“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楚汉争战，楚迫汉军睢水上，“围汉王三匝”，势已成擒矣，“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司马迁写的是历史，有传真写实的职责，但却把这些荒诞的传说与史实融合成一体，大书特书，显然是与他自己在《五帝本纪》所标示的“择其言尤雅者”这一对神话传

① 《汉书·叙传》。

说已抱有的批判态度相抵触，可见，不过是作者所使用的一种夸饰性的文学手法而已。

除此而外，更多地却是使用大量溢美的词语，如《高祖本纪·赞》袭用《尚书大传》"三统三正，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之说，颂扬汉王朝"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秦楚之际月表》"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来颂扬这位亭长的应天承运，天与人归。然而却又极其鲜明地把现实中隐藏着的、人们所直接感受不到的真相，通过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在作品中再现出来，使读者尽可能地从这一连串神怪故事传说和溢誉词语的背后，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所要叙述的事实真相以及伴随而来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嘲。

除《本纪》而外，作者又在《六国》、《秦楚之际》两表中采用对照的手法，进行了曲折的却又是大胆的揭发："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作者用"德义"与"兵"两者的都不如，指出秦之得天下为"天助"；又用"德"与"力"两者的都不如，落实汉之得天下为"天助"。正好对照《高祖本纪》高祖临卒时所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项羽本纪》项王于垓下自刎前所说："吾起兵至今八岁耳，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亡，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两《纪》两《表》互为照映，坐实高皇帝平生既无功德，又不能战胜攻取，他的得天下，不过系于"天助"、"天命"——只是由于上天的盲目安排，这位无赖出身的亭长才一跃而为千百万人命运的主

宰。而这一点,大皇帝本人也是意识到了的。

《史记》之所以是一部不朽之作,就在于把具体的历史事件提到哲学的高度,把历史事件的评价变成哲学的抽象。作者对于本朝篡夺农民起义的果实取得政权之后的因袭秦政,尽管不敢作正面的揭露,但还是变其词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 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当然不是说秦政的可以效法,乃是对汉政的微婉讽嘲。"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何必上古!"意思更其醒豁,点明秦政暴虐,而为本朝所取法,汉之治政,不过继承战国之权变,因袭秦政的暴戾而已。作者又在《礼书》中指明:"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论秦政,明著"虽依古以来",却"不合圣制";论汉政,则"大抵皆袭秦故"。高祖初入关,为表示自己和秦皇帝的不同,曾故作姿态,"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一时"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但当大汉帝国稍一稳定,萧何就"攈摭秦法,作律九章"。至今上汉武帝即位,张汤、赵禹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律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仅大辟罪款就有"四百九条",细目竟至"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①] 以致"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②]。这些律令和刑徒的数字,不正雄辩地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实质吗! 作者在这方面的所有论议,显然是有意识地提供当时的统治者检讨汉兴七十余年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汉书·路温舒传》。

的。这也正是《史记》作者对汉王朝政治意识的批判!

《史记》还用了一定的篇幅记载了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中下层人物,有:刺客、滑稽、日者、龟策、游侠、货殖者、扁鹊仓公等医者,极大限度地、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的风俗、人情、道德等活生生的社会风貌,深刻地反映了先秦以来这个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从而突破了自来史家的只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一狭小的为少数世袭统治阶层人物所盘据、垄断的历史领域,成为一部企图探索历史科学的著作。

试就《货殖列传》说,司马迁和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如晁错、董仲舒都认识到了贫富的两极分化这一社会现实。他在《平准书》中对战国后期社会情况的总结就是:"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并指出汉初"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使"物踊腾粜"。"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财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然而不同的是司马迁并不赞同他们提出的"抑制兼并"、"塞兼并之路"的建策。甚至相反:第一,他对"贸迁有无",由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而积聚财富,是赞赏的,支持的。他历举蜀卓氏、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等富至巨万的先人及其父兄,称许之为"贤人"(按贤字的本义"多财也",见《说文》贝部),给他们立传,总结他们的致富之道,"令后世得以观择"。第二,对占有财货的多寡,贫富的两极分化因而造成的等级差别以至相互斗争(即阶级对抗),他的解释是:"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他提出的求富"必用奇胜",实质上是指商品经济说的。尽管司马迁同情被剥削阶级,甚至歌颂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但是,他并不反对当时人对人的剥削。这一点正是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经济思想的鲜明表现。恩格斯评论黑格尔时曾指出,"黑格

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这是"他的巨大功绩"。对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难道不可以说,在这里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吗!①

不久前,金宝祥先生《马克思主义究竟怎样看待历史科学的任务》一文中评论《货殖列传》说:

> 值得称道的是,司马迁一方面反对私有制的出现,一方面又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反对私有制的出现,所以一开始就引老子的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表示他对那尚无商品关系而有宁静田园风光的井田制的向往,但紧接着就说"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司马迁虽然不知道原始共产主义之所以出现和所以被否定,但能看出公有制被否定的必然性,这就很了不起了。
>
> ……《史记》的可贵,就在于把具体的历史,变成哲学的抽象。但是司马迁毕竟只能直观地看私有制是历史的罪恶,却不能像后来马克思那样能科学地看出私有制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②

班彪、班固父子曾死抱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见解,嘲讽司马迁著《货殖列传》为"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甚至批判《史记》所称述的一些布衣匹夫的从事工商业致富为"越

① 参阅拙著《论司马迁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北方论丛》1981年第3期。

② 《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法",为"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无疑,班氏父子是在竭力维护危及封建专制制度所赖以建立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因而对作者所肯定的社会各阶层的工商业活动对国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完全不予理会。所以章炳麟说:"铺观前世史家,当以子长为上首,而世人忽其微旨,案其深远要眇,通知政俗学术消息之故,发言往往中要害,班孟坚所不与知,它无论矣。"①

仅就以上的事例,就证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史家,高瞻远瞩,有着他自己明确的目的和鲜明的倾向,他决不以维护封建主义至高无上的君权,决不以官书档案所罗列的某种理性原则和逻辑范畴,也决不以任何一家的政治偏见作为他的创作思想。他的"成一家之言"这一宗旨的主要内涵,就是始终尊重历史事实和生活现实,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特征。用今天的话说,是挖掘历史的和现实生活中的本质的典型的东西,作出自己的论断,进行史家的历史批判。他的每一论点,都是依据浩繁的历史政治资料得出的抽象。能在特定的深度、广度与其真实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他身处的时代。而这无疑是唯物主义史学的显著特色。毫无疑义,《史记》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史学史、文学史上,不只是在当时,而且在二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原载《人文杂志》1984 年第 4 期)

---

① 《菿汉微言》。

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两个层次

——《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

(上)

逯耀东

司马迁撰写史记,最终的目的是想“成一家之言”。在他的著作之中,却存在着两个“成一家之言”。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最终所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一是《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的“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因此,司马迁有两个“成一家之言”,虽然追求的目标一致,但表现的意义却不相同,而且进行的程序也有先后的层次。前者经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对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后的学术发展与演变,作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后者则是将经过整理后系统化的资料,纳入时间的框限之中,即所谓“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二者综合起来,就是对先秦学术作一次系统而总结性的整理,然后为中国史学拓创新的境界。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意旨所在,也是司马迁对中国学术与

史学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贡献。

“拾遗补艺”是对图书的校整,这是目录学领域的工作。镜考源流,部次流别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精神。自来讨论中国目录学,都集中赞扬刘向、刘歆父子在这方面的成就,完全忽略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武帝时开始的校整图书工作,规模较成帝时大,前后负责校书秘阁的就是司马氏父子。在校整图书过程中,由于政治与学术的环境不同,司马谈选择了黄老作为主导思想,提出他的“论六家要指”,规划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的轮廓,是中国传统目录学最早的录序。后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司马谈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他“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未竟之志,“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继续图书校正的工作。但为了适应当时转变的学术与政治环境,将孔子所成的六艺,独立于儒家之外,并超越各家之上,成为一个学术的专门领域,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由此而出,同时也铸定以后中国目录学经部的版型。

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这方面的贡献,奠定刘向、刘歆父子校雠的基础。本文分别从: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校书秘阁,二、司马谈的先黄老,三、司马迁叙孔子六艺之成各方面,探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

一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校书秘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屈赋之类下,有“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曰:“武帝也”。也就是这两篇赋的作者是汉武帝。

虽然班固的《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的《别录》与《七略》为蓝本编撰而成,但刘氏父子去武帝时代已远,论理说不应称武帝为“上”的。“上”是臣工对当代君主的称谓。所以,章学诚认为“上所自造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及审定称谓”①。

章学诚的疑惑,引发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刘氏父子校雠秘阁、编撰簿录其来有自,渊源于武帝时所编纂的目录。这部目录很可能是司马迁著书时,原有的辨章学术,镜考源流的簿录工作。但没有成书,而分散于百三十篇之中,但所撰述的底稿,仍有钞本流传或藏于秘阁之中,刘氏父子将这部底稿纳入已书,班固因循未改,也是非常可能的。②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武帝为“上”或“今上”。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今上就是汉武帝,《史记》很多地方这样称呼。案《汉书·刘向传》:“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此处所谓的“上”是成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有《高祖传》十三篇与《文帝传》十一篇,颜师古分别注曰:“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及“文帝所称及诏策”。《汉书·艺文志》对高祖与文帝都不称“上”,唯独对武帝称“上”,的确是非常有趣,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除了“上所自造赋两篇”外,在所著录的书籍作者下,往往出现“有列传”的小注。中国传统目录学体制,综合而言有三:一是考一书源流的篇目,二是考一人源流的叙录,三

①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三《校雠通义》内篇三;《汉书·艺文志》十五之五。

②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第10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是考一家源流的小序。[1] 对于考一人源流的叙录,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编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是以诸子、诗赋、兵书诸略、必注有列传三字于其下,所以使人参互而观也"。[2]

《汉书·艺文志》诸子、诗赋、兵书诸略,于作者名下注"有列传者",计有晏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商君、管子、苏子、张子、屈原赋,吴起,魏公子等十一种。颜师古在《晏子十八篇》下注称:"有列传,谓太史公书。"以上诸书作者,《史记》中不仅有列传,司马迁除论其行事外,并对他们著作的大要归指,皆有所叙论。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这些著作及"上所自造赋两篇"下的小注,很可能出自司马氏父子之手。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有《管子八十六篇》,其下小注曰:"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案《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高山》,《乘马》,《轻重》,《九府》。"正义引《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与《汉志》不同。《四库提要·管子条》下说:"叶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手笔,亦非一人之作,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所以有人认为《管子》一书是一种杂烩,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大约是战国及其后期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物,一部分是汉朝

---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26页,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章学诚:《章氏遗书》,《汉书·艺文志》十三之三。

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国地区献过来的。[1]《管子》中有儒、道、法、兵、农、纵横、阴阳各家的言论,严格说,《管子》一书可入杂家。所以,《管子》在汉代出现时,已经是一部范围包罗甚广,内容非常驳杂的资料汇编。在刘向校书之前,已有几种不同的校本。刘向《晏子书录》云:

>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刘向所校定的《管子》八十六篇,即《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著录的《管子书》。在刘向所校的《管子》校本中,有《太史书》九十六篇,和刘向的《管子》定本最接近,所谓"太史书",可能就是司马氏父子所校的《管子》。

司马氏父子在武帝时校书秘阁,定其归指,案《文选》卷三十六任彦升"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如积如山。"虽然汉初就开始收集秦火剩余的图籍,惠帝更下除挟书之诏,但有计划大规模收集轶书,并建立典藏制度,却在汉武帝时代。《汉书·艺文志序》说:

>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编籍,广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也。"于是建藏

[1] 郭沫若:《宋钘伊人遗书考》,《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青铜时代》,第54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对图书的典藏与整理,“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①]。武帝除了设写史之官外,并置太史令负责实际的图书管理与整理工作。《隋书·经籍志序》就说:

其(战国)后,陵夷衰变,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武帝时,始置太史公,令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

司马谈既为太史,负责石室金匮的图书整理,又保管国家的文献与档案,即所谓“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②]。于是,“百余年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③]。太史既负责图书的典藏,同时就必须对图书进行整理和校雠。因为图书的典藏和整理是一体两面的工作。

掌管与整理图书文献,原本是古代史官的工作范围。《周礼》关于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对图书的掌管和分工,记载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凡史官所主持的吉凶大礼及封赏庆典,所观测的天象、气候,所出纳的王言、章奏的记录,乃至于所占卜的休咎迹兆,都由他们自负登记保管之责。后来更将所有的法规、盟约都交付太史录下副本,妥藏备察。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也一并交由史官收藏。后来掌管的范围扩大,遂将私人的盟约,也由史官登记,三皇五帝图书概由史官蒐藏。所以,楚怀王说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典之书。韩宣子至鲁,观书于太史氏。史

① 《汉书·艺文志》注引刘歆《七略》。

② 《汉书》司马迁注引“汉仪注”。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或"柱下史",都说明图书文献的蒐藏,是古代史官的职掌。[①] 所以,《隋书·经籍志序》说:"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武帝置太史,有古代史官的遗意。司马迁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②]。其职掌的范围,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自嘲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星历卜祝部分,案应劭〈汉官仪〉:"太史公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要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记之。"这是史官的原始职掌部分。至于"文史"则是关于文字工作的处理,及图书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关于文字工作的处理,《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类》条下:"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至于图书档案的保管与整理,则是史官职掌扩大后的工作范围,太史令属官有望郎与掌故各三十人,分别负责"星历"和"文史"的工作。司马迁说司马谈,"于建元元封之间"任太史公。其间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至元封元年"发愤且卒",前后近三十年。司马谈的行事除见于封禅书,和祠官宽舒讨论封禅与设坛外,就是在《太史公自序》中的"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要指"了。这是太史掌管图书工作具体的表现。

所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要指"。悖,正义引颜师古曰:"惑也。各习师说,惑于所见。"所谓"各习师说,惑于所见",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曰:

① 沈刚伯师:《说史》,《沈刚伯先生文集》(上),台北:《中央日报》,民国七十一年。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儒者断其义，驰者骋其辞，不务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其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其诸要难。

学者不务终始，欲一观其诸要难，正是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各显其说的学术发展情况。《庄子·天下篇》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由天下裂。"的确是这个时期学术情况的实际反映。另一方面，先秦的书籍经秦火之后，焚销散乱，《史记·六国年表序》太史公曰：

>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惜哉，惜哉！"不仅是司马氏父子对秦火焚书的感叹，也是他们校书过程中，遭遇的实际困难。所以，司马谈在奉命整理图书之时，似乎就立下心愿，对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来，尤其战国至汉代的学术发展与演变，透过对图书的校定，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只是这个工作一直到他死时没有完成，然后由司马迁继承其遗志继续进行。《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

>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也。

对司马迁的"小子何敢让也"，扬雄、孙盛认为实在自不量力。[①] 但就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兴衰而言，秦焚诗书是一个分水岭。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案。

自秦以前远溯上古的学术发展,经孔子删定后,作了第一次的集结,即所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埋没,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①。自此而后,中国文献始有可征。所以,孔子是保存先秦文献的第一人②。此后五百年,其间经历秦焚《诗》、《书》,载籍涣散,至汉武帝大规模搜集轶书,然后司马氏父子出,校书秘阁,对孔子以来的学术思想演变,作一次系统的整理,这是中国文献的第二次集结。所以,司马氏父子欲以承五百年之运,继孔子之业以自任,这是司马迁说“小子何敢让也”的原因。因此,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

>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钦念哉!钦念哉!”是司马迁自勉之词。以上材料说明汉初至武帝百余年间,萧何、韩信、张苍等,各人因不同的政治需要,曾对不同类别的图籍,作过初步的整理,这些经过整理的图籍,最后都集中在司马氏父子处。他们就利用这个基础,对所有的图籍作一次整体而系统的整理,所以,司马氏父子不仅是刘氏父子的先行者,

① 《隋书·经籍志序》。

②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第1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并且为以后中国目录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不过，自来讨论中国目录学，都推崇刘氏父子的拓创之功。章学诚《校雠通义》就有《宗刘篇》，并且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非深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完全忽略了司马氏父子在这方面的贡献。事实上，武帝时对图籍的搜求，就规模与范围而言，都超过成帝时代。而且参与整理工作的，也不仅限于司马氏父子。《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小序就说：“武帝时，军政杨仆摭拾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杨仆的兵录，就是据张良，韩信序次的军法为基础整理的。司马氏父子则是当时所搜罗的图籍，作了总结性的整理与校定。只惜资料不全无法考证，不过仍有许多线索隐于《史记》中，可供探索的。

关于刘氏父子校书，《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序》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为之部，推其事迹，疑则古之制也。”所谓“古之制也”，是说刘氏父子部次条流有所继承的，关于这个问题章学诚认为“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得自太史公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讨论战国学者的异同，对刘向、刘歆有启导作用，至于“司马迁之载籍也。疏而有理，盖能溯原”。[①] 所以，章学诚也承认在叙述学术源流方面，刘向、刘歆及班固，的确受了司马迁的影响。所以，章学诚说：

> 《艺文》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书诸人之列传，未尝不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

① 章学诚：《章氏遗书·诸子略》三十四。

> 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详略互见之例也。[①]

所谓"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焉",也就是司马迁对战国秦汉间,著书诸人的学术渊源与文词流别,都叙述得非常详细,后来刘向、歆父子校书的叙录即渊源于此。

在《史记》中关于战国秦汉间著书诸人,以及有关学术流变的列传,计有管仲晏婴、老子韩非、司马穰苴、孙子吴起、仲尼弟子、商君、苏秦、张仪、孟子荀卿、吕不韦、鲁仲连邹阳、屈原贾谊、扁鹊仓公、司马相如、儒林、日者、龟册等十七篇,占七十列传四分之一强,如将附各传的著书诸人计入,当不止此数。这也反映司马氏父子对著书诸人,及战国秦汉之间的学术流变是非常重视的。这和整理图书所得到的材料有关。

二　司马谈的先黄老

虽然,司马迁著书,有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的体例。这种以人系事的写作方法,突出《史记》列传论其行事的性格。但对于重要的学术思想的流变与承传,则反复叙论。所以,对于老子的学术思想。《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说:

>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不知所终。

---

① 章学成:《章氏遗书·诸子略》三十四。

叙述老子著书的经过，然后又说：

> 世之学老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是之谓也。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正义曰："此结老子也。"最后于篇末的"太史公"曰，则对老子学说的承传与对各家的影响，作了扼要的说明：

>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老子与韩非合传，后世学者多有微词。而且对关于老子的传说，自战国以来就众说纷纭。司马迁归纳这些传说，以盖与或曰的形式，来叙述这位"隐君子"①。其目的不在"论其行事"，不过藉此镜考自战国以来就流行、对汉初政治与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学说其源流所自以及流派的演变。司马迁在他的自序中就说"李耳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执理、作《老子韩非列传》"。所以，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完全以镜考学术源流为着眼点。

至于老子思想的承传，司马迁说庄子、韩非、申子之学皆本于道德意。庄子"其学无所不阅、然其本归于老子之言"。而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至于申子之学也是"本于黄

---

① 拙作《汉武帝封禅与〈史记·封禅书〉》，《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民国八十二年二月。

老而主刑名”。

所谓“黄老”,刘向说:“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这种黄帝老子并称的“黄老”思想,在战国后期形成,对汉初的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是当时学术的主流。但黄老并称,不见于他书,由司马氏父子首先提出。因此,《史记》对这种学术思想的形成、流变与传承作了详细的探讨。

刘向所谓“清简无为、君臣自正”,正是黄老之学表现于政治的意旨所在。在汉初援黄老入政的是曹参。即《自序》所谓“曹参荐盖公,言黄老”。《史记·曹相国世家》说:

>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后来曹参继萧何为丞相,由地方到了中央、其治国仍用“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术。曹参为汉相国三年卒。百姓歌之:“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司马迁对曹参以黄老术治国,予以很高的评价。《曹相国世家》的“太史公曰”:“参为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贤。”

曹参的黄老术得自盖公。胶西盖公则受教于乐臣公。《史记·乐毅传》云:“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司马迁于《乐毅传》的“太史公曰”,对秦楚之际黄老之学的

承传,作了详细的叙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河上丈人,不知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

乐臣公除教盖公外,田叔也从乐臣公习黄帝老子,后仕于赵王张敖。《史记·田叔列传》称其“学黄老之术于乐臣公所”。案《索隐》曰:“臣公本燕人,乐毅后。”《史记·乐毅传》称:“乐氏族,有乐瑕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秦高密,乐臣公善修黄老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在秦灭赵之后,流亡到齐国,设帐授徒传黄老之言。司马迁叙秦楚之际黄老之术的承传情形,大致是可以相信的。①

至于司马氏父子镜考黄老之言的渊源,则认为出自于齐之稷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其议论立说成书,所著书“言治乱之事”。而其所著书,“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书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有《慎子》四十二篇。注称:“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道家类有《田子》三十五篇。注称:“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道家类又有《捷子》二篇。案

---

① 钱穆师:《先秦诸子系年》卷三“稷下通考”条下,中华书局重印本,1985年10月。

钱大昭《〈汉书〉辨疑》称:接、捷、古字通,则捷子即接子。道家类又有《娟子》十三篇。注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师古注曰:“娟,姓也。”娟为环之借字。案:应劭《风俗通·姓氏篇》:“环氏出楚环列之尹,复以为氏。”张澍:《风俗通辑注》称“环渊即娟渊”。又名家类有《尹文子》一篇。注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子。”师古注引刘向曰:“关尹子与宋骈俱稷下。”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宋子》十八篇、注称“荀子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慎到、接子、田骈、环渊、尹文、宋骈,同为司马迁所谓的稷下之士,《汉书·艺文志》分别将他们的著作置于诸子略的道家、法家、名家、小说家各类中。虽然类别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其言黄老意”。《庄子·天下篇》首先讨论《诗》、《书》、《礼》、《乐》与《易》的古道术之源。认为最先得之者是孔子。然后传授于邹鲁之士的缙绅先生。最后才是百家之学。百家依次将墨翟、禽滑厘归为一类;宋骈、尹文为一类;彭蒙、田骈、慎到为一类;关尹、老聃为一类;庄周自为一类;最后是施惠、公孙龙为一类。

如果《庄子·天下篇》,讨论百家之学的形成与发展,依时间的先后为序。则稷下学士宋骈、尹子、慎到、田骈之学,或当在老聃之前。老子在汉代已“世莫能知其所以然否”,老子之学至“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庄子才显于世。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合传、并附申子,并且说韩非、申不亥之学,皆源道德之意。所谓道德之意即黄老之学。《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黄老”。而申子之学“本黄老而主刑名”。他们二人的“刑名”之学,都渊源于黄老。案如上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有《申子》四十二篇。注称:“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四库全书》有《慎子》一卷,入子部杂家类。提要曰:“周慎

到撰。《汉书·艺文志》列于法家。今考其书,大旨欲同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于法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有不行,势不能不以刑齐之,黄老之为申韩,此其转关矣。"

《四库总目提要》认为《慎子》一书,是黄老转变为名法的关键。也就是申韩的名法之学,渊源于稷下的慎到而非李耳。《庄子·天下篇》慎到、田骈与彭蒙并论,并说:"慎到弃知去己,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荀子·非十二子》说"其言之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并且批评他们:"尚法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荀子·解数篇》又说:"慎子蔽于法不知贤。"《天论篇》则说"慎子见于先,无见于后"。荀子对慎子的批评"蔽于法而不知贤"。是申韩刑名之学的所自。至于"有见于先无见于后",则与老子道学的旨意相合。[①]

与慎子同在稷下,"立说在黄老申韩之间"的,还有尹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有《尹文子》一篇。注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子。"师古注引刘向云:"与宋骈俱游稷下。"《四库全书》录著《尹文子》二卷,入杂家。《四库提要》云:"大旨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则一一核其实,故立说放在黄老、申韩之间。"与尹文同游稷下的田骈,《庄子·天下篇》与慎到并论。前述《汉书·艺文志·道家》有《田子》二十五篇。班固说田骈曾游

---

①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两个帛书的字本。在《老子》乙本卷前,有《法经》、《十六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唐兰认为这四种古佚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稷下,号天口骈。《吕氏春秋·不二篇》:“陈骈贵齐。”钱大昭《〈汉书〉辨疑》称:“陈、田古今通用,则陈骈为田骈。”所谓“陈骈贵齐”,高诱注称:“陈骈,齐人也,作道书二十五篇。贵齐,齐生死,等古今。”《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学,“齐万物为首”。也就是“万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所以,慎到、田骈的“齐生死、等古今”,与庄子之学略似,或者是承杨朱的重生贵己而来。[①]

因此,司马氏父子所谓“皆学黄老意”的稷下学士,是战国时期诸子学说没成形前,流行的学术思想流派。这种学术思想对后来包括道法、名、阴阳等家思想都发生影响。至于稷下学士的思想流派,如何依托黄帝,后来又与老子思想结合,最后形成司马氏父子所谓的黄老,似仍有迹可寻的。

《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这种情形是先秦诸子思想形成时,常见的一种情况。刘勰就认为《诸子》是人道之书,但“君子处世,疾德名之不彰,而依托古人而自显”[②]。所以,他认为《诸子》是“上古遗语、战代记者”。战代即战国。也就是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是将当时社会流行的殊俗新知相互杂糅,然后援用古往今来已存的理论,加以系统化的整理、成为一家之言。因为这种援古论今的表现形式,易于为朝野上下所接受与奉行。所以,儒家言必称尧舜,墨家托于禹,农家上继于神农。然稷下学士却无所依。于是由邹衍将黄帝纳入其思想体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类》,有《邹子》四十九篇。

---

① 钱穆师:《先秦诸子系年》卷四“慎到考”条下。

② 刘勰:《文心雕龙》卷五诸子第十七。

注称:“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注曰:“亦邹衍所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又说:

> 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邹衍的学说是后来阴阳家的章本,其学说以先验小物,然后以推至无垠的推理方法,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形成他的理论体系。所谓时间方面,也就是历史的,由已知的现在推向未知远古,将黄帝固定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线上,即所谓的“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将黄帝以来的典章制度兴废,与古今的禨祥治乱结合,探索人间的盈虚消息,这就是邹衍“五德转移”的理论。邹衍将黄帝固定在已知和未知的分界上,于是,战国兴起的传说的黄帝,经邹衍将其纳入历史系统之役,成为人世真实的黄帝,然后进一步成为华夏民族的共祖。司马迁写《史记》始于《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又始于黄帝,多少受了这种影响。① 不过,这个华夏民族共祖的黄帝,在司马迁的汉武帝时代,又腾升为神仙的黄帝。其腾升的过程,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封禅书》的原因。②

所以,《史记》中有两个黄帝,一是《五帝本纪》中历史的黄帝,一是《封禅书》中神仙的黄帝。③所以,在汉代关于黄帝的材料

---

① 拙作《史传论赞与史记“太史公曰”》,《新史学》第3卷第2期,台北1992年6月。

②③ 拙作《汉武帝封禅与〈史记·封禅书〉》。

虽然丰富,但却是非常驳杂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托名于黄帝,或与黄帝有关的著作,计二十一种四百四十九篇,此外还有黄帝诸臣的著作七种一百零四篇。这些著作分别著录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书略》的阴阳,《术数略》的天文、历谱、杂占,以及《方技略》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类中。由此可以了解,由战国时期的传说,凝聚成黄帝,流传到汉代,尤其汉武时代,已有许多不同的面貌。对于这些分散在《汉书·艺文志》不同形式的著作,班固将其归纳成两类:一是起于"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一是"于诞依托"。

关于"于诞依托"的一类,多出汉武帝时代的方士之手,由汉武帝封禅求仙的需要应运而生的。[1] 至于"起于战国,与老子相似"的黄帝著作。《隋书·经籍·道经部》小序说:"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玄谈,处冲虚而已。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黄帝四篇即黄帝四经,四种古佚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注称:"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道家类有关黄帝的著作,还有《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对于这些著作班固皆注以"六国时所作",或"六国时贤者所作"。

所以,在黄老没有合流之前,黄帝、老子的著作各行其是。不过其意旨却有相似之处,于是,庄子出,在发扬老子思想的同时,就将稷下学士依托黄帝的学术体系,纳入老子思想体系以自重。[2] 讨论天下治道方面,黄、老有内圣外王之别,所以,《庄子·盗跖

① 拙作:《魏晋志怪小说与史学的关系》,《食货》复刊第12卷4、5期,台北1982年8月。

②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6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篇》就批评"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牺牲篇》又说:"黄帝致天下,是故安而不顺。"不过,在讨论道的时候,庄子对黄帝却有很高的评价。《庄子·知北遊》黄帝回答知所问到的问题。黄帝曰:

>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

黄帝论道,礼是道之华,但却是乱之首。并且认为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最后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黄帝又认为天下万物皆美者为神奇,恶者为臭腐。但臭腐可为神奇,神奇也可化为臭腐。所以,天道相通为一气。因此,圣人贵一。黄帝论道,与老子一般无二。至此,黄帝经庄子援引,与老子思想合一。

虽然,庄子将黄帝与老子结合起来,但并没有出现黄老之名。将黄老并称,作为战国以来的显学儒、墨之外,另一个新兴重要的学术思想,迟至司马谈奉命校整图书之时,才由他首先提出来。就目录学的发展而论,《庄子·天下》与《荀子·非十二子》,对战国时期的学术代表性人物,作了初步概略的归纳。他们所作的归纳,并非是为了镜考源流与辨其流别,只方便对所提出的学术代表性人物,进行讨论与批判。严格说,并不具有目录学的意义。后来《吕氏春秋》的《不二篇》,对战国以来包括老子、孔子在内的十位"天下之豪士"的学术性质,作了如"老聃贵柔"、"孔子贵仁"等扼要的定性,目录学始见端倪。但并没有对其学术流派作具体

的划分。至韩非的《显学篇》,因对代表当时显学的孔子、墨子身后的,儒、墨两派弟子“取舍相反不同”,形成儒、墨不同的流派,目录才初见学术流派的承传。到了汉朝,《淮南子》的《要略篇》提出了纵横、刑名、法等学术流派的名目及其所自。但仍无法对战国时期学术流派的发展与流变,作整体的分析与讨论。

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谈同时,目录学发展至此,已超越最初对个人的学术思想批判,辨章别流的学术流派的雏形已经出现。中国学术思想经孔子第一次清理之后,演变到这时已历五百年,迫切地需要再一次的清理。于是,司马谈利用校整图书的机会,对战国以来驳杂的学术发展与流变,作一次彻底而系统化的整理。首先在战国显学儒、墨之外,更提出黄老之学。不仅将黄老作为战国以来,新兴而重要的流派。并以黄老概括与统率阴阳、名、法、道德诸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且选择老子作为这个新兴学派的定点。以这个定点为关键,镜考其源流与讨论彼此相互的关系,至于老子是否存在是另一个问题,只不过借此探索一个学术流派的由来。然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他的“《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塗、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的“论六家要指”。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不仅对战国以来目录学的发展有新的拓创,更重要的是对这个时期的学术发展与流变,作了一次系统化的整理与总结。并且对经过系统化整理的学术流派,予以一个固定的分类的名称,清晰地划清不同学术流派间的范围。这种分类方法后来为刘向、刘歆父子继承,《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即以此为蓝本形成。只是自来讨论目录学与中国学术流变的,忽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这方面的拓创与贡献。

三 司马迁叙孔子六艺之成

不幸的是，司马谈壮志未酬身先死，案《太史公自序》，元封元年（前110）"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从事。故发愤，且卒"。司马谈自元始年间任太史公，到这时将近三十年了。这段期间司马谈除校整图书外，当然还负责天官的业务，而且由于武帝封禅与求神仙，这方面的业务更繁重了。但司马谈始终恭谨从事。但临近"天子接千岁之统"的封禅泰山，竟被摒除留滞周南，因而发愤且卒。[①] 临终前，司马迁适西使归来，见父于河洛间。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

>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所谓的"所欲论著"，包括他正在进行的校整图书，以及在校整图书过程中搜集材料，并准备撰写的太史公书，事实上这个工作已经开始。[②] 所以，司马谈卒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续为太史令，立即"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继续进行司马谈校整图书的未竟之业。太初三年（前104），司马迁与上大夫遂壶等所订定律历已经完成，图书校整工作似也告一段落。于是，司马迁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司马氏父子校整图书，并没单独成书。但司马迁都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分散在《史记》有关

① 拙作《汉武帝封禅与〈史记·封禅书〉》。

② 《史记》撰作，司马谈在世时已具规模，本纪、世家、书、列传四体已备，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赵群生《司马谈作史考》。

的篇节之中。所以,章学诚说:

> 读六艺者,必参观《儒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于《孟荀》、《管晏》、《老韩》等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兵书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术数略》之《龟策》、《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鹊》《仓公》等传,无不皆然。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文志始于班固,而司马迁列传,实讨论之。[①]

章学诚认为读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诸子、诗赋诸略,必须与《史记》若干著书诸人列传相互参读。因为《史记》在这些著书诸人的列传中,对生平、著书过程,著作性质,著者学术的由来,与其后的学术的承传,都各作叙述。其形式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所著的叙录相似。所谓叙录,"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虽然刘氏父子对《七略》分家未叙其由来,但以前必有传授,若溯其来由,则诸子十家,可观者九流,渊源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诸著书叙录,则承司马迁著书诸人的列传而来。这也是章学诚说"艺文始于班固,司马迁列传实讨论之"[②]的原因。

司马迁对著书诸人,在《史记》中有个人单独的列传,二人的合传及若干人合而为一的类传,叙述其著述之由来,承传之所自,著述之要旨,与彼此间的学术关系。如《史记》自序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纪统,绝惠王之利端,列往世之兴废,作《孟子荀卿列传》。又"孔子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传,崇仁厉义,作《仲尼弟

---

①②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三《校雠通义》

子列传》。至于作《老子韩非列传》,则是"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执理"。二者合传,由于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黄老"。至于韩非著书,传称:

> 非为人口吃,与李斯俱事荀卿。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实功能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以武干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司马迁对韩非的师承、著书由来,及要旨、篇目皆有叙述,是一篇典型的叙录写作形式。后来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叙录,一准于此。

韩非之师为荀卿。荀卿则因"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之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①。至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因"是时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宾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韩非、荀卿、吕不韦所著书,分别著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司马迁对著书诸人,多以合传的形式叙述,如管晏、老子韩非、孙子吴起、孟子荀卿等。不过,在这些著书诸人的合传中,受到议论最多的,则是《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

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贾生列传》。因为行事既不相类,时又相距百载,二人合传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鲁仲连子》十四篇。《隋志》作五卷录一卷。宋以后不再见于著录。清马国翰采《太平御览》、《意林》等书,辑得一卷,并以《史记》所载《郤秦兵》、《说燕将》等篇,与《国策》相校,文字不同,则知司马迁直接取鲁连原书,而非转采自《国策》。辑本序说《鲁仲连子》“意旨在于势数,未能纯粹合圣贤之意。然高才远致,读其书想见其人”。司马迁也说鲁仲连书“能设诡说”。所以本传太史公曰:“鲁仲连其意旨虽不合义,然以其多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折卿相之权。”所以,《鲁仲连子》一书不应在儒家,似应著录于纵横家。[①]

案《汉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司马迁以邹阳“虽然不逊,然抗直不挠,而以附于《鲁仲连列传》,班固也说邹阳“游于危国,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②]《汉书·邹阳传》说:“邹阳齐人。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邹阳因上书谏吴王,不能用。去吴归梁孝王。《史记·梁孝王世家》说:“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计。”则邹阳是文景间著名的游士,行走于诸王廷之间。其著书《邹阳》七篇,虽不知其意指如何?但应与汉初另一著名游士蒯通所著书相近。蒯通说韩信叛汉不果,佯狂而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蒯子》五篇。《史记·田儋列传》太史公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索隐曰:“长短说者,欲令此事

---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 《汉书·邹阳传》。

长,则长说之,短则短说之。故《战国策》亦名长短书。"鲁仲连,邹阳虽同为齐人,并无承传关系,而二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也不同。一在战国纷争之际,一在汉政权统一之时。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游说之士蜂起,行走于诸侯之间,鲁仲连以一介布衣,说义不帝秦,致书燕将解聊城之危,而坚持"所贵天下士者,为人排患解纷乱无所取也"。[①] 最后功成飘然而去,隐于海上,游说之士发展至此,可说已达颠峰。至于邹阳在汉帝国统一之后,虽最初诸王国招士,但说长道短的空间已经不大,吴楚七国乱后,地方分权向中央集中,游说之士更无活动的余地。邹阳则象征战国形成的游士没落一代,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透过他们的著作,叙说游士之兴废,也许是他写《鲁仲连邹阳列传》的微意所在。

至于《屈原贾生列传》,本傅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对屈原的际遇非常同情,他读古人书及探考遗迹,很少"垂涕"的。后来学者讨论《屈原贾生列传》,多从屈原贾谊的际遇方面考量。很少说到"贾谊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乃悉草具其事仪法、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法"。

虽然文帝不能用贾谊之策,但对后来汉武帝却发生了影响。班固注意到贾谊这方面的贡献,案《汉书·贾谊传》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不能远也。"所谓贾谊"言三代治乱之美",即《汉书》本传所载

---

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凡所述五十八篇”,《汉书·艺文志·诸子·儒家类》有《贾谊》五十八篇,与本传同。《隋书·经籍志》称“贾子”、《新唐书·艺文志》则称“贾谊新书”其重要政论《过秦论》《治安策》皆在其中。贾谊《过秦论》,司马迁录其部分为《秦始皇本纪》的论赞,另一部分则由褚少孙载入《陈涉世家》。至于对汉武帝影响至钜的《治安策》则不见载于《贾谊列传》,反而全篇录载贾谊的《鹏鸟赋》,的确值得玩味的。

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不敢直谏……自屈原沈汨罗后百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生者……。”以此衔接屈原与贾谊列传。自楚屈原死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百余年后贾谊出,似在说明楚辞汉赋的承传关系。《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关于赋的部分,有屈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及杂赋等四类。其中屈赋又是赋的主流、有屈原、唐勒、宋玉等外,汉代则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淮南、兒宽、刘向都属屈赋流派,“今上所自造赋”两篇也在其中。屈赋之属共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艺文志·诗赋略》小序云:

>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骚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扬雄之论见《法言》。虽云贾谊之赋可登堂,相如可以入室,但终

无所施用。却不能否认他们的作品是汉赋的代表。《隋书·经籍志》集部首列楚辞一类,其小序说屈原死后,"弟子宋玉,痛惜其诗,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而作之"。楚辞渊源于屈原,发展至汉代则为汉赋。汉赋之作,首推贾谊。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则有镜考源流,部次流别的征意在,叙述汉赋的渊源与流别。所以,读《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贾生列传是必须参观的。

司马迁所谓"悉论次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已将司马谈校整图书过程中,镜考源流的资料,完全分散在《史记》的著书诸人,及其他有关的各篇中。这些资料汇集起来,就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诗赋略》、《术数略》的资料来源与渊源所自。不过,司马谈和司马迁所生存的时代环境不同。由于司马谈生存的时代,是黄老之学自汉初以来,不论在政治和学术思想双方面,都是主流思想的时代,而且他本人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①,因此,司马谈的思想表现,的确已有"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倾向。至于司马迁除了继承其家学外,曾问故于孔安国,又从董仲舒习《春秋》,更重要的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政治与学术发生空前的转变,司马迁为了迁就转变的现实政治环境,其学术思想不得不作某种程度的调整。王鸣盛论"司马氏父子异尚"就说:

>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谓阴阳、名、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并致不满之意,而独推崇老子道德,谓其能兼五家之长,去其所短。又特举道家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与儒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交,以明孔之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则尊儒,父子异尚。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生、黄子、杨王孙等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首阳为拙、柱下为工、亦是尊黄老者,而迁独不然。《汉书》本传赞论谓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此本班彪之言,固因而述之。桓谭谓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曰:老聃著虚无两篇、薄仁义、非礼乐,然好之者以为莫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班彪、桓谭以谈之言即迁之意。①

王鸣盛对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司马谈崇黄老,司马迁尊儒,班彪、桓谭误以司马谈之言为司马迁之意,作了精辟的析论。不过,虽然司马迁受董仲舒,孔安国之教,是否真正尊儒是另外的问题。但,司马迁将孔子从儒家中分划出来,并超越诸家,提升到"至圣"的地位,却是事实。所以,司马迁尊孔崇圣是没有问题的。但崇圣和尊儒却不能等同视之。司马迁对孔子尊崇的心情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所以他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祗迴留之不能去"。这是《史记》各篇中,司马迁发思古幽情最深刻叙述。已超越史学与文学达到诗意的境界。司马迁对孔子所以如此,《孔子世家》太史公曰:

天下君王至于圣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天下言六艺者折衷夫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

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在其自序说他写《孔子世家》，因为“周世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道术，以道达王道，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文之统于后世”。后世对司马迁将孔子入世家，是一致赞扬的，认为这是他崇尊孔子最具体的表现。当然司马迁将孔子入世家，与陈涉入世家“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的。那就是孔子入世家“特以其立六经大法为汉作制，虽系周之岁时，而功在汉家社稷”。①

所谓“立大经大法”，也就是孔子“备王道，成六艺”，因此“天下言六艺者折衷夫子”，与“垂六艺之统于后世”，正是司马迁写《孔子世家》的意旨所在。关于“成六艺”方面，《孔子世家》说：

>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自卫反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是孔子删《诗》、《书》正《礼》、《乐》的过程，然后又序《易》。《史记·孔子世家》说：

---

① 朱东润：《史记考索》，香港：太平书店，1974年重印，页9。

>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将散漫的文献资料,作系统化的整理,并付予其所具有的文化的意义。然后以此教授弟子。最后,因见道之不行,恐无以见于后世,于是因鲁史而著《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说:

>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鲁史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至此,《易》、《诗》、《书》、《礼》、《乐》、《春秋》的六艺系统完成。至于六艺的性质与作用,《史记·滑稽列传》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司马迁在《自序》中对六艺的性质与作用有进一步的解释:

>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故长于度;《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纪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事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和发,《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春秋》以道义。

孔子将六艺系统化整理,然后以教弟子,即《孔子世家》所谓"孔子

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人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六艺之由孔门弟子承传播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叙述《春秋》的承传：

>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以上所叙关于《春秋》的流传及演变。孔门六艺之传，后来汉儒称之为传经。但孔子以前并无所谓的六经。孔子之门既然没有六经之学，诸弟子也没有分经相传的事实。[①] 自从汉设博士专以一经传授，推而言先秦孔门传经系统。于是子思、孟子、荀卿退处百家，而孔子之学集中六艺，另有承传的系统。因此，孔子的六艺与儒家分划成两个不同的学术承传系统。将孔子的六艺独立于儒家之外，并超越各家之上，则始于司马迁。司马迁《史记》中对孔

①② 钱穆师：《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门传经辨"条下。

子成六艺,六艺的性质与功能,以及六艺的承传,都作了分别的叙述。虽然关于六艺自孔子卒后至秦以前的承传或有依托。[2]但是关于汉儒传六艺之学,如《史记·儒林传》所谓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传。言《尚书》自齐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司马迁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及个人的见闻,对汉初六艺传经本师的叙述,是可以确信的。

司马迁将孔子的六艺超越诸家之上,成为一个学术的专门领域,虽然和当时现实的政治环境有关,却规划出后世经学的研究范围,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即由此而出,同时也铸定以后中国目录学经部的版型。章学诚说中国目录学为"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学就学"。[1] 自来讨论目录学,都从刘向、刘歆父子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始,完全忽略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这方面的贡献。司马氏父子奉命整理图籍,对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的文献与学术发展,作了另一次彻底而系统的整理。司马谈选择了黄老作为主导思想、塑出《汉书·艺文·诸子略》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雏形。司马迁标举六艺,是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章本,虽然司马氏父子整理图籍的材料,没有单独成书流传后世,但却已分散在《史记》各篇中,不仅清晰可见,且有脉络可寻。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最后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的总结。"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则是《太史公自序》的总结。也是

---

①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内篇一。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意旨所在。这是司马迁继承他父亲未竟的遗志“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对孔子整理文献以后的散乱图籍,再作一次系统的清理与总结。司马迁不仅担负了这个“何敢让焉”的责任,并且也完成“悉论次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使命。然后,以此为基础向另一个目标迈进,那就是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后两个“成一家之言”表现了先后两个不同的层次,因为只有在第一个“成一家之言”完成后,才能以此为基础,进行另一个“成一家之言”。

（原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92 年）

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施 丁

司马迁著《史记》"欲以成一家之言",发生在汉武帝号召"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标志着作者的一种反思想专制倾向同皇家的思想专制的矛盾,实乃秦汉思想史上的头等大事。这是值得注视和认真探讨的。

司马迁写史,一再提到欲"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①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云:"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据此分析,司马迁写史的企图与目的是:(1)整理学术遗产,推旧出新,肩负历史使命,开创史学新局面。(2)发扬传统,标榜独断,表明主体意识,对"天人"、古今、世道等等提出不同于流俗的新的史学思想。(3)写出创新的历史著作,以期传世不朽。这三点相辅相成,都表明史学家开创史学新天地的自觉性,三者是以"一家言"为主体。所谓"言",这里是指言论;故"成一家之言",以新的史学思想为核心,这是决定

---

① 以下凡引《史记》文字,只提篇名。

《史记》能否成“一家言”的关键。如果思考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表述的“欲遂志”、“通其道”继孔子《春秋》而发愤著述的心意，则对于“成一家之言”就会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本文就按这个思路，谈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一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人与“天”的关系。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历史理论问题。

究“天人”关系，是个古老的课题。古时人们受历史局限，“天命”、“天道”观念较为严重，汉代还有天人感应论；但先秦已有重人事、轻天命者，荀子有“天人相分”说。司马迁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然又不为其所囿役。

司马迁的《史记》写自黄帝至汉武帝几千年的历史，其中偶尔提到“天”，但并不着意谈论之，重点是在谈人事和社会变迁，写人的活动，论事在人为。其论夏、商、周的更替，秦的统一和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大多归结于人为。《秦楚之际月表序》云：“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这是说，三代更替至于秦之统一，都是人们行德用力的结果。此《序》又云：“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

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里论秦亡汉兴，提到"天"、"受命"，似乎是讲天命；实际上是歌颂陈胜、刘邦等平民反对暴秦，结果刘邦称帝，仍然是强调人为。

楚汉相争，以项羽失败、刘邦胜利告终。项羽曾说"天之亡我"，意谓老天爷坑害了他；刘邦曾说胜负的关键在于彼此"用人"的得失。究竟是非何在?《项羽本纪赞》评项羽之亡道："(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是说，项羽之亡与"天"毫无关系，而是他自己骄傲自负、刚愎自用的必然结局。

应当承认，司马迁《史记》所提到的"天"，有时是言神秘的上天，《天官书》以人事比附天象，所言天人关系颇有天人感应论的味道；但大多是指时势，是指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如《高祖本纪赞》云："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论秦亡汉兴的历史原因，着意于人为是否符合时势的要求。所谓"天统"，决非"天道"、"天命"之意，而是指历史大势，所谓"得天统"，是言汉初"承敝易变"，与民休息，颇得民心，符合历史的要求。

故我们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主要是谈人为与时势的关系，强调谋事在人而又受到时势限制，人乘时顺势则大有可为，违时失势则必然失败。他评述历史人物，往往将人为放在特定的时势下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空言"天命"。

《封禅书》对于秦始皇、汉武帝的封禅求神的种种闹剧，字里行间多寓讽刺。他写道："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湖、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

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意思是，汉武帝热衷于封禅求神；人事不治，而谋于“天”与“神”，那是愚昧而无效的。

司马迁的人生观，与其强调人为有关，故这里也谈一下。他在《史记》中记述了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对他们的为人处世有褒有贬。他认为，人生于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是富贵还是贫贱，是老还是少，是男还是女，总要有所作为，奋发上进，懂得恩怨荣辱，正直仗义，志向不凡。他所赏识而着意传写的，是一些有所作为的人。对于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而返国为君，《晋世家》有意描述之；对于陈胜号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颇为赞赏之；对于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以尊周室，号为霸王”，《越王勾践世家》允为贤者；对于刘邦等人“起于闾巷”，而登上高位，《秦楚之际月表序》称道“愤发其所为天下雄”。还有，《平原君虞卿列传赞》论“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见于后世”；《范雎蔡泽列传赞》称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魏豹彭越列传赞》说魏豹、彭越二人“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

他歌颂懂得恩怨荣辱的人。称许伍子胥为父报仇而鞭楚平王尸，是“弃小义，雪大耻”[1]；表扬刺客受人之惠宁死报之，是“士为知己者死”，“不欺其志”[2]。

他称道仗义正直之士，说晏婴伏尸哭庄公是“见义不为无

---

① 见《伍子胥列传》赞。

② 见《刺客列传》赞。

勇”,犯颜谏君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竟然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其执鞭,所欣慕焉。”①

他更称赞特立独行、志向不凡者,称许鲁仲连“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屈于诸侯”,“可谓抗直不挠矣”②;称韩信受辱于胯下,然“其志与众异”③。

他不仅传写和称道那些有所作为的古人,而自身也是奋发有为的。他自被刑受辱之后,没有倒下,而是从古代贤哲那里学到人生之道,忍辱而发愤著述,《报任安书》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自序》也有与此相同的表白。他面对现实,积极处世,可谓具有正确的人生观。

二

司马迁所提的“通古今之变”,主要是想弄清历史发展变化的奥秘,是个历史观问题。

古人早有历史观念,但对古今之变的概念是模糊的。孔子提到过三代礼制的损益,但没说清楚。《易》学有变的思想,但主要

① 《管晏列传》赞。

② 《鲁仲连列传》赞。

③ 《淮阴侯列传》赞。

在哲学方面。儒家有"民为贵"的思想,但尚未用到历史观上。法家有今胜于古的思想,而且强调变革,较为突出。司马迁多少吸收了已有的思想养料,在历史观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

首先,提出了"承敝通变"的观点。社会历史的每个阶段总不免有弊,有弊就得改,社会总是在变,变是历史规律。变有急渐之分,有的变是逐渐的,有的变是急剧的。变有好坏之别,变坏了,还得变;变好了,就通顺,社会就前进了一步。自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由诸侯纷争达到国家统一,是个大变,急变,变通了,历史也就发展了。《高祖本纪赞》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就是说,三代以来,世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承敝易变,就是历史。司马迁此论,大致表述了他对古今之变的看法。

其次,提出了"世异变,成功大"的观点。司马迁写自黄帝至汉武数千年的历史,写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之变,其中以写两次大变为最突出:一是夏禹传子,天下由"公"而为私;一是秦统一六国,天下由分裂而统一,由诸侯分立而定于皇帝一尊,由分封制而郡县制,由世袭贵族制而公卿官僚制。对于前者,由于受历史资料的限制,未能展开论述;对于后者,则广泛地铺叙,生动地描述,还发表了精彩的议论。《六国年表序》说:"(自春秋五霸之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

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侯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一段大议论,说明战国之世的风云变幻,尤其是秦"卒并天下",是近代"成功大"的"异变",符合"俗变"而"易行"的历史进化法则;有些学者寡闻浅识,因秦朝为期短促而讥笑之,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犹耳食不能知味,实在可叹。这"异变功大"的观点,在当时不同凡响,震聋而发聩。

再次,肯定"伐无道"的正义性。司马迁不仅写了数千年文明史上许许多多的矛盾事件,而且指出了为政者的无道引起了反抗斗争,并肯定反抗斗争的正义性,甚至称许反抗者取得的胜利业迹。《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对伐无道事业的历史定评。翻开《史记》,读读《殷本纪》和《周本纪》,则知作者对于商汤王伐夏桀王、周武王伐殷纣王的充分肯定;读了《孔子世家》,则知作者对于孔子悼礼废乐坏而欲通过作《春秋》以达王道的大力颂扬;读过《陈涉世家》,则知作者对于陈涉揭竿起义反对暴秦的由衷称许,而且对这些正义事业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称允其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虽然司马迁似乎并不大明确历史就是永恒的社会矛盾运动,更未明确指出正义的斗争是历史发展最积极的动力,但他给予"伐无道"这样明确的历史评价,尤其是对陈涉起义的历史评价,实是前所未有,在整个封建社会也少有同调。还有,给予卑贱者

一定的历史地位,肯定众人与英雄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不只是写帝王将相,还热情地为农虞工商、扁鹊仓公、刺客、游侠、滑稽、日者、龟策及文武奇士等"倜傥非常之人"树碑立传,肯定他们各自或多或少地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秦楚之际月表序》说:

>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按:自陈涉称王至刘邦称帝,凡八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
>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这里暂且抛开那"天"、"受命"等犹阳春面上的浮油不予讨论,而专门考察其大事,肯定秦楚之际发难、灭秦、平乱的陈涉、项羽、刘邦等的业迹,则知作者热情致意的英雄人物,并不是天生的帝王,而是"无土"、"起于闾巷"的平民,是他们"发愤"而成为"天下雄",是他们起着亡秦兴汉的首领作用。这不免有英雄史观之嫌,但歌颂平民在历史亟变中成了英雄,起到了改朝换代的历史作用,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

司马迁所提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探讨政治成败与政权

兴亡的道理。这是个政治观的问题。

先秦诸子的政治观,以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孟的"仁政",法家的耕战政策,为最著称。汉初的士人学子上书论政,大都谈些农商本末、礼法吏治、诸侯王、汉匈关系、君臣父子等问题。

司马迁吸收已有的思想养料,加以熔冶改铸,形成自己的政治观。我觉得,司马迁在"成败兴坏之理"问题上,时常在考虑着是否能做到因俗、安民、知人是其关键。他的主要观点是:

(一)善因民俗是基本的治国思想。《太史公自序》记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推崇道家之高明在于:"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以因循为用",在施政上就得善因民俗,顺着民心,"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1] 秦汉成败兴坏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秦朝违背民意,扰民不已;汉朝了解民心,与民休息。对于汉武帝时官营盐铁,搞均输、平准法,司马迁以为这是与民争利,则以"善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2]之论以讽刺之,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提出"无为"以安民的观点。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把安民视为政治好坏成败的一个标志。司马迁接受了安民这个观点,并发展了一步,以为安民之道要在

① 《管晏列传》。

② 《货殖列传》。

"无为"。"无为",是言少惹是非,不要多事扰民;而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平准书》写道:"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就是说,汉初百年间,统治者由"无为"而"多事",兴功兴利,变安民而扰民,搞得民生困苦,国家空虚,甚至"盗贼滋起"。[①]

(三)提出了玩法酷刑不如"奉职循理"的吏治思想。《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专写"奉职循理"与玩法酷刑两种官吏,谁好谁坏,形成鲜明的对比。汉朝的官吏,为善者少,作恶者多,他们多作威作福,奸诈玩法,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如:宁成,"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舞文巧诋以辅法","乡上意"而办事。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王温舒,杀人"至流血十余里"。杜周,"外宽,内深次骨","专以人主意旨为狱",使得案件大增,犯人满狱。他们有的人,"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②]例如,绛侯周勃免相而失势,竟然有人告他谋反,下了狱,狱吏落井下石,"侵辱之",好不容易才由文帝赦免出来,故周勃有

①② 以上引文,均见《酷吏列传》。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之叹。[①] 曾为梁中大夫的韩安国坐法下狱,狱吏田甲“辱”之,“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②]。邓通原是文帝的宠臣,自铸“邓氏钱”,拥有无数钱财,失势后被告入狱,家产被没收,“常负责(债)数巨万”,竟然“寄死人家”。[③] 足见狱吏欺人,实在可恶。如此吏治,其结果:一是“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就是说,腐败成风了;再是“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④]意思是,大官们畏罪而保命,哪有心思去考虑改进政治;三是民众恨之入骨,故“张汤死,而民不思”;[⑤]再就是,因酷吏迎合君主意旨玩法酷刑,“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意思是,物极必反,官逼民反。司马迁察此情景,大声疾呼:“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⑥]他的意思很清楚,单靠酷吏们玩法镇压吏民,只会扰民添乱,不可能国泰民安。

同时,司马迁也写了当代几个好官。如: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他反对“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谈论“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为天下言,专阿主意。……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

---

① 《绛侯周勃世家》。
② 《韩安国列传》。
③ 《佞幸列传》。
④ 《酷吏列传》。
⑤ 《平准书》。
⑥ 《酷吏列传》序。

威重"。[1] 张释之为廷尉,治狱按法办事,曾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任意轻重;"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故他赢得文帝和士民的称誉。司马迁情不自禁地称道张释之言法令及冯唐论将帅"可称廊庙"[2],意谓可为朝廷的准则。

司马迁又将先秦的一些良吏集中于一起,写其人其事:孙叔敖,"施教导民,上下和气,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子产为相,民风淳厚,"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公仪休,"奉法循理","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自身作出榜样。石奢,"坚直廉正",其父杀人,纵之,自知有罪,"自刎而死"。李离,为狱官,"过听杀人,自拘当死",不推过于下吏,"伏剑而死"。这些官吏,令人怀念,子产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司马迁称这些官吏为"循吏",即"奉法循理之吏"。他意味深长地论道:"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吏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3]意思是,法令是为了导民,而不是坑民;官吏当忠于职守,按理办事,而不能仗势欺人,胡作非为。

(四)不仅主张善于用人,而且强调"智不可专"。司马迁于《楚元王世家赞》论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这里明确地提到用人得失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

① 《汲黯列传》。

② 《张释之冯唐列传》。

③ 以上引文,均见《循吏列传》。

《史记》写历代兴亡都与用人得失有关。三代的兴亡,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成败,楚汉胜负,汉朝盛衰,都与用人得失分不开。

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强调"智不可专",应当群策群力。自秦朝以来,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皇帝多任用庸才为将相,这些大臣或恭谨自保,或阿谀献媚,或随风应变;而贤智直言之士,多受压抑。对此,司马迁大为感慨,不仅用心记述之,还借娄敬向汉高帝建议都关中一事,发表不同凡俗的评论:"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①]意思是,历史非个人所能创造,政治非私智所能成功,君主唱独脚戏是不行的;搞好政治,要靠善于用人,集众士之智。在此,司马迁既强调了贤士直谏与君主纳谏之重要,还用"智岂可专"暗讥君主专制之可恶。

另外,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司马迁认为诸民族各有特点,各有生存权利,不能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他认为现行的征伐匈奴政策不可取,征伐不如守御,战争不如和好。

四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很突出的。他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主要不是君主专制占有,不是封建官府垄断;而是民生,是百姓生存生活的权利。他的经济观,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一)提出百姓求利是正当的权益。司马迁能从历史发展的

① 《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角度，观察人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和物质欲求。他说，人们都求生，都“有欲”，所以都求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层人物在逐利，平民百姓也要求利，“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根据当时社会情况和各地习俗，指出社会上各种人物都在求富逐利，如朝廷大官、在野名士、在军壮士、间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者、博戏驰逐者、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舞文弄法的吏士、农虞牧工商的经营者，无一不在忙于财利。“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遗余力而让财矣”①。意即所有的人，一个个动脑筋想办法求利，没有一个稀里糊涂将财富让给别人的。对于平民百姓追求财利，司马迁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这样一来“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于国于民都有利，故他强调：“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②看来，司马迁是鼓励百姓谋利的。此与当时统治者口头宣扬“仁义”实际上夺民之利大异其趣。

有说司马迁于《货殖列传》言百姓欲富求利，与其《伯夷叔齐列传》强调“让”而毋争，于《孟子列传》论“好利之弊”，互有矛盾，因而疑此传的富利论是否肺腑之言，我看这是个误解。《伯夷列传》和《孟子列传》反对争权夺利，是指向那些既得利益的王侯卿士，是批评他们贪得无厌；而不是指责平民百姓。《孟子列传序》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① 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

② 《太史公自序》。

《魏世家》引述《孟子》见梁惠王章时改写得更为显豁:“梁惠王曰:‘……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则国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足见此论是针对统治者争利而发的。应当承认,司马迁是为平民求利的权益说话的。

(二)提出不同于世俗的本末观念。汉代以农业为基础,故当时统治者强调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封建国家强调重本轻末,甚至抑末。司马迁接受了“本末”的说法,但思想上并不重农轻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各地物产丰富而各有特点,人们生存生活必需一定的物资,这就需要农虞工商进行生产、交换和流通,并不强调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与时调相反,他大谈工商经营,为历史上经营致富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还以赞赏的口吻说,畜牧主乌氏倮拥有大量的马牛,秦始皇以其“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大矿主巴寡妇清“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她俩都“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又说,百万家产的庶民(农虞工商)可以与封君相比,命曰“素封”。[①] 事实表明,司马迁有重工商的倾向。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尊重历史,写明春秋以来工商业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暗有针对汉武帝搞官营盐铁,以国家权力打击工商业者,与民争利,使得“中家以上大率破(产)”[②]的情况,与国策唱反调。

(三)强调劳动致富,反对“奸富”。司马迁大讲以末致富的生财之道,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所谓“富”,指的是财利。他所传写的货殖人物,多为以经

---

① 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

② 《平准书》。

营工商致富者。又说,“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所谓“能”与“不肖”、“巧”与“拙”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善于生产经营,勤于生产,巧于经营,就可致富,不事生产,经营无方,想富也富不了。又说:“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作力”与“斗智”、“争时”,“筋力”与“奇胜”,就是拙与巧之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别。用力是治生之“正道”,这是对体力劳动的肯定;只是指出其难以致富。“少有”(即有点钱财)的人才有条件“斗智”(运用计谋,逐时争利),富者才有条件“奇胜”(出人意外地赢得财利),这对以资本和脑力劳动挣得很多钱,并不拜倒,也不反对。这是按当时实际情况而言。

(四)强调“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的放任政策。司马迁主张国家对农虞工商各行各业放任而不要抓死或压抑,任其自然发展,因民之利而利之,适当引导之。他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据是:(1)各地资源和物产丰富而各异,人们需要之,故必须开发、生产和交流;(2)由此必然产生职业分工,也就是说,农虞工商的职业分工是依据于客观条件和社会需求;(3)人们要经济生活,有物质欲求,就得“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也就是说,人要尽其能力,以得所欲,不能不劳而获;(4)表现于市场供求方面,就有抓时机,找窍门,了解信息,灵活经营等办法。“此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邪?”意思是,这不是符合客观规律,顺顺当当的吗?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为政者应该如何施政定策呢?当时汉武帝是以官府垄断经济,不给工商业者以一定的社会地位,限制和压抑私营工商业,使得“中家以上大率破(产)”,弄得民怨沸腾。司马迁对此情景,一方面记其事于《平准书》;另一方面又在《货殖列传》提出了自己对政策的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

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意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再加以引导;如有偏差或产生矛盾,教诲和整齐也是可行的;最下之策是与民争利,损害百姓谋生求利的正当权益。照此所说,汉武帝现行的财经办法是最下策,是搞不好的;只有他设想的办法,才能使社会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主观因素都调动起来,形成生动的局面,于国于民两利。

(五)经济决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关系。司马迁接受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免有点片面性,因为富者往往不仁。他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①这是说,财富的多少有无,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之主奴尊卑,决定着剥削奴役与被剥削奴役的关系,此乃客观的事理。这是他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很多农虞牧工商的富人因富而社会地位高、奴役很多人的事例之后得出的结论,非一般的泛泛空谈。这是个不同凡响的唯物主义观点。

五

司马迁的伦理道德观念,无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它所囿,而有自己的观点。

首先,提出了社会上实际存在富贵者与贫贱者两种道德观。司马迁于《游侠列传》指出:“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

① 以上引文,均见《货殖列传》。

存',非虚言也。"他从"鄙人"和《庄子·胠箧》那里吸取了思想养料,断言古来存在两种道德观,既得利益的富贵者满口仁义,实际上只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德观;而对于"鄙人"与"窃钩者"来说,则是另一码事。

司马迁以为,平民百姓是另有道德观的,他指出:"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游侠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是说,"乡曲之侠"(或称"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讲义气,有诚意,虽然时犯当世的法禁,但受到下层士民的欢迎,并称誉于世。

其次,肯定游侠之义,并为游侠作传。《游侠列传序》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这是说,游侠的扶危救弱的信义,不同于富贵者所宣扬的"正义",更深恶权贵豪暴之徒狼狈为奸,役贫欺弱。故他认为对游侠之义应予肯定,了解其特点,为其作传。

言游侠"不轨于正义"、"时扞当世之文罔",就是说游侠所为触犯当时法禁,是封建专制所不容的。因此游侠为统治者所切齿。当时著名的游侠郭解及其父皆死于统治者的屠刀。儒士出身的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议杀郭解时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遂弗知,其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凡侠义行为,

统治者都视为“大逆无道”之罪。司马迁于《游侠列传》记了公孙弘建议杀郭解之事,未直接置评;可是在此传末尾论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意谓众人皆仰慕郭解,其人虽死而声名不绝,实在可惜。这与公孙弘的态度绝然不同。

还有重要的一点,强调为人处世当以情义为重。整个人类社会史,无时无处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无人不有酸甜苦辣,人们多向往着和好亲切相处,然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无数遭冷遇受苦难的人为此心酸,有多少哲人智士对此苦苦思索,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对此麻木不仁。司马迁对此尤为敏感,深深沉思。他那无限情义的史笔写下了许多世道人情方面的点点滴滴。真情与假意,忌妒与诚信,恩恩怨怨,亲亲疏疏,几乎无所不写。如:既有屈原忠君为国而遭到谗贬,苏秦遭亲嫂的时冷时热,扁鹊医术高明而为同行忌害,戚姬为吕后妒忌而惨遭毒手,刘邦以怨报德杀丁公,勾践平吴功成而杀功臣大夫种,晋里克迎重耳为君而竟被赐死,郑甫瑕效力厉公而被杀,李斯忌同学韩非而害死之,郦寄与吕禄为友而欺骗出卖之;也有桑下饿人报答赵盾之恩,韩信报答漂母赐食之情,管仲与鲍叔的相知友好,张耳与陈余先友好而后仇杀,伍子胥决心为父报仇,范雎为人恩怨必报,豫让、荆轲愿为知己者死,校尉司马因受恩而放跑袁盎,李敢因父(李广)之怨而击伤卫青,少女缇萦愿代父(仓公)受刑,郑庄公思母而于黄泉相见,王陵母嘱咐儿子切勿持二心,贯高宁愿受大刑而证明赵王张敖不反,栾布冒被烹之险而伏友人彭越尸哭诉;还有,冯驩有“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之说,廉颇客有“天下以市道交”之论,邹阳直辞言世道不公,晁错之父劝子少结怨

家,如此等等。

司马迁对此类情景无限感慨,曾直言发表议论:"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①曾微婉地记述谚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②曾为主父偃成败的遭遇不同而哀叹:"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③又为汲黯、郑当时得势客众、无势客去而鸣不平:"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④于此可见他对世道人情的看法。

正因于此,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心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赢得士卒的深切同情。《李将军列传》写到李广死时,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又于传末论道:"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司马迁于此充分肯定李广身正意诚而获得真情的报答。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千份情义,必得万份厚报。司马迁深信于此,或者说他呼唤

① 《扁鹊仓公列传》赞。

② 《越王勾践世家》、《淮阴侯列传》。

③ 《平津侯主父列传》赞。

④ 《汲郑列传》赞。

和寄望于此。他深信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①],相信历史终究会判明是非。

司马迁是十分厌恶骨子里自私自利而表面上假仁假义,而热切期望人们和好相处与真情实义的。他觉得富贵圈里难觅真实的情义,倒是布衣平民之间尚有可贵的深情厚义。

六

这里要谈的司马迁的史学观,不是指广义的整个的史学思想,只是指狭义的撰著历史的旨趣,或者说是为何及如何写史的思想问题。司马迁的史学观,我以为有突出的三点:

第一,讲究"务为治",以有益于社会为宗旨。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大事介绍和阐释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论六家的长短,首先肯定道家;而所论长短,则是从"务为治"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务为治",拿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应用和服务于社会的意思。他俩不信奉当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方针。论道: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论六家的要旨,都是从其应用于社会的长短得失进行分析的,可以说主要谈

---

① 见《伯夷列传》。

的是六家社会学问题。他俩肯定道家，就是认为道家要旨在于"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司马氏父子不仅对六家是从"务为治"着眼，就是对史学家也是如此要求。司马谈临终对子迁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告戒其子一定要认真写历史，学习周公尊崇祖先的优良传统，以孔子"修旧起废"为榜样。事后，司马迁回忆和体会其父的教导："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意思是，其父留下意味深长的教导，要面向社会，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有益于世；他体会是这个意思，表示本人责无旁贷。

司马迁曾师事于《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牢记其言孔子作《春秋》的要旨："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据他说，董仲舒曾说过，孔子评论春秋二百余年史事的是非，实际上是要提供社会人事的规则。换句话说，孔子作《春秋》，也是"务为治"的。

由于受父教师训的影响，加之自己的独立思考，司马迁认为六经都是面向社会、有益人事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

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看!他所说六经的作用,尤其是《春秋》"补敝起废"、"拨乱反正"的道义,都是着意和有益于社会的。

司马迁自言继孔子作《春秋》,责无旁贷,那么,其所著《史记》"务为治"的宗旨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发扬史学传统,努力写出一部社会全史。司马迁继孔子作《春秋》,可不是邯郸学步。他是学其精神,加以发扬和发展。他著《史记》,无论是体例、记事,还是史学思想,都是超迈古人,而自成"一家言"的。《春秋》只是编年史雏形,简记春秋二百余年的大事,史学方法据说是寓褒贬,别善恶,史学思想是"尊王攘夷"、"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那一套。而《史记》,与其大不相同。司马迁自述其书的大概:"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易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上引文,均见《太史公自序》)就是说,《史记》是一部创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一百三十篇的体例全新的

巨著;是记述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风俗习惯、天文地理、各种历史人物、各族关系等等包罗宏博的社会全史;史学方法有褒有贬,有章有微,别善恶,明是非;还是发扬史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的“一家言”。的确它远胜于《春秋》,开辟了史学新天地,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史学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第三,强调“述往思来”,期望后人以史为鉴,理解这份遗产,继承这个传统。司马迁提起古人发愤著述、孔子作《春秋》时,一再申意: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这不仅坦露自己发愤著《史记》的心思,想要得到后人的理解;还有期望后人学习历史、继承这个传统的用心。他写史是“务为治”的,是强调“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是要完全反映人类社会史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那么,他“思来者”还会有别的用意吗?我想,他身遇寒冷而心常炽热,只有要求后人毋忘历史,理解其“名山”事业,继承这个学术传统的深切期望。

综观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和启示:

司马迁欲“成一家之言”。其所著《史记》,在体例、内容、文学思想诸方面,尤其是深邃的思想,比之前人与同时代人贡献了很多新的东西,确已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对后学来说,可以明确,“成一家之言”,不是随便提出一个无关宏旨的看法,或发表一通无足轻重的意见,或编写一本人云亦云的史书,就能轻易达标;而是在史学思想上确有高见卓识和新的成就,才能名符其实。

欲成“一家之言”,自然须具备才学识三长,须胸怀述往思来的志向,当然不能随从卑污之俗见,不可曲附专制之淫威,而应该

独立思考,争鸣不已,抒发真知灼见。

可以说,"成一家之言"是史学成就的最高层次,是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怪不得历来学者多以此为职志,并不懈地努力,作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贡献,因而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的儒学随着封建大一统盛行一千余年,但始终未像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一切那样的威势,自有复杂多种的历史原因,而司马迁藐视"独尊儒术"、标榜"成一家之言","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并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这是否是其原因之一呢?我以为是肯定的。

(原载《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司马迁"法自然"的经济思想[①]

巫宝三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留给后人的是他的一部伟大著作《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不论研究他在哪一方面的贡献,都离不开他的著作《史记》,不论研究他哪一方面的学说思想,也都离不开他在《史记》中所表述的思想。所以我们研究他的经济思想,也必须从他的著作《史记》和他在《史记》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开始。

一　司马迁的著作《史记》和他的基本思想

《史记》一书是与司马迁一生相终始的。从他42岁(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开始著述时算起,到他55岁(武帝征和二年,前91)《太史公书》完成时止,他为此巨著共用了13年的时间。若从他38岁做太史令(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开始搜集资料、准备著作时算起,则历时共有17年。再若从他20岁至21岁(武帝元朔三年至四年,前126~前125)遨游大江南北,22岁(元朔五年,前124)任郎中职随武帝巡游、奉使巴蜀滇中和负薪塞河等活动时算

① 此文是根据1980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讲稿整理补充而成。

起(谁都认为如果司马迁没有如此丰富的阅历,没有掌握亲自考察过的活材料,他是写不出《史记》这部博学而生动的著作的。)则历时共有35年。若再从他6岁起,父亲司马谈就做太史令,并且死前嘱咐他"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可知从司马迁幼年起,他父亲就注意培养他接班任太史,所以说《史记》一书与司马迁一生相终始,是不过分的。

这里自然要提出以下一些问题:司马迁为什么要著作《史记》这部书?他的世界观即基本思想是什么?《史记》这部书有哪些内容?它的贡献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似乎远了些,其实是很基本的。所以我们准备在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之前,先简括地回答上述问题。

《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通史,它叙述中国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反映各个时代,尤其是记录了自西周至西汉各个时代的政治变革、社会经济生活面貌和学术思想源流,在著作体例上开创了纪传体,成为以后"正史"编纂的范例。

《史记》是一部大著作,共五十二万六千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十二本纪是以一个朝代或帝王等统治人物为中心的大事记,是全书总纲。十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载简明扼要,作为本纪的补充。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叙述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山川水利,经济发展。自此以后,各代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资料的整理和编著,多是继承司马迁所开创的工作。三十世家主要是各诸侯国的历史,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大大丰富了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一段历史的内容。七十列传，是重要人物的传记，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特别值得提出的，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传记中包括有社会上低下阶层的人物，如医士、侠客、大商人、冶铁主、优伶、占卜人等。这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视野的广阔和思想的卓越。

《史记》是私人著作，并非官书。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藏之名山，付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又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后汉王允则说“司马迁作谤书”①，此盖言“迁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②。《史记》流布以后，各篇有所散失。《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注说：“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也说：“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注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褚少孙）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③

《史记》一书的经济思想集中表现于《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三篇。但司马迁的思想是贯穿在对史实的叙述中，研究他的经济思想，不可限于上述几篇。

司马迁的基本思想，最可以从他为什么写《史记》这部书

①②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

③ 《史记正义》云此十篇皆褚少孙补缺。《兵书》以《律书》补。

的问题看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作了表述。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

很清楚,“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史记》的中心思想。意思是他力图究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通晓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规律,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的是让后世可以有所取法和鉴戒。例如,他说:“后有君子,以览观焉。”②“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③,等等。司马迁在著作《史记》过程中,曾由于为李陵辩解而下狱,并受到极大污辱和惨酷的腐刑。但是他负辱忍痛,以极大的毅力,出狱后继续著作以至完成。他说,他“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④。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些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为坚持对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研究而与当时教会及经院哲学所进行的斗争。虽然司马迁在著作《史记》过程中遭受刑辱是由于推言李陵之功的原因,与哥白尼等之受教会迫害是由于提出反对上帝创造世界理论的原因不同,但是司马迁在封建专制压力下,为探讨真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和他们相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③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
④ 《汉书·司马迁传》。

同的。

那么,司马迁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对于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规律,提出了什么见解呢?应当说,司马迁对于这些关系和规律的见解,没有用总结的形式表明出来,他是通过对于各种历史事实的叙述,来表明他对这些关系和规律的见解的。如同顾亭林所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①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人对他的基本思想一直有不同理解。有说他“崇道抑儒”,有说他崇奉儒家思想,发挥《春秋》公羊学,至今犹争论不决。② 我们认为“崇道”是司马迁继承他父亲司马谈的思想,但是他并不“抑儒”,相反,他是十分尊孔的,他在“崇道”的基础上,发挥了儒家德治和仁政的思想。所以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基本思想是“崇道”的,但又尊儒。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起。《要指》说:

>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塗”。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遵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

② 参看何世华:《司马迁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许绍光:《试论司马迁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①]

从以上论述里,完全可以看到,司马谈对阴阳、儒、墨等五家分别判定其非与是,但对于道家则完全予以肯定。这与荀子的《非十二子》单纯地批判是不同的,也与庄子的《天下》有所非议也有所论述的中心思想是不同的。以前各家各是其是,非其非,学派之间相互对立,如司马迁所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②]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谈肯定的道家,已经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消极的、逃避现实的道家,而是与其他五家相同"皆务为治者"的道家。司马谈上述的道家,具有"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点。这不能不说,这种道家至少是以经过西汉文景时代与政治密切相结合的"黄老"[③]思想为其内容,而由司马氏父子在理论上加以发展而成的。这种道家思想,在政治上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学说思想上则以"法自然"为其核心,即上面引文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迁在为他这部著作写的自序中,如此完整

---

① 《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③ "黄老"之说,最先见于《史记》。

地提出这种思想，并在各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中，验证了这种思想，这就有理由认为这种"法自然"思想，就是司马迁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关于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规律的"一家之言"。一般都认为司马迁记述汉初的政治，说"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①，又说："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②，等等，是他的儒家德治思想的表现，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些思想不正是司马迁"法自然"思想的内容吗？司马迁根据这一思想，除了肯定汉武帝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以及兴治水利、统一币制等功绩而外，还指出武帝加强绝对君权专制主义的危害性。这就说明了司马迁思想强烈的时代意义和持批判态度的科学精神。司马迁提出这种思想，不是无的放矢的。他明白地说，《论六家要指》的提出，是由于他父亲司马谈"仕于(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③。所述"灾异"的问题上，是在论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天"主宰自然与社会的作用)，认为司马迁与董仲舒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全面的必要的联系，更谈不上司马迁是承受了董仲舒的全面的思想。④ 我们比较同意后一种意见。我们认为司马迁所说的"天人之际"，很难说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之学"。不说别的，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以及符瑞和灾异等，来解释人世间的盛衰治乱，但司马迁讲阴阳，主要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

① 《史记·高祖本纪》。
② 《史记·孝文本纪》。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 张维华：《司马迁与〈史记〉》，《文史哲》1980 年第 1 期。

为天下纲纪"[①]。对于"天"为物质之天,自然之天,而非人格神的天的认识,从荀子起已经提出。荀子曾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②]司马迁对于荀子"嫉濁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③],颇有引为同道之感。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天人之际"比较恰当的解释,就是"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意思。《史记》中是有当时盛行的一些迷信附会的言论,例如关于"五德之传"、"受命而帝"[④]等。不过,这也很难说是司马迁的主要思想。一则像《历书》所述,未尝不可以用上述"天行有常"的思想来解释。另外,要说迷信之事,汉武帝时的封禅和求仙活动,可以说是最大的迷信。但司马迁记载那些活动时,一再说"终无有验"、"无有效"[⑤]。由此也可知道司马迁对于迷信、灾异等的基本态度。公羊学派是讲"微言大义",不注重史实的,因而可以随意附会怪异之事,这与司马迁《史记》从历代史实得出他的论断是完全不同的。

二　司马迁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学说

由于《史记》首先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所以司马迁是以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而著称,而不是以经济思想家著称。不过就中国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荀子·天论》。

③ 《史记·孟荀列传》。

④ 《史记·历书》、《史记·天官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等篇都有此言论。

⑤ 《史记·封禅书》。

古代经济思想家而论，司马迁无论在史料的整理上和在新思想的阐发上，无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应享有独特的地位的。首先我们想提出他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作为"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家，这个问题也必然是他想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来回答的。

据司马迁说，中国历史起自黄帝，历夏商周，而经秦的统一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已经从远古社会发展到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帝国。司马迁研究古史，更研究"当代史"。[①] 他对于当时封建帝国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这是摆在司马迁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了远古以来的经济发展，着重地研究了西汉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写了《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联系、发展规律以及如何看待当前各种经济现象和国家经济政策的问题。特别是在《货殖列传》中，他集中地论述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他很尖锐地以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社会与汉代大一统帝国对比来提出问题。《货殖列传》一开头就说：

>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輓、晚古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②]

① 参看施丁：《司马迁写当代史》，《历史研究》1979 年第 7 期。

② 《老子》第 80 章原文为："小国寡民，使用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说,时代发展到了今天("近世"),如果要按照老子所说的办事,涂饰老百姓的耳目,那么一定是行不通的。这就把老子所说的社会与后来发展的社会的不同,十分鲜明地提出来了。那么司马迁所说的"近世"是怎样的情况呢?他紧接着上文说:

>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态)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里司马迁把远古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极其简括地描述出来,并说这种基本需要,不管你怎么巧为说辞要它改变,是无法改变的。根据这一认识,司马迁认为治国之道的上策,是顺应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实行教化办法,再次是实行刑罚干预,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这几句论述,非常重要。一则他把成为社会经济问题出发点的人类需要这个问题提到一定的高度。再则他把人类基本需要和他的"因"的思想联系起来,成为他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或"法自然"的基本思想。他提出这一理论,不是迂阔之谈,而是密切结合历史实际,特别结合汉代的经济发展。后面将说到他在论述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时,即指出有与民争利之处。由于这许多原因,司马迁关于"因"或"法自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学说,可以说是他的经济思想的纲。我们认为他的许多关于各种经济问题的卓越见解,都要从这个基本思想去理解。

司马迁关于人类基本欲求以至较高欲求的理论,多少是源自

荀子的人性论,但是他在这个问题的论述上,也有新的发展。荀子认为人类的自然欲望是不能去掉的,而较高的欲望要根据生产水平的可能性,按照封建等级制度尽可能予以满足。[①]《史记》中的《礼书》,大部分是根据《荀子·礼论》。例如《史记·礼书》说:

> 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这里所说的"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可以说完全是照搬荀子人性论和封建等级理论。但司马迁在《礼书》中论述的侧重点不完全同于荀子,更不是完全取之于《荀子·礼论》的[②]。例如《礼书》有一段说:

>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

---

① 《荀子·性恶》篇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说"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正名》篇说:"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② 《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注说,《礼书》是亡缺十篇之一,但他没有说褚少孙补作《礼书》。今《礼书》内容有不少司马迁自己的论述。

教,被服于成俗乎?

司马迁在这里说,“礼”是会废的,“乐”是会坏的,封建等级之间是常相逾越的。他用圣人之徒子夏等常常在“夫子之道”与人间“纷华盛丽”二者之间的斗争为例,来说明一般人对“纷华盛丽”的追求。这里他把封建等级制度的一套礼仪,不是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他在探究形成“礼”和“俗”的根本因素。请看《礼书》一开头就说:

>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大行”,秦官,主礼仪),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司马迁考察三代礼仪变革之后所作的结论。于此可以看到司马迁从荀子关于礼产生于节制人们欲求的理论,发展为礼仪的变化也是以“人情”、“人性”为根据的理论。司马迁这种认识,又使他进一步发展了前人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的“求富”、“求利”活动的理论,即他认为农虞工商等的普遍“求富益货”活动,是来源于人类的基本欲求和较高欲求的。

司马迁关于从远古到“近世”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当然远不止于上说。他还运用历史材料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下面是他关于这一方面带有总结性的一段论述。

>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纻属)、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玳瑁(一种大海龟)、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征者求也),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①]

上文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1)重视商品流通。在先秦经济思想中,《管子》是比较重视工商业的,如《小匡》篇对于商人的活动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奇物聚。"此外,荀子也是比较重视商品流通的,但他亦只说到"北海"、"南海"、"东海"、"西海"等地区的产品[②]。可以认为《小匡》及荀子所说的,都是大商人为了满足封建主需要,在诸侯国外或边远地区贩运的特产奢侈品。但司马迁所论述的,则是帝国内中心地区"山西"、"山东"、"江南"等地区的普通产品,他说这些产品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和"奉生送死"的生活用品,这就为他重视一般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论据。

(2)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先秦诸子一般都是重农轻工商的,即使有时就社会职能而言把工商与农并提,如《管子》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③],荀子提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④],但就他们思想的总体而论,他们虽然与商鞅、韩非之说有所不同,也还是重农轻工商的。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荀子·王制》。
③ 《管子·小匡、治国》。
④ 《荀子·王霸》。

这种思想在西汉时代,已经形成法令,成为法定的正统思想。但司马迁则根据客观事实提出不同的见解。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农虞工商(虞,主要是煮盐、冶铁的治山海之利的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索隐》说:“言贫富自由无予夺”,或可解为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致富或变贫之道)他还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在这里已经抛弃了已往的从不同社会职能而提出的“士农工商”的说法,而代之以四大社会经济活动部门的“农虞工商”的分类。这种新的提法,意味着一方面这四个部门都属于经济活动的领域,探讨的问题更专门化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需要来说,虞、工、商与农业生产有的是物质生产部门,有的是商品流通部门,是同样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所以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表明了他对这四种经济活动的实质和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3)提出“任能”、“作力”论。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分析了这些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动力。他认为这四种社会经济活动是完全适应社会客观发展的要求的,不是由于谁在那儿发号施令和施加影响而造成的。他说:“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四种经济活动各能发挥其作用呢?他回答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就是说,若能使农、虞、工、商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才力,满足他们的欲求,他们就会如水之就下,整天整夜不停地努力去干。他在《货殖列传》中反复阐述这个思想,如:“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

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正义》:'言少有钱财,则斗智巧而求胜也。'),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正统思想是墨守陈规,而歧视创新,对于古代世界最初起变革作用的工商,常常视为"奇技淫巧"。但司马迁则反其道而言之,极称技巧的作用,并引齐国之富庶作为例证。他把"作力"、"斗智"、"争时"三者总结为致富的三大原则,也最能表现他对于发挥各个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这些论述应该是司马迁遨游全国各地所观察到的活生生的事实。所以最后他用反问的语句总结说,这些事实"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正是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而得到了验证的。我们可以说,司马迁这些论述扼要地表述他的"法自然"的经济思想。对于他的"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的理论,我们不禁想起《管子·乘马》篇亦有与此颇为相同的论述。② 但是《乘马》所说的还仅指农业生产,而司马迁所说的,则是统农虞工商各种经济活动而言。这也是司马迁发展前人论述的方面。

司马迁的顺应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法自然"的经济思想,论者说是经济放任主义思想。胡适说,"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这种自然主义的放任政策是资本主义初发达时代的政治

---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乘马》篇说:"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

哲学"。[①] 这种理解,把司马迁的时代提到资本主义时代,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他所提的自然主义的放任政策,亦有待于说明。胡寄窗同志说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思想,是"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②] 我们认为司马迁不主张汉武帝时的封建专制官营经济政策,是事实,在下面第五节我们将谈到。但是"放任主义"与"法自然"各有特定的含义,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最后一节讨论。

司马迁的"法自然"的经济思想,表现在(1)"求富益货"即货殖学说上,(2)农虞工商各业经营的论述上,(3)反对封建国家绝对君权专制主义与民争利的政策上。以下依次分别论之。

三 司马迁的货殖学说

中国最早的经济思想就提出谋求"食"与"货"的问题。《尚书·洪范》说:"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当然是指谷物生产,"货"一般理解为货币和手工业产品[③]。至于如何增加食与货的生产,如何看待食与货经济活动,用什么方式生产食与货,食与货应以何者为重等问题,则是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家所不断探讨并成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问题。而到了西汉时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并由于过去思想家探讨经济问题所提供的思想资料,思想家因而也提出了新的经济观点、新的经济学说。可以说司马迁是提出新的经济观点和新的经济

---

①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集,第575页。

②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第53页。

③ 《洪范传》说是殷箕子答周武王问所作,现在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但其中有些思想,如关于"食"与"货"的观点,出现较早。

学说最为特出的思想家。他的特出的经济观点和学说,除了表现在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学说等而外,还表现在他对于"货殖"的学说。

食货问题到战国时代发展成为"富国"、"富民"的问题。到了西汉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更概括地提出了"求富"的问题。司马迁对于这一问题从史实到理论都作了全面的论述。他的著名的《货殖列传》所论述的重点之一,就是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先说清楚他所说的货殖的含义。

"货殖"一义,最早见于《尚书》,仲虺谏汤王说:"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①]但"货殖"成为一个专门名词,还是始自《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一语。朱熹注:"货殖,货财生殖也。"[②]这是对"货殖"所作的解释。司马迁所用"货殖"概念,与此义同。但对待"货殖"问题的态度,司马迁与往前是不同的。孔子批评子贡的"货殖"活动,说他"不受命",而司马迁则反过来说,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③] 这不但肯定子贡的货殖活动,并且还表彰了子贡货殖活动对孔子名扬天下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司马迁提出他作《货殖列传》的旨意,不是在于为贵族和统治者增殖货财作解说,而是在于论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④]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因为从战国时代以至西汉,重农

---

① 《仲虺之诰篇》。
② 《四书集注·论语·先进》。
③ 《史记·货殖列传》。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抑工商思想已逐渐居于统治地位,尤其以西汉时代为甚。但司马迁则认为即使是工商“末”业的货殖活动,也有可以供“智者”采择的地方。这显然提出了反对传统的和流行的抑末的观点。所说“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就是通过商业活动以增殖财富。不正是同战国时期所说的“事商贾”之人有类于“螟螣蚼蠋”害虫的思想相对立吗?① 不正是同贾谊所说的末业是“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之说相对立吗?②

其次,司马迁所说的“货殖”概念,是关于货财的取得和增殖,而货财的含义,既是各种自然状态和加工过的有用物品和交换得来的物品,如谷帛等物,又是可以换取各种物品的货币。《货殖列传》说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至少从字面解释,白圭是以实物交换的方法增殖财富。但司马迁所说的“货殖”,并不全指增殖实物财富。他在很多论述中,都讲到货币。如讲范蠡、计然之术,说“积著(贮)之理,务完物,无息币”③,这里是说不要使货币呆置,而应发挥其不断周转的作用。又说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这也显然是说范蠡通过商业活动,增殖了大量货币财富。又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这些数字也指货币(钱)而言。司马迁所以列举很多经营工商业的富人,而少举依靠地租或聚集财富的大地主,也表明他所说的货殖,特别指以商品交换形式增殖的财富。司马迁还在列述汉代工商业家致富经历以后总括地说,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

① 《商君书·农战》。

② 《新书·瑰瑋》。

③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引文不加注者,皆见此文。

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里"赢利","以末致财",当然是以 G—W—G'形式表现的。在货币经济尚未充分发达的封建社会,商人常通过以丝换谷或以谷换茧的方式累积实物财富,但这种实物财富的累积,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出售,作为增殖财富的手段。司马迁对这一点说得很充分。如说:"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又说:"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还说:"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①]这些论述,都不是指获取更多的生活用品,而是指获取更多的货币或可以再出售的货物。对于这种"富"的追求,自然是没有限度的。关于这一点,司马迁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司马迁的货殖概念,显然包括实物与货币财富二者,具有以交换为手段,以无限量增殖财货为目的的内容。[②] 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货殖学说。马克思说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有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③] 亚里士多德所说"货殖"原文是 Chrematistik,意为以货币形式增加财富的技术,或简单地说:"增殖货币术。"亚里士多德是

---

① 皆见《史记·平准书》。

② 吴炎吾说:"货殖之涵义,殆颇与今言之'经济'主义相当。"甚是。见《〈史记·货殖列传〉校释》,《华中师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

③ 以上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74 页。

把无限量的增殖货币财富的经济活动同有限量的取得生活用品的经济活动相对比、相区别的,并从伦理的角度认为后者是必要的,前者是不自然的,特别认为高利贷用货币增殖货币,更应受到谴责。如果以司马迁的货殖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货殖学说相比较,他们在无限度的增殖货币财富的论点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但司马迁论述财富的增殖,不像亚里士多德限于货币,还包括生活用品等实物,也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仍然没有摆脱伦理规范的束缚。

先秦和两汉时代的思想家关于"富民"、"富国"的论述,是很多的,但都离不开重视农业生产、重视自然经济这个大框框。像司马迁这样公开提出并论证增殖财富,包括货币财富的思想家,尚找不出第二人。从这里也就产生一系列问题需要解答。首先是如何看待谋求增殖财货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也作了重要的发展。道家主张弃利,儒家反对言利,法家专言君国之利。总起来说,就是关于人类"求利"、"求富"活动上,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司马迁认为"求利"、或"求富"活动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农工商贾畜长",他们的职业就是"求富益货"。他用一大段很生动文字来描述这种情形。他说:

>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

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上面所述的求富情形，不仅限于“农工商贾畜长”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贩运者，并且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宽广的图画，从达官贵人至隐穴之士，从壮士陷阵却敌至闾巷少年劫人作奸，从赵女郑姬目挑心招至游闲公子连车结骑，从弋射渔猎到斗鸡走狗，从医方食技之人至舞文弄法吏士，无一不为了财用和富厚而竭其心力。正如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所以极力描述这一幅图画，不是旨在赞美那些物质财富生产的求富活动，而是在于极言“富”的重要。尤其是他提出“匹夫编户之民”求富的不容非难的论点，更是非常可贵的。他认为“富”是礼仪的物质基础。他在引用管仲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后，说：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把“仁义”的物质基础，揭示得再透彻不过了。不但如此，他还称，庶民农工商贾富者为“贤人”，他们的富厚，“皆与千户侯等”。司马迁把他们叫做“素封”，意即“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

与王者同乐”。司马迁对于这些“素封”,并不与传统思想相同,意在贬抑,相反,他是意在“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就是要后世有所取法。他还责难那些好讲仁义不务货殖的人是可耻的(“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对于有千金之家,就会产生有余和不足的贫富问题,对于财富增殖的无定问题和剥削关系问题等,司马迁不但有所论述,并且把这些问题提到规律性的高度来看待。他说:

>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索隐》云:“言贫富自由,无予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
> 由此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
>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以上论述,可以说是司马迁为封建社会小生产者增殖财富,两极分化,以及产生的剥削关系所描绘的图景。他把封建社会“编户之民”两极分化所产生的剥削关系,叫做“物之理”,即把这种关系提高到规律性来认识,这应该说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最深刻之处。

需要指出,交换关系的发展,都是与货币的出现不可分的。货币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恩格斯称之谓“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①] 司马迁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表明他意识到货币财富的社会力量。不过司马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9页。

对于货币还缺乏理论的分析。《平准书》是主要论述货币问题的,在那里,他明确地说,有了贸易关系,有了商人,货币就会出现,他说这事已经"所从来久远"。他认识到"维币之行,以通农商"。①但是司马迁终究没有对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进行分析,没有对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和对货币在商人资本增殖货币财富中的作用等加以分析。他讲他作《平准书》的主旨是"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③这就是说,货币本来是用作商品流通的手段的,但是它产生了很多流弊,这种流弊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还难以说清楚,有待于继续观察其发展("以观事变")。显然,司马迁所说的"其极则玩巧"等,包括汉武帝时封建专制主义所实行的许多经济政策的流弊。

四　司马迁关于农虞工商各业经营原则的论述

司马迁以前的思想家论述"富"和"利",多是从一般原则或封建国家的观点提出问题。法家的"富国强兵"固然如此,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是如此,没有人从个人以及农虞工商各业如何经营致富的问题进行考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胡寄窗同志说:"在司马迁以前的经济思想家,对商品生产一般都缺乏较详细的论述,连管子也不例外。"②确实如此。所说"缺乏较详细的论述",我认为就是缺乏对个人以及农虞工商各业如何经营财货的增殖进行考察。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以往思想家多进行宏观经济的论述,而

①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第58页。

少对微观经济进行考察。从这一点来说,荀子的《富国》篇所论“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可以说综合儒法两家立论,为先秦诸子宏观经济的论述作了一个总结。若与希腊、罗马的一些经济著作相比,他们的《经济论》或《论农业》诸书,常常论述如何管理奴隶和经营大农庄,中国先秦思想家以“富国论”为其主题,可以说是一个特点。① 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迁着重微观经济的考察,也表明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从他“法自然”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和货殖学说派生出来的。

关于货财增殖经营原则的论述,司马迁用历史学家的笔法,列举农虞工商各业著名人物的经营业绩来作说明。我们来看他对于各业的论述。

(1)农牧 大概因为农业是小农经济,无何特殊事例可举,司马迁所列举的是三个畜牧长。其文如下: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②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

① 参看拙作:《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史记·货殖列传》。

去，毋令败群。"①

塞之斥也（《正义》孟康云："边塞主斥候卒也"。颜云："塞斥者，言国斥开边塞，更令宽广，故桥姚得姿其畜牧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②

这几个例子，说明畜牧可以繁殖，可以致富，并可以"买田宅"。而繁殖之道，要"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即要善为管理，时时检查，毋令畜病传染。另外，宣曲任氏可算是官僚地主兼商人的代表人物，他经营产业，颇有蓄财家的特点，即效法白圭的治生产之法——"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同时窖藏米粟，贾取善畜，待时换取金玉。这可以说是大地主向大商人转化的典型。

（2）盐铁　这是属于"虞"的部门。司马迁举的事例较多。兹录于下：

猗顿用盐盬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货殖列传》。

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①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索隐》:"谓通贾南越也。")富埒卓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偏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索隐》谓宁免去求官爵,止为刀氏作奴)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②

以上司马迁所举的关于经营渔盐和冶铁致富的事例说明:(一)冶铁煮盐是最重要的致富行业,因为这是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重要资料。有的经营规模很大,如蜀卓氏,所用工奴有千人之多。(二)冶铁煮盐业多兼营运销,有的如程郑冶铸产品的运销,远至南越。(三)这些大盐铁业主,很重视经营管理,如曹邴氏家中父兄子弟都按照规定办事:"俛有拾,仰有取",即不能浪费物资,要讲求效益。(四)利用工奴劳动,使工奴也得到一些收益,爱业如家,努力生产。如对于"不驯"工奴,刀间能按照上述办法,使用他们,"终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以上引文皆见《史记·货殖列传》。

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3)商业　司马迁举的著名经商人物也较多,这也是当时工商业的特出现象。司马迁未举小手工业者,因为小手工业者亦如小农相同,就各户来说,无何特殊性,并且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都通过商品流通而表现了封建经济的特点。封建社会的商业,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下部分生产物转化为商品的体现。封建主取得的剩余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奢侈消费品,小农和小手工业也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极少量生活用品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商业在封建社会经济中据有特殊地位,司马迁举了很多大商人的经营事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的。兹录其重要者如下:

昔者越王勾践……乃用范蠡、计然。(一说"计然者,范蠡之书也")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索隐》:"言米贱则农夫病也。若米斗直(值)九十,则商贾病"。)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吴炎吾云:"乏"应为"正",正,征也)治国之道也。积著(贮)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吴炎吾云:"食"读为"蚀"),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白圭,周人也。……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积著(贮)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盖天下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其所长,非苟而已也。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①

上述商业和高利贷经营原则,主要可以概括为:(一)敏锐地掌握时机,贱买贵卖,或高利贷款,以谋取厚利。(二)充分利用货币这个交换手段,以增殖货币财富。(三)采取"节衣缩食"办法,以积蓄货币资本,增大经营规模。(四)利用廉价劳动,发挥"僮仆"的积极性,以增大营利率。这些经营原则,都是力求利用各种条件,以达到最大地增殖财富的目的。司马迁从他所搜集的历史资料和汉代的记述资料,提出这些多种多样的商业和高利贷经营原则,说明司马迁对西汉时代商人资本的发展和活动,是有深刻的理解的。特别应该指出的,司马迁并没有同以往以及汉代的思想家一样,对商人以及畜牧长和盐铁家的经营活动,视为非蠹即奸,大加贬抑。恩格斯曾总结原始社会瓦解以后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发展说:

① 以上引文皆见《史记·货殖列传》。

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①

恩格斯这段精辟论述，也是司马迁历述工商业者各种经营原则所包含的中心思想。在他考察的时代，特别是到了西汉时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但使工商业占有商品财富和货币财富，并且土地也成为可以交换的对象，从而通过货币财富也可以占有大量土地。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表明土地也已纳入交换范围了。

五 司马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

在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继秦始皇之后进一步建立了大一统帝国，通过削弱诸侯，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上继汉初休养生息之后，农业和工商业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即在这个时期，汉武帝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表明了封建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向何处去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汉昭帝时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的争论表现了出来。这个会议所争论的盐铁、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是在汉武帝时期实行的，这些经济政策问题在当时已经暴露出来了，不过当时还没有通过会议形式变成公开的双方对垒的争论罢了。但是司马迁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早在盐铁会议之前就提出了对于汉武帝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以他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和关于货殖的学说为根据的,既不同于御史大夫,也不同于贤良文学。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司马迁对于汉武帝实行的经济政策所作的评论。

司马迁对于西汉以来的经济发展,包括汉武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既有歌颂,也有批评。例如《河渠书》中极言“水之为利害”,汉武帝对于治理黄河决口作了重大决定,“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又如西汉以来,私铸繁兴,钱法紊乱,汉武帝时各地方官亦多铸钱;但后来在元鼎 4 年决定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统一货币,“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①]。这当然是一项有利发展经济的重大决策。再如《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则是盛赞国家统一、实行取消内地关卡,开放山泽之利等政策后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对于以上这些政策和所取得的成就,司马迁是备致歌颂的,因为他认为这些政策是符合他所说的“善者因之”的“法自然”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的。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均输、告缗等政策,则持非议的态度,认为是与民争利,是“最下”的政策,是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背道而驰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对武帝和对时政有意指责,是由于遭刑之后的激愤[②],当然不能说这二者毫无关系,但我们认为司马迁对武帝和对时政的指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

责,是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大问题,应从司马迁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与民争利政策的经济思想来找解释。以下我们分两点来讲。

(一)官营盐铁和官营商业 《平准书》大部分是讲汉武帝时期实行的官营盐铁和官营商业政策,这些政策也是"求利"的,但在司马迁的评论中,显然与他在《货殖列传》对布衣匹夫之人"求富"的评论不同。司马迁对于后者是肯定的,肯定的根据是认为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原则。司马迁对于前者,可以说基本上是否定的,否定的根据是认为它与民争利,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原则。我们看司马迁是如何评论汉武帝的盐铁等政策的。

>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
>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
>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
> 元封元年……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

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①

上文中所说“尽筦天下盐铁”、“置均输、平准官”,是汉武帝新实行的经济政策。需要说明一下,秦国已经设有铁官,汉承秦制,可能西汉时代也有此官,主管官营冶铁。不过那时私营大冶铁主仍存在,可知冶铁只是部分官营。从元狩四年(前119)起,汉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先后做大农丞,把全国冶铁和煮盐这两大重要工业都收归封建国家官营。在各产区设盐铁官,管理生产。历史材料对盐铁收归官营的过程,记载很少,但它涉及禁止私营盐铁业的存在,必然经历一场激烈的斗争。《平准书》说,“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并用刑罚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亦足表明这场斗争的一些情况。均输和平准官的设置,是经营官营商业的,也归大农丞掌管。均输法规定,各行政区均输官按应纳贡物折价数和贡物运输费多少,用上好货物或货币上交国家,解决转运贡物实物困难和实物质量次劣等问题。平准官掌管平抑各地物价,免为富商弁大利。它可以命令各地均输官在物价低时买进货物,运到京都,然后再转运到价贵的地区出售。这样,封建国家就在全国建立了商业网,“尽笼天下之货物”。这种政策措施,当然也是对富商大贾不利的。这两种政策——官营盐铁和商业的实行,是前未有过的,具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最

① 以上引文皆见《史记·平准书》。

直接的作用,是为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找到新的来源,满足对外战争和君主豪华消费的需要(这本来是实行这项政策的最初目的),加强封建君主专制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实力。这项目的是达到了的。司马迁说:"汉连兵三岁……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①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即主要指这项政策实行的效果。但是在生产经营上,效果并不好。司马迁用御史大夫卜式的话说:"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另一最直接的作用,是打击富商大贾豪强势力,驱使工商业家向官僚地主转化,不致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对抗力量,而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有用肢体。关于这一点,司马迁也明白地指出了。他说:"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又说:"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事实上,主管这项政策的大员东郭咸阳和孔仅原来就是大冶铁家和煮盐家,桑弘羊也是出身于商贾之家。至于间接的和长远的作用和影响,则是抑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阻碍了私人工商业资本的积累,使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走上了一种完全由超经济强制起支配作用的道路,即走上司马迁所说的"最下者与之争"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善者因之"的道路。这是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或停滞的大问题,也是司马迁所注意的大问题。下述经济政策也同样具有这种意义和影响。

(二)新立工商税和颁布"告缗令" 汉代的税收,据史书所记,约有十九种,而汉武帝新立的有七种。这七种税是假税、车船

① 《史记·平准书》。以下引文不另加注者,同此。

税、息税、关税、缗钱算、盐铁税、榷酒酤。[①] 除假税是租种公地交纳的地租而外,其他六种都是主要对工商业者的课税。这些工商税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当然是有影响的。如御史大夫卜式就说:“船有算,商贾少,物贵。”[②]缗钱算是对商贾藏有的现钱课税。“算”是计算单位,每算一百二十钱。商贾按藏有现钱多少出算赋。但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又颁发了缗钱令,《平准书》记载如下:

> 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谓不是三老、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的,一乘抽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这个缗钱令与以前的缗钱算不同。以前只对商贾现钱课税,现在则包括商贾一切财产在内。所说“各以财物自占”,“占不悉,没入缗钱”,《史记·索隐》说:“谓各自隐度其财物多少,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尽,皆没入于官。”这就是说,工商业者自己向官府报告财物多少,如果虚报,即没收全部财物。这样一来,暴急刻深的酷吏即可诈取商贾财物。由于出现这种虚报情况,不久在元鼎三年(前114)颁发“告缗令”,用法律形式来没收商贾财物。这是汉武帝时实行财政经济政策中打击工商业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对

① 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第141、151页。

② 《史记·平准书》。

此记载如下：

> 杨可告缗遍天下[①]，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②]。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
> 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③]，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

在上述记载中，司马迁提出的重要问题至少有以下这些：(1)"告缗令"无异于对全国工商业者的财物发动一次空前规模的没收运动，不但富商大贾是告发对象，就是一般工商业者("中家")也包括在内。采取的形式是告发漏税，执行的方法是派遣大小官吏到

---

① 《史记·索隐》说"杨可"人名。如淳云："告缗者，令杨可告占缗之不尽者也。"《酷吏列传·索隐》说："汉代有告缗令，杨可主之，谓缗钱出入有不出算钱者，令得告之也。"故友谷春帆氏对此说提出不同解释，他认为"杨可"并非人名，"杨"应读为扬，"杨可"即宜告认可之意。因为如果"杨可"是人名，何以对于这样一个人而无他的生平行事等记载？此一新解颇有见地，特为录出。见谷著：《中国奴隶制经济重探讨》(未刊稿)。

② "中家"即中民之家，《史记·孝文帝本纪》有"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是十金为中民一家之产，一金直万钱，十金则为十万钱。

③ 上林，苑名，汉武帝扩建，供打猎及行乐用。水衡，掌管冶铜、铸钱。少府掌管皇家财货收入。太仆，掌管舆马。

全国各地办案,只要有告发,就没收其财物。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就是说商贾几乎全部破产了。(2)这个大规模运动的结果是,在官府方面“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因而封建国家以及地方官府财用大为充裕。而在大小官吏方面,奸吏则趁火打劫,没收财物,名为归官,实则攫为己有。司马迁说:“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①如酷吏杜周,他是告缗案的主办人,最初做监狱小吏时,只有一匹马,鞍辔都不齐全,但后来做了廷尉(掌握刑狱的大官),“家赀累数巨万矣”。②(3)这个“告缗令”的长远影响是,一方面老百姓再也不想积蓄财物经营工商业了,而有点资财的人,也就把它吃光用光。即司马迁所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浩劫下,当然会直接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因而导致老百姓的反抗。司马迁说“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并且一再说“物盛而衰”③,事实上,这就指出了汉武帝时社会危机在开始爆发了。

六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东汉班固评论司马迁的学说思想说:“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④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正统派对于司马迁的学说思想的非难。但班固的非难,也正表明了司马迁学说思想的卓越性。就经济思想而言,司马迁确实崇尚货殖,重视

---

①② 《史记·酷吏列传》。

③ 《史记·平准书》。

④ 《汉书·司马迁传》。

求富,他的经济思想卓越之处正在这里。从先秦以来,言富言利者多矣,但儒家如后来董仲舒所说"正其谊(谊,与义通)不谋其利"①,法家如后来晁错所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③,总的来说,都是贱视求利,贱视工商。而司马迁则反是。根据以上各节所说,他提出(一)求富是人之情性,自匹夫编户至千乘之王,都不能例外。(二)农畜工虞所生产,积贮交易所赢利,车船所得,子贷金钱,都属于财富范畴。(三)农虞工商,同样重要,"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④。(四)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人们就能勤俭治产,"致其畜藏"(积累财富)。(五)以上所举,都是为历史所证验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因此要使社会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最好的政策是顺应这些客观发展情况。司马迁提出的这些原则和学说,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最具有创新性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像汉武帝那样实行与民争利的专制政策继续走下去呢,还是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善者因之"的政策呢?这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关键性问题。因为他所目击的大量事实,已经把这一问题提到他的面前,于是他从封建社会过去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提出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学说。这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永放光辉的思想。司马迁的卓越史学和文学,永远为后人所称道。实则他的史学和文学中所包含的卓越的经济思想,构成了他的史学和文学的实质部分。侯外庐同志说,司马迁"并非仅为史学而史学,其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多针对现实的黑暗而批判,并对社会制度提出他的积

---

①③ 《汉书·食货志上》。

④ 《史记·货殖列传》。

极愿望和理想,这实在是他的史学的战斗精神"①。我们认为应当如此理解司马迁。这里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司马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的卓越思想,为什么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开花结果?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问题。司马迁所维护的农虞工商各业任其能、乐其业的原则,受到封建专制官工、官商的打击压制,使民间工商业者无由从刚刚开始出现而壮大成为一个可以与封建地主专制力量相对抗的阶级力量。有的同志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②,诚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深有所感地说:"《货殖列传》私谓与西士所论("富国学"),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义,千年湮没,深可悼也。"③问题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所建立的整个超经济强制经济,很少能有"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的可能。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常常都是有所继承和有所发展创造的。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与先秦以及西汉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是怎样的呢?可以说,在经济思想上,司马迁是接受了荀子的欲求学说的。荀子的封建等级制国家《富国》论是以他的欲求说为出发点的,司马迁则从荀子的欲求说出发论证了他的封建社会各阶级的求富说。除此而外,关于重工商的思想,不独先秦诸子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比,即使西汉

① 《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59页。

② 参看施丁:《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③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第2集,中华书局版,第35~36页。

思想家也是如此。《管子》中《轻重》诸篇确是对商业、货币、价格等问题重点地作了论述，但是它的基本论点还是为了加强封建专制国家的经济力量，是在于打击私人工商业。如果就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来说，《管子》中《轻重》诸篇的基本思想无疑是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思想一致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就很难说同《管子·轻重》篇的经济思想相一致。还有，我们前面提到在司马迁之后盐铁会议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的争论，似乎在“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①上，司马迁与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等人的观点是相同的。御史大夫辩论中所说的“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②等，完全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的相同。另一方面，贤良文学主张罢官营盐铁、均输、平准，反对“与民争利”，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③，亦与司马迁看待桑弘羊等所行所为的态度相同。并且司马迁在《孟荀列传》还说“利诚乱之始也”，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岂非又与贤良文学的观点和主张相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要看司马迁的基本经济思想是否与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相同，不可以片段论述来定其相同与否。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点，非常必要。有两个关键性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司马迁所讲的求利和求富，有两种含义，即有匹夫编户和“素封”之家求利与封建专制君主利用国家权力求利之不同。司马迁在《孟荀列传》所谴责的求利以及在《平准书》中对“兴利”所表示的意见，都是指后一种求利，而在《货殖列传》所说的“求富益

①②③ 《盐铁论·本议》。

货"和"利往"、"利来",则是指前一种求利。明确了这一区分,就可以知道在反对封建专制君主"兴利"上,司马迁与贤良文学以及董仲舒[1]是一致的,但在"抑末利"上,并不与贤良文学主张相同。另一方面,桑弘羊等御史大夫所标榜的"开本末之途",是旨在为封建专制君主"兴利",与司马迁所说的农虞工商求富益货的含义不同。那种"兴利",事实上是与民争利,是暴夺民间工商业者之利。其次要辨明的是,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本来都是大冶铁家、煮盐家和贾人之子,他们本来属于司马迁所说的"素封"之家,是治产积居,以末致财的人。但这些人一旦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大官僚,他们就成为官工官商,他们就能够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来取得资财和势力,而与匹夫编户的利益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主政之下,告缗令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他们投入封建大官僚的阵营,并且把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也拉到官僚阵营,这就一方面扩大了封建专制国家官营经济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削弱了民间工商业的力量。这是不符合司马迁所说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而为司马迁所反对的。有的同志认为桑弘羊的经济观点,"是商人阶级的观点,特别是富商大贾的商人资本的观点"[2]。这除了作官商观点解释外,是很难说得通的。因为"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3],虽为张汤所献策,武帝所批准,但也有桑弘羊的主张在内,并且桑弘羊是直接主持执行此政策之人,怎么能说他是代表富商大贾的商人资本的利益呢?弄清楚桑弘羊的真正的经济观点,对于理解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卓越性,是极其

---

① 董仲舒也主张"盐铁皆归于民",见《汉书·食货志》上。

②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第76页。

③ 《史记·酷吏列传》。

必要的。必须分辨清楚,桑弘羊的财政经济政策有利于封建专制君主的国家统治是一回事,它是否有利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一回事。恩格斯说:“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①对于汉武帝与桑弘羊所实行的官营经济政策和司马迁对这种政策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应该按恩格斯所提出的原理去理解。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他揭露了汉武帝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走上了扼杀经济发展生机的道路,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及其所以然的理论。他虽然还是在“本富为上,末富次之”的封建经济范围内提出问题和设想,他没有突破“君臣上下之分”,“夫妇长幼之别”的封建教条,但是他提出了封建经济内“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②的这个重要内容,他作《货殖列传》,供“智者”采择行事。他并且看到了封建经济内交换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具有“并兼兹殖,争于权利,去本趋末”的其极则“玩巧”③作用。他虽然不能明确指出这些事物是变革封建经济的内在力量,但他确实看到了“事变”在发生,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④他这些学说思想,对于封建专制统治者以及正统学派,当然是异端,但是对于当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确实提出了积极的和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再者,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

①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②③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若与西欧的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一下，也更可以看出它的卓越性。在西欧的封建社会末期，即在十五世纪末，商人资本积累有了发展，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接着英国、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然法”哲学。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路，认为人们有自利、竞争、自由获取财富的本性，人们也是生而平等的，这些权利都是自然的，不能剥夺的，人们保有这些权利是最合乎理性的，而国家的组织则是社会成员同意以契约形式建立的。这种自然法哲学以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而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所根据的自然秩序理论以及所提出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也是渊源于自然法哲学思想。不能不承认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与西欧自然法思想有共同之处，如认为人们有自利和自由获取财富的本性，国家经济政策应该顺应社会自然发展的原则，以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违反“法自然”原则等。但在时代上司马迁是处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封建主义初盛时期，与西欧思想家处在公元16、17世纪资本主义初期不同。就以商人资本的发展来说，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已经造成工商业者有与封建主对抗的力量，而中国在秦汉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大工商业者，但他们都处于依附封建专制君主的地位，最后都放弃了或改变了他们原来工商业者的阶级属性，而转化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构成力量。在这种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司马迁能突破传统教条，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识增殖财富的必要，提出“法自然”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不能不说他不但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享有卓越的地位，并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认为司马迁“法自然”的经济思想最好不用“自由放任”思

想和政策来比拟和解释，因为后一思想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涉政策的，时代在 18 世纪，晚得多，而中心思想也和司马迁不同。

（原载《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肖　黎

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他的《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撰写《史记》，在评价历史人物和论述历史事件时，势必会直接反映或间接流露出他的政治观念和态度。因此，为了全面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对于他的政治观也就有必要作一番考察。

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空前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司马迁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思想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司马迁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汉代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极力宣扬大一统思想。

汉初，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研究和总结秦灭亡的历史教

训，为刚刚建立起来的刘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除了少数几个有识之士对秦尚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外，大都一味指斥秦的暴政，进而全面否定秦的历史功绩。然而，司马迁却不同凡响，尽管他对秦的残苛大为不满，但对秦统一中国的作用却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秦统一中国这件事，"世异变，成功大"①，"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②。司马迁如此重视秦统一中国的功绩，就是因为他以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来评价历史现象。秦的历史短促，只有十几年，因此容易为一般学者所忽略，甚至不以为然。司马迁为了阐明自己的大一统思想，对于那些"耳食"的学者进行了批评。他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③

"史以道义"，这是中国的史学传统。司马迁之所以高度评价秦统一的功绩，并不是出自于他对秦政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也是为了古为今用。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由此可见，他赞赏秦统一正是宣扬他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统治制造舆论。

司马迁不仅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上体现他的大一统思想，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更加明确地表现出他的这种政治思想。

首先，司马迁赞扬汉初的"削藩"政策。在《史记》中，司马迁曾多次肯定了晁错的"削藩"建议，认为晁错的作为是："敢犯颜色

---

①③ 《史记·六国年表序》。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② 《田敬仲完世家》。

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①]同时,他还歌颂了汉景帝平乱的政绩。他说:“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②]对于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以削弱诸侯的做法,司马迁也表示赞同,并多次肯定。他认为武帝的“削藩”措施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③]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中,司马迁歌颂武帝的推恩令,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他主张天下一统,自然就要鞭挞分裂者,因此,他对淮南王安的评价是:“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④]又如淮阴侯韩信,目前史学界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从“传”中的文字来看,司马迁也是很欣赏韩信的奇才,但从传后的“太史公曰”来看,对韩信破坏统一的行径还是予以否定的。司马迁说:“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⑤]

其次,司马迁对汉的统一政权持肯定态度。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⑥] 经济凋敝,惨不忍睹。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汉武帝时期,经济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平准书》里,司马迁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

①② 《太史公自序》。

③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④ 《淮南衡山列传》。

⑤ 《淮阴侯列传》。

⑥ 《汉书·食货志上》。

间成群。”这里虽然难免有溢美之词，但经济发展很快却是事实。对于汉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司马迁讲过许多，其中谈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司马迁在这里强调了“海内为一”。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而才能“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商业才能得以繁荣。对于政权的统一强盛，司马迁更是备加称颂。他说：“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②

在如何对待汉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也表明了司马迁以汉为正统的民族一统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古籍中，《史记》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了五篇少数民族史传，着重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少数民族史传中贯穿了一个主题，即东南西北各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集杨越以保南藩”，“葆守封禺为臣”，“请为内臣受吏”，这些都体现了司马迁以汉为正统的民族一统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一再宣称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他认为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太史公曰：……余读

① 《货殖列传》。

②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①他认为楚的先祖出自帝颛顼:“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子孙,昌意之子也。”②他把勾践说成是禹之苗裔:“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③司马迁的这些看法,是他以“通古今之变”,研究历史而得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出于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本能,其目的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统一,维护汉家王朝。

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上,也反映出他的大一统思想。据《太史公自序》载,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与子诀别时,曾对司马迁留下遗言:“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表示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撰《史记》的原因时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从这些记载来看,司马迁把宣扬汉朝一统天下的业绩和德政作为己任。

《史记》的五体结构,也体现了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在《史记》五体结构中,本纪是提纲,它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以编年的形式排比了一代大事。至于其他入传的人物,则按照等级分别列入世家或列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

---

① 《吴太伯世家》。

② 《楚世家》。

③ 《越王勾践世家》。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以本纪突出帝王的业绩,以世家、列传记载诸侯人臣辅弼君上的作为,如同众星拱卫北辰。这就从形式上体现了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可见他的用心之周密。当然,这种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即反映了汉武帝时期打击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由于《史记》这一纪传体形式能够表现封建大一统的观念,形象地照映封建社会的严格的等级秩序,所以,《史记》的体例被历代王朝所接受。

二

如何治理国家,这是政治家的天职。认真总结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对古今各代兴亡盛衰的历史进行考察和分析。从《史记》来看,司马迁对治国之道颇有研究,他歌颂汉初的黄老的无为之治,提倡德政,主张贤人政治。

黄老之学出现于战国中期,本来并无多大影响。汉初,却格外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惠帝时丞相曹参提倡"休息无为"①,以黄老之学治国。随之,陈平也"本好黄帝、老子之术"②,"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③。从惠帝、吕后到文景时期的六十多年间,黄老之学被推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也是黄老之学的鼎盛时期。

汉初的黄老之学,并不是战国时期黄老思想的翻版,而是新

① 《曹相国世家》。
② 《陈丞相世家》。
③ 《外戚世家》。

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鉴于秦亡的历史教训和汉初百废待兴的形势下而提出来的一种治国药方。黄老之学“无为之治”的内容,从《史记》的记载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无事”;二是“无言”。《曹相国世家》载:“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拘束。……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府中无事。”这里讲的“无事”,并不是没有事情或不干事情,而是指不要干涉或少干涉一些事情,以达到“刑罚罕用”、“天下晏然”之目的。[①] 如曹参相齐时执行“勿扰狱市”的经济政策,就是“无事”的一种表现。由于对集市贸易活动采取不干预的政策,因而收到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的效果。从表面看来是“无事”,实际上是为了排除外界的干扰,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战略。关于“无言”,《万石张叔列传》集中体观了这个思想内容。传中载:“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又云万石君少子庆“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周仁“为郎中令,终无所言”。卫绾“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所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这些人都是“不言而躬行”者,以达到“不教民而自化”的目的。因此,深得司马迁的爱慕。他在传后说:“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从这段评论可见,“无言”的目的是“不肃而成,不严而治”。所以说,汉初的黄老之学既不同于道家的保守、消极,也不同于法家的苛法暴政。所谓“无为之治”,就是要求在遵守封建秩序的基础上,上下循法,各处其位,各司其事,以达到“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之目的[②],即缓和阶级矛盾,

① 《吕后本纪》。

② 《汉书·刑法志》。

巩固封建统治。

汉初以黄老的“无为之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出现了史称“文景之治”的“盛世”。所以,司马迁对黄老的“无为之治”非常欣赏,并为之讴歌。曹参是推行黄老之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①。百姓歌颂曹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宁静,民以宁一。”②司马迁在曹参传后的评论是:“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司马迁对于孝惠、吕后也是从他们实行黄老的“无为之治”进行评价的,他说:“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

提倡德政,这也是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内容之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由于秦亡的历史教训,迫使当时的思想家不得不对法家的严刑酷法的治国之道进行认真的思考。因此,统治阶级转向以怀柔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治国之道,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所以,长期被冷遇的孔孟的德政学说逐渐开始抬头。

司马迁是一个富于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子的进步思想,认真总结古今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他重视德政思想,一再论述仁义的重要。他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

①② 《曹相国世家》。

③ 《吕后本纪》。

要之以仁义为本。”[①]他还说:“《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②]他又说:“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③]这里讲的仁义,主要是强调诸侯要“以仁义为本”,不要犯上作乱。但从中却也反映出司马迁重视仁义,提倡德政的政治观点。

在具体撰史时,司马迁十分强调德政,并往往以此作为评价治国得失的标志。司马迁在《陈杞世家》对舜的德政进行了颂扬,他说:“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司马迁更加推崇召公的德政,他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④]。在《燕召公世家》篇后,司马迁又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对于汉初的政治,司马迁认为是德政,每每加以赞颂。如汉文帝是施行德政的代表人物,司马迁说他“专务汉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⑤]。在传后又写道:“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他还说:“汉兴,孝文施大德,无不怀安。”[⑥]对于施仁治,德政的官吏,司马迁也是大加赞赏,并立《循吏列传》表彰他们的

---

①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②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③ 《惠景间侯者年表序》。
④ 《燕召公世家》。
⑤ 《孝文本纪》。
⑥ 《孝景本纪》。

德政。他认为,这些"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①。他记载孙叔敖的德政时说:"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②

司马迁歌颂德政,自然就要鞭挞暴政。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暴政,他无不发出愤慨之情。对于历史上法家的功绩,司马迁还是有所肯定的,但对其严威酷刑却表现了他的不满。他说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③,评韩非"其极惨礉少恩"④,论商鞅时,说他"天资刻薄"⑤,写李斯则云"严威酷刑"⑥,从笔端中流露出他对法家的憎恶之情。司马迁对汉代的酷吏并不是完全否定,然而对他们的残苛也表现了愤怒。因此,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说郅都"严酷",宁成"其治如狼牧羊",周阳由"暴酷骄恣",赵禹"用法益刻",杜周"暴酷"等。

在对蒙恬的评价上,更加清楚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德政思想。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⑦司马迁批评蒙恬"轻百姓力",不能做到"振百姓之急,养老

① 《太史公自序》。

② 《循吏列传》。

③ 《孙子吴起列传》。

④ 《老子韩非列传》。

⑤ 《商鞅列传》。

⑥ 《李斯列传》。

⑦ 《蒙恬列传》。

存孤”,反而对百姓实行虐政。所以,他说:“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司马迁以天理难容的报应思想,鞭挞不实行德政的蒙恬。

德政与尚贤是联系在一起的。司马迁既然提倡德政,因而也就主张贤人政治。中国尚贤思想由来已久。孔子在德政思想中就提出过举贤才的主张。但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墨子。他在《尚贤》篇中已经阐明了“尚贤者,政之本也”的思想。到了汉初,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接受了尚贤的主张,并极力宣传贤人政治。其原因有两个:第一,许多思想家认为,赵高专权,屏除贤才是秦灭亡的原因之一,因此主张举贤才;第二,汉初统治者大都出身卑微,又都是在秦汉之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在实践中认识到贤才的重要。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提倡和支持尚贤思想。

作为思想家,司马迁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逐步加深;在“通古今之变”的思考中,司马迁对贤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理解得十分深透。他在《屈原列传》中记述了楚怀王不任贤而轻信小人的谗言,结果弄得国破身亡的史实之后,发出了这样的议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司马迁在这里说,人君虽然有“求忠”、“举贤”之意,然而却落了个“亡国破家相随属”的结果,原因就在于人君在用人上有问题,“忠者不以为忠,贤者不以为贤”。从历史教训中,阐明了他的尚贤主张。

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的“太史公曰”中，对勾践、范蠡进行了歌颂。他说：“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重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司马迁把贤才和国家的强弱盛衰联系在一起。他还借刘邦的口阐明了他的得贤才者得天下的思想。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遗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贤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①通过古今许多重用和排斥贤人的经验和教训，司马迁得出了结论：“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②由于司马迁对贤人政治的重视，对现政权在尚贤方面又有所想法，故他又发出这样的慨叹：“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③

三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阐明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说明了对战争的态度也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在秦统一以前，经常发生战争。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纵横交错。这些战争无一不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因此，司马迁在撰史中对古往今来的战争就要作出论述，形成了

---

① 《高祖本纪》。

② 《楚元王世家》。

③ 《匈奴列传》。

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和认识。司马迁在《律书》中对战争有很精辟的论述,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他对战争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首先,司马迁认为战争是"情性之理"。他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司马迁是从为了生存而竞争这一角度去认识战争,因此他说战争是"情性之理"。这种认识显然是肤浅的,但也存在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合理内核。所以,对司马迁关于战争的认识应给予适当的评价。

其次,司马迁认为战争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战争,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什么是正义的战争呢?他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都是圣人所作,当然是正义战争。他还在书中举例说:"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这些战争都是能做到"用之有巧","行之有顺",是圣人之作,符合天理,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呢?即指"用之有拙","行之有逆"的战争。司马迁说:"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绁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他认为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的战争均为非正义的战争。司马迁的这些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战争抱什么态度,"世儒"都侈谈什么"德化",司马迁在《律书》中予以尖锐的批评。他说:"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

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势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司马迁并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于诛暴一类的正义战争，他是支持和赞同的。所以他反对“世儒”那种“阇于大较，不权轻重”，一味强调“德化”，不主张用兵的主张。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其结果只能是丧权辱国。因此，他强调“诛伐不可偃于天下”，但要注意“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

司马迁反对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战争，主张和亲政策，这是他对汉政权对匈奴战争的态度。

汉朝以来的和亲政策是被动的，但却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司马迁为之赞颂。在《律书》中，司马迁说汉文帝与匈奴“结和通使，休宁北陲”，“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对于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作战，他是不满意的，在《史记》许多篇中都有流露。在《匈奴列传》中，他详细地载述了汉匈之间的多次和亲带来的后果，“通关市”，“无大寇”。在传后的“太史公曰”里，他还讥讽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建功不深”。在《酷吏列传》中，他还记述了博士狄山与酷吏张汤在对待匈奴的战与和的辩论。狄山说：“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这个记述是符合司马迁的思想的。司马迁反对穷兵黩武、贪得无厌。他在《平准书》中列举了许多因征伐匈奴而引起的弊政，如：“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而汉军之士

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连年战争,把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财富耗费已尽,人马大量死亡,法制的严酷,因而政治上也是动荡不安。这样的现实与汉初和亲政策带来的北方的安定,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的历史,司马迁自然是赞同和亲政策的。联系他的歌颂黄老的“无为之治”,提倡德政,主张贤人政治的思想,对匈奴主张和亲政策还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与他对战争的态度“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是一致的。

(原载《北方论丛》1983 年第 5 期)

司马迁的礼乐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华友根

司马迁推崇孔子与其弟子、孟子、荀卿,以及汉初的叔孙通、陆贾、伏生、贾谊等儒家学者,更以汉代孔子——董仲舒为师,而学《春秋》公羊学。又好调查研究,到全国各地考察,特别是详细考察和瞻仰了孔、孟家乡的古迹、礼器、遗物,并“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因此,非常重视礼乐仁义。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史记》,其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礼乐思想。对于司马迁,过去大多称他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很少谈他的礼学思想。实际上,他也是个著名的礼学家。他对礼、乐以及与礼密切相关的法,均有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礼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

首先是关于礼的产生、内容及其作用。司马迁认为礼是根据人的情性而定,所谓“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就是“礼由人起”。司马迁之所以如此说,这是因为“礼”就是养,所谓“礼者养也”。在他看来,人从母亲腹中生下来就有其需求欲望,有需求欲望而不能得到,则不可能不恼怒忿恨,恼怒忿恨而超过限度,必然发生纷争,有纷争则混乱不安,社会的正常秩序将遭到破坏。

为此,先王怕其混乱而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故制定了礼义,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这就是"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①。

礼不仅是养人的,而且是有等级、差别的,即"君子既得之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因此,"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②。

因礼是分尊卑贵贱差别的,所以立礼行礼必须从本。如创业之王为太祖以配天,而王之子孙为诸侯者不敢思祀其父祖;但作为诸侯——别子之后的士大夫,则以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如此则贵贱有别,而"贵贱治,得之本也"。所以,天子得祭天,而诸侯以下至大夫得祭社。这也是"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为了立礼行礼从本,司马迁特别提倡荀子说过的"礼有三本",并且指出:"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③又说:"礼者,人道之极也。"因而不法礼不足礼者,为无道之民,法礼足礼者为有道之士。如人不但能思念礼、维护礼,并更加爱好礼,那么就成为圣人,所以说:"圣人者,道之极也。"④《史记正义》注曰:"道谓礼义也。言人有礼义,则为圣人。"关于圣人,司马迁还说:"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⑤《索隐》注曰:"言徘徊周浃,委曲得礼之序,动不失中,则是圣人之行也。"除了圣人、无道之民、有道之士之外,又谈到君子、士、民(《索隐》称为小人)。他说,处平凡人域之中,能知礼义之域限,即为士及君子。特别是君子,心内常守

①②③④⑤ 《史记·礼书》。

礼义,如常守宫庭。而在礼义外,别为它行,即是民(小人)。这是司马迁根据人对礼的认识、实践的不同,而分为圣人、君子、士、民等,而且认为,这种养人、从本,社会各阶层对它认识不同,而尊卑贵贱有别的礼,是十分重要的。从个人来说,司马迁指出,如贪生好利而无礼的人,必至于"死"、"害"、"危"、"灭"的境地。而重义轻利、勤勉尚礼之人,必能养其"生"、"财"、"安"、"情"。所以,"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①。这也就是所谓"儒者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儒家以礼义养人欲、节人欲,故礼义、人欲"两得之";而墨家只依人的情性,而一味贪生贪利,又不尚礼义,所以是礼义、人欲"两失之"。

从国家与天下来说,他认为,如用礼义来治国,必然四方钦仰,没有战乱攻伐,安定太平,所以是强大而坚固之本。如用礼义来导引天下,必然天下归顺,即所谓"威行之道"。如用礼义以为天下表率,则天下必遵循向慕,即所谓"功名之总"。因此,"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②。

至于礼义对于维系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则显得更为重要。司马迁曾以在他看来是"礼义之大宗"的《春秋》来给予说明。他说,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也就是"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

①② 《史记·礼书》。

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1]。即必然导致不忠不孝和犯上作乱。

强调礼的重要和作用的同时,他又认为,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2]因此,礼是根据人的情性而定,可以养人、治人、治家、治天下。它既讲区别,也是可变的。

二

其次是关于乐的由来、内容及其意义。说到乐的由来,司马迁认为,乐是由音而起。而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所以被触动,是由外界善恶之事影响所造成的。一当外界哀乐喜怒和敬等事感人而动,则必见之于声。因单声不足,故变杂五声,使交错成文,乃谓之音。而"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3]。所以,乐原初就是人心为外界事物感触而生。为此,若外界痛苦,则其心哀戚,哀戚在心,故乐声踧急而杀。若外界美好,则其心欢乐,欢乐在心,故乐声必随而宽缓。若外界乖失,故己心怒恚,怒恚在心,心随怒而发扬,故无辍碊,则乐声粗而严厉。若外界怜慕,故己心爱惜,爱惜在内,则乐和柔。

既然声是随外界事物的不同而变化,所以由声"成文谓之音"的音,也与政治的好坏、社会治乱等外界相关。这是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

①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史记·乐书》。

民困。声音之道,与正(正同政)通矣"[1]。如何来说明音的变化与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相关呢?他把五音中的宫比拟为君,商比拟为臣,角比拟为民,徵比拟为事,羽比拟为物。如果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用,不相坏乱,则五音之响无弊败。如果宫乱,则其声放散,这是由君的骄溢所致。如果商乱,其声敧邪不正,这是由于臣的不尽职守所致。如果角乱,其声忧愁,这是由于政虐民怨所致。如果徵乱,其声哀苦,这是因为徭役频仍,民不得休息所致。如果羽乱,其声倾危,这是因为君赋重民贫乏所致。这样,由于宫、商、角、徵、羽等五音不和,则君臣上下互相侵陵踰越,所以国之灭亡也就在眼前了。

因为声、音与社会政治相关,所以乐也是如此。司马迁说,先王制乐,并非是要满足人的耳目之娱的要求,而是要教民平于好恶之理,去恶归善,反归人之正道,以通晓人伦道理,使各尽其类分。因此,"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2]。并且,也只有知政而通于伦理的君子,"为能知乐"。

因乐当通人伦道德,所谓"乐者,所以象德"。所以,在司马迁看来,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实是怀念父母养育自己的恩德。也是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风》诗,以教天下行孝。而夔为舜作乐,是为了赏诸侯之有德者,也所谓"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3]。又说,因乐象德,故乐为外,德为内。金石丝竹,为乐之器。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志、声、容三者本于心,然后诗、歌、舞

①②③ 《史记·乐书》。

可观,于是“乐气从之”。为此,乐是内外符合而无虚假,所谓“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①。

同时,司马迁也赞同子夏所谓新乐、古乐、德音、溺音之分,说古乐是俱进俱退,整齐划一,没有奸声;弦匏笙簧皆待拊为节;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整其乱行,节之以相,赴乱迅疾,趋之以雅,修身治家,平均天下。新乐是进曲退曲不齐一,奸声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短人弥猴相舞,乱男女尊卑。所以,古乐是雅正之乐,而新乐是淫乱之乐。

而德音是在天地顺四时当、君臣父子夫妇纲纪正、天下安定的情况下,“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②的体现。而溺音是“淫于色而害于德”,如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即是。这种溺音淫声的出现,与世乱有关。因为“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所以,在司马迁看来,好滥淫志的郑音、促速烦心的卫音,都是乱世之音,而殷纣王使师延所作长夜靡靡之乐的“桑间濮上之音”,是亡国之音。

乐又可分为君子乐与小人乐。他说,君子乐在行仁义,而小人乐在得邪淫。如以君子乐用仁义以制小人之欲,则天下安乐而不敢为乱。若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则小人肆纵其欲,忘其正道,而天下从化,皆为乱惑,不得安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③。即如行君子之乐,则天下之民皆慕仁义而崇道德。

因此,乐是人所不能缺少的,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极关

①②③ 《史记·乐书》。

重要。因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①。所以,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而“将欲为治也”。因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这是五音与五常相连,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体现,当然最有利于治国理民。因为,“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②。

三

礼与乐的相异及其近似和一致,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礼乐之相异,司马迁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这也就是,为人在中,和(和在心)有未足,故生此乐;为人在外,敬(敬在貌)有未足,故起此礼。所以,乐在和心,在内,故静;而礼肃人貌,貌在外,故动。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即乐使天下和合,是为同;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故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所以,礼义立则贵贱有等级;乐文同则上下并和。司马迁还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即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即帝王创业成功则作乐,天下太平安定则制礼。“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即乐能明太始是法天,礼能成万物是法地。“乐

① 《史记·乐书》。

② 《史记·乐书·太史公曰》。

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即乐之所施人,本有和爱之德,而礼之所施于人,本在止邪淫过失。"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理犹事)之不可易者也",即以乐主情,乐变则情变;礼主事之别,故云事之不可易。"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①]

同时,礼乐不仅有不同,也有相近似和乐包括于礼中,并相互一致。如"知乐则几于礼矣"[②],《史记集解》引郑玄注曰:"几,近也。"又如"礼者养也",礼有五养,其中"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③]。所以,乐也是养人之需,当属于礼的一部分。另外,像行丧祭之礼,也需要乐器与乐歌相伴,所谓"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悬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④]。又说,乐当需礼的调节。如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这就是,民有丧则先王制衰麻哭泣之礼以节之,使各遂其哀情,是"礼以哀之"。民有庆必歌舞饮食,祭祀之礼使不为过,而各遂欢乐,是"礼以乐之"。因此,哀乐虽反,皆用礼节,各终其分,故说皆以礼终。

司马迁还认为,礼乐也是一致的,所谓"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⑤]。而且,礼乐都为了约束、抑制自己,所谓"谦退为礼","损减为乐"。

礼是使"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而作乐器大小称十二律,始于宫,终于羽,宫为君,商为臣,也使"亲疏贵贱长

---

①②③④⑤ 《史记·乐书》。

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①。可见,礼也好,乐也好,都是为了使尊卑上下秩然有序。

礼乐都主张适时、合宜,所谓"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②。

所以,如将礼乐结合在一起的话,则意义更为巨大。因乐近于仁,礼近于义,如行礼乐,而以仁爱之,以义正之,那么,则民顺理而正行。故"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③。

对于每个人来说,礼乐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乐能治心,礼能治身,身治则庄敬,心治则和人。如心中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如身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矣"。所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特别是对于天子、诸侯、公卿大夫等"君子"来说,更是如此,所谓"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④。

四

礼与法有什么不同,两者关系又如何呢?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一开始就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上述乐近于仁、礼近于义,而刑罚显然是属于法制,故与礼乐相近的仁义,主要是在加以引导,即所谓"诱进",而属于法制的"刑罚",则是为了束缚与限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礼乐仁义加以教育、诱导,也就是事故未发生之时,当用礼义教育。而事故发生之后,礼义教育已经来不及,当用法制惩罚,即"礼禁

①②③④ 《史记·乐书》。

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①。治国理民,应当先礼乐而后刑罚。在司马迁看来,如行这种先礼后刑,就能使罪犯知罪伏刑,所谓"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②。

当然,对于治国理民来说,礼乐仁义比之法令刑罚更为重要。司马迁认为,正像孔子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有耻且格"。也像老子所说,法令禁网越加严密,民更要违法乱纪,而"盗贼多有"。所以,法令刑罚只是"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③。因此,礼乐等德教,才是治国理民而使天下太平的根本。

但他又指出,要使天下大治,是当以礼乐德教为主,然而法令刑罚也不可缺少。因为"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④;以及法不仅可以禁奸,也可以导民,即太史公所曰:"法令所以导民,刑罚所以禁奸也。"⑤法无疑也是天下一切事物的规矩和准绳。他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⑥

为此,司马迁极其称述汉初萧何制《九章律》、张苍定律历章程。他说,萧何因照《九章律》办事,故天下太平。而张苍绪正律历,"吹律调乐,人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⑦。因而,称之为"汉名相"。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礼书》。
③ 《史记·酷吏传》。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 《史记·循吏传》。
⑥ 《史记·律书》。
⑦ 《史记·张丞相传》。

同时他认为,兵是刑的一种,所谓“大刑用甲兵”,也是不可少的。他说,兵与刑一样,与礼乐是相辅而成的。只有互相配合,才可以治天下,并指出,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而兵之不可少,这是因为,使用“兵械”,是“百王不易之道也”①。所以,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

在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前提下,礼乐仁义与适当的法令刑罚,对于治国理民都是必须的。他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②并认为,礼义立则贵贱等,乐文同则上下和,好恶著则贤不肖别,刑罚禁暴,则政治均平。诱之以仁义,约之以刑法,则可“总一海内而整齐力民”。

五

上述可见,司马迁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礼乐的产生,礼乐的含义,礼乐的要求、作用、意义与影响,以及礼乐的不同与异曲同工,礼法的区别与密切关系。在他看来,礼、乐、法,形式有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一致的,是要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情况下,约束、限制人的心理、外表、思想、行为,以承认既存的差别、秩序,而维护封建统治,即所谓“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③。

其中对礼的认识,司马迁认为,礼是要限制、约束自己。既要

① 《史记·律书》。
② 《史记·乐书》。
③ 《史记·礼书》。

承认人有等级、有差别、有贫富、有轻重,也应该有自己的要求与欲望,如食、衣、住、行、听、视等,但要适当。必须以礼节欲,使礼义、人欲“两得之”。这既维护了礼,又基本上满足了人的要求。这样也就可使之安于生产、生活和维持正常的人间关系,而不致产生其他动乱。如礼义要求过高,或人欲要求过高,势必导致“两失之”,必然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么,人心不安,社会动乱,既谈不到礼,也无法满足人的欲望。这是对礼的比较客观的认识,比之其师董仲舒仅仅作为“节民”而讲差别、等级、安情防乱,要更加切合实际。

依对礼的认识程度分为圣人、君子、士、民,实际上是三等:圣人为“人道之极”,是委曲得礼之序,动不失中;君子与士是凡人中能够知礼义守礼义者;民为“外是”,即礼义之外,别为他行者。这些是董仲舒“性三品”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不过是把其所说的“中民之性”中的庶人、小人,以及“斗筲之性”合在一起,称之为民。因为董也曾称之为“诸斗筲之民”。这扩大了不遵守礼义的人,即在礼义范围之外争利贪欲之人。在司马迁看来,一个社会中,能知道并遵守礼义的人,可在礼义范围内活动的人,要比董所想象的要少得多。

关于乐,司马迁认为乐(包括声、音)与政治、五常有关。五音中的宫比之君,商比之臣,角比之民,徵比之事,羽比之物。乐关系到宗庙、乡党、家庭、朝廷,也关系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谓“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而五音中宫正圣、商正义、角正仁、徵正礼,羽正智。也就是五音与五常相关。所以在他看来,乐也是一种礼,既反映了君臣民的关系,也是五常的体现。他又把乐分为君子乐、小人乐、新乐、古乐、德音、溺音。君子乐就是

古乐;德音即雅颂正音;小人乐就是新乐;溺音是郑卫之声、桑间濮上之音,即淫乱之乐。这是礼方面分圣人、君子、士与民在乐方面的反映,所以乐完全是服从于礼的。因此,司马迁既主张礼乐有不同,但又相近似,往往异曲同工,殊途而同归,乐包括在礼之中,又是仁义德教的体现,也说明了古乐和古礼往往是一致的,但又把郑卫之声作为淫声批评,而武帝时已是"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①。所以,仅仅是对臣民的严格要求,也反映了司马迁思想上的保守。

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发展了董仲舒的仁义思想。董说,仁是爱人,义是正己。但乐变民风,礼以节民(即节民以礼),礼乐是对所有人的。而司马迁认为,乐近于仁,礼近于义,以仁爱人,以义正之。这是说,乐主要是对别人的,礼主要是对自己的。所以,比之董仲舒对人更宽、对己更严。

关于礼法关系,司马迁主张"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乐仁义比法令刑罚更为重要。又说,法不仅可以禁奸,也可以导民;礼乐刑政缺一不可。并主张刑不上大夫,所谓"《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②。也主张礼不下庶人,即所谓"外是,民也"。这些是德主刑辅思想的反映,也是《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周礼》"八议"思想的体现。当然,也是贾谊这方面礼学思想的发展与提高。

而关于法,司马迁认为法是规矩、准绳,律为"万事根本",应

---

① 《汉书·礼乐志》。

② 《汉书·司马迁传》。

该是汉初张苍绪正律历、吹律调乐、比定律令,“天下作程品”的发展,也是进一步重视法制的体现。同时,又探讨了兵刑关系,认为兵是刑的一种。这些认识,不仅在当时有其意义,在以后的历史上也有其深刻的影响。如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念念不忘司马迁所说的“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称之为“善哉言乎!”并认为“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①。明确指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而“律为万事根本”②。

至于从哲理上来说,司马迁认为“礼由人起”,礼义是根据人的情性而定。而性与情又怎样来的呢?司马迁没有谈及。但与礼相近似,并有异曲同工的乐,他认为是“人情所感”③,由音而起,而音“由人心生”,而人心之所触动,是由外界善恶的影响所造成,故乐原本就是人心为外界事物感触而生。可见,在司马迁看来,礼乐是由外界事物干扰、触动人心而产生的。所以,礼乐这种社会意识,显然是由外界的物质决定的,这是很唯物的。礼是讲损益、变化的,所谓三王不同礼,古今礼有变。乐也一样,认为五帝不同乐。而且,礼乐的使用要适宜、得当,即注意时间、条件,并有分寸。乐不能极度,礼不能太简,所谓“乐极则忧,礼粗则偏”。也就是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礼乐不能僵化凝固,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礼乐对于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但要适时、恰当。这体

① 《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
② 《历代刑法考·律令一》。
③ 《史记·太史公自序》。

现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司马迁无论对礼乐的认识，或者是对礼法关系及兵刑的认识，虽有保守和礼法面前不平等的思想，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切合实际的想法与主张，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礼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原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8期）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周文玖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但对与他同时代的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却重视不够。有的人即使看到这一点，也不愿承认，似乎“大一统”是董仲舒的思想专利，大一统思想也因此常常与腐朽、落后紧密相连。事实上，大一统思想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社会思想，在当时的历史人物身上特别是思想家那里都有所反映，所以，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通过解《公羊春秋》而阐发的，而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则是通过《史记》表现出来的。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二人的大一统思想内容也不尽相同，本文旨在剖析一下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一　通史意识，大一统思想在史学上的反映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从远古到当代的通史呢？这也涉及许多因素，但在这许多因素中，司马迁所处的那个伟大的时代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个时代的特点，司马迁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中云：“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这样一个大一统时代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很自然的是

大一统思想。撰写通史著作,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历史学家那里的反映。《史记》虽然是司马迁完成的,但其父司马谈早就有此想法。司马迁写《史记》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完成父业。但不论司马谈,还是司马迁,他们的这一思想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可见,撰写一部历史巨制,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负有时代使命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完成这一重任。司马谈父子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以此为己任。这种自觉意识表现在撰写史书上,就是"通史意识"。

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三千年来出现了许多历史大动荡,如商汤伐桀、武王讨纣、"周道废"、秦的统一、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以致"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自序》)。经过楚汉战争,最终实现了汉家统一。三千年里,出现了许多的战争,有中原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长期的战争,中原各民族间的战争,战国时期各国的战争等。历史变化纷繁复杂,头绪繁多,但司马迁并没有被这众多的历史现象所迷惑,而是抓住历史的主线,将三千年的历史线索条理得非常清晰。他设立《五帝本纪》,确立了历史发展的源头:"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自序》)《五帝本纪》之后,又有《夏本纪》、《殷本纪》等十一本纪。为什么设立本纪呢?司马迁讲得很清楚:"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自序》)即是说,十二本纪的目的,是"科条"历史线索,"科条"的标准是根据"王迹所兴"。本纪,其实是一种编年体裁,但这种编年体和通常所说的

编年体有所不同,它是以某个人物为中心的编年体,因此。十二本纪实际就成为以帝王为中心的三千年历史发展的纲。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严格按照"王迹所兴"的事实设立本纪,为此,他为项羽、吕后都立了本纪,没有被所谓"正统"观念所拘限,这反映了他的实录精神。《本纪》之外,第二部分是十表。《自序》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表的作用就是要从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理清历史发展的轮廓,这是对《本纪》的进一步补充。司马迁在十表前,为前九表都作了序,用简练的文字介绍了该阶段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特点。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司马迁把三千年的历史线索、盛衰大势展现出来。

司马迁把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源头,把从黄帝到武帝时期的历史过程,写得如此眉目清晰。他确定了历史发展的源,这个源后来分成数流,几经周折,又汇成一流,形成海内一统的局面,这种追本溯源,对于促进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及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用很大。可见,"通史意识"既是大一统思想在史学上的反映,也是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需要。

二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史记》中,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大一统思想。《史记》是一部通史,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民族一统的思想非常明显。首先,它揭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从《三代世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夏以前的五帝时期,黄帝以下的四帝:颛顼、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项是黄帝的孙,喾是黄帝的曾孙;从黄帝到尧是五世,舜是黄帝玄孙之玄孙。三代时期,夏

代的禹是黄帝的耳孙,殷代的汤也是黄帝的后裔;从黄帝至汤十七世。周代的武王还是黄帝的后裔,从黄帝到武王十九世。从黄帝时期到周代,有许多部族在不同的地域里活动,如夏、殷都在中原一代,周族在西部活动,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始祖。到周代,通过分封制,疆域更加广大了,出现了许多封国,这些封国有同姓,也有异姓,但不论同姓还是异姓,追本溯源,都能追到黄帝那里。到汉代,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司马迁认为也是黄帝的后裔,他说:“匈奴,其祖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司马迁的这些记载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他如此详尽细致地理清这些世系渊源,反映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出一源。这一思想其实也是当时不同地域众多人的思想倾向,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论赞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司马迁把黄帝作为历史的源头来写,也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调查的基础上的。

其次是民族等列思想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因素。《史记》记载了许多民族的活动,但最主要的还是华夏民族。十二本纪基本上是华夏民族历史的纲目。在汉朝时期的多民族中,司马迁很明显地把中原民族摆在了中心位置。但在写华夏民族的同时,他还写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写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对汉朝周围的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都进行了论述,记述了这些区域上的民族、地理特点、物产、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简要地讲了为它们设立列传的原因,指出它们与汉朝的关系,如:“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

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其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这说明,这四国都已向汉称臣纳贡。北方的匈奴,长期以来一直威胁汉朝,与汉朝关系比较紧张,武帝时期,多次派大军远征匈奴,故司马迁把《匈奴列传》放在《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写。大宛与汉朝的关系就稍微远一些,但汉朝对它来讲,依然有向心力。"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汉朝由于政治上空前统一,加上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无疑给周边少数民族一个向心力,他们对汉称臣,向汉朝进贡,是汉王朝的藩属国。司马迁对汉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及主臣关系的记载,反映了他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等列思想。但他的这种思想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观念,没有对少数民族的卑视,相反,常常从历史渊源上,找到与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对于匈奴,他也不主张过分使用武力,主张实行安抚及和平相处的政策,这一点从《匈奴列传》、《平准书》等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反映了司马迁在民族等列思想中还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因素。

(二)疆域大一统思想。历史是一部活剧,既有演员,又有舞台。司马迁把这个舞台描绘得非常宽阔壮观。汉朝到武帝时期,达到空前的强盛。西汉王朝的疆域,也是空前地辽阔和统一。这为司马迁著《史记》打开了广阔的视野。早在周代,疆域大一统思想就很明显,周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这种大一统思想的典型反映。春秋战国的战乱中,周天子的大一统思想土崩瓦解了,西汉统一后,大一统思想又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不论司马迁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史记》从史学的

角度宣传了这种大一统思想。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对五帝的活动范围进行了叙述,歌颂了他们统一“中国”的功业。如黄帝时期,“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帝颛顼时期,其活动范围则是“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物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帝喾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帝尧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舜时,“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最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皆见《五帝本纪》)。也就是说,到帝舜时,九州之内开始纳贡,产生统一国家的雏形。《夏本纪》基本讲的是疆域和贡赋。夏禹在建立统一国家方面,功劳最大,司马迁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夏本纪》)司马迁通过《五帝本纪》、《夏本纪》,描述了华夏民族祖先的活动范围,说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为汉朝疆域的大一统提供了历史根据。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像司马迁这样把中国疆域讲得这样详尽和完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大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山东地区、江南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地区,并分别论述不同地域的地理特点、物产、经济特点、风俗习惯等。他还指出关中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的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全国的十分之六。《史记》以汉朝统治区域为写作中心,在此前提下,还写了汉朝周围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

(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这种对比写法,固然是为了写出汉代盛世的恢廓局面,但也明显地反映出他以汉朝统治区域为中心,周边少数民族区域为之向心的疆域大一统思想。

总之,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疆域大一统的合理性,又从社会学的角度,描绘了汉代疆域大一统的具体图景。

(三)政治大一统思想。司马迁的政治大一统思想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他赞成统一。秦亡汉兴,很长时间,秦始皇是人们抨击的对象,许多人把他骂得一无是处,可司马迁对他统一中国却给予了肯定。"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序》)。他还耻笑那些儒生看不到秦在历史上的地位,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六国年表·序》)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极尽赞美,秦始皇共刻石六块,司马迁完整地记录了其中五块的内容,说明他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很重视的。

其次,他论述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六国时期的历史概貌,认为这是一个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但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就是说,秦原来是一个小国,处于偏远地方,中原诸国将它比作戎翟,瞧不起它,然它由弱变强,争雄诸侯,终于兼并天下,为什么?论德,它远不如鲁卫;论武力,不如三晋之强。司马迁这里归因于天,这里的"天"就是指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即是说,天下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秦国顺应了这一必然,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司马迁赞成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从史记体例的编排可以看出。《本纪》记载“王迹所兴”，《世家》记的则是“辅拂股肱之臣”。《列传》写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世家与本纪的关系，司马迁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自序》）即是说，世家所记载的王、臣犹如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一样侍奉皇帝，以使这以皇帝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国家机器运行无穷。司马迁如此突出君主、皇帝的地位，正是大一统思想和封建等级思想在他史学中的反映。司马迁赞同这种思想并把它自觉地贯彻在他的《史记》中。

第四，他主张政治上的一统局面，但在社会思想上，却反对一术独尊。他引用《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其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自序》）就是说，诸家学说虽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治国，只不过有的明确，有的不明确罢了。他与其父的学术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在对学术的态度上大概是相同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把道家说得非常完美，但对其他五家，也没有一棍子打死，既指出它们的缺点，又指出它们的长处。而此时的道德家与先秦老庄道家也不可同日而语，而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形成的“新道家”。司马谈写《论六家要指》的时候，正是汉武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司马谈针对这种思想倾向进行议论，反映了他的不满情绪，司马迁引征它，同样反映了他对已经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不满和反抗。司马迁盛赞大一统，但在政治思想上又主张多元化，多种思想并存，择善而从，这是他大一统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开明得多。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民族、疆域、政治等方面,即在《史记》这部巨著中,历史这部活剧的演员、舞台、组织形式都打上了"大一统"的印迹。这种印迹当然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要求,但更是司马迁社会历史思想的反映。《史记》是一部多民族史的杰作,其"大一统"思想对于华夏民族统一意识的形成,对于维护中国版图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与团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史学上,也开创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

(原载《唐都学刊》第10卷,1994年第6期)

论司马迁的伦理观

王明信

伦理,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史记》是一部史书,其《礼书》、《乐书》,乃后人采《荀子·礼论》、《议兵》及《礼记·乐记》补入,其中有关伦理的论述,不能视为司马迁的东西。但统观《史记》,司马迁则往往通过写人论事,来阐明他所推崇的社会伦理。他的伦理观也因此而得以体现。

1.《礼记·中庸》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是通常所谓"五伦"。《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压卷之作,开宗明义,重点是阐述人间的"五伦"。司马迁对五帝的论述,采取了"但叙其德而不详其事"的写法。他认为,有关五帝的事迹,"著见于百家者,皆非雅驯者也"。[①] 雅驯者采之,非雅驯者不取。这就是司马迁通过写《五帝本纪》表现其伦理观所采取的手法。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 齐景公听了之后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③] 那么,君、臣、父、子,各是什么样子,才算合乎标准了呢?请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黄

---

① 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五帝本纪》。

②③ 《论语·颜渊》。

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描述。

五帝之首的黄帝,司马迁把他看成是聪明智慧灵异的化身,他不仅文治卓越,而且武功显赫:"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打败炎帝,擒杀蚩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显示了他的巨大威力和统一的功德。"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于是"万国和"。他并且亲自主持祭祀,还能推算出未来的朔望节气来。黄帝能"顺天地之纪",教育人民"时播百谷草木"。他的德行不仅"淳化鸟兽虫蛾",而且遍布于"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他"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勤勤恳恳,未尝宁居,是一个标准的君主。

《五帝本纪》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他们都能继黄帝之德,因此,"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五帝之中,司马迁所由衷赞美的是尧与舜,二人都是空前绝后的一代圣人。帝尧,乃帝喾之子。他是那样的伟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是标准的人君。尧命其臣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方和四时之事。他们都努力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人民安居乐业,禽兽滋生繁殖。尧并能确定"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定出历法,授给人民。他进而"信饬百官",使"众功皆兴"。尧为君,不独断专横,君臣关系十分融洽。他爱护百姓,故驾崩之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

以思尧”。特别重要的是,尧选了舜这个理想的接班人。舜被选中后,尧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考验。舜能经得起各种考验,尧以为合格,终于把帝位传给他。从司马迁写五帝的顺序来看,黄帝是伟大的开拓者,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帝颛顼、帝喾,乃是过渡时期,至尧、舜,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这个太平盛世,使人间伦常关系之和谐达到了高峰。特别是舜。具备了人间一切美德。舜是一个孝子、良兄、义夫、忠臣、仁君。舜简直是人世间一个完美无缺的楷模。

舜由一个种田、捕鱼、制陶、作杂物及经营逐利的盲者之子而成为天子,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人间的种种美德。

《五帝本纪》中,首先写舜是一个孝子。其父瞽瞍爱其后母所生之弟象,多次欲害舜。但舜“能和以孝”,“不失子道”,“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因此,“舜年二十以孝闻”。及即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谨,如子道”。次写舜的友爱。其弟象与其父瞽瞍,设下圈套,让舜穿井,舜挖深之后,象与瞽瞍“共下土实井”。象高兴地说:“本谋者象,……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于是象走进舜的住处,弹舜的琴。这时,舜从预先旁开的小洞走出,回家来了。象惊愕万分,不知所措,吞吞吐吐地说:“我思舜正郁陶!”舜说:“然,尔其庶矣!”“复事瞽瞍爱弟弥谨”。践帝位之后,“封弟象为诸侯”。三写舜的夫义。当四岳向尧推荐舜之后,尧为了观察舜的为人,“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舜能正确处理家事。“居妫汭,内行弥谨”。在舜的影响下,二女甘心居于妫汭,“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四写舜的信义对人民的影响。“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不仅如此,舜所居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五写舜能尽

臣道,忠于职守。尧使舜任司徒,向人民宣扬五伦,舜尽心努力。人民都乐于接受;又使舜任各种官职,舜都干得井然有序,又让舜于四门接待宾客,四门一片和穆气氛,“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六写舜摄行天子之政及即天子位的政绩:

1. 舜勤于为治,能按时祭祀天地山川及诸神灵;五年一巡狩;诸侯四年一朝觐,政绩优异者加以奖赏;谨慎地设立各种刑法;建置十二州;疏通了各州的河道。

2. 举贤人,任用高阳氏的后代“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任用高辛氏的后代“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的融洽气氛。

3. 知人善任;以禹为司空,命禹治水,洪水平息了;命后稷教民播种百谷,百谷生长得十分茂盛。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百姓亲密和睦了。命皋陶为大理,皋陶执法适中,“五刑有服”。命垂为共工,“百工致功”。命益为虞,山林湖泽都得到开发。命伯夷为宗伯主礼,人民都懂得礼让。命夔为典乐,教育贵族子弟,他能使之“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夔用轻重不同的手法击石磬,甚至连野兽也跳起舞来。命龙为纳言。宣布政令,转达下情,要龙一定做到信实。舜对许多臣子都安排了适宜的职务,对他们说:“敬哉!惟时相天事。”并规定“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

4. 除四凶:“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舜为天子,出现了太平盛世。各地“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各方奇异之物都进献于国中,凤凰也飞翔而来,天下人人颂帝德,举国上下一片和谐气氛。君像君,臣像臣,五教敷行,百姓亲密礼让。在

司马迁的笔下,那时的社会简直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根本原因,就是人君有德。人君之德,在《五帝本纪》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人君不以天下为私有。让贤不让亲。其二,人君以孝悌为先,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三,人君能任贤人,远佞人,尧、舜都为后世君主做出了榜样。其四,人君不独断专横,有一定的民主作风,五帝都具有此德。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虽然对黄帝、颛顼、帝喾也都作了赞颂,看去都是美好辞藻的堆砌,只有对尧、舜的赞美,才有具体内容。拿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论述的人间伦理及对尧、舜的赞美,与儒家经典所载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司马迁的伦理观点。

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①]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②]《左传·文公十八年》太史克回答鲁宣公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他说:圣人(指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③]。又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④]"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大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

① 《论语·泰伯》。
② 《论语·颜渊》。
③ 《孟子·滕文公上》。
④ 《孟子·离娄上》。

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谓之大孝"①。"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②。《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甚至《管子·八观》亦说"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等等。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目的,在于宣扬五帝之功,使之流芳百世,为后世君主做出榜样。

司马迁赞美五帝之德,颂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关系。他写《五帝本纪》,取材十分谨慎。本来古代关于五帝的传说很多,但不合其观点者,一概不取。《五帝本纪·太史公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所以,便于众说中"择其言尤雅者"来写《五帝本纪》。如,"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段,是说在舜的德行的影响下,改变了当地的民风,取材于《韩非子·难一》。司马迁取了它,显然,这就是"尤雅者"。《韩非子》一书,记载尧、舜、汤、武之事很多,如,《韩非子·忠孝》说:"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瞽瞍为舜父,而舜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孟子·告子下》。

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这一段,悖乎儒家伦理,不合司马迁的观点,故其不取。显然,此乃"不雅驯者"。

司马迁宣扬儒家的伦理观点,赞美儒家的伦理,《五帝本纪》作如是观,一部《史记》亦可作如是观。《史记》于其他篇章中,赞扬此种伦理之处甚多,兹不一一论述。

司马迁不仅赞美、宣扬儒家的社会伦理,并且也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显然,他认为这是一种规范的道德。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说:"儒者……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位大力宣扬道家思想的司马谈,对于儒家所倡导的社会伦理,也是肯定的。这种伦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的影响之深,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为其他学派的学说所无与伦比。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社会伦理。在此漫长的岁月中,虽然也曾有一些优异特立之士,反对这种传统的社会伦理,但始终未能动摇它。实际上,儒家所宣扬的"五伦"也好,"十义"也好,最为人们所注重的还是忠与孝。司马迁对儒家伦理的身体力行。也突出地表现在忠与孝这两个方面。

先言其忠:司马迁在继父任太史令后,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他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①]不久,便发生了李陵战败投降匈奴的事。当"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的时候,司马迁欲"效其款款之愚","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想

① 《报任安书》。

替李陵说几句“公道”话。还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汉武帝便以为他“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司马迁自己叹息说“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①受了宫刑。可见,受宫刑是由于尽忠言不为皇帝理解所致。虽然如此,臣对于君,仍然是要尽忠的。

汉王朝建立后,过了七八十年,到汉武帝时,为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这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大帝国里,哲学思想上,出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学说。文学上,出现了司马相如这位歌颂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气魄伟大的辞赋家。《史记》也正是符合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的史学巨著。《史记》的“十二本纪”,自黄帝至于汉武,犹如一道滔滔奔腾的长河,把三千年的历史贯通为一。它系统、完整,而又气魄博大,从天上到人间,几乎是无所不包。三千年的帝业,大汉王朝是当然的承继者;日月所照,人迹所至,大汉王朝是普天之下的中心。这就确定了汉朝是正统所在。这对于巩固大汉王朝的一统天下,对于加强人民的粘合力,意义十分重大。它符合汉武帝这位雄材大略的皇帝在政治上的需要。《史记》虽不是司马迁奉诏而修,但它仍然是为大汉王朝服务的。所以,《史记》的产生,其政治性十分明显。对于这样一部旷世巨著的产生,如果只从司马迁个人遭遇上去联系,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挂钩,那么,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有什么意义?

司马迁十分热爱大汉王朝,且看他对大汉王朝的赞颂:“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

---

① 《报任安书》。

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①因此,司马迁以写《史记》为己任。他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②又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由于对汉王朝的忠心和职业的责任感所驱使,司马迁做太史令后就开始了《史记》的编写工作。他自己说:父"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④遭祸之后,仍继续写《史记》。从他的《报任安书》看,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史记》基本完成了。一部《史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就是司马迁对大汉王朝极大的忠心的体现。

再论其孝:其父司马谈虽"掌天官不治民",但"司马氏世主天官",政治敏感性强。他看清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时代需要他来写一部反映汉王朝一统天下和建立以汉朝为正统的史书。只可惜未能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而"发愤且卒"。故将撰写这样一部史书的希望,寄托于司马迁。看司马谈弥留之际对司马迁的要求及司马迁的决心。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又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

①②③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于是司马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①]司马迁受父命写《史记》,又表现为极大的孝。受宫刑后,为完成《史记》不顾人们的"谤议",顽强地活了下来,不完成《史记》决不罢休,表现了极其坚强的毅力。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②]"文采表于后",正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大孝行。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总论·太史公事历》说:"史公触武帝怒,不敢引决自裁,甘下蚕室,遂编《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以就父之志,其情诚可悲也。"所以,《史记》的完成,体现了司马迁最大的忠和最大的孝。

司马迁由于忠而被刑,故其满腹悲愤,亦往往表现于《史记》之中。在《史记》中,他除借写人、叙事,抒发其悲愤外,还有对社会的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正因为《史记》有刺讥统治阶级之处,后世亦曾有人将《史记》称之为"谤书"。[③] 他们只看到《史记》中对统治阶级有所刺讥的东西,没有看到《史记》对维护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毕竟是一代英主,他看《史记》就看出了这个问题。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卷第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如果是"谤书",汉武帝一定要下令销毁其书和治司马迁的罪。汉武帝没有这样做,说明他并没有将《史记》视为"谤书"。他仅仅是对《孝景本纪》中的"景帝之短"和《孝武本纪》中自己之"过"不满,"怒而

---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报任安书》。

③ 《后汉书·蔡邕传》王允语。

削去之”而已，对《史记》全书，并没有否定。司马迁受宫刑，乃以后之事。《西京杂记》又说：“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司马迁受宫刑，和“帝怒而削去之”或许有点关系，但亦恐不是主要因素。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政策确有不满之处，《史记》是有所揭露的。但揭露归揭露。臣对君的忠，却是绝对的。因此，司马迁的忠与孝，是完全合乎儒家伦理规范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赞美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社会伦理，并认为此种伦理如敷扬，社会则长治久安，反之，则天下大乱。司马迁本人，亦是此种伦理的身体力行者，其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忠与孝这基本两伦。因此，《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忠与孝的产物。

（原载《河北学刊》1991 年第 2 期）

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

薄树人

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占有极其光荣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人们都公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一书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其实，这种影响涉及广泛的科学领域。比如说，从《史记》一书中反映，司马迁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等等。由于他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过于光辉，以至他在其他科学方面的成就都被掩盖起来了。然而，当我们深入地来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早期历史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把司马迁及其《史记》抛开一边不予置理。特别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贡献尤其是不可抹煞的。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功勋的，而且一直惠泽及今。

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 他指出，月食现象的发生存在着周期规律，并提出了现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交食周期数据。由此，中国得以发展起日月食预报的工作。

2. 他发现了五大行星运动中的逆行和留的规律，从而把关于行星运动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3. 他发起了西汉历史上第一次盛大的历法改革运动。虽然最后颁行的新历太初历并不是他制定的,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却为历法改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重要的有:(1)司马迁等人根据旧历的预报比天象落后的情况,把朔望和节气都向前推移一段时间,确定了新的历元,从而改进了旧历误差。(2)他们重新测定了冬至点的位置,而旧历则使用春秋末年的冬至点位置,到太初年间误差已达五度左右。(3)他们还测定了有关恒星和行星的基本数据。这些工作对确立太初历的进步性起了巨大的作用。

4. 他注意到了观测恒星的颜色。他的关于参宿四的颜色记载已引起了当代世界天文学家的惊奇,人们正在研究这个二千年前的信息究竟具有何种新鲜的天文学意义。

5. 他注意到了恒星亮度的问题,留下了一个星等概念的原始雏型。很可惜,他的工作没有被后人系统地深入下去,否则定会使中国天文学产生许多新的伟大成就。虽然如此,反过来,不也显出司马迁在天文学上的确有其不同寻常的眼光吗?

6. 他观测并记载了好几颗亮度有变化的变星,这个成就在世界古代天文学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7. 他的《史记》对天文学问题给了特别的关注,除了在各纪、表、传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的天文学史料外,还专门写了《历书》和《天官书》这两篇讨论天文学问题的文字。这两篇书开创了中国记传体史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从而使中国丰富的历代天文学资料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至今。仅此一端,司马迁就是天文学史上的一大功臣。

8. 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司马氏星官体系。虽然体系本身的建立者并不是他。但是,正由于他在《天官书》中的记述,这个体系才能为我们得知,而今天我们在研究重要的汉代天

象记录时就不能不依仗《天官书》的记载。

9. 他对古人所记的一些名称难解的异常天象作了具体的描述,由此后人得以明白这些名称究竟指的是什么天象。这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价值。其中特别描述了一种叫格泽星的天象。从具体的描述可以判断,这是一种天文学上叫做黄道光的现象。他的记述比西方天文学家的记述早了十多个世纪。

他的成就还可以列举许多。从中国天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史记》也是一座充满了稀世之珍的宝库。因此,我们就不必去做这种徒劳的穷尽工作了。我们只须强调一下,仅就上述九项成就而言,司马迁就完全有资格跻身于古代世界大天文学家的行列。

对于这样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天文学家,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思想无疑是有益的。而且,作为一个古代的史官,他是兼有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及祭司这三种身份的。因此,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创作也不能无视他的天文学思想。

比如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最后的立志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通古今之变",借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求出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性规律;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而所谓"究天人之际"者就是研究天和人间治乱兴亡之间的关系。从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就是研究天道观;而从天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则就是研究星占术(事实上,星占术总是有天道观作基础;而天道观也往往以星占术作手段,两者常常互为表里)。当然司马迁心目中的星占术,和方士、星占家的星占术是有很大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来论述。不过无论如何,从天象和地上人事变迁之间有没有某种神秘联系的问题来说,司马迁是采取承认态度的。把这种承认的具

体情况弄清楚，到底司马迁是怎么承认的，承认到什么程度，他有了这样的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无疑是有意义的。

大家知道，按照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观念，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帝王则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天通过天上的各种现象来警报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间将要发生某种军国大事，某地、某诸侯国将降临何等吉凶祸福。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观念中，认为天上的现象和地上人间的现象是相应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无不重视星占术的思想原由，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必须重视天文学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不过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的司马迁，他的思想当然不可能摆脱星占术的影响。他在《史记・天官书》里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这里所谓的五家，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代，即夏、商、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历了五帝三代，弄清了天上和地上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又说："为国者必贵三五。"（《天官书》）所谓三，指日、月、星三光。所谓五，指日晕、月晕、适（一种与太阳有关的自然现象）、云、风这五种"天之客气"（按：我们这里所解的三、五与司马贞索隐所解不同。详见附说一）。司马迁认为，这三、五"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天官书》）。由此可见，"必贵三五"也就是必须重视星占术的意思。

司马迁认为天上和地上确实是有相应关系的。他说："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这是从理论上

找到天上和地上对应关系的“基础”或“依据”。正因“存在”着这种对应的“基础”或“依据”,五帝三代才会“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正因为他相信这种对应关系,他就去从历史记录上查找实际发生的相应事例。他举出“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直到太初年间“星茀招摇”等的天象,每次天象之后又提出相应的军国大事。于是,他概括道:“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可见,司马迁是笃信星占术的。

虽然当时的统治思想认为天上的现象和地上的人事有关,但却又认为这种具体的相应关系是十分神秘,而不是一般人所能掌握的。这种神秘的相应关系称之为“天数”,只有极少人能懂得“天数”。司马迁开列了一份自古以来能“传天数”的人的名单,开头两位就是他自称的祖先重、黎,以下是唐虞时代的羲、和,等等。名单一直排到战国时代的石申。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星占家。司马迁很以自己是黎、羲、和的后代而自豪。种种迹象表明,他不仅相信天象和人事有相应关系,而且力图继承他的家族传统,进行认真的探讨,以掌握天人相应的具体关系,即所谓的“天数”。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的具体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翻开他的《天官书》,我们看到的是通篇的星占术词语。

存在决定意识。司马迁是天文官世家的子弟,星占术的观念渗透了他列代祖先的思想。他本人又是汉王朝的最高天文官——太史令。他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天象,以揣测所谓天的意向,以便为汉王朝的最高统治利益服务。像他这样的阶级地位,又处在星占术思想充斥社会的汉王朝,他本人之相信星占术是不足为怪,很自然的。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在这看来很自然的逻辑中却蕴藏着令人惊奇的矛盾。司马迁虽然笃信星占术,然而却并不受星占术的束缚。其实,古今中外一切信奉宗教的科学家都是并不受宗教束缚的。这是因为他们在研究各种具体科学问题的时候,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客观的事实上去了。研究事实,从事实中引出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这才能使他们完成或大或小的科学发现。伟大的哥白尼、牛顿等都是这样,司马迁也是这样。尊重事实,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现象,这是一个科学家取得成就的基本出发点,尽管许多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自觉或并不十分自觉。而一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或多或少地离开了他们原来笃信的宗教教条。对于司马迁来说事情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客观现象和唯心的星占术有明显的矛盾时,他并不怀疑客观现象的实在性,而宁可对星占术作出局部的否定。司马迁是怎么局部地冲破或否定星占术的呢?

1. 星占家所提出的天人相应的五花八门的具体条文,或者纯出臆造,或者根据偶然的附会。因此,当有关这种条文的天象重复出现之下,这些臆造的或附会的人事相应关系常常并不可能重复。这时,一些牢守星占术思想的星占家就会设法增添新的附会、臆说来维护原来星占术条文的神圣性。而尊重客观事实的天文学家则相反,他们就会至少局部地怀疑原来的星占术。

司马迁就是这样。由于他作为皇家天文学家和皇家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他掌握了大量的历代天象记录和人事史料。他从中觉察到过去许多星占术条文是靠不住的。他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机祥不法。""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

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①]。幽、厉以往的星占术固然是不得法,战国时代的皋、唐、甘、石更是占起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来了。太史公的笔下对这些星占术明显流露出一派蔑视之情。而皋、唐、甘、石都还是司马迁所赞誉为"传天数"的人呢!可见,司马迁并不把过去的星占术条文看作是神圣不可改易的。

司马迁在这里批评的当然并不是星占术的整个思想体系,而只是批评星占家不讲"原则","以合时应"、"因时务论其书传"。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批评这些人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说法,投合时好,没个准谱。事实上,星占术的天人相应关系本来就是偶然凑合、附会出来的。要使星占术保持灵验,星占家就不得不采取朝三暮四的手法。比如说,发生月食,星占家认为是危害女主。可是随着天文观测的发达,人们注意到过不久就可以看到月食,而每次都不一定凑巧女主也出事。老不出事,星占家就得另编其他说词。例如,把月亮比作将相(日是阳,月是阴;君是阳,女主是阴,将相相对于君来说也是阴)。月食就是将相要倒霉。将相数量就比女主多多了,"灵验"的机会就大得多。米盐之类是全国到处都离不了的。占到米盐上去,米盐贵了、贱了,产量多了、少了,如此等。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总是会有地方发生异常情况的,这样一来星占家就万无一失了。可是,这样的星占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固然觉得荒唐可笑;而真正相信天人之间存在神秘对应关系的人也会觉得太不严肃,迹近胡闹。司马迁对这些人的行为加以讽嘲,即是为此。

尽管司马迁本人并不是想根本否定星占术,但是他的讽嘲无

---

① 《天官书》。

疑降低了星占家“通天”的“崇高”形象。与此同时，他们的“天数”的神圣性也自然发生了问题。因此，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往否定星占术的方向所走的第一步。

2. 尽管司马迁承认天人相应，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他却相信人的力量。在司马迁看来，人间的吉凶祸福主要还是由人们自己的行为所决定，天变只是上天对地上政治情况所作出的一个反应和预警。而上天发出警告之后也并不是说一切都必然如何如何而不能丝毫更改了。

比如说，他认为决定一个国君命运的是他的力量的强弱和德行的厚寡。他说：“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①这个思想里面毫不强调天的意志，而只是强调国君自己的行为。因此，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君来说，“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②。所谓“修救”，就是在天变发生后根据上天所警告之点采取救急措施，以消除灾祸根源。所谓“修禳”，则是在天变发生之后举行各种祈祷解禳的宗教仪式，以求上天回心转意，收回它的警告。这种“修禳”，当然是在承认天对国君命运有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司马迁并没有彻底否定天的作用。但是有意思的却是他把“修禳”放在四种应付天变的办法中的最末一种，而把事先调整国君自己的行为，即“修德”和“修政”放在第一、第二位，把临遇事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即“修救”放在虽然是第三位却仍然在“修禳”之前。这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对于国君的命运来说，他自己的行为比天的意志的作用要大得多。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司马迁实际上是否定了天意的作用。试想，如果人的作用竟然盖过了天，那么还谈得上有什么天的至

①② 《天官书》。

高无上呢? 在人力大于天的前题下,即使还承认有天意,那只能说是在传统束缚下的一种不彻底性而已。

因此,在我们看来,司马迁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如七国兴亡、楚汉相争之类,虽然也用过不少天命之类的词句,然而却并不能就此认定司马迁真是把这些大事的原因主要地都归结为天意了。要是他真是这么归结的话,他又怎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呢? 事实上,司马迁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作了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不管这些总结作得对还是不对,天意,天命决定论之类和他都是根本不能相比的。这种种纯属人间的经验总结才是司马迁最本质的东西。

3. 按照星占术的观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学规律不合的天象就叫做“变”。凡是“变”,就是天的警告,就属于占的范畴。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就不可能认识旧的天文学规律的谬误或粗疏,当然也就不可能去修正和发展陈旧的天文规律,更不可能去探讨或寻求新的规律了。

然而司马迁并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五星逆行规律的发现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人们早在司马迁之前许多年就已观察到行星有逆行的现象。但是过去一直把只有顺行的粗疏规律当作根本的规律,而把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的一切留(行星在恒星背景上从西向东运动叫做顺行;有时候也会从东向西运动,这就叫逆行。在改变运动方向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看上去好像不动似的,这就叫留)、逆现象都划入变的范畴,订立了名目繁多的星占条文。星占术使人们在五大行星的留、逆问题上陷入了迷误至少达二三百年之久。只有到了司马迁的时候,他从汉王朝的皇家天文台所进行的一百多年的行星运动观测记录中发现,五大行星的留、逆都不是稀见的现象,由此他并不顾以往星占术的规

定，而是对天文实测记录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终于总结出包括留、逆在内的五星运动的全面的较正确的规律，把中国的五星运动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与发现行星留、逆规律的情况相仿的是他提出月食周期的事。月亮在古代星占家看来是女主之家。月食是上天警告女主将发生某种灾祸，等等。然而通过对长期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月食现象是有周期性的，但是，在作这样的总结分析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已不再把月食看成是无法预测的“上天警告”了。司马迁就借用《诗经》里面的语言明确地说：“月蚀，常也。”

一般来说，当发现和旧的天文学规律不合的现象时并不断然把它归之于偶然的、无自然规律可言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的启发下，意识到它是合于自然规律，从而努力寻找出新的天文学规律或对旧的天文学规律作出修订，这是古代天文学摆脱星占神学的束缚而发展的一条比较普遍的途径。而能够这样做的天文学家，也至少局部地冲破否定了星占术，并由此取得他的科学成果。司马迁就是一个典型。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司马迁对历法问题的看法。历法和星占是历代皇家天文学的最重要的两项任务。对历法问题的看法是古代天文学家思想观念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司马迁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他当然很清楚历法对国家、对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历法工作做得好，其结果是，“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或者是“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①。而当历法混乱之时，则结果是：“祸菑荐至，莫尽其气。”②

①② 《历书》。

司马迁的这些说法中虽然讲到神,对历法的作用的描述也过于夸张,但是其总的精神却应该说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大家知道,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而农业是季节性特强的生产部门,因此,它对历法的依赖性很强。历法搞得好,季节预报得准确,当然会有助于农业获得丰收。反之,如果历法错谬,季节混乱,那就要破坏农业生产,这时,整个社会都要遭殃。这些都是古代农业社会只能靠天吃饭的一个结果。司马迁所说正是这种靠天吃饭状态的反映。

中国古代长期使用阴阳历。季节在这种历法中呈现很复杂的规律。它很难为广大人民、绝大多数的部落首领及国家官吏所掌握。只有极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天文学家才能掌握它,而这些天文学家乃是由最高统治者所任命,并为他服务的。一个能领导这些天文学家的统治者,手里掌握着颁布历法的大权,也因此控制了社会的一条命脉。正因为这个缘故,历法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并成了统治权的一个标志:奉行谁颁行的正朔,也就是承认在谁的统治之下。甚至传说尧、舜先后向舜、禹移交权力的时候都要向舜、禹宣布"天之历数在尔躬",[①]意思是说,上天所赐的历法归你掌握了(见附说二)。所以,司马迁会说:"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②]他的说法大体上是反映了历史真实的。

不过,司马迁也有过历法与天命有关之类的话,即所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③]这套说法本起于战国时代的五德终始说和其后的三统循环说。发明这些政治神学的目的是藉助于神权来巩固王权。这些学

①②③ 《历书》。

说在汉武帝时代有很大泛滥。流风所及,司马迁也受其影响。当然,像他那样的阶级地位,思想上又并未彻底摒弃天人相应的观念,所以,他之接受历法与天命有关的观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司马迁说过那样的话,但在实际上司马迁提出历法改革时所申述的理由却并不是因了“易姓受命”,而是确实因为当时的历法——秦颛顼历的误差已经非常显著:“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司马迁等人上书改历时说的正是:“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他们在改历过程中也的确为纠正旧历的误差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历法和天命有关的说法并不代表司马迁的主导思想。

这次历法改革的最终结果,并没有采用司马迁等提出的历法,却用的是邓平、落下闳等人搞的八十一分律历。这个历法虽然也有优点(其中大部分与司马迁等人的工作有关),但它把天文数据和音律联系起来,添加了人为的神秘因素。对此,司马迁是不赞成的。

本来,他和以往的许多天文学家一样,相信音律和历法有某种关系。这种信念的建立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 音律有十二律,一年也有十二个月,数目相同,人们可以把二者作出对应。

2. 和谐美妙的音乐使人精神愉快。在充满迷信的古代,人们由于这种愉快会产生一种和天地自然融合和谐的神秘感觉。优良的历法正确地指示季节,也会使人获得和自然协调和谐的感觉。

3. 对于管乐器来说,只要口径一致,每种音调的管子长度也是有一定的。这样,可以从音律获得一种标准尺度。历法推算也离不开量度。这也会使古人有律可生历的错觉。

虽然司马迁认为音律和历法有关系,但他似乎只限于把十二

律和十二月相对应。《律书》中就给出了他所定的对应关系。按颛顼历的次序,从十月开始,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九月,每月对应的音律为应钟、黄钟、大吕……南吕、无射。从所排月名序来看,这篇《律书》应该是改历之前写成的作品。

太初改历的结果是汉武帝下诏命司马迁行用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司马迁本是太史令,是改历班子里的重要人物,选择一个好的历法本是他的职责。然而实际情况是皇帝亲自下诏命令他使用某个历法。这只能说明他本人是反对这个历法的。而皇帝则喜欢它,因而只能亲自出面来压他接受。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司马迁是无法违抗皇帝意志的。历法虽然颁行了,司马迁仍然反对它。他在他的《历书》里只字不提太初历这部历法,甚至不提邓平的名字。相反,他所列出的 76 年间每年冬至及十一月合朔的大小余表,都是按四分历的数据来推算的。

司马迁为什么反对邓平的历法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反对太初历因迎合帝王政治需要而歪曲客观规律、篡改天文数据的做法。八十一分律历为了使自己的数据具有神秘的性质,因而将四分历的朔望月长 $29\frac{499}{940}$日改为 $29\frac{43}{81}$日,余数部分的分母为 81。邓平等声称 81 是黄钟律管 9 寸长的自乘,这一来这个天文数据就有了神秘性。由此算出的回归年长度为 $365\frac{385}{1539}$日,其 1539 也可以凑出某种神秘意义。仿此,八十一分律历的主要天文数据都可以生硬地编造出各种神秘的意义。这样,八十一分律历就显得何等奥秘神妙。而颁行这种历法的帝王当然也就更具有天赋神性了。然而,从天文科学来讲,这些神秘的朔望月、回归年数据却比原来四分历的数据误差要大。作为一个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

家,司马迁是不能接受这种生凑出来的“神妙”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录了他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之要指》。其中有一段说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司马迁当然赞成他父亲的思想的。事实上,司马谈的这个思想和司马迁本人对皋、唐、甘、石批评说“其占验凌杂米盐”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反对过度的穿凿附会。因为他们都能觉察到那些过度的穿凿附会之事往往是未必然的。显然,把当时人们认为的十二律和十二月的简单对应关系,甚或因音律管子可作为量度标准而产生的律可以生历的错觉,扩展成为历法的数据来自音律的某种意义神秘的数学运算的结果,这无疑正是一种过度的穿凿附会。而这样搞出来的数据又不如司马迁所相信的四分历,因此,司马迁自然也会认为它们也是“未必然也”的。从这一点来说,司马迁对八十一分法的拒绝是正确的。

当然,要从全面来看,邓平、落下闳的太初历与司马迁的主张相比也还不是没有优点的。优点主要有二:1. 太初历定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的置闰原则,使每个中气都能保持在固定的月份里。司马迁在实践上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全无资料。不过在《历书》里他是赞美过先王的制历原则,其中有一条叫“归余于终”。这一条的意思就是把闰月放在年末,例如,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它的闰月就放在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如果闰月在年末,则就有可能这一年中有若干中气不在其月。这条原则当然是比“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的原则要来得落后。2. 司马迁等人重新测定了历元,以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为元,由此改善了旧历的误差,这是进步的。但他们却把这一年的年名改为焉逢摄提格,即甲寅年。而实际上按从前的纪年法延续下来,这一

年应是丙子年。两者中间隔了37个年头,从而使纪年突然中断。在处理各种历史和科学问题时一向注重实际的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却破天荒地采取了不实事求是的神秘化的原则。也许在司马迁看来,一次年名中断,只是在上推往古的时候稍为麻烦一点而已;而对下推将来是毫无关系的。不过司马迁没有想到,如果他的原则在后世改历时也照样搬用,则太岁纪年也好,干支纪年也好,完全失去了规则的连续性。除非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历法是永世不变的。不管司马迁怎么想的,中断纪年的连续性总是一件错误的事。太初历的作者就把这一点改正了过来,仍然把这一年定为丙子年。对此,我们当然只能肯定邓平、落下闳而批评司马迁。

总之,司马迁关于历法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也必须承认,他也有缺点。

除了星占术和历法以外,司马迁在其他天文学理论方面,诸如宇宙结构、宇宙起源等问题上几乎都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天官书》、《历书》都只是处理太史令职责所关的知识。而那些天文学理论问题却并非是太史令执行任务时所必需的。

不过,我们似乎也不能断言他对天文学的理论问题一无兴趣。《天官书》里曾偶然出现有两句关于恒星及银河的本质的议论。他说:"星者,金之散气。本曰火。""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可见,司马迁也还是注意到理论的。

这两条议论很有点趣味:(1)他把银河看成是和恒星一样的东西:"金之散气"。现在我们知道,明亮的银河主要是由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巨大的天体系统。司马迁的议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与实际有所巧合。(2)人目所见的恒星都是自己发光的炽热

气体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比之为一团火。司马迁所说"本曰火"的话也有所巧合。

两千年前的古人就能提出与用近代科学才查明的事实相巧合的猜测,这当然很有意思。但我们要强调一下,这只是巧合,而且只是一定意义下的巧合。因为司马迁是在古代五行理论指导下提出这些说法的,它们并不是某种科学的概念,也不是基于科学观测和理论上的科学观测和理论上的科学预言,更不可能有什么神秘的天外来客向司马迁传授当时人间还不可能有的关于恒星和银河的科学知识。例如,他把银河之本看作是水,这就是他从银河之名而联想出来的,它在科学上就毫无巧合可言。虽然如此,这终究还是一个有趣的猜测。

小 结

上面我们概括地介绍了司马迁在星占术和历法两方面的一些主要观点。司马迁一方面承认天人之间有神秘的相应关系,他要研究这个"天人之际"。他承认星占术的原则,但他却讽嘲以往星占家的许多具体细说。他认为天所警告于人的不是米盐琐事,而是涉及千千万万人命运的军国大事。他认为人间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自己的行为,天的警告只是就人行为的后果所作出的预告,人接到警告后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他还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他还认为过去所谓的警告,实际上有许多并不是警告,而只是人们没有掌握正确的规律而已。他本人就从这些超出旧规律的天文观测中总结出了好几条重要的新的天文学规律。

司马迁深刻理解在只能靠天吃饭的古代社会里历法对生产、对社会的巨大意义。他的叙述也使我们得以明白历法为什么会

成为古代统治权的标志。司马迁并未能摆脱历法和天有关的思想,而且在个别问题上他也有保守的观点,但他从事了大量实际工作,为历法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天并不是一个支配的力量,而他对天体的实际运动则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承认他是唯物主义的,但也不能不充分肯定他有浓重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在某些问题上应该说他的思想是异常光辉的。

附说一:"为国者必贵三五"

这一句,过去按司马贞索隐,解"三"为天运三十岁一小变,"五"为五百岁一大变,因而"三五"就是一种天运的长周期变化。我们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有问题。这种"天运"的长周期变化,对于当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也许是很有兴趣的;而对于诸侯、帝王这样的"为国者"来说却并无"贵"它的必要。最多,处在"变天运"时期的为国者中的部分人可能会考虑考虑这个周期,自己最好识时务;而对于不在"变天运"时期的为国者,这个周期有什么注意的必要?就是对处在"变天运"时期的"为国者",大部分人也是不识时务,不去考虑这种周期的。这样,又怎么谈得上"必贵三五"呢?

事实上,《天官书》末段提到:"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这里的三指日月星,五指五种"天之客气",而且指明,"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可

见这“三五”只能是八种(3 +5)天象。“为天数”的星占家要通它,“为国者”也要贵它,因为它们“最近天人之符”。

另外,就在“为国者必贵三五”之后,司马迁接着就写道:“上下各千岁而天人之际续备。”并列出春秋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天象来说明之。这些也说明,司马迁固然提到“天运”有长周期变化,但他更注重的是重大的天象和人事变化。只有积累了长期的资料,才能弄清“天人之际”。

因此,我们认为“为国者必贵三五”的“三五”不是指天运变化,而是指具体的三光五气这八种天象的变化以及它们所预示的人事上的重大变动。

附说二:“天之历数在尔躬”

过去人们把这句话中的“历数”解作天道,即是指“历运之数”。有的更进一步推论成为“五行”。我们觉得这么解也有点困难。说五行次序轮在某个人身上,这简直难以想象。说:“天道”,说“历运之数”,好像还说得通,但要注意,这一“天之历数在尔躬”的话也是写在《历书》里面的,而《历书》则主要讨论“历法”而不是天道和历运。而且就在这一段的前面,讲到三苗服九黎之德,南正、火正二职废了之后造成“历数失序”。这一段更是明白地讲历法问题,而不可能解历数为“天道”或“历运之数”。因此,我们认为“天之历数在尔躬”一句中的“历数”也以解作历法为好。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

浅探司马迁在中国民族史上的作用和贡献

阎崇东

伟大的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奠基者。同样,他也为中国民族史的创立和发展起了巨大的催生和促进作用,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通过自己确切的和有联系的记载,为我们最终树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观念;他首创民族史传,一反前代狭隘的偏见和传统的看法,专门给周边各族立传,为后世研究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以至研究东亚、南亚以及西亚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创造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他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的思想,超越了当时的统治思想和旧有观念,其中还表露出许多独特而非凡的看法,并成为今天各民族认可的原则和大团结的基础;他广泛地搜集了民族史方面的有关资料,并加以系统和科学的整理,成为人们研究民族史必备的重要文献。总之,司马迁在民族史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中国古代任何史家无法比拟的。

一 中华民族统一观念的确立

《史记》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而五帝中的头一帝,便是"黄帝"。司马迁根据他所看到的资料和收集到的各

种传闻,“学者多称五帝”,“百家言黄帝”①,又依靠自己“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②的实地考查和寻访,得出了“其所表见皆不虚”③的结论。所以作者“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④。因此,人们可以说,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把黄帝列为第一号人物是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选择的。因为黄帝以前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尚矣”,“其文不雅驯⑤,时间太久远,不足以取信。而黄帝正是司马迁所记载的最早而确有所据的人物,他不是虚幻缥渺的神仙鬼怪,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描述了黄帝使人喜爱的性格和许多优秀的品德。他笔下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他能够“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他是个天才,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幸福。不仅如此,黄帝还有“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扶万民,度四方”⑥的统帅军队,治理天下的能力。他率领拥戴他的各个部落,在阪泉之野击败了“侵陵诸侯”⑦的炎帝,在涿鹿之野诛灭了暴虐作乱的蚩尤。从而平定了九州,代神农氏为天子。黄帝设置了官府,排定了官吏,重新整顿部署了军队,抚恤天下百姓大众,使四海大治,万国和顺。因此,黄帝也就自然地成了当时人们崇敬的领袖、大帝。

黄帝之后,司马迁又记述了他的子孙一代接一代继续治理天下的情况。颛顼、帝喾、尧、舜、禹,以及禹之后的夏、商、周三代,一直到秦,绵延不断。司马迁认为,包括吴、越和其周边地区的部

---

①②③④⑤⑥⑦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中华书局 1982 年 11 月版。

族或民族,如匈奴、西南夷、南越、东越、朝鲜等,他们的诞生和繁衍,都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司马迁所记载的关于黄帝及其后代的延续情况,关于炎帝、黄帝的历史对于形成华夏民族的影响,以及轩辕,轩辕氏、土德之瑞等描述,再加上中国原本的黄土地、黄河、黄皮肤等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特色,才使得中华各民族最终形成了"炎黄子孙"的概念。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夏代"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①]的传业;载述了商汤"改正朔,易服色","诸侯毕服","平定海内"[②]的功绩;歌颂了周王朝"改法度","分封诸侯","作周官,兴正礼乐"[③]的成就;批判地褒扬了秦"卒并天下","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④]客观地记述了汉朝"承敝易变","得天统","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⑤],使中国达到了从来未曾有过的强盛统一局面。司马迁热烈地颂扬了夏、商、周,特别是秦、汉的统一及其成就,这就更加有力地增强了这种民族国家统一的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了它不可撼动的潜在作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间,神州大地虽时合时分,但始终是统一的时间长,占据主动;分裂的时间短,处于被动和不得已,即使在分裂时期,广大各族人民也始终向往着统一。这种历史现象的形成,当然有它的各种因素在起着作用,而《史记》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具有共同祖先

① 《史记·夏本纪》。
② 《史记·殷本纪》。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⑤ 《史记·高祖本纪》。

这一观念,以及后来确立的"中华民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一思想,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

二 《史记》首创民族史传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发展、互相融合的历史。在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正统的儒家思想一再宣扬"夷夏之辨"。当时人们的民族思想主要表现为"尊夏贱夷",认为华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高于夷狄,有《诗》、《书》、《礼》、《乐》和法度等高度文明,而夷狄散居蛮荒,无任何文明可言。因此称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而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蛮、戎、狄四裔之邦,并以此来区分种族的贵贱尊疏。所以也就出现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①的态度和主张。孔子在修《春秋》时,就把"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②作为主导思想之一。而"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③经孟子诠释后,成了历代统治者统治压迫四裔各民族的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的把各民族分为大小不同的等级思想,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思想的加强,和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民族偏见日益严重,大汉族主义逐渐形成。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史记》诞生了。司马迁以其卓绝的见识,开创了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体例。他用自己的如椽之笔,写下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

---

① 《左传·闵公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8 月版。

②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中华书局 1980 年 10 月版。

③ 袁梅:《诗经评注·鲁颂·閟宫》,齐鲁书社 1982 年 6 月版。

传》、《西南夷列传》等传目,详细地记载了东、南、西、北周围相邻民族的历史,并且跨出了当时汉王朝统治的区域,写下了《大宛列传》,记述了中国以外的西域其他各国的历史。撰写这些列传的动机和思想本身,说明司马迁早已冲决了当时那种狭隘的统治思想的束缚,他的民族观在当时确实是超人的,超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司马迁写下了这些民族史传,为中国民族史的建立,起了一个开拓性的作用。

三 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融合

司马迁将自己写作列传的宗旨定为“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①。而他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也写入列传,说明在作者的思想中,它们同那些将相、贵戚、有名之士一样,是和汉朝不可分割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作者不仅把它们各自列入专传,而且没有将其视为细枝末节,一概罗列于全书之后,而是合理地安排在列传其中。司马迁将《匈奴列传》放在《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既说明了匈奴与几位将军有密切的关系,也说明司马迁对汉匈关系的重视。作者将《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放在《平津侯主父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之间,《大宛列传》也位于司马迁感情上很投入的《游侠列传》之前。这最起码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歧视这些周边民族,也是后来的史家及其作品(比如《史记》以后的二十五部正史)始料不及和无法比拟的。

通观司马迁的这些民族史传,我们会发现其内容并没有截然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夏是夏，夷是夷，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感觉。而更多的给人以“夏可以变夷，夷亦可以变夏”，他们之间从来都是杂处、融合在一起的印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些记载：

>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二人乃奔荆蛮。[①]
>
>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②]
>
>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③]
>
>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④]
>
>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⑤]
>
>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⑥]
>
>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⑦]

从以上看出，司马迁笔下的这些周边民族的祖先或部族首领，他们都来自于华夏，很早就从内地或因分封或私奔定居于这些地方，并同当地的人民同俗相处，最终取得了先祖或首领的地位。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有人认为以上记载完全是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指导的结果，事实上没有这种可能。笔者认为，

---

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③ 《史记·楚世家》。
④ 《史记·匈奴列传》。
⑤ 《史记·南越列传》。
⑥ 《史记·东越列传》。
⑦ 《史记·朝鲜列传》。

如果说中国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祖先都来自于华夏、中原,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司马迁写史是很注重根据的。这些记载或来自于前人留下的史籍,或来自他亲身的访查,起码也应该说是司马迁的一种看法或一种学术观点,其二,我们不能把当时司马迁所记载的周边各地,如东越、南越、西南夷等,就认为它那里相应的一定有个什么民族存在。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是它特定的生活地域、人种、宗教、风俗习惯等种种因素积累而成的,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原华夏族先人发展定居到那里,成为这个地区的首领,或最终成为这个民族的始祖,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而有的可能自始至终就是中原民族的一个分支。

上述所举是一些《史记》中反映出的"由夏变夷"的例子。同样的,司马迁也记述了不少"由夷变夏"的情况:

"禹兴于西羌"[1],而其后来成为夏后氏之祖。

秦的先祖大费,"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2]。而在春秋时,秦国"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

这个长时间居处于戎狄之地的秦,究竟是华夏族还是戎狄族,不容易说清楚。

> 公刘虽在戎狄,重修后稷之业。[3]
>
>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4]

---

①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史记·周本纪》。

④ 《史记·匈奴列传》。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1]

可以看出,以上这些记述所反映出的思想,跟汉以前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很不相同,而这些事例,正说明了夏可变夷,夷亦可变夏,夷夏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这充分说明在司马迁的头脑中具有民族平等、民族之间互相融合的思想。尽管当时司马迁头脑中还没有汉族、少数民族这些概念,平等的含义也不可能和我们现代人的理解等同,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出的夷狄与夏的关系,却是融为一家的兄弟关系。所谓"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2],正说明了这一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述了许多汉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匈奴等民族发生战争的情况,但他并不是主张战争、支持侵略的。司马迁既反对其他民族对汉朝的侵扰,亦反对汉朝对这些民族和地区用兵。

司马迁反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对汉朝的侵扰,这可以从《史记》的行文中直接看出。例如,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写道: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

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众,遂至彭阳。

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

周边民族侵扰汉王朝造成了广大人民的痛苦,司马迁自然是反

① 《史记·田儋列传》。

② 《史记·吴太伯世家》。

对的。

同样,司马迁也反对汉王朝对周边各民族发动的战争。因为涉及避讳汉朝统治者的问题,所以在《史记》有关的篇目中不易看出司马迁的这种态度。但我们可以通过互见法,在其他传目中,特别是在《平准书》中了解到司马迁的真实思想:

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军,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以上是记述汉匈战争的。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用兵,也表达了作者同样的态度。

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①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

① 《史记·平准书》。

蜀,巴蜀之民罢矣。[①]

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②]

以上都说明了,无论是周边民族侵扰汉朝的战争,还是汉朝对周边地区或民族发动的战争,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两败俱伤,而最遭殃的是广大人民和士兵。既如此,司马迁是反对这些战争的,当然也就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史记》中的一些记载,发现司马迁思想中的一些非凡和闪光之处。司马迁认为,匈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③]。这说明自古以来,河南地(指今陕西、山西北部一带)就是匈奴先人活动的地区。但"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④]。接着,《史记》还记述了匈奴强大以后的情况,"冒顿既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⑤]。将以上记载联系起来看,这里明明是说,河南地原本属于匈奴,秦收河南地,是对匈奴的侵略,而今汉攻占河南地,当然也属于不义之战,因而匈奴也是有权利进行"夺"的。《史记》中还记有下面一些文字:"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⑥]又云:"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劳其苦,而

①②③ 《史记·平准书》。
④⑤⑥ 《史记·匈奴列传》。

干戈日滋。”[①]这里又是说明,本来当时汉匈已订立和亲盟约,而这次却由于汉朝设谋马邑,所以又导发了一场新的汉匈战争,责任是在汉朝一方。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道:“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②]这又说明司马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他认为,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民,他们之间始终是愿意和平相处、互相交往的,只有统治者才热衷于侵略和战争。以上的记述,不断地反映出司马迁在民族问题上认识的非凡之处。作为一个史官,既表明他忠实于史实,不偏不向任何一个民族,也表明了他无论是对汉王朝,还是对周边各族,都有一个基本平等相待的态度。

四　为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任何专门史的研究,都需要文献资料作为基础,否则它就成为空中楼阁。而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奠定了文献基础。

《史记》的诞生,为我们展示了以中原汉族为中心,周围环绕着各民族的宏大的画面。司马迁撰写的民族史传基本上包罗了汉朝周围的各地区和各民族。除此之外,《史记》中的《五帝本纪》、《秦本纪》、《六国年表》、《平准书》、《吴太伯世家》、《燕召公世家》、《楚世家》、《越王句践世家》、《蒙恬列传》、《吴王濞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淮南衡山列传》、《货殖列传》等,很多篇幅都涉及了民族史方面的内容。

司马迁在写这些有关民族史的篇目时,尽可能地探究各民族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匈奴列传》。

的起源，交待各民族发展的线索，比较明确地指出了各民族活动的范围、地形地貌、民情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汉族与各周边民族的交往等，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详实的材料。例如，司马迁这样写道：

>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①]

这一段将匈奴的先祖，族系的演化，地理位置，文化及社会组织状况，民情习俗等，都介绍在其内了。

再如，东瓯王“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②] 这里又把东越与汉朝的关系进行了介绍，特别是东瓯杀吴王刘濞于丹徒一事史料价值更高，使东越与汉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又如，

>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史记·东越列传》。

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①]

这里又反映了西域的一些国家的情况,说明西域一带的小国很多,虽距中原遥远,但却很早就和汉朝有了一定的交流和往来,使我们认识了西域地区的各民族。

《史记》以前的一些史籍,有的虽然也记载了一些民族史方面的有关情况,然而这些作者多是不自觉的,因而反映在作品中的都是一些零散的只言片语。而司马迁根据自己调查访问所得,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它们整理在一起,系统地将他所了解的各个民族从它们出现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情况给予了尽可能翔实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仅是中国的民族史研究,就是包括日本、朝鲜、蒙古、缅甸、越南等外国民族史的研究,也都须借助《史记》的记载。因而我们说,《史记》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学习和研究中国民族史离不开《史记》。

(原载《内蒙古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 年第 3 期)

① 《史记·大宛列传》。